

白宫岁月

——基辛格回忆录

白宫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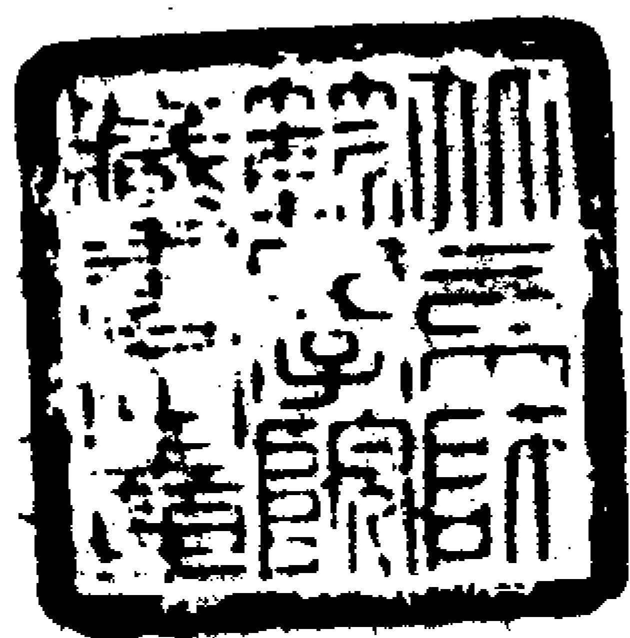
——基辛格回忆录

第二册

〔美〕亨利·基辛格 著

吴继淦　张　维　李朝增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Limited, 1979
根据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一九七九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孙 政

白宫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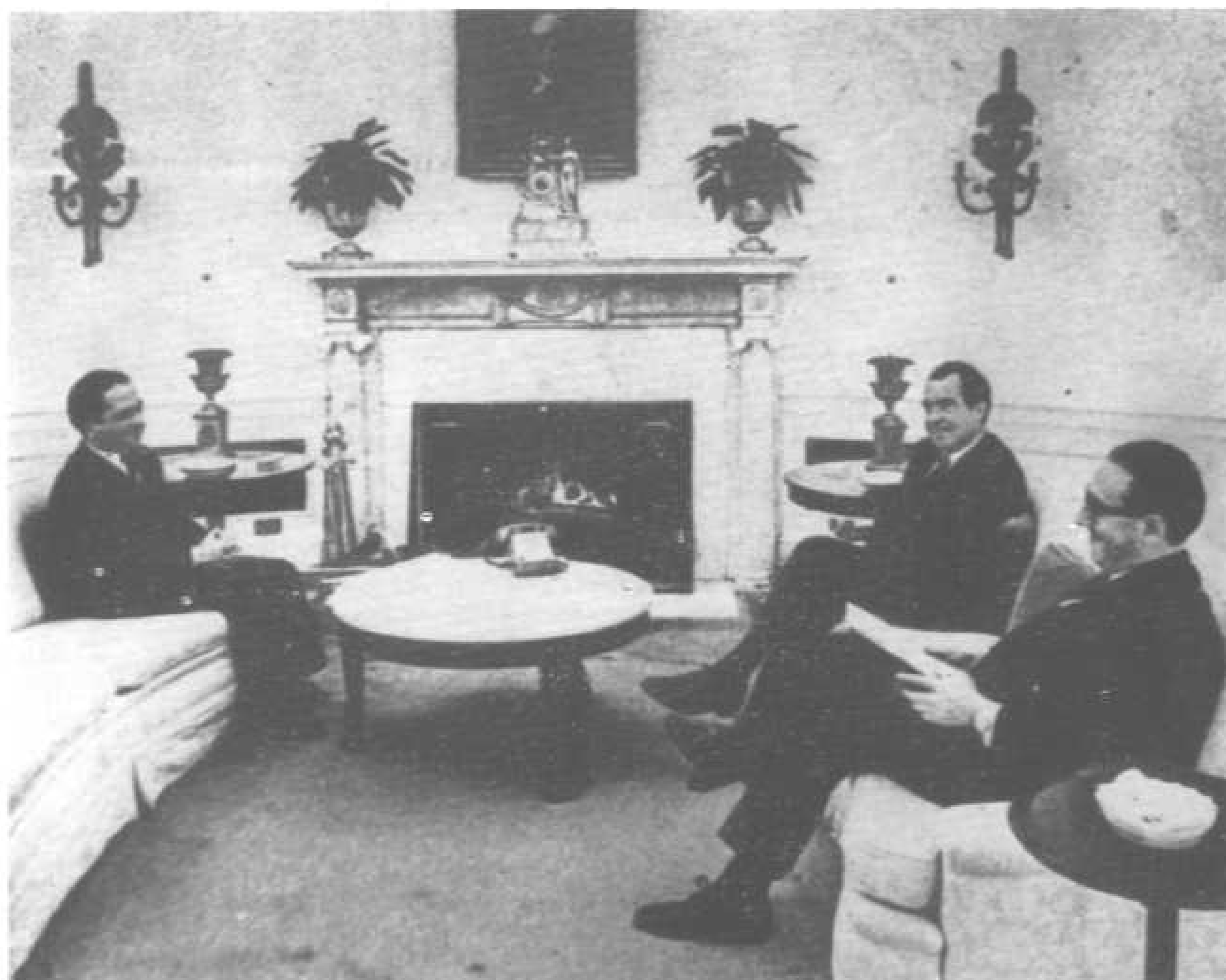
——基辛格回忆录

第二册

〔美〕亨利·基辛格 著
吴继淦 张 维 李朝增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展览路24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12.5 插页：4 字数：300,000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书号：3003·1613 定价：1.35元



约旦国王侯赛因访问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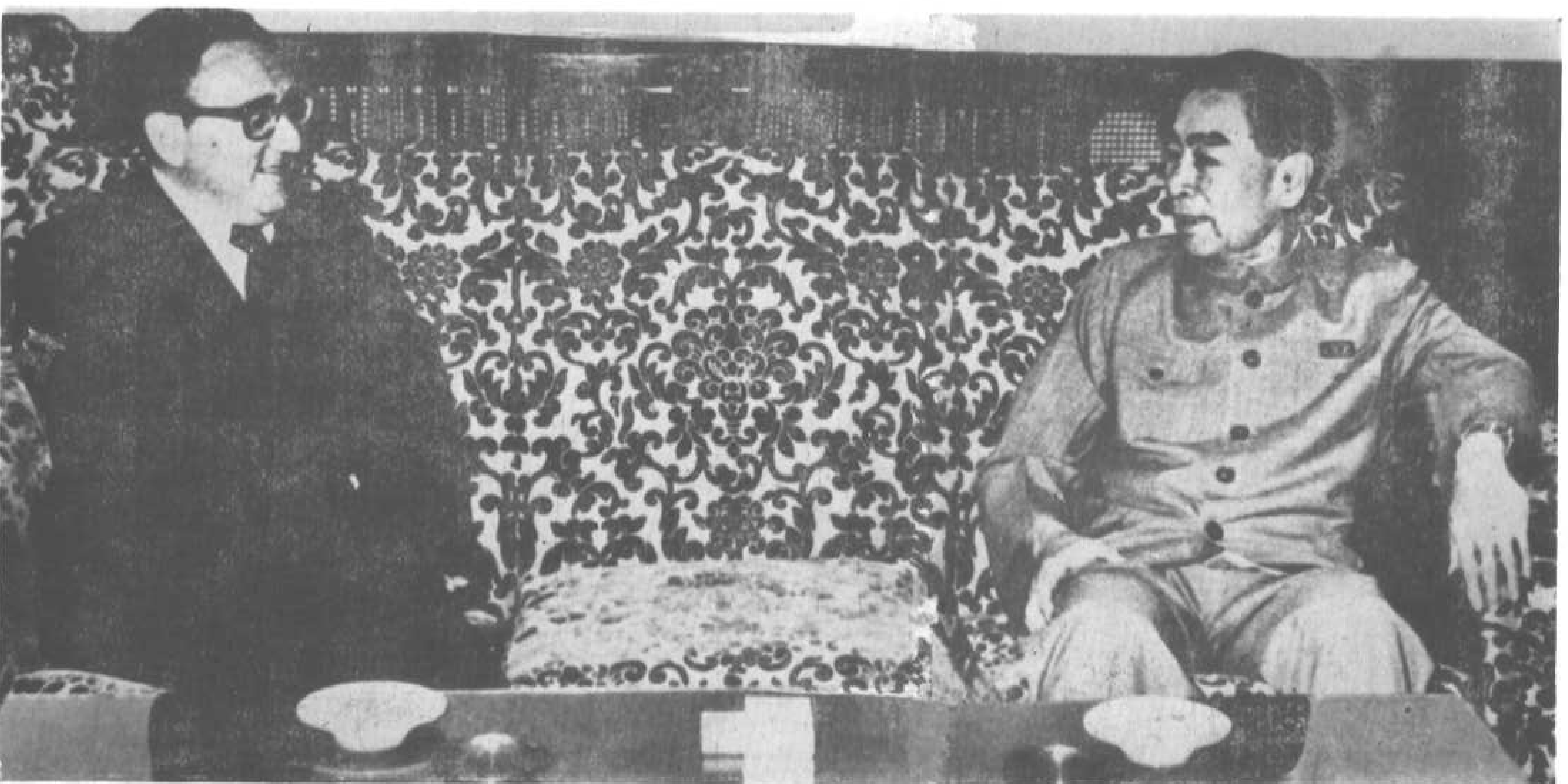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圣克利门蒂同美驻约旦大使谈约旦危机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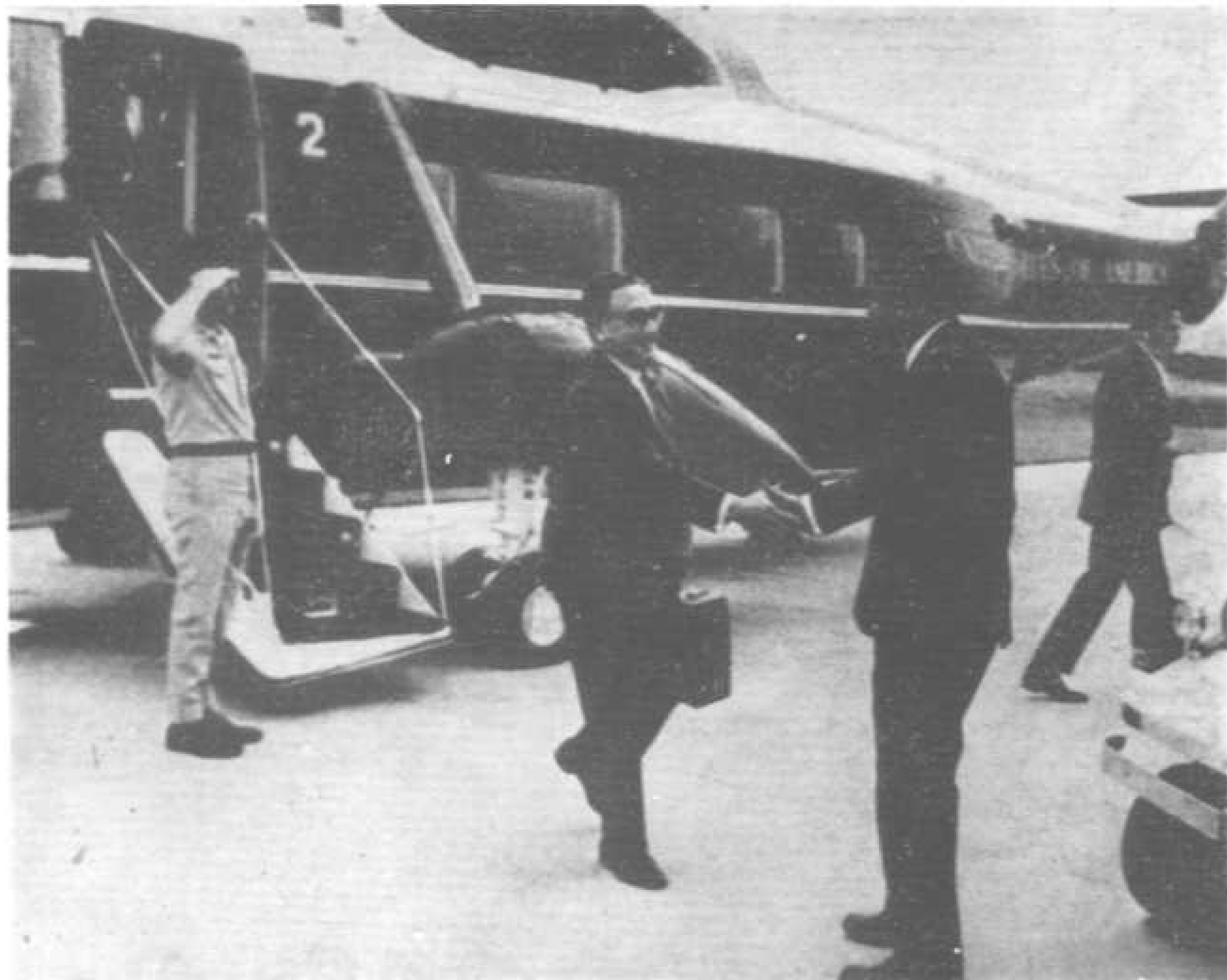
一九七一年七月八日到达巴基斯坦时，受到知道我去最终目的地的三个合作共事者的迎接。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基辛格秘密到达北京，叶剑英、黄华等到机场迎接。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基辛格与周恩来会晤。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三日，基辛格由北京归来，
在圣克利门蒂受到尼克松的迎接。



一九七一年九月中国之行归来。

目　录

第三部分
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从混乱到希望

第 三 部 分

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从混乱到希望

第 十 二 章

战 争 扩 大 了

印度支那一九七〇年的动乱和神话至今还影响着我们。老挝和柬埔寨都卷进了战争漩涡。一九七〇年初，上台还不算太久的美国政府的最大愿望莫过于使战争降级。然而北越一方面同我们进行秘密和谈，一方面使军队的行动同美国舆论巧妙地配合起来，故意搞了个战争升级。这年二月，北越在老挝查尔平原发动了攻势。三月，他们开始从一九六五年以来一直被他们完全非法占领的、位于柬埔寨同南越接壤地区的庇护所出击，切断交通，骚扰金边，企图推翻在我们既不了解也未参预的情况下取代了西哈努克政府的朗诺政府(联合国和苏联都承认朗诺)。

可是，由于接踵而至的悲剧而受到愤怒谴责的并不是河内，而是美国。当我在巴黎同北越使者黎德寿谈判时，他拒绝使柬埔寨和老挝中立化，强调他的人民命中注定不仅要接管南越，而且要统治整个印度支那。牛皮是秘密吹的，但表现这种狼子野心的军事

行动是有目共睹的。有一种传说认为柬埔寨的恶梦是美国决策引起的。这是一种顽固的民族变态心理的产物。现在，越南人已经在没有美国挑衅作为借口、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抗议声的情况下终于实现了他们征服整个印度支那的野心，然而这种神话还在流传。在柬埔寨，一伙杀人不眨眼的理论家结成的乌合之众看来确实已为一个有组织的共产党国家取而代之，但完成此事的正是早在一九七〇年就开始试图这么干的外来武装力量。柬埔寨苦难的根源是河内贪得无厌地谋求霸权，而不是美国优柔寡断的反应。

我们的军事反应引起了大量痛苦的呻吟，而我们则认为要使我们的撤退不至成为溃败，这些反应是最起码的。错误肯定是有的。但是所谓美国官员在柬埔寨阴谋推翻中立的西哈努克亲王、更深地投入到老挝和柬埔寨战争中去的说法之所以能够长久流传，正说明感情胜过了现实。四月三十日宣布我们对柬埔寨庇护所发动进攻的理查德·尼克松，正是四月二十日宣布撤走十五万军队的同一个总统。最后终于采取行动阻止共产党完全接管柬埔寨的美国政府，正是四月四日提出柬埔寨中立化建议——并遭到轻蔑拒绝——的同一个政府。关于印度支那，存在大量令人痛苦的怪事。顽固拒绝和解的是河内，受谴责的却是美国，几乎使美国政府不知所措。这些大事相互联系，都需要在本章分别加以叙述，但开始必须谈谈当时政府的实际状况：一九六九年底和一九七〇年初，我们为了解越南当地情况——并再次同河内进行秘密和谈——正进行重大努力。

研究工作从一九六九年秋天就开始了。那时，埃利奥特·理查森和我建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即越南问题特别研究小组。我在一九六九年九月五日给总统的备忘录中简单说明了这个小组的目的。我说：

回顾我们过去几年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是官员们多么频繁地被他们关于越南的成见引入歧途——尽管对垂手可得的事实做一点细致客观的分析就会使他们得出不同的结论。

这个小组十月二十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的有埃利奥特·理查森、戴夫·帕卡德、理查德·赫尔姆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情报局的代表。我的工作人员拉里·林恩和鲍勃·桑塞姆领导的一个工作组对南越四十四个省当中的十二个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以便解决准确地估计农村形势——即为控制农村人口而斗争的形势——这个多年存在的难题。

我读了长达一百页的研究报告，在上面注满了问题。例如：为什么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给我介绍的情况是南越人正在取得进展？什么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顾问们了解他们看到的情况吗？我写道："我发现最不称职的人正是最容易感到满足的人……如果你那儿事件较少，这究竟意味着你干得漂亮还是意味着敌人故意如此呢？如果是后者，那么，这是否是一个信号？我们怎么知道遭到我们摧毁的是什么样的常设基地？……大家都说土地改革很重要。可是土改还没有进行，我们的绥靖工作却取得了进展。这怎么可能呢？"重新起草的文件回答了这些问题。于是我在一月二十二日把文件的结论摘要报告了总统。南越百分之三十八的人口生活在城市，相当可靠地处在政府的管辖和保护下(特别是一九六八年春节攻势的失败使越共损失大量干部之后)。但是敌人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控制占人口百分之六十二的农村居民，从农村包围城市，使城市"象熟透了的果实般掉下来"。这次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从一九六八年九月以来，西贡政府对农村的控制从百分之二十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五；共产党的控制则从百分之三十五减少到百分之七。约四百万南越农村居民生活在双方争夺

地区，白天受西贡控制，夜晚受越共控制。但是，在我们继续撤军的情况下，能否保持这个比例是没有把握的。

统计数字比较令人鼓舞，然而我们也知道北越并没有丧失信心。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河内发表了它的国防部长武元甲将军写的一系列文章，共计七篇，其主要论点是：通过持久斗争可以战胜美国的技术优势。我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七日送呈总统的文章提要中预言，河内将拖延时间，直到美军撤出的数量使它可以在比较势均力敌的基础上向西贡武装力量提出挑战。一月中旬，我把自己对一些态度乐观的报告的怀疑归纳如下：

（一）北越人战斗了二十五个年头，不可能不再作一次重大努力而就此罢休。这种努力可以通过对美军、越南共和国部队*或地方部队发动攻击等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如果他们决定不作这种努力，照说他们应当对于谈判更积极些。（总统在这里批注："有道理。"）

（二）我们还没有见到说明越南共和国部队真正有所改进的证据。可能的情况是敌军受到了创伤，而不是越南共和国部队比过去大有进步。还有一种可能是：也许由于我们八月初在巴黎提出的威胁，敌人主力后撤了，减少了八、九两个月的活动，而低估了这种做法对他们游击部队的影响。

（三）也许上级要求乐观报道的压力太大……。

由于这些原因，我建议总统把我的军事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和一个分析专家小组派往南越访问。他们从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九日到二十九日调查了九个关键省份，证实了我们在华盛顿研究得出的结论。但他们也警告说：形势好转的速度在一九六九年最后几个月已经明显地放慢了。"没有迹象说明敌人已经认输……。美军撤退给越南政府**造成的压力可能导致……地方保安部队工作

---

* 即南越部队。

** 即南越政府。

的恶化，使越南政府丧失民众支持。"中央情报局独立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表明南越领导人由于害怕美国过分仓促撤走，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悲观情绪。我把中央情报局这份报告送给了尼克松。他在报告上写道："基*——心理状态极为重要。他们必须挑起担子，才有可能建立信心。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必须冒点风险。"

诚然，当时也有相反的观点。以打败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的战略设计者著称的英国游击战问题专家罗伯特·汤普森爵士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访问了越南。后来他报告说，西贡处于"取胜的地位"，而且除非美国撤走过快并减少援助，将可保持这种地位。各部门都得到了这份报告，并且——同他们在越南问题特别研究小组里表达的观点多少有点矛盾——对报告表示赞同。

但无论进行多少研究，无论这些研究多么客观或恳切，都解决不了我们的基本矛盾。对于决心持久作战的敌人，必须使他们在战场上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才可能使他们走向妥协。我们要想这么做就必须加强南越的力量，挫败河内在这方面的一切阻挠。我们的战略肯定会遭到美国人当中那些虔诚的、大声疾呼的、人数日增的少数派拼命反对。十一月三日的演说为越南化赢得了一定时间。可是时间是靠不住的。我们必须利用这段喘息时间来加强我们在当地的力量。同时，我决心探测一下谈判的前景——通过谈判，双方可以检验自己关于对方的估价，而我们则力图从似乎无法解决的僵局中找出解决办法。

回到秘密谈判

我一贯认为举行谈判最有利的时机是局势发展看来顺利的时

* 指基辛格。——译者

候。向压力屈服等于鼓励对方施加压力；给自己造成一个缺乏毅力的名声等于大力鼓励对方拖延谈判。主动让步是促使对方也让步的最有力的办法，也是使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的最好保证。在我进行过的谈判中，我总是设法判断什么是最合理的结局，然后努力用一两步就迅速达到目的。那些喜欢零敲碎打、到最后一分钟才举步的人嘲笑这种战略是"先发制人式让步"。但是我认为他们那种战略的主要作用不过是安抚官僚机构，并使良心得到慰藉。它使初出茅庐的人得到一种印象，似乎这是强硬的表现。在通常的情况下，这种战略总是弄巧成拙；零敲碎打地吊胃口会促使对方坚持不让，等着瞧下次可能出现什么让步，总也不能断定这是否真正的底牌。因此，在我同越南人以及其他人进行的多次谈判中，我倾向于在出乎意料、压力最小的情况下采取重大步骤，并使对方认为我们将坚守这一立场。我几乎一贯反对在压力下修改谈判立场。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似乎是尼克松政府就职以来我们的地位最强有力的时候。我们顶住了河内发动的一次军事攻势，也顶住了反战大示威；总统向人民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并得到大量支持。这个月，亨利·卡伯特·洛奇由于个人原因辞去了出席巴黎谈判的大使职务，而尼克松为了对谈判进展缓慢表示不快，拒绝提出继任人选。河内把这看作是一个说明我们可能恢复轰炸的信号，因为停止轰炸是以开始谈判为条件的。它顽固阻挠巴黎谈判达一年之久，现在却不断叫嚷要美国任命新的高级谈判代表。我建议尼克松利用这段时间再试试是否可能举行秘密谈判。北越无法利用巴黎秘密渠道进行宣传；如果他们拒绝谈判，公布出去对他们是不利的；如果河内准备解决问题——这一点我是怀疑的——我们也只有通过秘密谈判才能获悉。无论属于哪种情况，只要我们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就可以立此存照，证明河内是谈判的阻力。

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尼克松对谈判持怀疑态度。他不大相信

河内在遭受重大军事挫折之前会按照我们能够接受的任何条件解决问题。这种看法后来证明是正确的。总的说来，任何谈判过程都使他感到忐忑不安；他非常不喜欢使自己处在可能失败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他总是小心翼翼为失败安排一种借口。我每次参加谈判之前，尼克松都要通过书面或口头下达要我保持强硬态度的命令，并以某种方式表示他并不真以为谈判会成功。但是，因为尼克松尽管说话很硬，实际上真诚希望和平，所以他最后总是不能不同意我的论点，即我们对人民负有责任，无论机会多么渺茫，都必须探索取得光荣解决的可能性，并且记录在案，说明我们已经这么做了。

于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底，我们请我国驻巴黎武官弗农·沃尔特斯将军提出同春水秘密会晤的要求；他们迅即接受了要求。这是尼克松当政时期我们第一次不通过外国中间人直接同北越人接触。沃尔特斯建议他们同我再次秘密会晤。但北越人当时还没有准备好。作为周密的计划者，他们对尼克松十一月三日演说的全部含意还没有得出结论。或许由于春水不是决策人，他们认为在这一级再次会晤没有意义。河内感觉必须首先表示冷淡，以便恢复心理平衡。

不管是什么理由吧，十二月十二日，沃尔特斯将军被召请到北越人的住地。北越驻巴黎总代表梅文蒲宣称河内对十一月三日的“好战”演说、对总统拒绝任命一位高级官员接替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不快。他要我们注意河内在八月会议上提出的、他称为“既符合逻辑而又合情合理”的建议。既然我们过去已经拒绝这个“符合逻辑而又合情合理”的建议，河内认为举行新的秘密会晤是毫无意义的，除非我们有什么新的意见要谈。

在遭到河内拒绝整整一个月之后，我又做了巨大努力，说服尼克松授权再做一次尝试。于是，沃尔特斯将军在一月十四日会见了春水，建议在二月八日以后的任何一个周末举行会晤，“如果双方

都愿意越出现存格局的话”。尼克松仍持怀疑态度。“我不知道这些小丑要谈些什么玩意儿，”他对我说，“但我们的方针是：如果他们不谈，我们就沉默到底。我并不认为现在是做出让步的时机。”

河内一连几个星期毫无反应。但是，一月二十六日，我们看到了谈判可能即将开始的第一个迹象。河内宣布，北越政治局委员（实际上是统治集团中第五号人物）、河内同艾夫里尔·哈里曼谈判的主要代表黎德寿将参加即将召开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然后，在二月十六日，北越人把沃尔特斯召到他们住地，通知他说，我们傲慢的谈判对手同意在二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举行会晤。他们让我们等了一个多月，现在却要求我们在十二小时内答复。后来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我们在限期内接受了二月二十一日作为会晤日期。现在回想起来，我毫不怀疑，当时尊重这种蛮不讲理的要求给人一种迫不及待的印象，而这是不必要的；它使河内在心理上赢得了它极为珍贵的一分。这件事并未造成长期损失，但使我们从一开始就别扭。

黎德寿和我的秘密谈判就是这样开始的。从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日*到四月四日，共开了三次会。

精力充沛的沃尔特斯真是得其所哉。他给谁担任翻译就喜欢模仿谁。如果说有什么事比这更使他得意的话，那就是安排秘密会晤。为了进行得更秘密一些，我一般是在周末或假日由一名秘书和两三名工作人员陪同，乘一架波音 707 总统专用飞机从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程。飞机航行证件上说，这是为检查总统旅行航线而进行的一次定期训练飞行。它将在法国中部布尔日附近一个法国空军基地阿沃尔机场着陆。法国人在这个基地驻扎着海市蜃楼式战斗机和 KC-135 加油飞机，外形同总统波音

* 从上下文看，应为二十一日。——译者

机差不多。我坐的飞机降落后只停很短的时间，让我在那里走下飞机；它从雷达追踪电波中消失的时间不会超过二十五分钟；然后它就载着我的秘书飞往法兰克福的莱茵—美茵机场。这时我的助手和我已转乘蓬皮杜总统专用的神秘-20式喷气机飞向巴黎附近供私人飞机使用的库布莱镇机场。

在库布莱镇机场上，沃尔特斯将军会登上飞机来接我，理所当然为他的安排感到洋洋得意。①他把我和我的同事领到一辆没有标志的租来的雪铁龙牌小轿车去——这对沃尔特斯是一个敏感问题，因为他是正式派驻巴黎使馆的人员，而这次旅行不能告诉使馆，开始的时候又没有官方拨款可以偿还他支付的费用。他开车把我们送往巴黎纳伊区他居住的那幢公寓楼去，途中通常都要提醒我这件事。到达后，他就偷偷用电梯把我们从地下车库送到他住的一套房间。他的管家只知道我是前来访问的一位美国将军，名叫哈罗德·A·基尔希曼。我们在那儿过夜（他把自己的卧室借给了我）。第二天沃尔特斯开车把我们送往巴黎郊外舒瓦齐勒罗瓦区达迪路十一号。这里距离我们住处有三十分钟路程，是一个中下阶层居住区。有一年半时间，秘密会晤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在三次旅行中，两次都是按这种程序顺利进行的。但是三月十六日的会晤却由于飞往巴黎途中发生技术故障险些儿流产。驾驶员突然发现起落架液压控制系统失灵，必须用手操作才能使它降下。然而降下后如果不补充制动液就无法使起落架重新升起。在阿沃尔机场着陆是不可能了，因为驾驶员不了解法国军事基地是否有设备进行这种虽然次要但却必需的修理；即使有这种设备，也会由于一架进行训练飞行的总统专机从一切追踪雷达上消失过久而引起疑问。

飞机必须飞往德国的莱茵—美茵机场，而那儿谁也不知道我们马上就要到达，更不知道我们的使命和困境。我的旅行并没有

通知国务院的官僚机构，因此无法告诉德国当局有一架法国飞机要来接我。

幸好总统专机都拥有优越的通讯设备。我当时的特别助理托尼·莱克通过华盛顿线路中转，从飞机上同巴黎的沃尔特斯将军取得了联系。沃尔特斯去法国总统官邸爱丽舍宫交涉，由当时担任法国总统府办公厅主任的米歇尔·若贝尔和蓬皮杜总统亲自授权派法国总统专机去接我——这次是在法兰克福。

我在莱茵—美茵机场一个黑暗的角落着陆；蓬皮杜专用的喷气机已在那里等候。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沃尔特斯是用什么借口在这样不可思议的地方搞到一架波音 707 飞机用的舷梯。我的工作人员和我迅速换了飞机，着陆不到十分钟就又起飞了。沃尔特斯自称，西德人之所以迅速合作是因为他们——在他的糊弄下——相信飞机上的乘客是蓬皮杜的秘密的女朋友。②沃尔特斯戏剧化的禀赋曾经办成许多非同寻常的事，不过我常常纳闷，他怎么会认为乘客的性别可以瞒得过在那里等候的地勤人员。

不管怎样，沃尔特斯以他的想象力和不屈不挠的意志使我们三月十六日的旅行化险为夷。他一切出色的成就都具有这种特征。结果我们又欠了若贝尔和蓬皮杜一笔债。后来若贝尔担任外交部长时，他同我经常要交锋，但是在越南谈判期间，他从来都是很帮忙而且慎重其事的。至于蓬皮杜，他从来没有辜负过我们的信任，没有因为了解我们的秘密而试图得到任何特殊好处，也没有要求我们对他采取的大量友好行动做任何报答。

我们在舒瓦齐勒罗瓦同北越人会晤用的那幢房屋可能属于当地工厂的一个领班。底层有一间小起居室，旁边是一间更小的餐厅，通向花园。起居室内面对面摆着两排绷着厚实的红套垫的安乐椅。美国谈判小组——我、我的越南问题专家理查德·斯迈瑟尔、托尼·莱克以及沃尔特斯将军——沿着门左那面墙就座，北越

代表团共六人，坐在对面，相互之间的距离只有四、五英尺，但观点上的距离是无限的。

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举行第一次会晤时，春水出来迎接我，把我领进起居室，去会见作为当权的政治局成员地位比春水高好几级、但却宁愿使用春水的特别顾问这个头衔的人。

特别顾问黎德寿和第一轮谈判

黎德寿头发花白，仪表端庄，总是穿一套黑色或褐色毛式制服。他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只是偶然才显露出使他十六岁就参加共产党抗法游击队的那种狂热。他一直神态自若，除一两次外，举止态度都无懈可击。他总是胸有成竹，并且竭诚而巧妙地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他的事业是要摧毁美国的意志，并在我们力图保卫的一个国家里建立河内的统治。随着会谈的进行，我们建立了有限的个人接触，私下开玩笑的时候多了，了解到黎德寿以革命为职业，他的专业就是游击战争。他可以口若悬河地高谈和平，但就他个人的经历来说这完全是一个陌生而抽象的概念。他在法国统治时期蹲了十年监狱。一九七三年，他领我参观河内一座历史博物馆，忸怩地承认他过去从没有来过。那些越南历史文物——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都是法国殖民政府搜集的——使黎德寿想到出土这些文物的城镇里的监狱，而不是想到越南文化的光辉灿烂。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陈列室，在这个过程中我获得大量关于各种牢狱中单独监禁的相对优点，关于警察如何识破伪装的农民以及其他方面的知识。我若是决定在印度支那领导一场游击斗争，这些知识是极为宝贵的。

对列宁主义戒律的热烈信仰和对越南民族的信心支持黎德寿

以惊人的英勇进行活动，把极端自信转化为一种信念，即越南注定不仅要统治印度支那，而且要统治整个东南亚。他的民族优越感使个人对美国的憎恨都无足挂齿了；我们不过是几百年来由于天生愚昧无知而擅入印度支那的又一批洋鬼子，而越南的使命就是把这些洋鬼子赶出去(当然，我常常想，还要先把他们折磨一番)。

黎德寿的列宁主义使他深信他比我自己更能了解我的动机。他的越南传统表现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唯恐上当的情绪。我有时怀疑，看上去斗智失败可能比实际失败更使他烦恼。四年后，谈判终于严肃起来，这时他却要在我们提出的最无害的建议中寻找陷阱。开始时，这种心情使他大讲特讲任何资本主义诡计都骗不过他。后来，这种说教使人越听越厌烦。

我逐渐明白，黎德寿把谈判看作是另一种战斗。按照他的定义，任何妨碍河内取得最后胜利的解决办法都是一种诡计。他来就是为了把我拖垮。作为真理的代表，他根本没有妥协的概念。河内的建议是唯一"符合逻辑而又合情合理"的谈判基础。北越人是"被压迫民族"；尽管历史上存在大量相反的证据，他仍认为北越人根本不可能压迫别人。引起战争的全部责任都在美国。我们建议通过战争降级或停火来减少敌对行为——这在批评我们的人当中是非常时髦的——而黎德寿认为这是阴谋诡计或制造混乱的机会。照他看来，结束战斗的唯一"合理"办法是美国接受河内的条件，即在规定期限内无条件撤退并推翻南越政府。作为"真理"的代言人，黎德寿根本不理解我们的谈判方法。用让步换取让步对他来说似乎是不道德的；除非出现比道德更高的需要，否则他准备无限期等待，直到我们不愿继续为止。他关心的似乎是使自己在越南斗争伟人祠中得到有利地位；他无法平等看待我这样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把雄辩看成是扭转历史不可抗拒的进程的一种手段的野蛮人。黎德寿无疑是用英雄的材料制造的。我们很不情愿

地理解到——而国内许多人始终不理解——英雄之成为英雄是因为他们具有偏执狂般的决心。他们很少是使人感到愉快的人；他们僵硬得近乎疯狂；通过谈判取得和平所需要的才能并不是他们的特长。

我们在达迪路那间昏暗的起居室里第一次见面时，幸好我还不了解我面临的问题的全部含义，否则我可能早就不干了，最低限度我会把自己由于希望这次会晤成为和平对话开端而产生的期待感——几乎是欢欣鼓舞的感情——克制一下。

黎德寿同我见面时表现冷淡而彬彬有礼，就像一个具有不言自明的优越性、因此即使表示一种近乎纡尊降贵的礼貌也不会有失身份的人那样。我讲笑话他也笑，有时放声大笑，有时则像重任在身而又被琐事耽误的人那样不耐烦地笑。他知道自己要什么；经过十年囹圄和二十年战斗生涯，他不会倾倒在一个资本家幻想的魅力面前。二月二十一日的会谈分两次进行。上午谈了三小时，后来休会，使沃尔特斯将军和我可以到圣路易岛蓬皮杜总统寓所去同他共进午餐，并讨论前面提到过的他即将访问美国的问题。午后较晚才恢复谈判。我那些来自河内的对话者连最细微的程序问题也不放过，直到我马上就要出发去看蓬皮杜的时候才同意下午开会。这正是他们的特点。

我过去在学术界的同事认为，河内不相信我们的意图是通过妥协取得和平的主要障碍。我对这一点仍然半信半疑。上午开始会谈时，我宣读了一篇事前准备的讲稿，保证我们一定认真谈判。我强调说，我们希望达成一劳永逸的解决；过去一切协议只是使无休止的战争暂时停顿下来，我们不想重蹈覆辙。我指出，从八月份我同春水举行会晤以来，河内的处境并没有改善，而尼克松总统已经证明是得到公众支持的；按照当地的力量对比，河内也没有理由坚持在政治上得到支配地位。最后，根据我们判断，“国际形势的

发展可能使其他国家不再专心关注越南，现在支持越南的国家也可能不再一致予以支持”——相当明显，是指中苏争端而言。

我接着提出了两点新的意见：美国愿意撤走全部军队，而且不在越南保持基地；在安排双方撤军时，我们并不坚持把北越军队放在和美国军队同等的法律基础上。我说：我们要求的是实际上而不是理论上结束战争。只要河内事实上把军队撤走，我们并不坚持要它正式加以宣布。在这个基础上，我建议把宣传撇在一边，订出一些双方同意的原则。然后可以在克莱贝尔大街举行的全体会议上补充具体内容。我们准备派一名新的高级谈判代表到巴黎来达成协议。

从技术上说，黎德寿只是河内驻巴黎代表团的“特别顾问”。因此，答复首先来自代表团形式上的团长春水。春水舍不得放弃这样一个在上级面前卖弄口才的机会（内容显然是事前准备的）。他坚持在进行任何谈判之前美国必须确定单方面撤军的期限。然后，可以谈判我们撤走的方式，但不得影响撤走的时间。作为报偿，北越方面唯一的义务是在我们的队伍登上船只或飞机撤走时不向我们开枪。对南越的战斗将继续下去，直到推翻西贡政府为止；释放美国战俘问题根本没有提。春水仍然坚决认为美国的任何姿态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已经宣布撤走十万多名军队，他却认为这是“零零碎碎的撤退”而不值一谈。尽管我们把B-52飞机出击架次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并通过改变战斗指令大大减少了美军的攻势，他却荒谬地断言我们正在使战争升级。

下午轮到黎德寿发言。他一开始就反驳我提出的八月以来形势发展对我们有利的估计。他用列宁主义讲师的口吻说：“我们必须正确估计力量的对比，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他的发言把我国舆论放在突出地位，从而透露了河内对我国舆论的重视。他否认尼克松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并引用盖洛普民意测验

材料，说明赞成立即撤军的美国人已经从百分之二十一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五。但这还"仅仅"是舆论。"此外，我还看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克利福德先生等发表的多次声明，都要求全部撤走美军，要求撤换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要求指定洛奇大使的继任人选。"我尖锐地回答说，我不愿再听河内谈什么美国舆论了；黎德寿到巴黎来是就越南立场进行谈判的。虽然我对国内分歧感到痛心，我认为同敌人讨论这种分歧是不符合我们的尊严的。开了几次会我才使他们弄懂这一点，但我从来没有完全成功。

黎德寿接着又攻击我们对军事形势的估计。他一针见血地击中了越南化的痛处，十分精明地指出，美国的战略是撤走足够的军队，使美国人民可以忍受这场战争，同时加强西贡军队，使他们可以自立。然后，黎德寿提出一个我当时也感到十分苦恼的问题："过去你们有一百多万美国军队和傀儡军队，尚且失败了。那么，让傀儡军队单独去打仗，又怎么能够成功？现在美国仅仅提供支援，你们怎么可能打得赢呢？"

根据这种分析，黎德寿得出了无情的结论。他坚持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必须同时讨论，并且在一九七二年十月以前从未偏离这个立场。他认为需要讨论的唯一军事问题就是无条件结束美国的卷入。民族解放阵线为撤军提出的六个月期限是确定不移的，是不以其他方面的协议为转移的。但是，即使我们撤退，河内也只有在取得政治解决的条件下才停止战斗。按照黎德寿的观点，这就是说，首先必须搞掉"好战成性的"阮文绍总统、阮高其副总统和陈善谦总理，建立联合政府，其中包括三种力量："西贡政权"中真正主张"和平、独立和中立"的成员（二阮一陈除外）；符合同样标准的

---

* 陈善谦已取代陈文香担任南越总理。

中间人士；以及共产党的民族解放阵线。至于谁是主张“和平、独立和中立”的人，那要由民族解放阵线决定。但是，从组成状况看对河内如此有利的这个联合政府还不算数。尽管它三分之一的成员是共产党，其余成员是共产党批准的，反共领导人全部被摒除在外，它还必须同全副武装的民族解放阵线去谈判最后解决办法。黎德寿安慰我说，这个宽宏大量的方案会带来富有希望的前景。他说：“如果你们表现善意，态度认真，问题很快就会解决。”

在三月十六日的会谈中，我尝试了另一种办法。我向黎德寿建议，双方在谈判期间都不要在越南或“有关”国家里施加压力——也就是说，在整个印度支那减少相互军事行动。黎德寿以学究式的说教轻蔑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说：任何战争都有自己的高潮，这是无法加以干预的。在四月四日的会谈中，我再一次提出这个建议。北越方面没有进行任何探讨就再次轻蔑地加以拒绝。三月十六日我还提出了一份在十六个月内撤走全部美军的时间表，对每个月的进度都有精确的规定。北越方面说，总统在十一月三日演说中建议的是十二个月，这份时间表又变了，因此不能接受（我提出十六个月是因为五角大楼当时只有这样一份精确的时间表，它反映了我们对撤退剩下的四十万军队及其装备需要多少时间的技术上的估计）。我解释说，这份时间表只是说明性的，期限当然要同总统宣布的时间统一起来。河内仍然表示拒绝，因为他们支持民族解放阵线提出的“正确而符合逻辑的”六个月限期。照黎德寿看来，我们的时间表的缺陷在于它要等到达成协议之后才开始执行，而河内要求我们无条件撤退，其时间不受任何其他问题影响。此外，任何政治解决办法，凡是要求保持南越政府任何领导人的，黎德寿就拒绝讨论；他嘲笑我们作为监督自由选举的公正手段提出来的、成立包括越共成员在内的混合选举委员会的建议。他们是要求我们投降，而不是举行任何正常意义的谈判。

在四月四日的会谈中，春水总结了河内反对我们立场的理由：期限比他们要求的六个月长，还要以解决其他问题为前提，因此是“错误的”；双方共同撤军是不能接受的；只要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和其他“反对和平、独立和中立”的领导人仍然在位，就无法解决问题；我们在巴黎的代表团还没有一个高级官员来接替洛奇的职务。我建议探索一些办法来组织公平的政治竞赛。他们的答复还是寸步不让，认为只有推翻西贡政府才能解决政治问题。

不过，最尖锐的意见还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北越刚在老挝发动了一场攻势。黎德寿指责我们使老挝战争升级。我回答说，究竟是谁在搞谁，搞的什么名堂，一个很好的检验办法是看哪一方面在往前推进。黎德寿辩解说，北越的攻势是美国“挑起来”的；无论怎么说，打仗的是老挝部队。（因此我说，巴特寮的越南话说得那么高明，真是了不起。）谈到柬埔寨问题，黎德寿情绪激昂，毫不退让，对我提出的使柬埔寨中立化的建议大肆嘲弄。他坚持说，印度支那的战争已合而为一，他们将在这个基础上打到底。关于老挝和柬埔寨，我将在这一章稍后加以讨论。

简单地说，同黎德寿举行的三次会谈说明河内的立场是蛮横无理、寸步不让的。北越拒绝双方共同撤军的时间表，拒绝使战争降级，拒绝使柬埔寨中立化，也拒绝在南越建立混合选举委员会。黎德寿所想的谈判就是他单方面提出要求，其实质是美国必须在很短的限期内撤走，以至西贡非垮台不可。在撤走的时候，还要求我们解散一个盟国政府，建立一个成员由河内选定的政府代替它。即使这样一个政府，其唯一任务也只是同河内的解放阵线谈判最后条件。我问黎德寿，他的政治方案是表示一种愿望，还是作为条件提出的。他回答很干脆：“是条件。”直到一九七二年秋天，河内一直都坚持这个条件。

黎德寿声明，除非我们改变立场，否则再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

了。*我们同黎德寿进行的第一轮秘密谈判就此结束。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再来看过去的记录，我对自己当时乐观得异乎寻常的报告感到惊讶。造成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是我希望保持这条渠道。尼克松持怀疑态度我是知道的，结果我掉进了许多谈判代表经历过的陷阱，成为自己参加的谈判的鼓吹者。这种情况没有造成损害，是因为河内使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做什么具体决定。感到乐观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我们对河内冷酷的心理战的奥妙还相当缺乏了解。例如三月十六日会谈后，我报告尼克松说：河内已经暗示它愿意讨论双方共同撤军问题。事实上，第二次会谈时就明显看出，黎德寿原来就坚持只有在我们撤退之后河内才会讨论他们军队的作用问题，而且只能同在西贡建立的、其组成由他们控制的联合政府进行讨论。

记录毫无疑问证明，我们当时是在寻找各种理由使谈判成功，而不是使谈判失败。我们的批评者喋喋不休地说我们决心用武力解决问题。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我们总是竭力把谈判解决的可能

---

* 我同黎德寿举行首次会谈的第二天，《费城公报》上出现了一篇足以说明公开辩论如何完全脱离现实的代表作。作者罗杰·希尔斯曼在美国卷入越南初期曾经担任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他说总统“拒绝了共产党提出的、几乎是立即在越南实现和平的建议，虽然建议的条件照许多美国人看来可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希尔斯曼自称这种观点得到艾夫里尔·哈里曼等专家的支持。根据他们对河内含糊其词的声明的解释，希尔斯曼和他的朋友们自称发现了以下几点和平建议：

> 不进行选举，而是通过旧式政治交易建立一个把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等一切政治派别的代表都包括在内的联合政府；
>
> 虽然他们的宣传仍然要求立即全部撤走美军，他们私下已经表示撤军可在两三年内分期进行；
>
> 把越南北方和南方的重新统一推迟五年到十年；
>
> 对老挝和柬埔寨的领土完整给予国际保证。

当然，以上各点都已经十分明确地遭到河内的拒绝。

性想得尽可能多一些。尼克松尽管比较悲观，也同样持积极态度，并且愿意冒风险。二月二十七日，在准备三月会谈时，我写信给他说：

> 我们阐述的主张应当足够合情合理，使它们具有吸引力，但又要十分坚定，以免在现有渠道垮台后转向另一条比较常规的谈判渠道时被迫后退……。由于我们同越南政府尚未就立场问题达成协议，你必须确定我们的立场，而这种立场以后若是透露出去，可能使我们同西贡的关系发生困难。这样做有风险。但是为了保持势头和保守秘密，我看舍此别无他途。

尼克松在最后一句话边上批注："同意——这么办行。"

把阮文绍说成是一个障碍——除非就河内反对阮文绍存在这种特殊意义上来说——也是不公平的。每次会谈后，我都通过秘密渠道用电报把全部情况报告驻西贡的埃尔斯沃思·邦克大使，以便向阮文绍总统汇报。无论是对程序问题还是对实质问题，阮文绍都没有表示异议。我们是慢慢地、到整个过程快要结束时才知道阮文绍并没有真正同意我们的主张。开始，他估计这些主张是河内不会接受的，只有默认才能使我们继续支持战争。

秘密谈判带来的一个不幸后果是加剧了部门与部门之间互不通气，给尼克松政府造成严重的祸害。罗杰斯直到一九七一年相当晚的时候才获悉有关秘密谈判的事。由于戴维·布鲁斯一九七○年七月担任我们参加巴黎谈判的代表团团长之后听过汇报，而邦克则随时都了解最新情况，这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结果：两位大使都比他们名义上的上司更了解情况。莱尔德从来没有得到过正式通知，虽然我敢肯定他一定充分了解是谁在使用他控制下的飞机，以及使用飞机的可能原因。这是一种糟糕的制度；尽管我利用过这种制度，我仍然认为今后绝对不应加以效法。尼克松对内阁

成员的缺乏信任，加深了他们当中已经很强烈的固执己见的倾向。他们不断干扰我们的主动行动，或对我们已经明确阐述的战略表示异议，一部分原因是不了解情况，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感觉对并非自己制定的政策无需承担义务。

同黎德寿举行的第一轮谈判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外交永远是某种力量对比的反映，而黎德寿的估计并非完全错误。他对美国舆论的了解，特别是对他具体谈到的几个领导集团的了解，是颇为准确的。越南化确实存在矛盾。美国官僚机构的纪律涣散使政府内部哲学观点的分歧彻底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黎德寿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修改他提出的无条件撤军和推翻西贡政府的要求。直到两年半之后军事形势的发展使他别无选择余地的时候，他才看到需要这样做的理由。

老挝插曲

在印度支那西北角的崇山峻岭和湄公河平原之间，老挝的各个部落和民族在一个信仰佛教的国王统治下过了几百年和平生活，基本上不受比较黩武的邻国进行的战争和斗争的影响。十九世纪法国人征服老挝时，根据记载并没有遇到抵抗。后来，他们就从河内对老挝和整个印度支那进行统治。

作为历史的一个小小讽刺，为独立而斗争的人有时也会继承前殖民统治者的帝国抱负。因此，信奉列宁主义的河内主人认为自己是法国曾经从他们现在占据的总部统治过的一切地区的天然继承人。早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越南就试图统治老挝和柬埔寨③；现在又增加了一种要同法国殖民统治规模媲美的倾向。一九五四年签订日内瓦协议、结束了法国统治之后，爱好和平的老挝各民族不幸正处在北越为了便于绕过协议规定的非军事区侵入

南方而需要经过的道路上。④

巴特寮(受河内控制的老挝共产党人)一开始就控制了万象政府权力始终鞭长莫及的两个东北省份。一九六一年，位于东北的巴特寮、位于老挝中部神话般的查尔平原上的中立力量和位于湄公河沿岸靠近泰国边界的右派集团三派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内战，有六千多名北越军队卷入。这场冲突的严重性使肯尼迪总统不得不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警告说："老挝离美国很远，但世界是狭小的……。如果老挝不能保持中立的独立地位，整个东南亚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一九六一年五月开始在日内瓦举行有关老挝前途的谈判。同河内谈判总是旷日持久的，这次也是一样；河内按照它惯用的策略，一直保持军事压力，直到一九六二年五月肯尼迪总统把五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派到毗邻的泰国去为止。这次显示力量之后不到两个月，包括北越和苏联在内的十四个国家就签订了保证老挝中立的新的日内瓦协定。美国接受了苏联和北越的建议，同意撤退一切外国军事人员，建立以中立主义的梭发那·富马亲王为首、包括所有三派代表的联合政府。

北越从签字那天起就无视协定的存在。驻在老挝的六百六十六名美国军事人员全部通过国际检查站离开了老挝；而驻在老挝的六千名北越人员，只有四十名(的确是四十名)通过检查站撤走；其余数千名都留下了。

一九六三年四月，老挝不稳定的联合政府分崩离析。战斗迅即重新爆发。北越军队实际上兼并了老挝南部，在那里建立了向南越渗透的错综复杂的交通网——胡志明小道。到一九七〇年为止，已有五十多万北越军队沿着这些通道开赴南越。驻扎在老挝的北越军队增加到六万七千人——十倍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肯尼迪总统任职时期曾经造成一次重大危机的人数。

从六十年代中叶开始，美国逐渐增加了对曾经受到我们反对、但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议各方一致承认其领导地位的中立派领袖梭发那·富马总理的支持。我们的目的是保持一个中立主义的政府，同时设法使富马默许我们切断胡志明小道。我们为老挝王国部队、王宝将军领导的某些非正规的苗族部队、有时还为在老挝活动的泰国志愿人员提供财政援助。这种情况大部分已在报刊上零星加以披露；一九七〇年，由于斯图尔特·赛明顿参议员举行了几次秘密听证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已获悉全部情况。但是美国政府没有正式承认，以免河内以此为借口更大规模地违犯日内瓦协议，接管整个老挝。

这段历史有一定的重要性，因为一九七〇年初一个短时期内老挝成了我们在印度支那注意的焦点，也是国内辩论的焦点。北越的攻势有可能席卷老挝北部。国内批评者乘机惊呼，说我们有不知不觉在印度支那承担新的“看不到尽头的”义务的危险。

河内在老挝打的基本上是两场战争，虽然目的都是为了称霸印度支那。老挝南部的胡志明小道是河内通往南越战场的纽带。在老挝北部，河内支持巴特寮，但我们认为这种支持是有节制的，因为它害怕引起美国或泰国的反应。河内准备在南越获胜后再来对付老挝军队，现在仅对它保持必要的压力，以免它作为行使权力的工具巩固自己的地位。我们方面也不想打破这种不稳定的平衡。不可能有任何美国政府希望在老挝这样的国家发生战争。当我们正忙于从南越撤军时，把冲突扩大到老挝是毫无意义的——除了为保护自己而不得不进行的最低限度的冲突之外。一九七〇年一月底，北越方面打破了这个局面，突然向查尔平原增派了一万三千名军队，并运去大量额外的装备。当时，中立部队正在查尔平原狙击巴特寮。北越的增援既威胁到富马亲王，也威胁到我们和富马的关系；如果富马不再默许我们轰炸胡志明小道，就会大大减轻

河内在后勤方面的困难，使我们在南越面临日益严重的危险。更糟糕的是，如果北越军队进抵湄公河畔，这场战争对泰国就失去了意义。曼谷那时将在沿河数百英里的地带受到压力，大河两岸都是平原，无险可据。它几乎肯定不会让我们继续使用泰国空军基地，然而这些基地对我们在越南使用 B-52 轰炸机和战术空军作战是必要的。

一月二十三日，敌人攻势已迫在眉睫。我国驻老挝大使 G·麦克默特里·戈德利要求用 B-52 轰炸机打击北越一个据信驻有四千军队的重要集结点；这将是第一次在老挝北部使用这种飞机。这件事在华盛顿引起了一场仪态万千的官僚主义小步舞，很能说明我们政府的精神状态。感到应对美国部队负责的官员要求给部队提供保护，而来自国会的冷酷无情的攻击吵得他们无法思考问题。我们则被夹在当中。

我预定一月二十六日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会，考虑戈德利的请求。开会前两小时，梅尔·莱尔德告诉我他赞成用 B-52 打击那个目标；另一方面，他害怕走漏风声，希望不要在跨部门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莱尔德主张通过秘密打击柬埔寨时使用过的渠道来批准这次行动。因此，他对我说，他已指示他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代表反对在老挝北部使用 B-52，虽然他本人是赞成的。这样一来，无论莱尔德个人是什么观点，会议记录将表明五角大楼是持反对态度的；总统将承受这个决定引起的愤怒。开会前一小时，比尔·罗杰斯来电话说，他反对在老挝北方使用 B-52，而且莱尔德也站在他一边。我对这种说法含糊地表示怀疑，但建议我们三个人一起去见总统。不幸总统刚好挑了这个时候去戴维营，要在清静的环境中为他第一次使用否决权、拒绝一项福利拨款法案准备咨文。按照习惯，他在这种情况下是拒绝接电话的，即使是我打的电话也不行。等到可以再找到他时，所有主要人物都已表

态，立此存照，以便局势无论怎么发展都可以保护自己。

因此，我又从头开始进行联系——这一次是找厄尔·惠勒将军。我问他是否可以不用 B-52 而用战术飞机攻击莱尔德谈到的目标。（由于某种原因，战术飞机出击引起的抗议声似乎小于 B-52。）惠勒告诉我正在使用战术飞机进攻那个目标，但效果同 B-52 出击不能相提并论。当我回头再找莱尔德时，他强调集结的四千名敌军即将分散；这是他就任国防部长以来最适合使用 B-52 的目标。另一方面，他说，如果这个建议遭到拒绝，他也不会见怪。我最后说，要就这个特定目标取得一致意见为时已晚，但我答应要请总统作出明确的原则决定。

二月十二日，担心已久的北越攻势终于在查尔平原开始。次日，梭发那·富马首相正式要求派 B-52 去轰炸——几次要求中的第一次。到二月十六日，北越和巴特寮部队已将政府军队逐出控制查尔平原通道的大多数高地。当天下午，总统召集莱尔德、代理国务卿理查森、赫尔姆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代理主席）穆勒海军上将和我开会。我建议，若是敌人越过一九六九年夏天政府军发动攻势前共产党入侵最深的地点芒绥，总统就授权 B-52 出击。总统表示同意。不到二十四小时，共产党军队就越过了芒绥。二月十七日——十八日晚，三架B-52 进行了轰炸。长达一个月的讨论，北越的一次重大攻势，加上老挝前线接近崩溃的状况，不多不少才使我们出动一次 B-52。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莱尔德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次行动；他的立场对双方都合拍。惠勒是一贯赞成。罗杰斯开始时反对，后来转而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

然而，B-52 出击一次已足以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第二天，即二月十九日，《纽约时报》就报道说，对付南越的 B-52 已经转用于攻击老挝北方的北越部队和巴特寮部队。尤金·麦卡锡和弗兰克·丘奇参议员迫不及待地对美国飞机和驾驶员卷入老挝表示哀

叹，而对北越攻势却绝口不提。二月二十一日，迈克·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同样不提北越还在继续进攻，却把美国战争“升级”记录在案。当时还出现了这样的报道，说“穿便衣的美国武装人员”正在支援老挝指挥部。⑤二月二十五日，马赛厄斯、曼斯菲尔德、戈尔、赛明顿、库珀和珀西等参议员攻击政府对他们所谓“美国卷入日益加深”的情况“讳莫如深”。同日，戈尔和曼斯菲尔德参议员要求公布十月份他们在小组委员会上听取的有关美国卷入状况的秘密证词。赛明顿参议员还致函国务卿罗杰斯，要求把戈德利大使从老挝调回作证。二月二十七日，《华尔街日报》对使用B-52表示半心半意的支持，但是提出警告，反对进一步升级。三月二日，《华盛顿邮报》也抛出一篇措词尖刻的社论，标题是：《老挝：老一套骗人的把戏》。

参议院和新闻界为弄清老挝问题“真相”而进行了许多个月的运动，现在达到了高潮。问题不在于获得事实——事实已是众所周知的——而是要诱使政府公开证实这些事实，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工作人员调查和秘密听证基本上已经掌握全部情况。新闻界也差不多，他们已经给公众提供相当准确的报道。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在于正式承认我们在老挝的行动会在什么程度上毁掉一九六二年协议的残余部分，使河内进一步加紧在老挝北方进行侵略有词可借，并在国内煽起更激烈的争论。

两党分别领导的前后三届政府之所以都对我们在老挝的作用“讳莫如深”，正是因为每一届总统都希望使这种作用保持一定限度。公开地、具体地说明这个限度，正如具体说明我们卷入的程度一样，都会危害这个战略。当时我们受到压力，要我们把两方面的情况都公布于众。从批评者的观点来看，提出这个问题的好处在于可以借此非难我们在越南的整个事业。如果老挝垮台导致越南垮台，某些人甚至会认为是一种额外的收获。他们要求得到的不

是事实，而是弹药。

尽管存在这些危险，我们仍然认为需要发表某种正式声明，阐明我们对老挝的政策和意图。导致这个结论的推理有点拜占庭的气味。莱尔德要求发表公开声明，以免国务院走漏风声，使他成为替罪羊；因此，解释必须由其他任何部门出面去做，但绝不能由国防部去做。出于同样的理由，罗杰斯反对由国务院介绍情况；他不想为老挝问题冲锋陷阵。他建议公开发表国务院过去在赛明顿小组委员会上提供的秘密证词。赛明顿的表现是高尚的。在离现在已经很久的那些年代里，许多国会委员会还把向他们介绍的秘密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赛明顿不愿不经政府同意就发表保密情报。但如果政府表示同意，就会破坏秘密听证会的惯例和原则。将来只要掀起一场公开争论就可以迫使人们把秘密证词公之于众；这对于不友好的委员会永远是一种诱惑，使它不禁要对秘密证词进行组织安排，造成极为不利的宣传效果，然后强迫发表。

我在送呈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老挝，真正的问题是同越南密不可分的：

——只要北越愿意为破坏一九六二年协议支付政治上和心理上的代价，他们无疑可以在他们高兴的任何时候席卷老挝。

——如果北越席卷老挝，我们关于越南冲突的整个交易将遭到破坏。事实上，如果北越在老挝的军事行动取得足够的胜利，使富马相信他必须屈服于北越的影响才能生存，我们可以预料他将拒绝允许我们继续轰炸胡志明小道，结果我们在南越的军事行动将受到灾难性打击。

——这是基本的考虑，其他一切都不过是胡说八道……。

——要做到这一点，国务院认为最简单的办法是发表赛明顿小组委员会上的证词。我们可能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可安抚赛明顿、富布赖特和其他人等，又使公众了解我们行动的真相。

——另一方面，发表证词中敏感部分是否能安抚这些参议员是值得怀疑

的。老挝情况的真相以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他们是了解的。内部会议已使他们了解一切……。

——发表证词将使北越可以用文件证明它的说法，即我们正在违犯日内瓦协议，而用不着承认他们违犯这些协议，从而严重破坏我们行动的真正基础。

这样做还会使苏联人更难于保持他们目前对老挝王国政府采取的比较友好的姿态……。

——在老挝问题上屈服，就会在有关其他国家的问题上损害政府不发表记录敏感部分的立场。我们可能会打开一个名符其实的潘朵拉魔盒，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对外关系上给自己带来一连串难题。人们无法再相信我们维护国际协议尊严的诚意，谈判这些协议的外交使者的作用也将受到损害。我特别担心泰国的反应，他们已经在怀疑我们对他们承担的义务。

二月二十七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了我们在老挝问题上的公开立场。使内阁成员大为宽慰的是，会议决定由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起草一个声明，由白宫发表。为什么我当时会同意这种使白宫每逢事实性争论都处于直接承受批评火力的地位的做法——是由于官僚主义缺乏经验，或仅仅是由于无穷无尽的推卸责任的企图使我感到精疲力竭——现在事隔已久，无法确定。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很快就着手起草解释我们卷入老挝情况的公开声明。为了避免显得过分被动，我使声明在形式上看起来是一个新的建议，即建议日内瓦会议两主席英国和苏联召开一九六二年协议签字国会议，为老挝中立提供新的保证。我对开会并不抱幻想。伦敦和莫斯科当时都不大想暴露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三月六日发表的这个声明，充分而坦率地陈述了美国卷入的情况以及从肯尼迪政府以来一直秘而不宣的理由。但是，声明里有一处不准确，因此引起轩然大波。造成不准确的一部分原因是

各部门(由于他们不会受到攻击)在为我的工作人员提供全部细节时不够审慎,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货真价实的官僚主义的粗枝大叶。尼克松原来认为,要证明美国人并没有卷入老挝地面战斗,最好的办法是着重指出没有任何美国人在这种活动中阵亡。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完会以后,他对我说:“B-52轰炸老挝,谁也不会放在心上。但对我们在老挝的士兵,人们是担心的。”声明是由新担任我的特别助理的温斯顿·洛德——后来成为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负责起草的。他和其他工作人员经过同各部门仔细核对,得到的印象是:没有任何美国人员在老挝阵亡这个说法需要斟酌的唯一原因是偶尔从越南进入老挝南部的美国侦察小组出现过一些伤亡。小组的任务是观察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骚扰胡志明小道的渗透活动(代号“燎原行动”)。这种行动同越南战争有明显联系,而同老挝北部的战斗毫无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可以容许这样一种说法,即“从来没有任何驻在老挝的美国人在地面战斗中阵亡”。

把将近十年的事情说得这么绝对当然是一种缺乏经验的迹象。谁也无法肯定官僚机构尘封的角落里隐藏着什么事实会突然冒出来。很快我就得到一次教训,懂得了说话过于绝对的危险。

三月六日发表声明之后,官僚机构突然开始向报界透露它不愿向总统提供的情况,即过去九年内的确有极少数派驻老挝的平民和非战斗军事人员因被流弹击中丧命。三月八日,白宫被迫承认现在已从国防部获悉,一九六九年初以来有六个平民和一个“未参加战斗”的陆军上尉在老挝被打死。在这以前的五年中,平均每年约有四个美国平民在老挝被打死。三月十日,国防部又殷勤地宣布从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以来在老挝服役的美国军人就有权获得“火线津贴”。至于谁应当对这些错误负责,后来进行了调查,结论不出所料:错误是一连串误解和互不通气造成的。洛德在事后分析时回顾了起草过程,也回顾了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

人员之间的讨论；这种分析并不能反映这位聪明正直的人在担任我的特别助理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职务时最初几个星期经历的巨大痛苦。

尼克松认为这是我曾经吹嘘过的工作人员造成的失误，因此大为光火；有一个星期我都见不到他。我承担了全部责任。三月九日，我给莱尔德写了一封信，并抄送总统：

亲爱的梅尔：

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希望告诉你，你的回忆是正确的。你的工作人员曾经两次划线标出没有美国人在战斗中阵亡这句话。我当时误认为他们考虑的是燎原行动，因此对声明作了相应改动。无论如何，防止这种错误是我的职责。我希望你了解，你是没有责任的。

向你热烈致意。

亨利·A·基辛格

当然，报界和国会对当时——在一年有四、五个人非战斗死亡的基础上——称之为已经证实的美国在老挝的军事卷入都显得义愤填膺。公开辩论的焦点是新的"信用差距"，而不是基本事实，即美国卷入老挝的程度显然微不足道，而北越正处于攻势。

老挝的形势不久又出现了一个严重转折。共产党部队已挺进到通往首都万象的最后一个要塞龙镇地区，威胁到领导苗族抗击共产党统治的王宝总部。共产党向湄公河进军已迫在眉睫，因此泰国表示：如果老挝政府提出要求，它愿意派志愿人员到龙镇去。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举行的两次会议上，国务院极力反对这个建议，其他部门也只表示半心半意的支持。当我们收到老挝和泰国双方政府的正式请求后，总统推翻了各部门的意见。他深信拒绝这个建议会使泰国怀疑我们承担的保卫泰国的义务，还可能使

富马惊惶失措。我同意这种看法。三月二十六日，我把总统的决定告诉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

三月二十七日，老挝政府发动了反击。这次反击得到泰国志愿人员的支援。他们的干预起了决定性作用。三月三十一日，老挝政府部队夺回了龙镇附近的桑通；桑通机场迅即恢复使用，我国飞机开始运去给养。第二天北越部队就从龙镇地区后撤了。

老挝危机就此平息下去，直到年底；老挝北方的政治和军事平衡保持下来了。但是，我国政府内部的分歧已经戏剧化；反对派对我们的疑虑已经非常深切，以至指责我们挑起了我们力图避免的事，连后来发生的事——邻国柬埔寨发生的政变——也怀疑是我们组织的。事实远非如此。

西哈努克的垮台

将近三十年，柬埔寨的政治生活是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暴风雨般的生涯和性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九四一年西哈努克十八岁的时候加冕成为国王，一九五五年逊位，以首相身分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一九六〇年六月，柬埔寨国民议会一致投票推选他担任国家元首。一九五三年领导柬埔寨王国脱离法国、宣布独立的就是西哈努克；他塑造了柬埔寨政治制度并支配着柬埔寨的政策。

作为柬埔寨的领导人，西哈努克善于走钢丝——在世界政治中介于东西方之间，在初露端倪的共产主义分裂中介于中苏之间，在越南战争中介于敌对双方之间，在国内则介于左右两派之间。他说话口若悬河，为人难以捉摸，耽于逸乐——人们通常说他"反复无常"。当血腥的战争使印度支那其他地区生灵涂炭时，他巧妙地把自己的国家保持为一片世外桃源。最后，在一九七〇年，这位

轻捷灵巧的走钢丝演员突然失足跌下，使柬埔寨人民坠入甚至比邻国的境遇更黑暗得多的地狱。

一九七〇年一月七日，西哈努克亲王带着他的夫人莫尼克和十一名随从人员离开柬埔寨首都金边，去法国里维埃拉海滨的格拉斯疗养院休息两个月。他习惯两年一次到那里去"接受治疗"，以减轻他所说的"肥胖病、血液病、蛋白尿"等疾病引起的不适。他出国时把政府托给了他自己挑选的领导人：国民议会议长郑兴(担任代理国家元首)；首相朗诺（西哈努克一九六九年八月任命他担任首相，九月又赞扬他"效忠王室和民族，是我唯一可信赖的人"）*和第一副首相施里玛达。

西哈努克同他自己的政府关系并非一贯融洽。他前几年曾把左派人士搞得名誉扫地，逐出政府（事实上，共产党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曾被缺席判处死刑）。朗诺—施里玛达内阁对他的经济政策，对他无法赶走占领柬埔寨东部地区的北越和越共部队，对他的随从人员贪污腐化，对他在金边开设国营赌场的不得人心的决定也有不同意见。但是在一九七〇年一月，这些争吵似乎都没有严重到足以阻挠他的法国南部之行。

美国更没有预感到会出现什么麻烦。前面说过，我们已经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同柬埔寨恢复了外交关系，并且在那里有一个以劳埃德·里夫斯代办为首的规模很小的使团。从一九六三年西哈努克取消美国援助以来，我们就没有对柬埔寨实行军事或经济援助。此外，主要由于曼斯菲尔德参议员的坚持，恢复外交关系后我们也没有向金边派遣中央情报局人员。一九七〇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上半月，美国政府最上层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老挝已经露头的危机和与此有关的国内争执方面。三月十七日，我同国务院东亚

*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朗诺还作为西哈努克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国庆，在天安门上同毛泽东站在一起。

司的马歇尔·格林和威廉·沙利文共进午餐；我们讨论的焦点是中国、越南和老挝；根据记录，柬埔寨问题甚至根本没有提到。

在西哈努克虽然变幻莫测但却非常巧妙的指导下，中立的柬埔寨保持了不稳定的政治平衡。从美国观点来看，这是可能达到的最好的局面了。当然，河内悍然无视国际法、利用柬埔寨领土向我们的军队发动军事进攻的危险是经常存在的。但是这方面也建立了某种平衡。西哈努克对我们轰炸庇护所如果不是鼓励的话也是默许的；我们则停止从地面上穿越边界作战；河内还继续使用这些庇护所，但代价更高了。我们对柬埔寨内部平衡不稳定的程度也还有一些认识。一九六九年七月三十日尼克松总统和阮文绍总统在西贡见面时，阮文绍很有预见地警告说，如果柬埔寨的平衡由于推翻西哈努克而遭到破坏，最后获胜的将是共产党人：

(尼克松)总统询问了他对西哈努克的看法。阮文绍总统回答说，西哈努克坏，但我们不希望出现比他更坏的人。他又说，柬埔寨只有两个集团能推翻西哈努克，那就是军方和共产党。军方力量单薄，缺乏效率，共产党更有可能成功。即使军方起来反对西哈努克，他感觉最终还会由共产党接管。西哈努克干什么或者能够干些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越南局势。柬埔寨是一个弱国。如果推翻西哈努克，如果我们鼓励推翻他，共产党接管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们同意这种估计。柬埔寨的悲剧在于它内部存在的压力终于破坏了西哈努克力图保持的微妙平衡，让阮文绍曾经准确预见到的那些力量脱颖而出。使这种局面加快出现的因素是北越用来骚扰我们的部队的共产党庇护所。这些庇护所日益激起几百年来曾经目睹越南历代统治者使自己的祖先的国土殖民地化的柬埔寨人的民族主义愤怒；事实上，西贡周围地区是越南人近在十九世纪

初叶才从柬埔寨人手里抢走的。如果后来不是法国占领，很可能整个柬埔寨都会遭受同样的命运。柬埔寨人自古以来就厌恶一切越南人。由于西哈努克不能把令人恐惧的北越人从柬埔寨土地上赶走，这就日益削弱了他的地位。

西哈努克在那个时期发表的公开声明，使人毫不怀疑他把什么人看作对柬埔寨独立的威胁。他曾经一再公开抗议北越"侵略"和侵犯柬埔寨主权。一九六九年六月，即秘密轰炸开始三个月之后，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抱怨说，柬埔寨的腊塔纳基里省"实际上成了北越的领土"，而且"越盟"(北越人)和越共部队已经大量渗入柴桢省。西哈努克主编的《民盟》月刊一九六九年十月号刊载了一篇题为《越共和北越人盘踞我们边境》的文章，以很大篇幅抗议北越的占领；有一幅地图标明了三万五千名至四万名北越和越共军队占领柬埔寨领土的地点(对我们的情报工作不无补益)。西哈努克在该刊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号一篇署名文章中甚至推崇美国在越南的作用。他指出："十分坦率而客观地说"，美国部队在东南亚的存在造成了区域均势，使柬埔寨这样的小国"受到欧洲甚至亚洲社会主义阵营的尊重，如果不能说是受到他们追求的话"。西哈努克写道：如果美国力量撤退，美国在亚洲的盟国无法转向共产党得到补偿，否则无异飞蛾投火，"无论飞蛾是否温驯，最后总是会被吞掉的"。西哈努克在文章结尾对尼克松主义表示了响亮的支持：

新宣布的尼克松主义预计不再使用美军进行干预。这个主义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付诸实施……。但是，他们(美国人)出于自身的利益，将不得不支持深孚众望的民族主义者抵抗新帝国主义，即亚洲共产主义……。如果美国提供援助时不附带条件，也不出兵干预……肯定要比他们亲自出兵更有希望遏制共产主义洪水的泛滥。实际上，他们这样做有助于剪除共产党的颠覆性宣传的力量，因为在外国军队"占领"这个地区的时候，共产党就要号召人们起来造反，争取"民族解放"。……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二日，我把这篇文章摘要送呈尼克松。根据他的指示，我又在二月二十三日把文章全文送给了曼斯菲尔德参议员。

西哈努克十分清楚，从根本上说是谁在印度支那进行侵略。举例来说，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越共从柬埔寨领土上向设在越南的一个美国特种部队的营地开火；美国进行的报复性空袭受到大肆宣扬，据说杀害了大约二十五名柬埔寨人。西哈努克为此对美国提出了抗议；我们的政策是赔偿损失。尽管如此，西哈努克在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一篇讲话中，指出这件事应当由北越承担责任。他说：

> 达丹事件是谁挑起的呢？是从我国领土上向美国人开火的越共。美国人挨了打，生气了，就轰炸我们。那时越共和越盟都溜走了，仅留下高棉居民作为牺牲品。这就是全部真相。……
>
> 号称我们的朋友的红色大国，联合国的欧洲赤色分子，不准我们向联合国提出控诉。……

西哈努克告诉听众，他不会像某些人敦促的那样再次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原因是：如果他这样做，"我们将不得不对越盟和越共采取同样的办法，因为甚至在我们已经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他们还在继续对我国领土进行侵略。"

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二日，西哈努克在法国休假即将结束时宣布他打算在三月份回国途中访问苏联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友好国家"，谋求他们的支持来减少或消除北越在柬埔寨的影响。

但是，西哈努克在他的经历中第一次对局势失去控制。三月八日，柬埔寨柴桢省村民示威反对北越占领。三月十一日，两万柬埔寨青年洗劫了北越和越共驻金边的大使馆。（游行示威显然是

柬埔寨政府插手组织的。）柬埔寨议会两院举行特别联席会议，要求政府重申柬埔寨中立，保卫国土。议会要求扩大西哈努克由于害怕军队造反而故意使其处于虚弱状态的柬埔寨军队。

西哈努克从巴黎给住在金边的母后发了一份公开电报，谴责柬埔寨政府中“某些人”试图“把我国抛入一个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强国的怀抱”。他宣布他打算立即回到金边，“向全国人民和军队发表讲话，要求他们做出抉择”。西哈努克离开巴黎以前就在接见记者时警告北越和越共要么尊重柬埔寨中立，要么就得面对亲美派接管柬埔寨政府的局面。⑥但是，由于从未充分说明的原因，他在巴黎犹豫不决，而金边的局势开始失去控制。三月十二日，施里玛达副首相宣布暂停执行和越共签订的贸易协定，并为柬埔寨军队增加一万名士兵。金边爆发了新的反越骚动，越南人开办的商店和教堂受到攻击。三月十三日，柬埔寨外交部宣布，它已通知北越和越共大使馆：一切属于越南共产党的武装部队必须在两天后、即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五日黎明前撤出柬埔寨领土。

同日，即三月十三日，西哈努克做出了对他的命运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决定。他离开了巴黎，不是象两天前宣布的那样回到金边，而是按预定计划访问莫斯科。为了在国内群众最关切的问题上夺回主动权，他在巴黎宣布：“我即将前往莫斯科和北京，要求他们制止越共和越盟在我国的活动。”他通过高棉通讯社转发了他写的一封信，说他将“对利用军事形势渗入并盘踞我国领土的越南共产党人”进行斗争。尽管他原来打算迅速返回金边，尽管苏联的波德戈尔内主席劝他第二天就飞回国去，西哈努克还是在莫斯科消磨了关键性的五天，就军援问题讨价还价，为抚慰由于得不到任何新装备而感到愤怒的柬埔寨军队做最后的努力。甚至在那以后他也没有前往金边，而是到北京去了。西哈努克在自己的叙述中有些自我辩解地说，他“需要更多时间观察金边形势的发展”⑦，并多次声

称即使他企图回国，也会由于朗诺和施里玛达阻挠而回不去。但是直到三月十八日他自己的议会才抛弃他，机场也是那时才关闭的。西哈努克在乘车前往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途中才从柯西金总理那里获悉自己已被废黜的消息。这使他感到目瞪口呆，因为他的随从都不敢告诉他：拥有九十二名议员的柬埔寨国民议会和王国议会在当天早些时候再次举行特别联席会议时已一致通过解除他国家元首职务。

西哈努克抵达北京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拥抱，还参加了中国人为他举行的宴会，似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周向他保证说，中国仍然把他看做国家元首。同时，在金边，柬埔寨议会把西哈努克留下代理其职务的郑兴任命为临时——而不是代理——国家元首。这不是典型意义的军事"政变"；这是西哈努克自己的政府，就是缺了西哈努克。

数月后，我从让·圣特尼处获得一份描绘西哈努克表现的报告。我是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同北越方面举行会晤前在巴黎圣特尼的寓所见到他的。他透露，就在北越和越共驻金边使馆受到攻击的那一天（三月十一日），他曾在巴黎同西哈努克共进午餐。当时西哈努克计划立即回国——圣特尼深信，如果西哈努克那样做了，他本来是不会被罢黜的。圣特尼深信，使西哈努克改变主意的部分原因是莫尼克公主想去探望他们在布拉格和北京念书的孩子。我认为另一个理由是西哈努克过分自信；他无法相信毕竟是由他提拔起来的那些人会危及他的统治。他还希望莫斯科会通过军事援助和迫使河内撤离柬埔寨的办法帮助他安抚他的军队。最后（西哈努克后来告诉我），他收到他母后从金边来的电报，警告他注意回国的危险性。

如果要对使柬埔寨卷入血腥冲突漩涡的责任作任何估计，就必须从这里开始。就朗诺和施里玛达来说，关键在于他们胆大妄

为，竟敢站出来同受到憎恨然而实力远占优势的北越和越共部队进行大众要求的战斗。就西哈努克来说，关键在于他举棋不定达一星期之久，因为他如果大胆重返金边，亲自出面压倒对手，本来可以扭转局势，对每个人都最有利。这正是朗诺和施里玛达害怕的，是波德戈尔内建议的，也是美国相信和希望的。一旦重新掌权，西哈努克就可以从他传统的地位再次起平衡作用——这种地位就是我在四月二十一日给尼克松描绘过的，“故意把自己摆在右翼的极左一端”。我们几乎肯定会对这种努力给予合作。到三月二十日，形势已如脱缰之马，难以控制了。

美国在这些事件中起的作用并不象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有目的性，也不象其他一些人自诩的那么有效。那一年的头三个月，我们在专心处理老挝问题，也没有情报人员驻在金边，认识已经远远落后于事物的发展。我们既没有鼓励别人去推翻西哈努克，事前也毫不知情。甚至过了许多星期我们还不理解这件事的意义。我个人对当时局势的无知反映在呈交尼克松的两份备忘录中。虽然尼克松每天收到要闻简报，但我直到三月十七日才就反对西哈努克的第一次游行示威（三月十一日）做出比较详细的分析给他送去。一个星期的耽误表明柬埔寨当时很难说是我们优先关注的事。更突出的是我在分析中暗示这一切可能都是西哈努克精心策划的把戏：

> 鉴于施里玛达和西哈努克之间存在尖锐的竞争，可能施里玛达是想使西哈努克面临既成事实，或者是迫使他在施里玛达的立场受人欢迎的问题上进行交锋。另一方面，多年来还从来没有人曾经如此直截了当地向西哈努克挑战，这完全可能是一种精心策划的花招，使西哈努克可以呼吁苏联和中国同他合作，一起敦促越共和北越军队撤离，理由是如果这些军队留在柬埔寨，他就会垮台，被一位“右派”领导人取而代之。

这两个论点——不是共谋策划的诡计就是西哈努克确实面临来自施里

玛达和朗诺的挑战——都符合西哈努克和高棉王国政府最近的表现。

我很难理解金边那些主要演员的动机，一个并非毫不重要的原因是朗诺属于同共产党部队——也就是他的政府现在反对的那些部队——进行走私交易而捞到利益的人。三月十九日，我在送呈总统的另一份备忘录中仍然认为西哈努克可能试图返回金边去收拾残局：

朗诺过去一直满足于充当第二号人物，但这一次看来是对权力直接提出了挑战。他从人民反对越南共产党入侵的怒火中找到了向西哈努克挑战的很好的题目(这场怒火是军队煽动起来的)，不过朗诺同共产党人的交往并不说明他是一个强烈反共或反越的爱国者。

将来的抉择。形势的发展存在三种可能性：

——在军队支持下建立朗诺或施里玛达占统治地位的新政府。这个政府得不到人民多少支持，将不得不通过反越口号和发展经济来收买人心。

——达成不稳定的妥协，类似一二一五年英国贵族同英王约翰之间的休战，允许西哈努克重任国家元首，但权力将受到很大限制。这种局面将是不稳定的，因为西哈努克要设法包围和消灭他的对手，并且可能成功。

——西哈努克使军队转过来反对朗诺，从而取得胜利。

对外交政策和对我们的影响。高棉民族主义已(被)煽动起来反对越南共产党的占领。将来任何政府要同越南合作大概都得更加小心谨慎，更加隐蔽。朗诺选择这个问题做文章，就必须设法公开证明他正在采取行动反对越南人的占领。同样地，西哈努克在一段时间内将不会“对越南人心慈手软”，以免授人以柄。

这将给越共和北越军队造成严重问题。他们将有很多理由对柬埔寨采取更加敌对的路线。

我送呈总统的任何报告都没有谈到过美国情报人员有任何牵

连，也没有对政变表示任何特殊的高兴。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也并不比我更有预见性，一部分原因无疑是该局已奉令不得在金边进行活动。直到三月十八日，即西哈努克被赶下台的那一天，才有一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在华盛顿传阅。报告的要点是：如果西哈努克拒绝接受反对河内的政策，朗诺鼓励的骚动就会成为反西哈努克政变的前奏。这份情报是一个星期以前从一位不便说明身分的亚洲商人那里获得的。这份报告分发过程中的耽误和中央情报局未能预见西哈努克垮台问题，后来成为总统国外情报谘询委员会调查的专题。我回忆不出政变前有任何预料到这次政变的文件曾引起我的注意；我的文件中也找不出这样一份东西。至于指责情报工作失败问题，应当记住：作为政变对象的领导人比我们有强烈得多的理由要了解他本国的真象，而他也没有预料会出现这场阴谋。

三月二十日，尼克松和我讨论了他即将举行记者招待会的问题。我建议他除要求尊重柬埔寨中立外不要对柬埔寨问题发表意见。他同意我的建议，并且说：西哈努克"可能卷土重来，再次接管政权"。在三月二十一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说柬埔寨的形势是"无法预测的"、"流动不定的"，并希望北越尊重柬埔寨的中立。他公开重复了他私下对我说的话，即他仍然认为西哈努克可能返回金边：

……大家知道，我们已在一种暂时的基础上同议会选出的那个政府建立关系；只要那个政府看来是该国政府，我们将继续同它打交道。至于这个政府将朝什么方向发展，**西哈努克亲王回国时将有什么遭遇**，我认为任何猜测都是不成熟的，也是于事无补的。

三月十九日召开的讨论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华盛顿特别行动

小组会议反映了我们优先关注的项目；大部分讨论都涉及老挝。我的工作人员为我准备的汇报材料对由于两名水手叛变而改道驶往西哈努克港、并被柬埔寨扣押的美国船只“哥伦比亚之鹰号”表示的关切不下于对政变长远影响的关切。至于政治形势，他们认为结局还不能肯定，对西哈努克回国的可能性也没下结论。我的汇报材料提出一个关键问题：“朗诺可能更加亲西方的倾向是否能够补偿西哈努克下台可能导致的更加严重的不稳定状态？”

但是，无知并不能保护我们，使我们无需做出决策。政府在柬埔寨问题上甚至比在老挝问题上意见更加分歧。这是毫不奇怪的。尼克松从一开始就赞成采取比较积极的方针。他在我三月十七日的备忘录中谈到朗诺打算给柬埔寨军队增加一万人的那一段话旁边批注：“让我们搞个计划来援助新政府实现这个目标吧！”我还没有执行这个批示，尼克松就把我三月十九日写的、通知他西哈努克已被推翻的备忘录退了回来，并附有以下批示：“我要赫尔姆斯拟定并执行一项计划，为柬埔寨亲美分子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不要告诉三〇三*或官僚机构。要用我们(代号“菜单”的)空中袭击那种办法处理。”三月二十二日，黑格把总统的要求直接转告赫尔姆斯，我确定三月二十三日同赫尔姆斯开会。

赫尔姆斯的答复主要是程序性的。他说：除非让中央情报局在金边设站(中央情报局术语，指常驻办事处)，否则它提不出什么切合实际的建议。他概括地谈到从秘密空运到为朗诺罗致国际支持等一系列可能采取的行动，但暗示中央情报局在掌握更多情报以前无法提出具体建议。因此，总统决定让中央情报局在金边设站。后来发现这件事并不简单，因为国务院极力反对，部分原因是害怕曼斯菲尔德会在国会对它采取什么行动。四月一日，当我外

* “三〇三号”委员会，当时已改称“四十号”委员会，是一个监督秘密情报活动的跨部门委员会。

出休假——说明我并不认为形势岌岌可危的另一确证——的时候，总统把罗杰斯和赫尔姆斯叫到椭圆形办公室，向他们下达了自己的命令：立即在金边建立一个中央情报局办事处。

尽管如此，或许是因为尼克松象他同罗杰斯面谈时经常做的那样说得太简略，要不就是国务院成见甚深，以至无视直接下达的命令，总统的愿望根本没有执行。第二天，即四月二日，中央情报局指定一名官员和一名通讯人员前往金边。但是罗杰斯打电话给赫尔姆斯说他认为这种办法是不聪明的，不过他同意研究如何解决通讯问题。在国务院考虑是否向柬埔寨政府提出正式要求期间，又耽误了一段时间。四月七日，劳埃德·里夫斯代办去拜访了柬埔寨一位低级官员；这种做法最大限度地增加了遭到拒绝或至少是拖延时日的可能性。使东亚司明显感到沮丧的是，对方当场就表示初步同意，并且答应很快发出正式通知。国务院坚持要等待正式答复，并再次采取拖延战术，建议通过商用飞机而不是军用飞机把通讯设备运往金边。

到四月十六日，也就是总统直接下令的十五天以后，中央情报局的官员、通讯人员和装备还毫无动静。虽然尼克松讨厌直接下命令，他在十分激动的时候也会变得粗暴起来。他把赫尔姆斯、他的副手库什曼将军、黑格和我（已经休假回来）叫去，对这种因循怠惰和违抗命令的做法发泄他的愤怒。为了表示不悦，这次会议没有请国务院代表出席。尼克松限定二十四小时内派出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和通讯人员。作为惩罚，他还给了国务院另一个耳光：因为国务院曾经说障碍之一是我们大使馆面积太小，于是尼克松下令从金边撤走一名国务院官员，给他们腾出地方。

我们再次目睹现代国家的奇迹之一，即领导人在控制官僚机器、削弱它们成年累月扯皮的权力方面是相对无能为力的。二十四小时的限期在继续动摇犹豫中消磨过去。整整隔了一个星期，

直到总统又发了一次火才终于有了结果。减少使馆人员的命令则从未执行，因为局势的发展已经走在总统指示前头了。

因此，在四月中旬以前，我们了解或影响柬埔寨局势的能力一直受到严重限制。在柬埔寨两派当中，任何一派获胜本来都符合我们的利益。但是到四月中旬，问题已不再是派系之争，因为西哈努克已于三月底做出他第二个重大决定。他在北京安顿下来（当时我们同北京毫无接触），决定与河内共命运，转而激烈攻击美国。三月二十日，即西哈努克被废黜的两天后，他实际上对新政府宣战了。他发表声明要求举行全国公民投票，抨击把他撤职是“绝对非法的”。他谴责中央情报局勾结废黜他的“卖国集团”造成了柬埔寨的“动乱”；他为北越在柬埔寨的活动辩解，说他们是在“抗击美帝国主义”。第二天，西哈努克发誓要同新政府斗争到底，“直到取得胜利，或是死亡”，并谴责新政府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从那以后，如果西哈努克重新上台，结果就不会是恢复中立主义，而是他新找到的、完全不能由他控制的共产党保护人的胜利。

作为报复，柬埔寨国民议会三月二十一日投票决定，如果西哈努克回国就予以逮捕，按叛国罪论处。金边的报纸和广播连篇累牍地渲染他腐朽的私生活，对他多年来的领导进行攻击。三月二十二日，在一连三天避免对柬埔寨形势直接发表意见之后，北越给柬埔寨新的领导人扣上了“亲美极右集团”的帽子。河内具有权威性的党报《人民报》声称西哈努克的下台是美国策动的。该报郑重表示“我国人民完全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对新领导人）的斗争”。三月二十三日，西哈努克发表五点声明，答应建立一支“解放军”和一个“民族统一阵线”，并吹捧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共产党的反美斗争。

四月初，北越部队和越共部队开始提供他们曾经保证要给予的“支持”。共产党的部队离开根据地，开始深入柬埔寨国土去推翻

新建立的政府。四月三日，北越开始向柴桢省的柬埔寨军队进攻。到四月十日，柬埔寨军队已被迫撤出位于鹦鹉嘴地区的边境阵地。共产党还开始骚扰湄公河的运输。四月十六日，北越和越共部队袭击了金边以南的茶胶省省会。柬埔寨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时间早在美国采取任何行动的几个星期之前。

同时，西哈努克还在四月二日谴责美国是“使印度支那三国出现战争和政治不稳定局面的罪魁祸首”。四月三日，他呼吁本国同胞进入丛林，到“已经在那里建立起来的抵抗地区”去。四月四日，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北朝鲜时，正式表示支持西哈努克的抵抗运动。四月十四日，北京电台报道了西哈努克的“民族统一阵线”已于四月六日在柬埔寨柴桢省正式成立临时委员会的消息。总之，到四月中旬，即在我们采取任何重大行动之前，西哈努克已经破釜沉舟地同共产党携手合作，共产党已经决心推翻金边政府，北越部队已经深入柬埔寨境内发动进攻。

黎德寿在秘密谈判中采取的态度无可怀疑地表明，河内已经把柬埔寨同越南战争正式联系在一起。他强调河内意图推翻金边政府，用河内可以接受的人取而代之，把柬埔寨用作在越南作战的基地。三月十六日，即西哈努克被废黜的两天之前，黎德寿在秘密会谈中指责我们，说五天前金边发生的骚乱是我们组织的。我有力地否定了这个指责。我认为黎德寿火气很大的发言令人十分担心，所以我向总统报告说：“他们有关柬埔寨的发言是令人不安的，可能是要在柬埔寨增加压力的迹象。”

南越突然出现的军事“高潮”只能增加人们对河内总的意图的担心。这次“高潮”打破了从九月份起就一直存在的沉寂局面。三月三十一日，尽管我们还在同黎德寿继续进行谈判，而且提出了使战争降级的建议，北越方面却在南越全境发动了几十次进攻。美国一周阵亡人数高达一百三十八名，几乎等于上一周总数的两倍。

这种情况为我们四月四日在巴黎举行的会谈进入高潮准备了条件。黎德寿再次指责我们，说我们要对柬埔寨的动乱负责；他实际上对柬埔寨新政府宣布了战争：

你们认为可以利用一伙军事反动派推翻诺罗敦·西哈努克，然后就没事了。这种想法未免过分简单。正是你们在那里的行动使整个柬埔寨的人民奋起对美国代理人进行斗争。他们已经对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民族阵线的号召表示响应。高棉人民已经站立起来全力捍卫自由和中立。

我着重地然而徒劳无益地驳斥了他的指责：

我已经没有希望使特别顾问相信我们同金边出现的事态毫无关系，虽然我为他对我国情报机构的高度评价感到荣幸。如果这些情报机构知道我在此地，我就会把这种高度评价转告它们。

这次也有一种简单的检验方法。究竟谁在柬埔寨派有军队？不是美国。印度支那半岛人民的语言天才使我再一次得到深刻的印象。我们曾经发现巴特寮是说越南语的，现在我们又在柬埔寨发现了同样的现象。

你们在柬埔寨保持基地，利用这些基地进攻我们在越南的军队。对此，我们表现了很大的克制。……

我对黎德寿强调指出，美国不希望扩大战争。为此，我建议立即讨论保证柬埔寨中立的具体步骤：

我们准备立即讨论保证柬埔寨中立的明确的、具体的措施，使柬埔寨绝对不会在任何国际冲突中充当卒子。我们愿意同你们在双边范围内讨论，也愿意在国际范围内讨论。……我们准备考虑使老挝和柬埔寨——特别是柬埔寨，因为它是一个新问题——的中立得到保证的各种合理建议。

然而黎德寿否定了关于实行中立或举行国际会议的任何建

议。他断言，印度支那的冲突现在已经成为一体；他甚至根本不愿讨论把战争限制在越南的问题。柬埔寨已经成为一个战区；讨论保持柬埔寨中立问题是河内不能容忍的。早在我们采取行动的三个多星期之前，黎德寿就说：

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越南人民、老挝人民和高棉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保持了传统的团结。这种团结是你们无法破坏的。现在面临美国把战争扩大到柬埔寨的局面，三国人民将不惜任何牺牲，坚持斗争，直到胜利。

按照黎德寿的看法，不可能就柬埔寨中立问题达成任何正式协议。相反，在金边夺权的那个政权必须推翻，“我们不承认朗诺—施里玛达政府。我们支持诺罗敦·西哈努克的五点声明。我们深信，只要朗诺—施里玛达政府继续留在柬埔寨，就不可能解决柬埔寨问题。”

在柬埔寨，同在越南一样，我们当时面对的建议是：打开和平之门的唯一钥匙是推翻现在的政府（虽然包括苏联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继续承认这个政府）。四月六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发言人宣布，联合国将“同有效地控制柬埔寨局势的当局打交道”，实际上是承认了朗诺政府。

在柬埔寨，同在越南一样，河内拒绝谈判并蓄意扩大战争。在柬埔寨，同在越南一样，河内只愿讨论夺取全部权力的问题。因此，柬埔寨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三个星期之前，我们总的说来是宁愿西哈努克继续在位的。现在，如果他通过河内的军事压力、并且作为河内的工具卷土重来，整个柬埔寨就会成为敌人的庇护所；通过西哈努克港的补给线将造成加倍的威胁。正如四月一日的一份工作人员计划书指出的那样，我们最害怕的是“一个受

共产党支配的西哈努克政府为越共和北越部队提供安全的庇护所和后勤基地”。

正当我们逐渐地、无可奈何地认识到由于河内坚持要让共产党统治柬埔寨全部国土、柬埔寨中立已无可能的时候，柬埔寨提出了要求美国军事援助的第一次正式请求。四月九日晚，朗诺的弟弟、金边宪兵司令朗农要求会晤我们大使馆的官员。朗农谈到柬埔寨军队要从三万五千人扩充到六万多人；马上需要十万到十五万件武器，最后将需要二十万至二十五万件武器，包括弹药在内。

美国驻柬埔寨的代办劳埃德·里夫斯认为这些数字是夸大了的；他认为无法对柬埔寨的需要做出估计，因为他们没有提供分类数字，说明他们要求提供什么类型的武器。里夫斯建议华盛顿“认真考虑通过第三方的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如果找得到的话——来提供武器”。朗农的要求最初是通过情报工作渠道加以考虑的，因为我们仍然渴望避免直接介入。秘密供应武器可以避免河内以此为借口发动全面进攻；这种做法本身也限制了我们所能提供的数量。当时大家一致认为，不应当把美国的军事力量和美国武器投入柬埔寨。大家同意，我们的主要兴趣是防止越南利用柬埔寨作为补给基地。我们甚至准备接受朗诺和越共之间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如果这种和解为柬埔寨政府继续生存所必需的话。我们试图按照里夫斯的建议，通过第三方安排军事援助。当时决定：指示里夫斯建立同柬埔寨政府联系的秘密渠道；向法国交涉，鼓励他们给柬埔寨提供更多的援助；探索是否可能找到其他的中间人；请国防部查明南越有什么缴获的共产党武器和弹药可以转让给（一直是用共产党的武器装备起来的）柬埔寨军队。当时并没有授权提供美国军事援助。

里夫斯执行这些指示的劲头是有选择的，同东亚司完全合拍——当时东亚司正热情洋溢地致力于保持一种比柬埔寨政府的

看法更严格的(并且已经被河内完全拒绝的)柬埔寨中立。里夫斯把通过第三方提供援助的建议变成了一篇说明美国不愿直接卷入的学术论文。他向柬埔寨外交部长暗示，法国是提供军需物资的符合逻辑的来源，并以赞成的口吻向国内报告：柬埔寨外交部长回答说，鉴于美国不愿卷入，柬埔寨政府将仅同美国大使馆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触。

共产党人并没有表现类似的克制。四月十三日，柬埔寨在靠近南越边界的贡布省的一个军事哨所遭到蹂躏。四月十三日和十四日，柬埔寨在金边以南的茶胶省的好几处军事阵地都被占领。四月十四日，柬埔寨政府报告，有“数百名”越共军队攻击了金边东北约二十五英里处波萝勉省的戈罗卡。四月十五日，位于蒙多基里省斯雷克顿的一个柬埔寨哨所陷入北越手掌，使沿一三一号公路往东的奥朗镇的联系被切断。同日，位于磅湛省克列地方的一个军事哨所被共产党攻占，使柬埔寨方面无法同横跨七号公路的该省省会棉末保持联系。四月十六日，越南共产党部队进攻茶胶省会被击退。但是他们那天攻占了贡布省的金船镇。同日，一小股敌军进攻了桔井以北的一个哨所和桔井省会南面的川龙。他们的战略显然是要切断金边同各省的联系，从而使朗诺垮台。

四月十四日，朗诺总理通过广播宣布：“鉴于局势严重，从现在起有必要接受任何来源提供的任何不附带条件的外援。”他指责共产党使“有系统的侵略行动升级”。当我把这个情况告诉总统时，尼克松说，他决心不让柬埔寨新政府在共产党压力下垮台。当天我就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会。这个小组的组成和过去基本上相同，但是让更多的工作人员出席，文件也通过正式渠道处理。这种变化说明柬埔寨问题的发展已经超出情报系统的范围，不久之后可能需要做重大决策。

会议组成可能是新的，但与会者不愿美国卷入的情绪依然如

故。我要求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就军援水平和类型问题提出建议，既要从心理上解除朗诺的疑虑，又不要使河内有借口进一步加强攻势。一致的意见是从南越库存中拿出最多三千支过去缴获的共产党 AK-47 型步枪，通过南越渠道送给朗诺，从而保持我们不介入的姿态。包括我在内，大家都认为提供美国 M-1 型步枪的“时机尚不成熟”。正因为如此，我对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说，总统现在还不准备批准提供可供一千人使用的美军装备包（中央情报局有时秘密向友好部队提供的整套小型武器）。当时没有讨论大中型装备问题。国务院甚至连医药用品也不愿公开提供；最后大家同意让柬埔寨自己选择提供这些物资的方式。总之，在北越方面已经走出庇护所、力图孤立金边三个星期之后，美国不多不少只拿出了三千支缴获的步枪，供暗中运交朗诺。我们没有提供其他援助。

次日，柬埔寨政府要求我们给予军事和经济援助，使他们可以把军队扩充到二十万人。这个要求显然超过当时政策范围，也大大超过据我们判断柬埔寨能够吸收的能力。四月十五日又举行了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决定通过一个友好政府给柬埔寨提供五百万美元（然后由我们偿还），而不是正式开辟一条美国军火补给线；这样柬埔寨就有钱到公开市场上购买军火。款额当然是象征性的，同柬埔寨的需要完全不成比例，更低于柬埔寨提出的要求。数以千计的北越军队正在柬埔寨国土上有系统地破坏它的政府的权威，屠杀它的公民，鲸吞它的领土。对于这样一个国家的政府提出的要求，这笔钱很难说是一种英勇的或紧迫的反应。

这是因为外来侵略的方式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北越部队正在柬埔寨全境进攻，特别集中攻击省会和通往金边的交通线。

北越的威胁和尼克松的沮丧情绪都在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总统亲自插手加速对柬埔寨的援助。四月十六日，在同赫尔姆斯

和库什曼举行的、主要讨论建立中央情报局金边站问题的一次会议上，尼克松下令拨付四十八小时前我曾按照他的指示予以否定的可供一千人使用的整套装备。几天后，他又把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批准的应急费增加了一倍，达到一千万美元。事实上，在河内进一步升级使这些指示失效之前，在尼克松两周后决定对庇护所采取行动之前，这些指示都还来不及执行。

起初出现过短暂的希望。苏联驻联合国常任代表雅科夫·马立克在四月十六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只有举行新的日内瓦会议才有可能找到新的解决办法，缓和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苏联要求召开新的日内瓦会议是一件耸人听闻的大事；它必然使人联想到结束朝鲜战争时的类似情况。美国政府认真分析了这个要求，舆论界也广泛予以重视。这本来是我们最渴望探索的。我认为马立克的发言事前不告诉河内是简直不可能的——特别是黎德寿当时正在莫斯科。我给总统提供了以下几种可能的解释：

——北越的地位比我们的情报所说的软弱；河内特别担心在柬埔寨再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它需要喘一口气。在获得一段喘息时间后，它可能设法中断会议。（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一年至六二年的会议都中断过，时间长短不一。）

——在巴黎一切有效的接触都陷入停顿后，河内感觉需要某种讲坛来认真对付我们。此外，它也可能是想认真对待越南政府，而这只有在较大范围内做起来比较容易。

——任何有关日内瓦会议的谈论（即使还没有开会的苗头）都会限制我们对河内可能采取的任何新的军事措施进行报复。（但是当苏联有些严肃的事务需要在维也纳同我们打交道的时候〔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我们怀疑他们是否愿意这样被人利用。）

但是我们还来不及作出答复，马立克就在四月十八日以苏联

外交官惯用的冷酷方式撤回了他的"建议"——苏联外交官是善于突然变卦的老手，他们变了卦还说这实质上是符合逻辑的正统做法。马立克突然不加解释地把举行日内瓦会议说成是不现实的，还说"美国人必须滚出越南，否则其他问题都谈不上"。谈判之门又乓地一声关上。会议开不成了；美国单方面撤出越南仍然是举行谈判的先决条件。

尼克松对我们反应之慢越来越恼火。他在阅读一份关于柬埔寨内地某山区的一个越共基地的报告时，下令在两小时内用B-52进行轰炸。这道命令多少有点不切实际，因为B-52飞到那里就不止两小时，而且那份报告还没得到证实；此外，在做出其他基本决策之前用B-52深入柬埔寨内地进行轰炸还具有一种不符合我们的愿望的象征意义。他要求掀起一场心理战，把西哈努克同共产党人说成沆瀣一气，使美国对朗诺的支持戏剧化。他过高估计了中央情报局进行"黑色宣传"的能力，更过高估计了这种宣传的影响。这种办法也很快为形势的发展所推翻。

到四月中旬，柬埔寨政变已经一个多月，而美国还几乎纹丝未动。到那时为止，我们还没有提供军事援助或情报支持，我们同新政府也仅保持形式上的接触。政变本身是突如其来的；其后果不仅威胁到柬埔寨的自由，也威胁到我们在越南的整个地位。朗诺政府垮台之后，我们面临的将不是靠近越南边界的狭窄而孤立的庇护所，而是整个柬埔寨都将变成共产党基地，其范围沿南越边界延伸六百英里，并拥有离海岸很近的补给线。越南化和撤退美军的计划将化为泡影。因此，我们是由于既非我们所能预测也非我们所能控制的柬埔寨形势的发展而犹犹豫豫地、无可奈何地被迫支持朗诺的，我们采取的一系列折衷措施也总是落后于迅速恶化的形势。那个时期做过重大决策的所有各方——河内、朗诺、西哈努克、美国——当中，我们的选择自由最小。记录证明，尽管三月

政变也出乎北越意料，他们无疑应对柬埔寨发生的事承担最严重的责任。他们对柬埔寨领土的非法的、蛮横无理的占领破坏了西哈努克那个中立主义国家存在的脆弱团结；在西哈努克垮台以前很久，他们就搞了一个红色高棉来反对西哈努克；当西哈努克流亡国外时，他们又利用他来提高那一小伙匪徒的声誉。四月四日，黎德寿不仅拒绝讨论在印度支那任何地方实行停火，而且拒绝讨论有关柬埔寨中立的任何方案。决定在一个只希望不受干扰的小小的中立主义王国的流血的尸体上打到底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

所以，柬埔寨的苦难具有希腊悲剧式的必然性。共产党人决心夺取全面胜利；西哈努克受到伤害的自尊心使他同过去的死敌联合起来；而我们那时已在撤离印度支那，正在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

但是在局势变得无可挽回以前有过一段短短的间歇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为了维持自己在越南的地位还不得不再采取一个单方面行动来削弱这种地位，因为当时已到做出新的撤军决定的时候了。

四月二十日的撤军声明

表面上，问题很简单。（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宣布的）最近一次撤军是到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五日为止的四个月内撤出五万军队。由于我们已经撤出十一万五千军队，进一步撤军显然将开始严重削弱我们的战斗力。矛盾是一目了然的。撤军有助于医治国内公众的创伤，但这样一来河内就没有必要同我们就脱离接触问题讨价还价了。如果越南化不能填补我们撤军造成的防务缺口，我们不仅可能失掉用于谈判的杠杆，而且可能使南越丧失独立，我们做出牺牲的整个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虽然各部门口头上都支持越南化，到一九七〇年中至少出现了三派意见。国务卿罗杰斯在国内政策方面是有经验的。他对公众和国会的意见非常敏感，然而对美国失败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后果、对根据国内考虑做出的决定可能给我们的谈判地位带来什么影响，则比较缺乏本能的反应。他主张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出尽可能多的军队；至于军事上的影响，他认为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他主管的国务院不断提出使西贡穷于应付的实行政治改革的建议；这些建议主要是为了应付美国国会的压力，而并不符合一个仅具有程度有限的民主传统、遭到数十万敌军和游击队蹂躏、被战争弄得支离破碎的国家的实际情况。

莱尔德部长在总统的高级顾问当中是政治上最精明的。他了解每次民意测验反映出来的公众的矛盾心理：既反对单方面撤军又要求结束战争，把减少我们军队的实力看作是前进的迹象。莱尔德希望同这种情绪保持协调。他愿意使越南化真正有成功的机会，所以长期主张在越南留下几十万美国军队。但是他要求把人数迅速降到这个水平；为了保持公众的信任，他认为重要的是使我们的撤退尽可能显得坚决一些。他还把越南看成是使他难于实现武装部队现代化计划的障碍，认为如果他支持撤军就可以减少国会要他削减国防预算的压力。为了保证实现他选择的方针，莱尔德力图把撤军速度同国防预算套在一起，使撤军方面的任何拖延都必然会减少武器采购——也就是用威胁各军种心爱的新计划的办法使他们赞成迅速撤军。

起初我在总统高级顾问中是最抱怀疑态度的人。但是越南化一旦开始，我就竭力使它获得成功的机会。此外，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的同事并不全都清楚的话——我们在越南化问题上承担的义务正在逐渐减少我们的选择余地。当时许多人建议规定一个期限。这已成为公众和国会辩论的主题，并在政府中层人士

里面获得某些支持。倘若我们愿意接受西贡垮台的局面，我们本来可以采纳其中任何一个建议。但是，如果我们关于美国失败会给全球造成什么后果的谈论是认真的话，我们就必须给南越时间，使他们可以取代美军而不至引起灾难。此外，如果我们想要有节制地使用我们进行谈判的有利条件，我们撤退的战略必须使总统拥有按照敌人的行动加速或放慢撤军速度的某种自由处置权。尼克松也是这么看的。

这些观点分歧有的只是细微的差别，有的则是实质性的。由于各个主要演员对公众的看法都非常敏感，分歧就显得更加尖锐起来。大家都想从撤军计划方面捞一点功劳；谁也不愿为撤军可能带来的失利或失败受到责难。立此存照的备忘录数量激增；它们的作者大概认为历史对主张大量撤军者会采取仁慈的态度。热衷于猎取一切可能的机会使自己得到有利宣传的总统小心翼翼地保持缄默。他害怕话讲多了他手下的人会透露比他准备授权撤退的人数更高的数字，使他在公众眼里处于不利地位。

这是谁也难以胜过莱尔德的一种游戏。莱尔德是一个爱国者，他的一切本能都是要赢得战争；他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了解赢得战争的前景说得再好也是成问题的。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客。他完全愿意支持一项强硬政策，只要不把他看成是这项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就行。发生危机时，他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人物。在紧张地对付危机的时候，他会铺天盖地抛出一系列备忘录，使大家几乎无从了解他的真正意图或——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确切建议。

每一个撤军决定都为莱尔德表演他的惊人绝技提供了舞台。一九七〇年，他很早就开始表演了。二月二十七日，他写信给总统，说明在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会计年度要从预算上为美国对越南的军事行动分配“日益匮乏的资源”将越来越难于做出抉

择。预算情况"按任何合理标准来说都是紧张的"；改变战斗需要还可能造成新的"资源问题"，而为此重新安排资金将"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莱尔德提醒总统说，一九七一年会计年度的预算是根据美军战斗行动和支援活动将要减少的假设安排的，这些约束"相当严重地限制了我们强行增加军事活动的能力"。换句话说，莱尔德既反对进行新的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又力图把任何军事失利说成是由于预算限制而无法进行新的军事行动的结果。

三月十一日，我征求惠勒将军的意见，请他谈谈究竟是一次宣布四个月(当时考虑的最大限度)的撤军数字比较好，还是每两个月一次分两次宣布撤军比较好。惠勒在三月二十日送来一份未署名的备忘录，作为答复。这份备忘录是通过黑格转给总统的，以免通过国防部渠道引起麻烦，也避免肯定会使莱尔德大发雷霆的局面。惠勒建议采取"一气呵成方式"，因为时间放长一点可以把关键部队留到最后撤，更灵活些。但是，他补充说，鉴于"总的形势"尚难逆料，他主张根本"不要进行新的重新部署"。他强烈要求把下次撤军决定搁置九十天。

四月四日，莱尔德提出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再次参加辩论。备忘录的意图是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在越南花的力气是"巨大而昂贵的"。他建议固定每月撤军人数，并相应减少B-52和战术空军活动。莱尔德侵犯国务院的职权范围，建议我们设法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他要求我们建议在越南停火，并提出使老挝和柬埔寨战争降级的有份量的新建议，为巴黎和谈任命一名新的高级大使，或者研究一下法国提出的召开印度支那会议的建议。除此之外，莱尔德保证全力支持总统的政策和计划。

不能责备莱尔德不了解这些方案已经全部遭到黎德寿拒绝；事实上，我们的国防部长在这样一种真空状态中工作正是我们政府管理方法的一个弱点。但是，他在备忘录中提出的问题超出了

他的策略知识的范围。至于他有关军事问题的建议，正如我在作为附件送交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的那样，全都假设敌人的威胁会伴随我们的撤退相应减少。相反的情况倒是更有可能。

整个战争时期，政府内外都有许多人主张避免军事解决而寻求外交解决。但是，赤裸裸的事实是：我们的对手不但不能接受而且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区别。每次我同黎德寿会谈，他都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描绘我们的军事处境如何毫无希望。他认为这是终将迫使我们接受北越要求的"客观"因素。单纯的外交出路是没有的。军事同政治必须保持步调一致，否则两方面都会劳而无功。一九七二年以前，河内从来没有给我们提出可供选择的政治出路；它在谈判中采取的立场是要求我们单方面在很短的期限内撤走，要求推翻西贡政府。河内这么做是因为它相信自己正在取得胜利；只是在军事僵局已经明显之后，它才选择妥协的道路。

我同其他高级顾问一样竭诚致力于政治解决，甚至比他们更乐于提出谈判方案。但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求制定一种可以说服河内进行妥协和谈判的军事战略。确定期限和自动撤退无助于政治解决，而只是浪费我们借以讨价还价的有利条件。我认为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即我们的撤军计划既慢得无法使我们的批评者满意，同时又快得使我们无法取得军事和政治的效果。这根本不成其为政策，而是放弃职守；为了推迟垮台，结果倒会使垮台成为不可避免。

四月八日，艾布拉姆斯将军对形势的估计送到了白宫（事实上几乎三个星期以前就送出了，但是因为他的意见不受欢迎，被五角大楼扣下来供"研究"）。它支持惠勒使撤军暂停九十天的建议，而对莱尔德减少战术空军活动和B-52出击架次的主张表示严重怀疑。艾布拉姆斯强调指出美军的撤退使他不得不把南越部队用于消极防御。因此，B-52已成为他手中唯一的战略后备。四月十

五日，我给总统送去一份备忘录，指出越南化的成果还很“脆弱”，盟国军队的使用已“紧张到接近他们能力的极限”，因此国防预算实际要求的那种大量减少空军活动的做法将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我建议总统下令对越南化必需的空中支援进行研究。四月十七日颁布了一道这样的命令，制止了在眼前危机中减少活动的做法。但是秋天又开始——以几乎难以察觉的方式——减少空中活动了，结果敌人在一九七二年发动攻势时我们不得不大量增援。

我认真看待艾布拉姆斯和惠勒要求保持部队水平的意见，特别是考虑到北越已在老挝和柬埔寨发动攻势。但我也知道，停止撤军九十天会引起头一年夏天曾经发生过的那种公众抗议，使最后不可避免要恢复的撤军看上去是失败的表现。我的结论是：主要毛病出在表面上一成不变的时间表上。人们期待我们每隔数月就宣布一次撤军，而每次都会在政府部门内部和公众当中引起辩论。这些自我规定的期限正在削弱使我们能够支持下去的力量，使人怀疑我们的意图。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建议尼克松宣布一个巨大的撤军数字，同时把撤军时间延长到一年。我同惠勒将军磋商后提出的总数是十五万人。按每月平均数计算，这比过去略有增加；但是，作为补偿，我建议开始九十天只撤出很少数的人，大部分人计划在一九七一年撤出。尼克松明白这种做法使他在战略上拥有灵活处置的余地，并且可以在公众中造成有利影响。另一方面，他确信如果把他的意图透露给手下的人，就会使自己至少在三方面卷入争论的漩涡：他们会设法把他的计划化为按月固定的数字；他们将要求增加人数；最后几乎肯定会有人把消息泄漏出去，故意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其他的人曾经建议一个甚至比这更大的数字。

结果是一局错综复杂的官场棋赛：尼克松在我的协助下一面向业已确定的方向移动棋子，一面故布疑阵使他的内阁摸不清他

有什么打算。我们首先需要了解邦克和艾布拉姆斯的反应。四月六日，我通过秘密渠道给他们发了电报：

……任何宣布如果大大低于过去已经定型的格局，都可能给我们同国内批评者的关系造成重大困难。因此他考虑宣布的决定是在今后一年内至少撤出十五万人，但今后几个月内如果要撤的话也只是象征性的。你们对这个方案的影响有什么看法，盼告。

四月八日，艾布拉姆斯和邦克通知我说，如果在一九七〇年内军队大部分留下不撤的话，那么一年内陆续撤出十五万人的方案是他们并且按他们判断也是阮文绍总统可以接受的。此外，邦克和艾布拉姆斯坚持B-52出击架次必须保持尽可能高的水平，特别是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军队人数迅速大量减少的时候。

此时，华盛顿官场游戏的复杂性达到了新的高度。总统撰稿人开始为宣布新的撤军起草讲稿，但把人数和时间空着不填。四月十一日，我通知邦克和艾布拉姆斯现在总统需要取得阮文绍同意。我强调必须“绝对保密”，因为在华盛顿除尼克松和我以外谁都不知道总统的意图；邦克必须向阮文绍强调指出防止走漏任何风声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政府各部门也在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和意愿给邦克下达指示，使用的数字同正在通过秘密渠道磋商的数字大相径庭。邦克和艾布拉姆斯在使这两套指示保持有条不紊方面干得真了不起。阮文绍同意了我们的方案，但在时间和飞机架次问题上保留了艾布拉姆斯和邦克原先报告过的那些条件。

四月十七日，尼克松前往夏威夷欢迎返回地球的“阿波罗-13号”宇航员。为了密切注视柬埔寨局势和撤军问题上的策略斗争，我没有陪他去。太平洋美军司令约翰·麦凯恩海军上将在檀香山向尼克松做了详细汇报。这位性情执拗的猛将的举止风度、火爆

脾气和说话方式简直同水手波拜*一模一样。他的儿子成为河内战俘已经好几年了；这个悲剧并没有使他畏缩不前。为了取得他的本能和教养所要求、然而政治现实不容许他得到的胜利，他进行了斗争。麦凯恩使尼克松明确看到老挝和柬埔寨存在的危险，使尼克松更加坚信撤军计划必须灵活。

四月十九日晚，尼克松和我在圣克利门蒂重新会合。尼克松在远离内阁成员三千英里的地方向报界宣布他将在第二天晚上就驻越美军重新部署问题发表演说，但拒绝吐露任何内容。我们被来自华盛顿、特别是来自莱尔德的电话弄得应接不暇。尼克松拒绝接电话。他指示我在第二天早晨告诉莱尔德和罗杰斯，说他正在考虑只宣布每月撤军数字而不讲总数——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他的目的是避免泄漏他已决定的总数或其他任何数字。

四月二十日下午很晚的时候——那时要把消息泄漏给电台晚上的新闻节目已经来不及了——我从圣克利门蒂给莱尔德和罗杰斯打电话，告诉他们总统的决定是：一九七一年春季结束以前撤出十五万人，其中六万人一九七〇年撤出，其余九万人一九七一年撤出。在一九七〇年的人数中，大部分要在八月一日以后撤出。四月二十日，尼克松宣布了他出人意料的决定。这是我们借以维持我们在越南的努力的精心杰作之一。它既满足了制定撤军日程的政治需要，又满足了在未来三个月内，在河内部队进攻柬埔寨并在老挝挺进的关键时期保持尽可能多的军队这种军事上的需要。无论官僚机构施展过什么计谋，无论每月撤军数字有过什么起伏，事实仍然是事实：我们已在一年之内作出计划，要把军队从我们上任时发现的最高数字——五十四万九千五百人——整整减少二十六万五千五百人。

---

* 美国漫画中的人物。——译者

罗杰斯拥护总统的决定；使他感到遗憾的只是由于无法更加频繁地宣布撤军，总统丧失了定期从公众压力下获得喘息的机会。莱尔德要求使撤军速度更均匀些；他坚持要见到尼克松。我把这次约见安排在第二天，地点是华盛顿。尼克松发表声明后立即飞返华盛顿。当他们四月二十一日见面时，尼克松向莱尔德解释说，未来两三个月内“我们必须进行一场激烈的竞赛”，因此不得不推迟撤军。莱尔德表示异议。他说：“我希望你知道你存在一个财政问题。这你是知道的，是吗？”（这是莱尔德喜欢用的一个词，无论别人是否能够弄懂他刚刚表达的意思——而且特别是在别人弄不懂的时候。）总统说他确实知道。莱尔德对总统说，他必须在十一月国会选举前撤出六万军队，否则“你最好甭搞选举了”。尼克松回答说，别人将按照我们最后离开越南的方式而不是按照一定时期内多少人离开越南这个标准对他作出判断。尼克松说他将“考虑”莱尔德的警告。

当尼克松告诉一位内阁成员他将“考虑”某件事的时候，这几乎总是意味着他希望避免面对面的冲突，然后就会通过霍尔德曼或用备忘录的形式确认他原来的决定。情况果然是这样。第二天，即四月二十一日，*尼克松给莱尔德送去一张简短的便条，后面签上他姓名的缩写：

致国防部长的备忘录：

经过我们昨天下午的讨论，我希望重申我的决定：今年重新部署的军队不得超过六万人。应按此制定计划并于五月一日前呈报给我。

在我重新审查计划以前，不应安排进一步撤军。

莱尔德表面上欣然接受了这个决定。但是他十分了解自己的

---

* 时间可能有误，因为前面说尼克松同莱尔德见面是四月二十一日。——译者

上司，所以会在比较有利的时机重新提出争论。八月，他使总统相信如果要使柬埔寨行动的胜利引人注目，最好的办法是——同总统原来的打算完全相反——在一九七〇年底以前撤出九万人，一九七一年再撤六万人。莱尔德达到了目的。尼克松默认了这种做法，部分是因为他讨厌不断争论，部分是因为国会选举已迫在眉睫。

我如此不惜篇幅讨论撤军问题是因为它可以深入说明两个有关的难题：一是我们想要摆脱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场战争、而又受到毫不妥协的国内反对派和毫不妥协的河内两头夹攻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一是尼克松政府的领导作风问题。

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同公众辩论的性质之间存在的鸿沟反映了我们的越南政策左右为难的情况。我们面临的现实是敌人在老挝和柬埔寨的攻势威胁到我们在南越的军事地位。然而在客观威胁日益增加时，人们却要求我们继续实行单方面撤军计划。公众辩论的焦点集中在我们是否有在另外两个遥远的国家里不知不觉承担新的"义务"的危险。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只有防止这些国家垮台才能加强南越人的力量，使他们能够收拾我们撤军造成的残局，而不致溃不成军。公众的辩论否定一切军事考虑，认为军事方面的努力都是徒劳，同我们的外交希望达到的目的不是毫无关系就是不协调的。（这种看法对武元甲将军肯定是新闻。）我们同黎德寿的接触已足以使我们懂得，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军事战略，就谈不上有效的外交。

至于尼克松的领导作风，他是愿意面对现实做出决定的。一旦确立自己的信念，他敢于毫不留情地抓住核心问题；但是每做出一个引起争论的决定都使他更感到无限孤独。他确实几乎没有办法面对意见不同的人，也害怕去说服或鼓舞他的下级。他躲在自己织成的茧里独自做出决定，而不愿和意见不同的人交换意见。

这是一位在作出决定方面坚强有力、而在实行领导方面不能坚持到底的总统的矛盾。决定的制定和执行给他和其他人留下了这么多伤痕，以至政府部门的团结成了总统职权祭坛上的牺牲品，事与愿违地促使刚愎自用的下级尽量规避执行他的指示。尼克松不屑做任何努力来灌输集体精神，并且一般不吐露自己的打算，等于鼓励他的内阁夸大本部门的自主权。反过来这又加强了他认为官僚机构不支持他的信念；这个官僚机构确实也很少为执行他的命令的精神特别卖力。这一切已经成为恶性循环：总统越来越向自己孤独的壳中蜷缩，使主要决定权日益集中于白宫，反过来又增加了他任命的人当中存在的愤懑和对抗情绪。

不久之后，这种程序就会受到另一次危机的考验，使白宫再次处于漩涡中心。如何对待柬埔寨已经到了非做出决定不可的时候了。

进攻北越的庇护所

历史学家很少对政策制定者心理上承受的压力给予公正的评价。他们能够得到的文件是为各种不同的目的写的，发表时受到当时条例的限制，日益粉饰现实，并不都能说明决策时的情况。至于各种意外事件、各种难以捉摸的因素、担心和犹豫加在一起造成的影响，则是任何文件都无法说明的。

一九七〇年三、四月间是非常紧张的时期。我同黎德寿的谈判看不出会有什么结果，令人十分恼火。我们面临的局面是：老挝看来出现了一场重大攻势；柬埔寨政变和接踵而至的北越在柬埔寨全境出击；还有苏联战斗人员出现在埃及——这是它第一次在卫星国范围外冒战斗的风险。当这些事件纷至沓来时，总统日益烦躁。尼克松把自己受到的挫折归咎于官僚机构在执行他的愿望

时办事拖沓、反复无常，又把这种状况说成是三十年民主党统治的流毒。霍尔德曼逗趣说总统的“情绪好极了”；他们在电话中一个问题还没谈完，尼克松就把电话挂断了好几次。

四月十三日，正当柬埔寨形势即将出现决定性转折时，节外生枝发生了一件使尼克松大伤脑筋的事——阿波罗-13号发生了故障。四月十一日这艘宇宙飞船发射不久之后就可看出它运转严重失灵，宇航员可能不得不乘坐为在月球短暂着陆设计的狭窄而脆弱的登月舱环绕月球飞行。我是晚间十一点钟左右获悉此事的。我想设法通知总统，但却受阻于霍尔德曼为确立自己的权威而制定的一种愚蠢规定：没有他的明确授权不得叫醒总统。他拒绝为一件在他看来不涉及外交政策考虑的技术问题授权叫醒总统。我警告霍尔德曼说，不让总统了解此事将很难做出解释；他坚持公共关系属于他的职权范围。翌晨，龙·齐格勒不得不从语言上玩弄花招，在不直接撒谎的情况下暗示总统似乎整夜都在坐镇。

在柬埔寨所受压力成倍增长的那个星期，援救宇航员问题占据了尼克松很大一部分注意力。不仅如此，阿波罗-13号事件还使他不得不在四月十七日前往夏威夷，去欢迎在同无限空间的遭遇战中几乎是奇迹般地幸存下来的宇航员返回地球。麦凯恩海军上将的军事汇报说明了我们在柬埔寨面临的风险，也说明了柬埔寨形势给越南化带来的威胁。这次汇报增加了尼克松的不安，促使他更快做出决定。但是尼克松的思想状态首先还是紧迫的客观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是任何认真看待总统责任的人都无法忽视的。后来在水门事件时期，霍华德·贝克参议员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问题：“他知道什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个问题现在同样适用。

四月头两个星期，共产党就对柬埔寨城镇和交通线发动了一系列进攻，现在更进一步升级。四月十七日，森莫诺隆（蒙多基里

省的省会）附近几个柬埔寨政府军哨所被北越攻占。同日，柬埔寨军方发言人宣布，敌军已在前两周内把控制地区扩大一倍以上。四月十八日，柬军一个营在湄公河西岸金边以南二十五英里处遭受重创。沿湄公河再往南，柬军设在兴雷的一个司令部被敌人重兵围困了一个星期。四月二十日，敌军向桔井省的斯努进攻失利。在干丹省，共产党部队暂时占领了金边以南约二十英里的萨昂镇。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即总统宣布撤军的第二天，共产党部队攻击茶胶市并切断从茶胶通往金边的道路。

共产党军事行动的格局日益明显。惠勒将军不在时期代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报告说，在北越和越共的优势兵力面前柬埔寨武装部队"作用极其有限"。他写道："敌人的目标很可能是孤立金边市，从各方面对金边施加军事压力，最后在适当的时候或许把西哈努克弄回来，重新取得政治上的控制。"

共产党的政治压力也在升级。四月二十一日，西哈努克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通过越共秘密电台号召推翻朗诺。同日，西哈努克从北京播发了一个文告。据河内电台报道，他在文告中号召柬埔寨人"立即抛弃和孤立朗诺—施里玛达反动集团，把枪口对准这些卖国贼"。

主张改变政策的人写的历史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个和平中立的柬埔寨受到美国部队猖狂进攻，并被推入一场本来可以避免、但由于美国迷恋军事解决而未能避免的内战中去。事实并非如此。西哈努克早在三月二十日、即他被推翻两天之后就对柬埔寨新政府宣战，同曾经被他搞得走投无路的共产党人站在一边，并在北京安顿下来——北京当时仍被认为是全世界最革命的首都，而且我们同北京没有任何联系手段。四月，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进攻，企图推翻柬埔寨现存政府结构。黎德寿已经在三月十六日

拒绝了使军事活动降级的一切建议，四月四日又拒绝了有关中立化的一切建议。他声称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人民是一个整体，他们将并肩战斗，直到在整个印度支那赢得胜利。到四月下半月，北越方面已经在有计划地扩大他们的庇护所，把这些庇护所合并成一个“解放区”。他们正在包围金边，切断通往金边的一切道路——使用的正是五年后导致金边陷落的那种战术。

如果这些措施通行无阻，迄今一直局限于靠近越南边界的一些狭窄而荒无人烟的地区的共产党庇护所，就会组成一个大的联成一片的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将拥有一定的纵深并且有一个使他们可以迅速调运部队和补给品的后勤系统。四月二十一日，我对一批共和党参议员说：我们本来宁愿要原来的西哈努克政府。但是西哈努克的历次声明几乎无可怀疑地表明，我们已经失去做这种抉择的机会。如果朗诺倒台，重新上台的西哈努克将领导一个共产党政府，而不是保持中立，在相互对立的各种势力之间起平衡作用。他本身的需要(以及他受到伤害的虚荣心)将使他不得不清洗过去他曾经借以在对立各派间保持行动自由的温和派；他将被降为一个挂名元首。西哈努克港将重新对共产党补给品开放。在南越的整个南半部，安全状况将急骤恶化。

到四月二十一日，越南侵略成性的行动已经使基本问题暴露无遗。这个问题就是：越南化仅仅是用来掩饰美国失败的一种托辞、抑或是一项用来达成光荣和平的严肃认真的战略？如果是前者，则撤军速度和邻国局势都无关紧要；事实上，任何加速南越崩溃的事态都会使我们因祸得福。某些反对派，如乔治·麦戈文参议员，采取的就是这种立场。虽然我认为这种立场违背国家利益，它还是合乎情理的，是诚实的。使我百思莫解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自称存在一条中间道路，既可避免越南的崩溃，又可无视共产党即将接管柬埔寨的事实。

如果河内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征服了柬埔寨，这将给南越致命的一击。这一点是没有人真正怀疑的。当战争仍在进行时，它的主要盟邦却在加速撤军和减少空军支援。正当河内增加援军使战斗力大大超过前一年水平的时候，却要求西贡接受这种严峻考验。如果此时此刻柬埔寨变成一个统一的武装营地，灾难将是无法避免的。西贡需要时间来巩固和加强它的部队；美国必须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对敌人保持可靠的威胁；必须减低河内渗透的速度，摧毁它的补给品，从而削弱它发动攻势的潜力。这是越南化、美国撤军和河内攻势三方面进行的一场竞赛。

战略上无法把柬埔寨看成一个与越南无关的国家。一九七〇年，柬埔寨本国的共产党部队——杀气腾腾的红色高棉——规模尚小，而且完全依靠河内提供补给。从柬埔寨那边威胁南越和美国人的部队全都是北越的；那里的根据地是越南战争的一部分。正在为切断交通线忙个不停的北越部队已经占领柬埔寨四分之一国土。所谓"在柬埔寨陷入新的战争泥坑"的危险是荒诞的说法；在柬埔寨碰到的敌人就是在越南碰到的敌人。无论我们在柬埔寨对什么部队作战，我们都无需再在越南对付这些部队了。反之亦然。正如黎德寿宣布的那样：战争当时已经成为一个整体；柬埔寨之所以出现动乱，正是因为河内决心用它作为入侵南越、在印度支那建立霸权的一个基地。

到四月二十一日，我们已经面临严峻的抉择。我们可以让北越席卷整个柬埔寨，使柬埔寨成为整个战场无可争议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可以从空中和海上发动进攻——甚至罗杰斯四月二十一日也对我说：如果共产党接管了柬埔寨，他认为那就应当取消一切轰炸限制。另一种办法是：我们阻止他们吞并柬埔寨，支持得到联合国以及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大多数国家承认的政府的独立。*

四月二十一日以前没有考虑过进攻庇护所问题。最后决定是

四月二十八日做出的。因此，要了解何时谁知道什么，就需要比较详细地回顾一下做出决定的过程。

四月十八日麦凯恩海军上将向尼克松做的汇报无疑已使尼克松在柬埔寨问题上开始萌生的忧虑明确起来。尼克松担心的程度已足以使他要求麦凯恩四月二十日到圣克利门蒂去给我做一次同样的汇报。毫无疑问，前一星期连续用脑过度使尼克松变得有点

---

* 十分有趣的是，我们的柬埔寨政策的一个最固执的批评者对我们当时面临的抉择也是这样分析的：

> 早在三、四月间，政府在怎样对柬埔寨事态做出反应方面曾经有过选择的自由。如果政府当时决定不鼓励朗诺、更不用说去武装朗诺的话，它本可以促使西哈努克重新上台、至少是促使朗诺设法维持柬埔寨残缺的中立地位。这可能不是华盛顿理想的解决办法，它很可能意味着建立一个受河内控制的政府，至少要让共产党继续使用西哈努克港（已被朗诺重新命名为磅逊）和那些庇护所。但是，正如遭到封锁的《全国情报估计》指出的那样，除非永久占领，否则这些庇护所对南越政府永远都会是一个军事难题；从地理和革命战争方面来看，都是如此。⑧

这段话之所以有趣，首先是因为它集中反映了对一九七〇年柬埔寨事态的各种错误看法。我叙述的情况无可怀疑地说明我们并没有鼓励朗诺；在北越军队蹂躏一个中立国家几个星期之后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武装朗诺。由朗诺恢复柬埔寨中立地位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黎德寿已经明确加以拒绝。此外，西哈努克当时的地位已经使他不能保持中立了。过去他的政府是由朗诺派组成的，将来他也需要有这一派的核心人物才能同他新结识的红色高棉"朋友"保持均势。但是他只有摧毁朗诺派才能重新上台。因此，我们面临的实际前景恰好是前面引用的那段话描绘的最可能出现的结局：重新开放西哈努克港，金边成立受河内控制的政府，重新开放的庇护所现在将包括柬埔寨整个东部地区，而不再是一条孤立而狭窄的地带。那段话同我的看法截然不同之处在于它断言我们有过"选择的自由"。我们恰好没有这种自由，因为它描绘的那种前景意味着印度支那军事力量对比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南越的生存将是一种势不可挡的、无法克服的、决定性的威胁。

至于所谓"遭到封锁的"《全国情报估计》，那是另一个虚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从来没有"封锁"或压制过任何情报估计。这种估计照例发给一切主要部门。中央情报局送来的情报在每次考虑政策时（包括就柬埔寨问题做出决定前进行的考虑）都是一个重要因素。尼克松四月份至少在三次国家安全委员会或阁员级讨论中听取过赫尔姆斯局长详尽的汇报，更不用说他私下还三次会见过赫尔姆斯。

神经质了；但是这一点并不能改变事实，即他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在前往圣克利门蒂同他会合途中，我得出了同样结论。我看不出我们怎么能够袖手旁观、瞧着柬埔寨倒下去而不同时瓦解我们在越南的全部事业。要不是麦凯恩在某种意义上先我一步的话，我本来也会向尼克松提出这个问题。尼克松返抵华盛顿后第一个行动就是确定四月二十一日上午七时同赫尔姆斯和我开会了解最新情况。赫尔姆斯的汇报说明北越正在柬埔寨全线出击，金边要长期顶住这种进攻是不可能的。在讨论我们(微不足道的)反应执行情况时，尼克松发现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四月十五日批准、后来不久又被他加了一倍的那笔为柬埔寨购买武器的五百万美元，由于官僚主义的拖沓仍未拨出。他四月一日下令、四月十六日又坚持拨给中央情报局的通讯设备也没有运出。尼克松暴跳如雷，下令立刻把钱拨走。他决定第二天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确定总的战略。

在准备过程中，我问威斯特摩兰将军，让南越部队进攻庇护所是否可行。他认为能起作用，但如无美军支援就不能起决定性作用。我还通过秘密渠道给埃尔斯沃思·邦克发去一份电报，要求了解他和艾布拉姆斯对西哈努克重新上台或共产党在柬埔寨获胜可能造成的军事、政治和心理后果的“真实判断”。同时，我请他们就可能采取的对策提出建议。

从二月份起，南越方面就考虑在我们的后勤支援下偶尔稍稍越过边界——越过三英里左右——打进庇护所去，行动规模不超过一个连，目的是搜寻武器贮藏所。黑格将军一月份访问南越后报告说：越过柬埔寨边界几英里处就有敌军补给品贮藏所；这些贮藏所离居民区太近，所以B-52不能把它们当做轰炸目标而又保证安全。莱尔德二月份访问越南时已经授权艾布拉姆斯将军为南越部队穿过边界短途出击提供后勤支援。三月二十七日南越部队

就进行过一次越界作战，报界已予报道。第二天他们再次越界作战，也报道了。三月二十八日，白宫新闻秘书龙·齐格勒宣布，现在已经授权美军战地司令官在美国部队受到威胁时可以越过柬埔寨边界。

我获悉第一次越境作战的消息时，就要求在我们根据新的形势做出考虑周密和协调一致的判断之前，暂时停止这种行动，以免河内以此为借口扩大战争。我不愿让战地司令官的战术决定确定政策。在发出这些指示以后，我就去度我(早就安排好了的)一个星期的假日了。因此，执行这些指示的电报是黑格三月二十七日发给邦克的。电报说：

如果这些行动继续下去，我们就会受到指责，说南越政府正在把美国拖进更大的战争。

基辛格先生知道你在这方面并不能自行其是，但希望你能鼓励阮文绍除现行美军作战条令适用的情况外不要采取这些行动。基辛格先生希望你了解：虽然总统理解南越的动机，他担心越境作战会危及我们为保持国内目前对我们总的越南政策的支持而做的努力，这种风险可能超过越境作战带来的军事上的暂时利益。

三月三十日，邦克按照指示会见了阮文绍，向他解释了应当暂停越境作战的理由。邦克对他说：我们的目标是防止战争扩大。阮文绍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三月三十一日，《纽约时报》警告说：柬埔寨政府愿意让盟军越境袭击共产党庇护所一事可能使美国更深地卷入战争。柬埔寨政府随即在三月三十一日“忠实执行严守中立的政策”，正式否认曾授权美国和南越进行这种袭击。

同日，当我仍在休假时，莱尔德往谒总统，对停止越境作战表示抗议。我电话指示黑格在我回来之前设法推迟答复，无论如何

在我四月四日按预定计划会晤黎德寿之前不要授权继续越境作战。总统否决了我的建议。他命令黑格通过秘密渠道指示邦克恢复越境作战行动，条件是不要超过反战大示威以前的水平，并且要同柬埔寨武装部队协调一致。就我现在所能确定的情况来说，四月份头三个星期进行了四次短途越境作战——都在我四月四日会晤黎德寿以后，每次不超过一天。

四月份最后两个星期，共产党部队加紧进攻柬埔寨城镇。四月二十二日，边境城市斯努受到攻击，柬埔寨政府再次呼吁联合国为它反击侵略提供援助。尽管这种侵略明目张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柬埔寨政府的呼吁却同其他所有各次呼吁一样遭到忽视。四月二十二日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华盛顿举行重要会议讨论柬埔寨问题的日子；这一天我还不断收到来自总统的打字信件，其中反映了他与时俱增的激动情绪。

尼克松的第一封信是早晨五点口授的，信中强调必须在柬埔寨采取"大胆的步骤"，并且表示尽管他认为朗诺恐已无法维持，他仍然决心"采取某种象征性行动帮助（朗诺）生存下去"。他认为我们由于担心美国援助会破坏朗诺的中立地位、使北越获得介入的借口，因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正如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及老挝和柬埔寨事件证明的那样，共产党从来不是等到有了"借口"才行动的。总统建议派罗伯特·墨菲大使去消除朗诺的疑虑。"如果我决定采取这个方针"，尼克松说，他就要我向"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所谓朋友派来的某些胆小如鼠的大使"强调指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姿态将告诉我们"谁是我们的朋友"。（信件全文附后。）⑨

同一天收到的第二封信再次谈到这个题目——即我应召见日本、法国、英国和其他友好的大使，对他们强调指出我们指望盟国的支持。第三个备忘录评论了西哈努克最近给曼斯菲尔德参议员

写的一封信。西哈努克拿朗诺政权同希特勒进行了比较。他说："最严酷的意识形态——在基于社会正义的前提下——也比由极端腐朽堕落的人和压迫人民的反动派组成的政权好得无与伦比。……"西哈努克说他决心解放自己的国家，即使"以柬埔寨改变意识形态作为代价"也罢。尼克松指出西哈努克"一切方面都在仿效共产党的路线"；他要我把这封信用谨慎的办法转给罗杰斯和赫尔姆斯。第四封信要我召见苏联代办，警告他说总统已经做出"带有命令性质的决定"，如果共产党进攻金边就要作出反应。

事态发展的速度使我来不及执行这些指示。四月二十二日上午，我后来见到总统，劝他不要派墨菲（或者是他后来建议的迪安·艾奇逊）到柬埔寨去，因为这样做只会引起大量辩论，并且很可能落后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总统说："好吧！无论如何我希望保证柬埔寨不会无所作为就此完蛋。"他接着说："所有到我办公室来的人都是建议如何输掉战争。从来没有什么人来建议如何赢得战争。"总统下令撤换我们驻金边的代办劳埃德·里夫斯，并为短途越境出击提供美国支援。同尼克松要求撤换人的许多命令一样，这道命令是为了表示他的不悦，是并不打算执行的；下级也根本没有执行。

在此期间，我们收到邦克和艾布拉姆斯通过秘密渠道发来的长篇复电。他们勾画了西哈努克作为共产党傀儡重新掌权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越共和北越的士气将得到加强；河内进行持久战的能力将得到提高；南越将出现冲击波；越南化将受到威胁。邦克和艾布拉姆斯建议立即增加短途越境作战次数，同时由美国和南越部队联合对共产党主要庇护所采取行动。

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时实际上提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策略：一种是无所作为（国务院和国防部选择的方针）；一种是只用南越部队进攻庇护所（我的建议）；一种是使用包括美国战斗部队在内

的一切必要的部队，使全部根据地失去作用——这是邦克、艾布拉姆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

大家特别关注两个根据地。柬埔寨柴桢省被称为“鹦鹉嘴”的地区楔入越南直到离西贡仅三十三英里处。在整个越南战争年代里，这个地区为进攻西贡地区和盛产大米的三角洲地区的北越军队提供了藏身之处。由此往北还有一个代号“鱼钩”的地区。我们的情报分析人员相信南越中央办事处——共产党在南方指挥全部战斗的总部——就设在那里；这也是周期性地威胁西贡并不断到邻近的南越西宁省进行骚扰的北越第七师集结休整的地区。鱼钩地区防御坚固；我们认为南越部队的实力要同时对这两个地区作战是不足的。因此，建议仅由南越部队采取行动等于建议仅对一个根据地采取行动。

重大的决策很少是经过深入讨论才产生的。一个问题提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的时候早已经过无数下级委员会分析研究，以至内阁成员起的作用类似早已排练成熟的戏剧中的演员；他们基本上是重复他们的部下已经在其他场合说过的话。尼克松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存在另一个因素，即每个参加者都疑云满腹，认为几乎肯定有什么他不知道的勾当在进行。照例还有一种矛盾心理：既想迎合性格复杂的首长的意图，又害怕国内的影响。任何可能被说成是在越南升级的事都会使他们心情沉重起来。会议桌上谁也不怀疑共产党接管柬埔寨会造成什么后果。但是我们都知道，无论做什么决定，都很可能在国内激起新的愤懑、抗议、甚至暴力行为。如果柬埔寨垮台，我们单方面撤军就更加困难；如果我们接受其他任何选择，又会指责我们在“扩大战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因此，进攻庇护所的初步决定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次气氛沉闷、甚至有点漫不经心的会议上做出的。罗杰斯反对大举越境进攻，即使南越部队进攻也不行，但是他认为金边政府倒台后理所当

然要对柬埔寨进行不受限制的轰炸。莱尔德是短途越境作战最坚决的鼓吹者，但是他反对艾布拉姆斯将军要求把庇护所一扫而光的建议。赫尔姆斯则赞成使庇护所失去作用的任何行动。尼克松通常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完会以后而不是在会上宣布自己的决定；他要经过仔细斟酌，然后用书面或通过中间人发出指示。他这样做是为了强调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个谘询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有人对他的命令表示异议。尼克松这次却一反常态地告诉他的僚属说，他同意由南越部队在美国支援下进攻根据地。由于南越的实力只能进行一场攻势，惠勒建议他们攻打鹦鹉嘴。这就引起了一场关于美国参预问题的争论；莱尔德和罗杰斯力图把美国的参预限制在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甚至连派遣美国顾问或用战术空军支援也反对。

这时，斯皮罗·阿格纽副总统发言了。他认为整个辩论都不得要领。庇护所要末是一种威胁，要末就不是一种威胁。如果拔掉这些钉子有价值的话，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美国作用问题上要那么观望不前，也不理解仅仅进攻一个地区能达到什么目的。我们的任务是使越南化获得成功。他主张同时进攻鱼钩地区和鹦鹉嘴，包括使用美国部队。阿格纽是正确的。尼克松讨厌别人给他提出他没有考虑到的计划。如果有什么比这更使他讨厌的事，那就是当着一群人的面使他显得不如他的顾问们强硬。尽管尼克松对此感到恼火，他机敏地采取了介于副总统和内阁两者之间的立场。他授权为鹦鹉嘴行动提供美国空中支援，但仅仅“在显然必要的基础上”才能这样做。对鱼钩地区他则避免明确表态。这些决定后来用书面发出。会后，尼克松把我狠狠埋怨了一顿，说我事前没有把阿格纽的观点告诉他。事实上，我事前也不知道。现在看来，阿格纽的干预对尼克松最后决定下令进攻一切庇护所并且使用美军无疑起了促进作用。

第二天，四月二十三日，各部门就开始进行部署，都想把必将随之而来的公众抗议导向其他部门。罗杰斯请求批准他把柬埔寨要求提供庞大援助一事通知国会各委员会，理由是可以使预定的作战行动相形之下显得比较克制——当然，看上去倒象是一种避免实行全面军事援助方案的办法。莱尔德要求保证任何美军地面人员都不进入柬埔寨，即使是为尼克松前一天刚刚批准的战术空军支援服务的空军地面控制人员也不行。四月二十三日，我召开了两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安排执行尼克松决定的措施。毫不奇怪，小组成员都是根据他们自己的上司的意见照本宣科。国防部要求每次战术空军出击都得经过华盛顿批准。很难想象有什么打击目标会保持静止不动，一直等到我们完成这么累赘的程序。经过两次会，小组成员多少有点勉强地同意把必要时使用美国战术空军飞机的总的权力交给艾布拉姆斯将军，并授权美国空军地面控制人员随南越部队行动。四月二十四日，尼克松批准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这两项建议。

无论怎么说，北越是不受这种限制的。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四，北越和越共部队攻打了柬埔寨的棉末和安塔松城，并在从斯努镇通往桔井省会的十三号公路上夺取了一座重要桥梁。已被围困数天的干丹省兴雷地区柬军司令部，虽有南越空军支援，仍不得不在四月二十三日予以放弃。柴桢以西一号公路上两座桥梁也被敌人占领。共产党部队四月二十三日开始、四月二十四日还继续对滨海城市白马进行打了就跑的袭击。

共产党在政治方面也采取了升级行动。四月二十四日，根据西哈努克提议，在老挝—越南—中国边境某地召开了“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协调三个叛乱集团的战略。参加会议的有西哈努克、巴特寮的苏发努冯亲王、越共的阮友寿和北越总理范文同。西哈努克四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公布的一个长篇联合声明保证他们要

在“反对共同敌人”——即“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相互支持”。西哈努克在会议闭幕词中还欢呼“人民柬埔寨”的诞生。

这个时期是非常紧张的。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对共产党攻势做出反应，柬埔寨和南越都无法继续生存。但是我痛苦地意识到进攻庇护所必然会造成政治上的动荡，也意识到我的工作班子里存在意见分歧。我有意识地吸收了我所能物色到的最能干的青年男女。我认为使他们的精力和理想发挥作用是很重要的；在我看来，十分关键的是使大批和他们同时代的人以抗议形式表现出来的那种关心也能表现在愿意从事政府为探索和平而进行的比较平凡无奇的工作上。同我最接近的三个工作人员是托尼·莱克、罗杰·莫里斯和温斯顿·洛德。他们都不大喜欢尼克松，从感情上说很可能都愿意要一位民主党总统。我费了很大劲使他们继续工作下去，因为我国面临的问题不是哪个党派的问题，而且我深信他们必须懂得在某些情况下表现美德最好的办法不是堂而皇之的姿态，而是愿意在争取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到来而需要经历的各个不那么美好的阶段中坚持下去。莱克和莫里斯二月份就告诉我他们已决定离开；心情的矛盾使他们不愿再象工作需要的那样加班加点。我让他们继续干下去，搞一些不那么紧张的计划工作，一直到秋天莱克回研究院去、莫里斯参加蒙代尔参议员的工作班子时为止。温斯顿·洛德留下来了；他成为我极可宝贵的合作者和挚友。

就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我为莱克、莫里斯和洛德费了不少时间。在反对我们打算采取的方针的意见中，说理最充分、立论最翔实的意见不是来自各个部门，而是来自他们联名给我写的一份备忘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讲的道理倒使我得出了我本来不太情愿得出的结论，即我们唯一切合实际的选择是摧毁庇护所。他们的基本判断同我一样。他们说，我们的一个主要目标必然是

避免西哈努克重新上台：

如果他重新上台，那将是共产党决定让他这么做的结果，其中包含意味深长的保证，即他将听他们的。……更重要的是，西哈努克作为共产党的傀儡重新上台将在越南和老挝造成严重的心理影响，至少会给阮文绍的反对派——特别是、而且危险的是军队中的强硬派——提供反对阮文绍的论点。

尽管如此，他们的备忘录还是反对美国对庇护所采取军事行动。他们赞成：

由现有领导人或除西哈努克之外的其他领导人主持成立柬埔寨中立政府，同共产党私下达成谅解，让他们象从前一样利用边境地区。这种办法意味着柬埔寨政府将不是公然默认，而是采取掉头不顾的态度。这也包含继续“菜单”（秘密轰炸）行动并继续让越南政府进行防御性越境作战的可能性——而柬埔寨政府对两个越南的部队在有限的边境地区采取军事行动都不积极反对。这种局面虽然不好，但比建立一个积极反对越南政府并公开反对“菜单”等行动的西哈努克政府要强。

换句话说，我的三位年轻朋友和助手认为继续秘密轰炸柬埔寨和越过边境几英里的短距离进攻是必要的，但深入进去则是没有道理的——我现在仍然无法理解这种区分有什么道德上的意义。他们希望得到的结果，即恢复“原状但不要西哈努克”，是有吸引力的，但是无法实现。为了取得这种结果，他们要求我们鼓励朗诺政府同河内妥协，同时警告河内我们将用武力反抗把西哈努克强加于人的做法。黎德寿四月四日已经一再声明河内绝对不同朗诺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妥协是不可能的。更有可能的是，如果我们设法安排这种“解决办法”，这个行动本身就会导致金边的崩溃，使共产党获胜。我也无法想象，为了使河内相信我们将反对西

哈努克而采取的措施怎么能够同妥协一致起来。由于并非我们所能控制、也非我们所能调解的不同力量作用的结果，柬埔寨不幸已分成两个极端。总之，他们建议的办法只是规避做出艰难的抉择，安慰自己的良心，而不能成为行动指南。

我对实际上是我建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即仅用南越部队进攻庇护所的决定，越来越感到不安。阿格纽说得对，我们要末使全部庇护所失去作用，要末就应当放弃这个计划。很难想象仅对一个庇护所采取有限行动、而且南越部队最多只能得到美国极其有限的空中支援，怎么可能使形势发生决定性的变化。我们当时有把各种行动方针的缺点都凑在一起的危险。我们将因为干涉柬埔寨而受到严厉谴责，而在实现战略目标方面又一事无成。

我还来不及把这些看法告诉尼克松，就发生了一椿看来微不足道、但却加快了历史进程的事情。《纽约时报》记者威廉·比彻报道了一份高度机密的电报的内容——这份电报通知我国驻金边代办，我们已经决定向柬埔寨政府提供缴获的共产党步枪。尼克松大发雷霆。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泄密也会使他怒不可遏，而这次泄密在他看来似乎是官僚机构为了造成国会和公众的压力来反对为柬埔寨提供任何援助而作的一次明显的尝试。更糟的是，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尼克松发现他在四月一日和四月十六日两次下令送往金边的通讯设备和中央情报局代表仍然没有出发。

他勃然大怒。四月二十三日晚，他至少给我打了十次电话——三次是我在富布赖特参议员家里非正式会见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的时候。就象他极为激动时惯于做的那样，他狺狺地下一道命令，然后立刻挂上电话。他要立刻撤换我国代办里夫斯；他下令开除马歇尔·格林；念头一转，他的副手比尔·沙利文也得调职；要立刻派一架空军飞机把中央情报局人员送往金边；每一个有可能接触过那份电报的人都应接受测谎器检查；立刻任命一位将军负

责柬埔寨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比较审慎的办法是不要争辩，而是等待二十四小时，看看哪道命令是尼克松平静下来后还坚持要求执行的。结果，他一道命令也没再提过（不过我的确让军用飞机把中央情报局的通讯设备送到金边去了）。但是四月二十三日这场发作终于促使他接受了阿格纽的劝告：同时进攻鱼钩地区和鹦鹉嘴，使用美国部队对付鱼钩地区。四月二十四日上午，他召集参谋长联席会议代理主席穆勒海军上将以及中央情报局的赫尔姆斯和库什曼开会。尼克松要讨论的是在进攻鹦鹉嘴的同时由美国和南越部队联合进攻鱼钩地区是否可行。他以只想听取军事和情报工作汇报为借口，没让罗杰斯和莱尔德参加会议。这反映他对官僚机构磨磨蹭蹭的做法极为恼火。赫尔姆斯和穆勒都强烈主张进攻鱼钩地区的庇护所，认为这样做将迫使北越放弃包围和恐吓金边的努力。摧毁补给品将为越南化赢得宝贵的时间。但是尼克松当时还不准备宣布什么决定，而是乘直升飞机到戴维营去进一步斟酌，考虑用什么办法使内阁同意他越来越倾向采取的方针。在此期间，他把我留下来对付官僚机构。

这种状况有它异乎寻常之处。总统已经开始越来越倾向由南越和美国部队对全部庇护所采取联合行动，而各部门还在为南越进攻其中一个庇护所提供美国空中支援问题上拖沓不前。我认为不让国防部长了解参谋长联席会议代理主席同总统会晤的情况是不对的。因此，我打电话给莱尔德，就说穆勒汇报了军事方面可供选择的办法，包括美军进攻鱼钩地区在内。莱尔德强调在四月二十七日罗杰斯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以前最好避免授权美军采取任何行动，这样罗杰斯就可以如实地说没有任何美国人卷入柬埔寨事件。莱尔德报告说，甚至通常属于鹰派的两院军事委员会也对美国卷入柬埔寨感到不安。他争辩说——后来几天他还多次

提出——艾布拉姆斯和惠勒实际上也反对进攻鱼钩地区。我同穆勒海军上将核对了这个情况，他说他的部长对情况做了错误的理解(穆勒用的海军行话更富有色彩，这里只是转述大意)。

尼克松一旦开始执行一项方针，他的决心之大同他的多谋善断是不相上下的。他决定按照罗杰斯的建议用柬埔寨要求大量援助的前景吓唬国会，但目的是为美军进攻庇护所提供根据，这却是罗杰斯从来没打算做的。

根据尼克松的要求，我请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同我会晤。斯坦尼斯属于参议院中资深位高、选区地位巩固、在多年积累的经验中体现出连续性的那一代领导人。在国内问题特别是种族问题上，他们有时落后于时代精神潮流，但是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却是中流砥柱。他们当中有许多南方人，来自一个自身经历过悲剧的地区。他们懂得国内其他多数地区所不懂的道理：有些灾难是无法弥补的；人类是难免犯错误的；完人是无法设想的；而没有权力的美德是软弱无力的。斯坦尼斯风度优雅、博学明智、富有爱国心，和他杰出的同事理查德·拉塞尔一样，属于那种能够使僵硬刻板的三权分立制度起作用的人。他高尚的品德是当总统的人可以信赖的；内阁成员可以指望他尊重他们的努力。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我会见斯坦尼斯，并且向他解释了为使越南化继续进行下去，从军事上说就必须在美国支援下打进柬埔寨去的理由。我给他看了一幅地图，图上标出了作为越南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那些根据地。在我们谈话过程中，尼克松按照事先的安排给我办公室打来电话。我当着斯坦尼斯的面把我介绍的情况扼要谈了一下，并告诉他斯坦尼斯的反应总的说来是好的。然后，斯坦尼斯接过电话，亲自向总统表示支持。

我又同惠勒和赫尔姆斯一起把计划重新审查了一遍，并要求

赫尔姆斯对可能出的纰漏做一次以防万一的研究。我强调说，如果他有任何犹豫不决都应当告诉我；如果他改变了主意，我将立即转告总统。赫尔姆斯仍然坚持原来的建议。他感觉打两场仗和打一场仗在国内付出的代价是同样的，而两路进攻战略上的报酬则大得无与伦比。

然后我同我的高级工作人员当中那些反对这种行动的人——除洛德、莱克和莫里斯外，还有比尔·瓦茨和拉里·林恩——谈了一小时，使他们有表示反对意见的最后机会。这是一次令人痛苦的会议，因为我们打算干的事给他们刺激很深。莱克、莫里斯和瓦茨提出了辞呈。

从两天前开过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后，就没有从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那里听到什么消息。他们知道存在涉及美国军队的应急计划；实际上，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的进攻鱼钩地区的计划本来就是莱尔德转来的。他们对总统日益激动的情绪不可能毫无察觉；但是他们无法相信尼克松会当真做出决定，授权美军入侵。他们的做法就好象只要他们不提出可供选择的办法、甚至只要他们不提出系统的批评，问题就会化为乌有。

我敦促尼克松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使各个方面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正如我告诉赫尔姆斯的那样："我认为，并且强烈建议，任何决定都必须同这两位内阁成员讨论——即使决定早已做出、命令已经在抽屉里准备停当也罢。在他们有机会表达意见以前，你不能硬要他们接受。"这次会确定在四月二十六日星期天下午举行。

这时尼克松已经决心干下去，他的主要问题是把同罗杰斯和莱尔德不可避免的对抗减少到最低限度。当尼克松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他略带浪漫色彩的气质就会表现出来；他就会把自己看作是一位象巴顿将军那样遭到围困的军事指挥官。但是，撇开个人特

有的气质不谈，尼克松提出的根本问题是：如果西哈努克港重新开放、整个柬埔寨都变成一个庞大的联成一片的根据地，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地继续一步步从越南撤军吗？政府内部那些畏缩不前的人多数是担心国内的反应。至于柬埔寨整个边界都为大规模渗透敞开大门时我们怎么能够继续实行越南化这个困难问题，谁也没有提供答案。无所作为也不能避免我们在国内碰到的难题。如果我们抵抗，人们就会指责我们搞战争升级。但是，如果我们默许共产党接管柬埔寨，我们的伤亡开始增加，越南开始解体，人们又会指责我们执行了一个毫无希望的战略。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六，尼克松把我召到戴维营去审查计划工作进行状况。他在游泳池里扑通扑通打水，我则沿着池畔跟着他。我们讨论了预定在第二天下午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问题。尼克松决心把鱼钩作战计划付诸实施；实际上他还开始开玩笑似地谈到豁出去干一场的念头：或许我们在进攻柬埔寨庇护所的同时应当恢复轰炸北越并在海防布雷。无论我们是否这么干，反对派都会同样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的。我认为这是尼克松为了证明自己态度强硬而倾向于提出、然而实际无意执行的冥想之一，虽然他以后可能以此为例向心腹朋友证明是工作人员拆了他的台。同时，我不认为总统在班子内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能够安然度过如此严重的危机。因此，我回答说，现在的任务已经够我们干的了；我们不能抛弃我们刚刚断然宣布的一个战略。

十分钟后，尼克松就不谈这件事了，以后也没有再谈。我不相信他当时是在认真考虑那种办法。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我们本来应当更认真地考虑一下的。我们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之所以出毛病，祸根就在于优柔寡断；我们总是努力把最低限度需要多少军队或多少时间计算得分毫不差，没有为可能出现误差或混乱留有余地，这就鼓励我们的对手坚持下去，直到我们的疑虑使我们

的努力归于无效。

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最难领悟的一个教训或许是：在使用军事力量方面，他的基本抉择在于要末行动、要末就不行动。半心半意或表现无能并不能使他摆脱因使用武力而引起的道义上的谴责。疑虑重重、动摇不定是得不到报酬的；失败的政治家也不会因为表现克制而得到奖励。一旦投身战斗，就必须取胜；如果不打算取胜，就不要投入国家的力量。在越南战争期间，历届政府及其批评者都没有充分理解这个道理。这是越南战争中许多悲剧的根源所在。

无论如何，戴维营的池畔战略会议并不是当天讨论的结束。我们坐飞机回到了首都。下午接近黄昏的时候，尼克松邀请约翰·米切尔同贝比·雷博佐和我一起乘总统游艇"红杉号"游览波托马克河。严肃的军事计划工作造成的紧张气氛在几杯饮料作用下变成了兴高采烈，甚至使我们做出一些表示爱国但却令人尴尬的事：大家决定在"红杉号"经过芒特弗农*时都要肃立致敬，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同样成功地表演这番绝技的。回到白宫，尼克松又把同他一起饮酒作乐的同事请去看电影《巴顿将军》。我已是第二次享受这种荣幸了。影片无疑是动人的，但我仍然设法在放映中途溜出来一小时，以便为第二天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做准备。

四月二十六日，星期天，北越和越共军队袭击了在通往金边的湄公河上航行的商船，使我们的讨论更形紧迫。共产党部队占领了安塔松城。从金边往南经过茶胶省的铁路线已被分割成好几段。河内和北京发出的新闻报道拒绝了印度尼西亚关于召开亚洲会议、恢复柬埔寨中立地位的建议——这个建议我们本来是会赞

* 芒特弗农是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陵墓所在地。——译者

成的。

那天晚上，总统在行政办公大楼他的工作室里会晤了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顾问——罗杰斯、莱尔德、惠勒、赫尔姆斯和我。阿格纽不包括在内。尽管尼克松现在接受阿格纽的劝告，他对副总统那次出其不意的袭击仍然耿耿于怀，决心要在这次会议中充当铁腕人物。会议从一开始就有点奇怪。赫尔姆斯从情报方面估计河内正在扩大根据地，使这些根据地联结起来，力图给金边造成极度不安全的感觉，从而促使政府垮台。惠勒叙述了使用美军进攻鱼钩联合基地的建议，并谈到使这次行动扩大、把其他根据地也包括进去的可能性。尼克松极力避免同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顶牛，所以装做我们只是在听取汇报。他以后将发出书面指示。使我感到惊讶的是，罗杰斯和莱尔德——他们现在对这位难以捉摸的首长的手法毕竟已经熟悉了——居然同意这种把戏，似乎这不过是制定计划工作的一次演习，都没有表态。但是尼克松为什么要在星期天晚上把高级顾问们召集起来听一次应付意外事件的汇报呢？这个问题他们都避而不提。

尼克松大大松了一口气。他把沉默解释为同意；无论如何，他总算避免了争端。会议刚刚结束，他就把我叫到他的官邸那边去，命令我发出授权美国部队进攻鱼钩地区的指示。我让人起草了一份指示，总统签了字。为了表示郑重，他先在指示上签署了自己姓名的缩写，然后在缩写下面又签署了全名。

总统的双重认可也未能保证指示的贯彻。第二天上午，我正在情况室主持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会、讨论执行总统指示问题的时候，就被叫出去接罗杰斯打来的电话。他想知道他刚收到的指示是否意味着总统已经下令美军向柬埔寨庇护所之一展开进攻。我承认几乎不存在任何其他解释。罗杰斯说这将使他在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打交道时处于非常为难的境地，因为当天下午他

就准备在作证时指出美国没有卷入柬埔寨。我建议他给总统打电话。

我刚回到情况室，另外那位高级阁员就来了电话。莱尔德按照他一贯的策略——即提出一个最易攻破的枝节问题——反对在指示中把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称为“负责执行的机构”。他说这种提法破坏了按照规定必须经过他的办公室的指挥系统。我对他说，可以改成“负责协调”，或者改成他认为合适的其他任何字眼。然后莱尔德才转到真正使他伤脑筋的问题上来。他说同时对鹦鹉嘴和鱼钩地区作战可能使每周阵亡人数达到八百。他争辩说，艾布拉姆斯和惠勒并不认为双管齐下的办法可行。莱尔德坚持说：当惠勒星期天下午谈到对两个庇护所采取行动时，他指的是鹦鹉嘴加上鹦鹉嘴南面很远的一个叫做七〇四号根据地的庇护所（后来发现这个庇护所对莱尔德的意图倒是非常合适，因为在这个季节那里已是一片汪洋）。我建议莱尔德也打电话找总统去。

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刚刚重新开会，我再次被叫了出去。这次是霍尔德曼。他对我说，罗杰斯和莱尔德都已动身到总统那里去。他请我也去参加，但提醒我要“让总统去挑担子”。

总统同内阁高级官员的会晤很有点超现实主义的色彩。罗杰斯首先关心的是他下午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事。他希望能够声明美国人并没有卷入柬埔寨；因此他要求总统撤销他的指示。莱尔德则比较复杂。他再次提出担心伤亡增加的问题；他暗示对艾布拉姆斯的建议存在极大的误解，这个建议实际上指的是那个积水未退的南方根据地。莱尔德再次重申他反对指示的措辞——这一点（他很清楚）我早已承认了。

尼克松说得很少，说也是模棱两可——任何熟悉他的做法的人都知道，这是他决心坚持自己的决定的明确无误的迹象。他宣布休会，对那两位内阁官员说他们很快就会听到他的意见。罗杰斯

和莱尔德刚走，尼克松就倾盆大雨地向我诉说一切使他感到失望的事情。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的高级顾问从来不给他提出战略上的论据，而用他们个人的政治问题浪费他的时间。这种态度不会使他改变主意。我建议他把执行指示的时间推迟二十四小时，甚至可以暂时收回成命，如果这样做可以减轻罗杰斯的困难的话。在此期间，我将用他的名义询问邦克和艾布拉姆斯，以便证实他们的看法；我们必须保证对他们的建议和他们预计的伤亡人数都不存在任何误解。同时，我将要求莱尔德把电报送来——他正是根据这些电报作出判断、认为战地司令官不赞成同时进攻鹦鹉嘴和鱼钩地区的。尼克松接受了我的建议，撤回了那份指示。我则通知内阁成员，最后决定即将在二十四小时内做出。

同时，我通过秘密渠道致电邦克大使，以最迫切的方式要求他和艾布拉姆斯阐述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美国和南越部队联合进攻鱼钩地区是否符合我们的愿望？应与进攻鹦鹉嘴同时进行还是以后进行？是否在南越境内发动类似进攻效果更好？是否进攻其他根据地——例如七〇四号根据地——成果更大？预计伤亡如何？这份（以总统名义发出的）电报最后说：

> 我关心的是：艾布拉姆斯将军究竟是真正根据这次行动本身的价值而希望采取行动，抑或仅仅因为他认为这是我的愿望所以表示赞成。因此，请把你和艾布拉姆斯将军对以上问题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我，这些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将指导我的行动。请将此电交艾布拉姆斯将军一阅。

黄昏时收到莱尔德的备忘录以及邦克和艾布拉姆斯的复电。莱尔德重申他原来的立场：反对在柬埔寨使用美国战斗部队；因此他赞成南越部队进攻鹦鹉嘴，必要时，作为补充，还可进攻七〇四号根据地，也由南越部队进行。莱尔德值得大大称赞之处在于，一

旦尼克松决定投入美军作战以后，他并没有参加当时流行的推卸责任的活动；这位在枝节问题上泄密的能手也从来没有公开透露他曾以书面形式反对过在柬埔寨采取的这次无比重要的行动。

至于艾布拉姆斯和邦克，他们强烈建议由美国和南越部队联合进攻鱼钩地区，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办法，最好在进攻其重要性仅次于鱼钩地区的鹦鹉嘴的同时进行。艾布拉姆斯证实七〇四号根据地同其他两个根据地的“重要性不能相提并论”。邦克和艾布拉姆斯认为在南越境内发动任何进攻都不能产生类似的效果。艾布拉姆斯态度谨慎，他对可能伤亡的人数避不表态，但保证他将竭尽全力使伤亡保持在“绝对最低的限度”。

从罗杰斯那里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只是新闻报道说他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还没有就在柬埔寨使用美军问题做出决定。

尼克松在做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决策时多数情况下都要找约翰·米切尔商量。这次他也决定这么做。我们三人仔细研究了各种备忘录以及赞成和反对现有抉择的各种意见，一直讨论到将近午夜。最后，尼克松决定维持原议，并在上午当着米切尔的面通知莱尔德和罗杰斯。尼克松要我准备一份新的指示，把莱尔德反对的那句话修改一下，使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拥有“协调”而不是“执行”权。指示其他部分则保持原样。

第二天上午，星期二，即四月二十八日，尼克松同米切尔和我从九点半到十点二十分再次审查了行动方案。尼克松要我在他会见罗杰斯和莱尔德以前从旁门出去；他认为最好避免使我成为各部门批评的靶子。然后，总统同罗杰斯、莱尔德和米切尔谈了二十分钟，再次肯定由美国和南越联合进攻鱼钩地区的决定。他指出，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曾经反对使用美国部队，基辛格博士也“倾向于反对”。（这种说法已不符合事实；我至少在一个星期以前就改变

了看法。我认为尼克松把我同两位内阁成员混为一谈是出于各种复杂的、通常是混在一起的原因。他真诚而慷慨地想保护我，使我免遭各部门打击报复；他无疑也希望保持他在自己心目中作为一个能够给畏缩不前的部下打气的孤身临战的领导人的形象。）尼克松向他们保证，他将口授一份决策过程大事记，明确说明他的高级顾问的反建议；他们的反对将记录在案；他将承担全部责任。（米切尔关于这次会晤的记录见附注。）⑩

由此可知，采取行动的最后决定并不象事后人们喧嚣一时力图暗示的那样是一个失去理性的狂人的一时冲动，而是一个几乎每天都不得不克服自己容易神经紧张的毛病去对付僚属、克服行政部门半是无意、半是有意的因循怠惰的人经过多次动摇犹豫后十分审慎地做出的决定。他承担全部责任是某种高贵品质的表现。这个决定并不是象后来说的那样背着他的高级顾问做出的——虽然后来其他一些决定是那样做的。尼克松推翻了内阁成员的意见，但并没有使他们蒙在鼓里。这是总统职务的实质，是这种职务造成的无法避免的孤独状态，而这种状态由于尼克松的高级阁僚具有把担子推给他并公开同他保持距离的倾向而复杂化了。尼克松遮遮掩掩、迂回曲折的决策方式无疑加强了他们固执己见的癖好。但是尼克松的意见是众所周知的；各部门有许多机会陈述自己的理由。直到现在，事实证明，就柬埔寨问题的实质来说，尼克松是正确的。而且他当时是总统。执行总统直接指示时拖延迟缓，对总统明确表达的意图加以自己的解释以便阻挠这些意图的实现——这些做法在那以后无疑助长了尼克松本来已经很强烈的守口如瓶地独自决策的倾向。

和持不同意见的人面对面谈话使尼克松精疲力竭。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过那次会议之后，他就躲回到行政办公大楼那间隐蔽的办公室去，直到四月三十日他发表演说、宣布进攻柬埔寨时才重

新露面。我每天同他一起消磨几个小时，使他了解计划方面的最新情况。演说的基本内容是帕特·布坎南根据我的工作人员提供的简单提纲起草的，但主要论点是尼克松的。演说的动人词藻和格调也是尼克松提供的；他每天用很长时间润色一次又一次送来的草稿。

一天早晨，他给我看他在一张黄色横格便笺纸上写的利害得失清单；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类似的黄色纸片。或许是因为我们经常口头交换意见，我们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他担任总统职务的早期做出的这个最重大的决定宣布以前的那些日子里，理查德·尼克松几乎是完全孤独的。他坐在行政办公大楼一间光线暗淡的房间里，在立体声系统播送的柔和的新古典派音乐声中沉思、郁闷、集中思绪、抑制自己的愤懑。演说中出现的丘吉尔式的词藻与其说反映了决定的实际重要性，倒不如说反映了他无疑存在的反抗情绪——这种情绪的产生，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在制定过程中几乎得不到僚属支持、然而他深信是正确的决定将引起轩然大波。

我忙于两种工作：既要协助总统，又要协调决定的执行。一个内阁部门一旦认识到决定已经无法挽回、已经不能通过巧妙的解释或泄密的办法加以改变的时候，这个部门可以成为一个颇为胜任、效率很高而且考虑周到的非常出色的工具。前几个星期那种逃避责任、拖沓不前得令人害怕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现在却开得干净利落、简单明了。久经锻炼的负责政治事务副国务卿U·亚历克西斯·约翰逊提出了他擅长制定的极为高明的总体计划（在官僚术语中叫做“电影脚本”），其中对每个关键人物和关键部门在战斗打响前后的任务都按钟点做了安排。

进攻鹦鹉嘴的以“碎石机行动”为代号——南越人称为“全胜第四十二号”——的战役是四月二十八日晚间开始的。约五十名

美国顾问随先头部队行动，后来四天又增加了二十二名。

在四月三十日这个命运攸关的日子里，总统在晚上九点发表演说，向忧心忡忡的公众解释说："敌人最近十天的行动明显危及现在越南的美国人的生命，对于再撤走十五万人以后仍然留在那里的人则将构成无法接受的威胁。"他在开始演说时，用一幅地图说明北越方面已经开始威胁金边，并把过去分散的根据地扩大成"一个供敌人集结休整的辽阔地区、一个沿着长达六百英里的边界向南越发动进攻的跳板"。我们有三种办法可供选择：一是无所作为；一是"为柬埔寨本身提供庞大的军事援助"；一是清除庇护所。他现在宣布：决定由美国和南越联合进攻"指挥共产党在南越的全部军事活动的总部"。这次行动是有限的、短期的，不是针对任何其他国家的，是实现越南化并使伤亡保持最低限度所必需的。

总统使用的词藻同演说的主题不大相称，然而同过去几个星期受到的压力却并不是不相称的。他强调美国不会接受"屈辱"；我们不会屈服于"无政府状态"；我们不会像个"可怜的、束手无策的巨人"那样行动。他也不会选择"轻而易举的政治途径"，把责任全部推卸给过去历届政府。这是典型的尼克松。他已经"抛弃一切政治考虑"：

> 同正在越南为我们的国家、为和平与自由的事业英勇战斗的四十万美国人的生命相比，我的党是否能在十一月获得更多选票是无足轻重的。同美国是否会由于我们在这场危机中无所作为而证明不配在世界历史这一关键时期充当自由力量的领导相比，我是否只能担任一届总统是毫不重要的。我宁愿只担任一届总统并采取我认为正确的行动，而不愿担任两届总统而眼睁睁瞧着美国沦为第二流强国，瞧着这个国家遭受它一百九十年光荣历史上的第一次失败。

后来有人批评这次演说充满自命不凡的说教，过分矫揉造作，

是一篇制造分裂的演说。他毕竟还要过两年多才会面临另一次选举；他无疑把问题同他个人联系过多了。对于那些以结束越南战争作为唯一目的、并因此认为应当不顾后果尽快结束一切战斗行动的人，这次演说肯定是不能使他们满意的。毫无疑问，尼克松本来应当对那些真正被这场同我们国家的经历大相径庭、既无明显意义又无明显结果的战争搞得痛苦不堪的人表示更多同情。他正好干了对他的批评者有利的事，因为他把一次时间和地点都受到限制、基本上是防御性的行动描绘成一件震撼世界、使良心受到考验的大事，从而使他的批评者可以振振有词地指责他"扩大"战争、因此超越了总统权限。而且他还加上了一句既与中心主题毫无关系、又不符合事实的话，说我们在这以前不曾对庇护所采取行动——忽略了秘密轰炸。

但是，说句公道话，这些批评者很少越过词藻去探讨决定的实质。因为在那些既是顾影自怜而又自命不凡的字眼后面，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是无可争辩的。我们并没有鼓励柬埔寨政变，事前甚至不知道会发生政变。我们有四个星期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利用这次政变。促使我们采取行动的因素是：黎德寿已经把越南战争和柬埔寨战争联系起来；西哈努克已经同共产党站在一起；北越部队已经从庇护所破门而出，开始向柬埔寨内地进击，其明显目的是要推翻柬埔寨政府，建立连成一片的地区，使他们可以从一个大大改善了的后勤基地对南越的南半部进行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不停止撤军就会使越南化成为摧毁一个盟邦的遁辞。尼克松过分玩弄词藻这件事并没有改变现实，即我们只有他概括的三种办法可供选择。无所作为等于坐视柬埔寨和南越陷于崩溃。如果我们真想减少我们在越南卷入的程度而又不让曾经依靠我们的人去自生自灭，我们就必须挫败河内对柬埔寨的阴谋。简单地说，如果要有条不紊地撤出印度支那并有任何可能阻止河内统治

这个地区，进攻庇护所就是符合这种做法的唯一方针。

飘忽不定的共产党总部及其他战斗

五月一日，西贡时间上午七点半，美国和南越部队攻入鱼钩地区。同日，尼克松视察了设在五角大楼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并由于一时冲动下令把他长期考虑的进攻其他一切根据地的念头付诸实施。结果在最初三个星期中就有十二个敌人根据地遭到进攻。有些是美国和南越部队联合进行的；有些则是在美国空军和后勤支援下由南越部队单独进行的。有的行动时间短促（一星期到十天）；有的则持续到整个战役结束。

两艘美国舰艇以及海军巡逻飞机在离西哈努克港（当时已重新命名为磅逊）十二海里的领海线外监视港口活动，必要时就封锁港口。它们的活动进行到六月十三日结束。秘密进行的一系列"菜单行动"已于五月二十六日正式结束；B-52则继续出击，为在柬埔寨的美国地面部队提供公开的支援。此外还对北越进行了两天空袭，目标是设在非军事区北沿的三个敌军补给基地。艾布拉姆斯将军早在四月底就要人们注意这个后勤联合基地，认为它是敌军补给工作的中心。

尼克松的演说突出点到设在鱼钩地区的南越中央办事处，把它列为我们进攻目标之一。莱尔德曾经正确地提出警告，反对在演说中提得这么具体，但他到演说发表前一两小时才看到讲稿，而尼克松已经不愿修改了。结果出现了一个著名的、自作自受的信任差距——这个差距同讨论的中心问题毫无关系，但对公众的信心起了侵蚀作用。八年后，柬埔寨共产党证实了某些美国人不愿相信的尼克松的话：南越中央办事处确实设在鱼钩地区。⑪尼克松发表演说之前，我在给报界介绍情况时承认南越中央办事处具有高

度机动性，我们并不认为可以把它一锅端。事实上，对鱼钩庇护所的进攻严重破坏了南越中央办事处的活动，俘获了它许多人员，摧毁了大量补给品和设施。五月十八日，南越中央办事处通知所属单位说，它已受到盟军进攻的严重威胁；它指示所属一切电台密切注意收听，因为总部仅在必要时才恢复短暂的通讯联络。虽然所属单位多次试图重建无线电联系，南越中央办事处却在相当长的几个时期里没有发报。但是，由于我们不能透露情报系统来的消息，只好听任新闻界无情嘲弄我们搜寻飘忽不定的共产党总部的工作而毫无招架之力。

即使不谈南越中央办事处，这次行动的成功也是无可怀疑的。第一个月结束时，已经缴获五吨半重的敌人文件，其中包括有关敌军在越南的战斗序列的极其重要的文件，为推翻金边政府的战役制定的详细计划，还有通过西哈努克港运送物资的提货单，其数量超过了我们对西哈努克港重要性的最高估计。五月二十二日，国防部估计已有一万二千名北越军队由于我们的行动在渗透途中受阻。共产党在电讯中哀叹这些军队把他们预定在雨季使用的储备物资消耗掉了。共产党逃兵人数大增。六月底，尼克松在向全国报告最后结果时列举了缴获军用物资的数量：

——单人使用的武器两万二千八百九十二件，足够装备七十四个满员的北越步兵营；大型数人使用的武器两千五百零九件，足够装备二十五个左右满员的北越步兵营；

——弹药一千五百多万发，约等于过去一年敌人在南越发射的数量；

——大米一千四百万磅，足够估计是在南越活动的全部敌军战斗营维持四个月左右；

——用于进攻城市和基地的火箭、迫击炮和无后座力步枪弹药十四万三千发。根据最近一个时期的经验，迫击炮、大型火箭和无后座力步枪弹药的数量等于敌人在南越约十四个月的发射量；

——高射炮弹十九万九千五百五十二发，地雷五千四百八十二颗，手榴弹六万二千零二十二颗，炸药八万三千磅，其中包括一千零二个炸药包；

——至少四百三十五部车辆，摧毁了一万一千六百八十八座地堡和其他军事建筑。

如果我们不是武断地在两个月内撤出部队的话，军事效果本来可能更大。国内震耳欲聋的喧嚣是非常使人气馁的。

四月三十日发表演说以后不久，尼克松就开始催逼，要求从庇护所做象征性撤退，然后又要求大量撤出部队。六月三十日的期限开始只是尼克松就这次行动将持续多久问题临时给国会领袖提供的一个粗略估计；但是很快这个期限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在另一次给国会介绍情况的会上，他突然给美军进攻规定了三十公里的限度（五角大楼又莫名其妙地把它换算为二十一英里）。总统险些又犯了我们在越南的军事政策长期存在的那种错误：采取足以引起抗议风暴的强硬行动，然后却举棋不定，使这些行动不能产生决定性效果。为我们部队的行动规定时间和地理限制只能略微平息国会和新闻界的情绪，但肯定妨碍我们从这些行动获得充分的好处。根据地当时已扩大到几百平方英里；不进行系统搜索就不可能发现秘密仓库；发现后也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把找到的物资运走。规定时间限制就不可能进行彻底搜查。而地理上的限制简化了敌人的计划工作：他们只要把部队和某些仓库撤退到我们宣布不予侵犯的地区去就行了。如果我们按照认真搜查的需要把部队逗留时间延长两三个月，是否就会在公众当中引起大得多的敌对情绪呢？对此我表示怀疑。如果延长时间，共产党可能就无法保持某些基地了——他们后来就是从这些基地出发在柬埔寨获胜的。这些禁令虽然使我们未能获得完全成功、因而令人遗憾，但并未妨碍我们达到主要目标。对庇护所的进攻使我们比较容易撤出

越南；它还拯救了生命；甚至在共产党重新占领部分庇护所以后，他们已经由于丧失储备物资而不能发动持久的攻势了。

我的工作班子里的系统分析人员估计我们的行动摧毁或缴获了敌人在柬埔寨的全部储备的百分之四十。我自己的估计比较谨慎。在行动开始时给记者介绍情况的会上，在同总统谈话时，我曾预言通过破坏敌人的供应和军事行动将"为我们购买到"六至八个月的时间。罗伯特·汤普森爵士代我们巡视印度支那以后，认为共产党不可能在那年雨季增加自己的补给品，旱季也无法完成重新储备的计划。只有在下一个雨季之后他们才能使储备物资恢复过去的水平。换句话说，他认为我们已经赢得长达两年的时间。

后来证明汤普森是正确的。一九六九年以后，越南战争已经变成美国撤军、提高南越军队素质、以及河内发动攻势阻挠这个过程的能力三方面的一场竞赛。随着美军战斗作用的减少，凡是能够削弱河内战斗力的事对我们都是极为重要的。河内必须远离本国基地作战。因此，切断河内的补给线路、减少它的储备物资就会破坏它的计划，削弱它的战斗力。无论系统分析人员得出什么结论，在那以后，过去最易受到来自庇护所的攻击的那些南越地区将近两年没有发生重大战斗。湄公河三角洲和人口稠密地区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而且在一九七二年春天河内发动全国攻势时，它的主攻部队是穿过补给线最短的非军事区来的；它从柬埔寨方面发动的攻势力量最弱，也是最容易遏制的。

当然，对美国人来说，最关键的检验标准是我们的伤亡。进攻庇护所期间，伤亡数字短期有所上升，但从来没有超过莱尔德曾经担心的每周八百这个数字的四分之一。后来，阵亡人数四年来第一次降低到每周一百以下，然后继续逐月下降。从一九七〇年六月开始，每月平均伤亡人数还不到一九六九年同期的一半。到一九七一年五月，即一年以后，伤亡数字已经降低到每周三十五人；

一九七二年五月是每周十人。美国部队的撤退肯定是使伤亡人数下降的一个因素；但是整个一九七一年我们还有几十万美国人在越南，如果河内有力量的话，它本来可以造成比实际数字大得多的伤亡。它之所以未能做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柬埔寨战斗为我们提供了喘息时间。

在国际舞台上，并没有出现某些批评者曾经强烈预言的同其他国家的纠纷。苏联讲了些含糊其辞的带刺的话，远未发出任何具体的威胁。五月四日，苏联总理柯西金举行了一次态度强硬的记者招待会，说在我们"侵犯"柬埔寨中立的情况下，苏联怎么能信赖美国承担的国际义务。但是他拒绝把这种泛泛的抱怨应用于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他并未保证苏联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声明，甚至并未表示不承认朗诺政府。五月十八日，苏联副外长尼古拉·费留宾对我们一个欧洲盟友说，苏联打算在金边保留大使馆，因为"没有其他办法"。费留宾把柬埔寨的局势说成是混乱的，把西哈努克说成是北京的囚徒。

中国人尽管语言更生动些，也同样持慎重态度。五月*，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美国"猖狂挑衅"提出"严正"警告。中国提醒大家要记住毛主席关于美国是"纸老虎"的名言，断言"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只要团结一致就"一定"会取得胜利。**第二天《人民日报》社论重复谈到同样的主题，并且安慰印度支那的革命者说，"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换句话说，正如我告诉总统的那样，"中国人已经发表声明，实际上是说他们什么也不打算干。"五月二十日，以毛主席名义发表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声明，用了一个颇为唐突无礼的题目：《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

* 即五月四日。——译者

** 引文见一九七〇年五月五日《人民日报》第一版。——译者

*** 同上。——译者

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毛支持西哈努克新成立的流亡政府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并再次指出,“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我在五月二十三日送呈总统的分析中说,这份声明除了口头鼓励外也没有给河内提供什么东西。

柬埔寨行动远远没有伤害我们同两个共产党巨人的关系,倒是给莫斯科和北京增加了一根可供争夺的骨头,从而改善了我们的地位。由于莫斯科承认朗诺而北京承认西哈努克,中苏分歧被移植到印度支那去了。六月十日,多勃雷宁和我又开始探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中东问题、甚至美苏最高级会谈问题;后来,在夏天,同莫斯科的关系紧张起来,但那是在世界其他部分出现利益冲突造成的。到六月底,我们已经从中国方面得到无庸置疑的信号,表示他们愿意同我们重新开始接触。

危机既不是出现在战场上,也不是出现在外交方面,而是出现在国内。

国内的阵痛

这些成就对一九七〇年春天爆发的、使进攻柬埔寨那个时期变得异乎寻常地紧张的抗议浪潮没有起任何作用。我参加政府时曾经希望通过结束战争的努力,帮助我移居的国家弥合裂痕。我对学生的痛苦感到同情——他们热望实现美国梦想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上,思想以其纯洁性战胜一切而无需求助于权力这种暧昧的手段。越南战争是可以通过电视屏幕看到的第一次战争;报界对战争大多持敌对态度这也是第一次。任何战争必然会带来的悲惨、痛苦和混乱变成了美国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过多的人把战争造成的痛苦归咎于他们自己的领导人的缺陷。

尽管某些抗议者的伪善和残暴使我反感，我对学生仍然怀有特殊的感情。他们是在怀疑论者、相对主义者和精神病学者培养下长大的；现在他们在世界上像是一艘失去了舵的船，他们要求得到保证而无需付出牺牲。我这一代人鼓励他们放纵不羁而没有使他们有所寄托，因此对他们是有愧的。后来几个月，我耗费了多得不相称的时间去和学生集团交往——仅在五月就有十次。我同抗议者在私人家庭里见面，倾听他们的意见，向他们解释，同他们辩论。但是，我对他们的痛苦感到同情并不能使我忽视照我看来是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我认为他们是错误的，正如他们是热情的一样。他们的压力推迟而不是加快了战争的结束；他们那些简单化的想法并没有使我们更接近和平，而对和平的渴望并不是只有他们才有的。感情不成其为政策。我们必须结束战争，但条件是不得损害美国帮助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能力——即使那些最愤怒的人的前途也将取决于这种新秩序的建立。

把动乱主要归咎于尼克松的夸夸其谈、甚至归咎于肯特州立大学事件也是不公平的。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中，对话过去也失败过。从十一月份起，反战运动就处于休眠状态，在等待新的时机。四月中旬，大约有两百个城镇出现了抗议活动，情绪激动到如此程度，以至四月二十八日南越部队单独进攻鹦鹉嘴的消息传来也被当作一次重大战争升级加以谴责。这是美军卷入战斗和尼克松发表演说两天以前的事。北越部队在柬埔寨横冲直撞已经大大超过一个月，谁也没有批评河内一句。但南越的反应却遭到各报的谴责，其中包括《纽约时报》（“实际上抛弃了总统要从东南亚脱身的诺言”）、《华尔街日报》（“美国人要求的是从印度支那脱身的可以接受的出路，而不是更深地陷入印度支那”）和《圣路易邮报》（“一次令人震惊的升级”）。南越进攻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有条不紊地撤退。但是国会几乎立即开始制造障碍，反对援助受到野蛮侵略的

柬埔寨——虽然侵略柬埔寨的就是在越南同我们作战的那些敌人，并且用的正是同样的部队。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J·威廉·富布赖特参议员四月二十七日在早就使罗杰斯痛苦不堪的那次汇报会后对全国广播公司记者说，外委会几乎一致认为援助柬埔寨抗拒北越征服"将是进一步扩大战争的行为"。

后来抗议浪潮中提出的一切批评性论点早在总统演说以前就存在：我们正在使战争升级；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可能成功，因此，政府声称取得胜利是假的。人们认为我们对自己的决定已经如此缺乏控制，以至把我们采取的最微小的步骤都看做会使数十万美军无限期投入战斗。信任差距已经涉及为摆脱战争寻找光荣出路的任何努力。因此，报界对尼克松在四月三十日演说中讲的道理有一种简单的回答：他们不相信他。这是"又一个军事幻想"——据《纽约时报》说——"时间与经验已经使美国人民和国会再也不会轻信了。"对于《华盛顿邮报》来说，这是以"可疑的证据、似是而非的道理和过分夸大的词藻"作为根据的一场"自动继续的战争"。而按照《迈阿密先驱报》的看法，"柬埔寨演出的剧本和肯尼迪时代以及约翰逊时代的越南故事惊人地雷同。我们过去都听过了——听过无数遍了。"辩论已经淹没在群众的激情中。

同四月三十日以前刚刚萌芽时的情况一样，进一步高涨的抗议浪潮是以学生领袖号召罢课和游行开始的。这些学生领袖已在过去的抗议季节中证明他们擅长制造对抗的能力。在任何事都可能遭到曲解的感情激动的时刻，总统发表的摇摆于伤感和刺耳音调之间的声明是无济于事的。他五月一日视察五角大楼时随口说到"在校园里扔炸弹的……不务正业的浪荡子"。这句偶然被记者从旁听到的嘲弄话是一种不必要的挑战，虽然原意指的只是向建筑物投掷燃烧弹、并把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毕生研究的成果付之一炬的为数极少的学生。五月四日，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罗兹

为了在连续数天的暴力活动中维持秩序而派遣的国民警卫队开枪打死了肯特州立大学四名学生。这件事产生的冲击波把全国及其领导带到了心力衰竭的边缘。

政府的反应是一篇极为麻木不仁的声明。龙·齐格勒奉令发表谈话说，这次枪杀事件“应当再次提醒我们大家：意见分歧转化为暴力，就会带来悲剧”。

学生罢课和抗议的势头立刻激烈起来。校园的动乱和暴力活动超过了柬埔寨战斗本身，成为公众注意的主要问题。华盛顿就像一座被围困的城市。五月九日，大规模群众抗议达到高潮。在那个炎热的星期六下午，估计有七万五千到十万人聚集在白宫南面的埃利普斯（椭圆）公园举行示威。警察把白宫围绕起来；为了保护总统官邸的庭院，还用六十辆公共汽车组成了一个防御圈。

五月九日以后还有数以千计的学生，常常是在老师带领下，到首都来谴责“战争升级”和政府的“愚蠢行为”。一千名律师到国会游说，要求结束战争，接着就是三十三名大学负责人、建筑师、医生、卫生官员、护士，还有来自纽约的一百名公司经理人员。报界为这种情绪火上加油。报纸社论对五角大楼所谓在柬埔寨取得胜利的说法表示怀疑。除了和平示威以外，反战的学生还善于采用富有想象力的策略，把破坏同直截了当的暴力行为结合起来。哥伦比亚大学约两千名学生在交通拥挤时刻拦路静坐。好几所大学的校园里有人纵火作为庆祝和平的营火。在锡拉丘兹大学，当两千五百名学生举行示威时，有人纵火烧毁了附近一座新建筑物。五月七日和八日，学生在纽约市的金融区举行示威。作为报复，正在盖世界贸易中心的建筑工人蜂拥到华尔街，用棒棍和其他代用武器殴打抗议者。这个事件造成的震动使某些人认识到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会反过来给示威者带来危险的后果。这件事并没有使抗议运动放慢步调；它只是使尼克松更加相信美国广大群众是同他站

在一边的。

确实，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有很多人支持总统的行动。在回答“你认为美国应当运送军火和物资去帮助柬埔寨吗?”这个问题时，百分之四十八被问到的人都说应当，百分之三十五说不应当，百分之十一没有表态，还有百分之六的答复是有保留的。在回答“你是否赞成尼克松总统处理柬埔寨局势的方式?”这个问题时，百分之五十表示赞成，百分之三十五表示不赞成，还有百分之十五没有表态。此外，百分之五十三的接受询问的人赞成尼克松总统处理越南局势的方式，百分之三十七不赞成，百分之十没有表示意见。

新闻界和学生的批评形成的轩然大波对国会产生了强烈影响。国会因为总统同它磋商不够而提出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它现在也开始升级，企图通过立法手段规定必须撤出柬埔寨，并禁止美军重新进入。五月十三日，参议院开始辩论对外军事物资销售法案。弗兰克·丘奇和约翰·谢尔曼·库珀参议员提出修正案，要求禁止美国在六月三十日以后继续为柬埔寨提供军事援助或继续在柬埔寨进行军事活动。另一方面，罗伯特·伯德参议员提出的一个修正案则要求授权总统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一切行动来保护驻在南越的美国军队。这个修正案在六月十一日被看做是一场预赛的表决中，以五十二票对四十七票的微小差额遭到否决。参议院的辩论和国会中的斗争一直进行了七个星期，直到六月三十日参议院在一次唱名表决中以五十八票对三十七票通过了库珀—丘奇修正案。尽管按照行政部门的判断这样做等于宣判南越的死刑，参议院仍然投票赞成使共产党可以在柬埔寨为所欲为。这个法案后来送交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由于众议院拒绝同意参议院通过的修正案，造成了僵持局面，结果整个对外军事物资销售法案在一九七〇年剩下的时间里一直停留在讨论阶段。到那个时

候，大部分损失已经造成；正当北越公然入侵期间，参议院却告诉敌人：柬埔寨得自己照顾自己。

库珀—丘奇修正案的焦点是柬埔寨，而对国防采购法案提出的麦戈文—哈特菲尔德修正案则想通过在一九七〇年底——后来推迟到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停止一切拨款的简单办法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参议院最后在九月一日以五十五票对三十九票拒绝了这个提案。但是他们行动的格局是清楚的。参议院里的反战派要接二连三提出修正案，迫使政府必须不断打后卫战才能为谈判保持最低限度的机动余地。这只能鼓励河内采取拖延战术，等待我们国内鹬蚌相争使它可以从中渔利。

所有这一切都加快了幻想消失的过程。保守派由于战争转为退却而灰心丧气；自由派则由于他们自己造成的后果而陷于瘫痪——因为他们无法完全忘却正是一个自由派的政府把五十万美国人派到印度支那去的。他们既不愿正视自己过去的行动造成的恶果，又同样不愿认真保持镇静。大家拚命规避责任。一个十分不寻常的现象是，包括持不同政见者和其他人在内，所有集团都把责任推给担任总统职务的人。一位高级教授宣称“离开越南的办法就是坐船”。这句话已经在大学生中传为笑谈。实际结果是：在缺乏任何可以认真考虑的选择办法的情况下，政府除了贯彻自己的政策以外，就只有投降一条路可走了。

政府结构也开始瓦解。行政部门患了炮弹休克症。政府工作人员的孩子和他们的朋友的孩子毕竟也参加了示威游行。国务院大约二百五十名雇员，包括五十名外交官员在内，签署了一份反对政府政策的声明。内阁成员明显存在的不同意见说明行政部门几乎同全国一样处于分裂状态。内政部长沃尔特·希克尔公开提出了抗议。《纽约时报》五月九日报道说：国务卿已禁止大家对他的态度进行任何猜测——这很难说是对总统表示响亮的支持。一群

雇员占领了和平队办公楼，在上面悬挂了一面越共旗帜。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罗伯特·芬奇拒绝在公开场合反对他的总统和老朋友的意见——就像他私下确曾做的那样——而他属下的一大批官员却占领了该部礼堂以示抗议。[12] 总统把自己看做是中流砥柱，但是动乱对他也是有影响的。对于抗议者的敌意，他装做不以为意，实际上深感痛苦。如果能够得到一点点像学生对受人钦羡的肯尼迪兄弟表现的那种爱戴，他愿意付很大代价。由于这种矛盾心情，尼克松感到精疲力竭，甚至使他的顾问们深为忧虑。五月九日上午五点他去林肯纪念堂同学生进行的那次令人尴尬的会晤，只是说明他的心理状态的一个小小的苗头。

精疲力竭是当时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特征。为了获得一点睡眠，我不得不从被抗议者团团包围的住处搬到白宫地下室去。尽管我需要协调处理危机的工作，我还得耗费大量时间对付心情抑郁、近乎惶惶不安的同事，用甚至更多的时间对付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同事。我同宣布要在拉斐特公园绝食到全部美军撤出为止的两位年轻的和平主义者布赖恩·麦克唐奈和托马斯·马奥尼谈了相当长时间。我在情况室对来自各个大学和研究生院的一群群学生谈了我对他们的绝望情绪从何而来的看法，我认为这种情绪的根源比为战争感到忧虑要深刻得多。

我发现同学生讨论问题比同参加抗议的老师讨论问题收获更大一些。当我应一批大部分曾经担任过政府高级职务的哈佛大学教授的要求同他们在情况室共进午餐时，我建议在不供发表的基础上同他们推心置腹地讨论一下我们做出决定的理由。这些人过去多数都是我的亲密同事和朋友。但是他们不愿接受我的建议。他们不是作为卓越的学术界人士、而是作为政界人士来的。他们背后都有一个选区，即由于肯特州立大学的悲剧和战争而燃烧起来的校园。他们事前已向报界宣布——但没有对我宣布——这次

来是同我对抗的；他们宣布从今以后拒绝在研究或咨询工作方面同政府发生任何关系。

他们就柬埔寨决定提出的反对意见说明，夸大其词并不是政府才有的毛病。一位杰出的教授作为经过仔细考虑的分析提出来的意见是："某些人忘了告诉总统，柬埔寨是一个国家；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似乎并不知道。我们是否对柬埔寨承担了很大的义务？承担是腐朽的外交政策。不承担也是腐朽的外交政策。"他深信这种行动"明显危及美军的撤退"——虽然事实恰恰相反。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这位教授居然愿意相信国防部长莱尔德在总统宣布这些军事行动以前是不了解情况的。他令人惊讶地认为"这是一场根本不应当进行的赌博，即使它本身获得成功也是一样"。还有人说关于柬埔寨的决定是"无法理解的"，"比约翰逊干的任何事都更加令人发指"，是"灾难性的"，"令人惊骇的"。有位教授提出一个异乎寻常的假设，即这次为时八周、范围二十一英里的行动可能会使我们的军事司令官认为使用核武器现在已经是可以想象的了。另一位教授宣称，对方的一切行动都是我们挑起的。

这次会晤使我彻底走出了学院的象牙之塔，进入了现实世界。这些人在他们从事的专业方面都是执牛耳的人物；他们曾经是我的朋友，是毕生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因此是应当能够正确地看待事物的相互关系的。他们不同意我们的决定，这一点可以理解；我自己在确信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以前也经历了长期动摇犹豫的过程。但是那种缺乏同情、自以为是、拒绝提供任何选择的态度加强了我的两个信念：为了我国的内部安宁，必须结束战争；在努力按照符合任何国际义务的条件结束战争时，我们不能指望曾经和我共事多年的那些人的帮助。创伤必须战后才能愈合。结果，这些创伤并没有愈合。

柬埔寨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尼克松和反对派根本都不应当这

样提出问题。我们面临的基本上是一种策略上的抉择：在八个星期的时间里，用美国部队使庇护所不起作用是不是保证我们撤出越南的既定步调和安全、并防止河内席卷印度支那最好的办法。通情达理的人也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理性的讨论已经结束了。总统的表达方式把他的决定提高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某些关键性抉择相同的举足轻重的水平。批评者反击时则把他描绘成一个失去控制、毫无理性、并且挑动敌人进攻的总统，其行动即使成功也是不道德的。

但是辩论的真正主题并不是对柬埔寨的进攻，而是前一年反战大示威时曾使国家陷入分裂的同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应当为自己的荣誉、世界地位和已经做出的牺牲坚持任何条件；换句话说，美国是否应当立即无条件地使自己的努力归于失败。富布赖特参议员鼓吹的那种政治解决——除迅速把一个共产党政府强加给西贡这一点以外——恰恰是河内已经拒绝的办法，正如不到三个星期以前黎德寿曾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向我证实过的那样。那些温和派的批评者谁都不愿承认的是：如果我们按照他们的建议办事，拒绝援助柬埔寨，很快我们就只有接受他们谁也不赞成的河内的条件，别无其他选择。我们的反对派不断宣扬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似乎存在某种未加说明的政治选择、某种保持中立的法宝，而我们执意予以摒弃。以六月三十日做为从柬埔寨撤出美军的期限，这个仓皇失措的决定是公众压力造成的具体后果之一。

政府的中间阶层则更不安定。公众抗议的影响使他们不是去讨论如何使战斗获得胜利，而是为战术空军的出击、为六月三十日我们撤离后南越在柬埔寨的行动、为美国顾问的作用精心制定种种限制。华盛顿政府的矛盾心情必然会感染战场上的人员。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华盛顿并不鼓励在柬埔寨采取大胆而富想象力的行动追击敌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柬埔寨正是我们在印度支那的全

部努力的一个缩影。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当对话完全断绝时，胜利者是不存在的。如果企图用汹涌的激情强制决策，如果身居高位的人只是为了平息街头抗议而被迫采取他们并不真正相信的措施，那就不可能有什么严肃的国家政策。如果批评者获悉我同黎德寿的谈话——由于政府坚信保密是使谈判成功的必要条件，这些谈话没有公布——他们当中某些人或许会比较谅解。但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印象是：多数批评者，除了找借口之外，并不需要抓住总统什么错误。（如果他们知道我在进行谈判，很可能会谴责柬埔寨战役危及谈判的整个前景。）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把所有解释都看做同过去历届政府一样的夸大其词而不予理会的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情绪。批评者很少提到我们的根本矛盾：在允许敌人开辟新战场时，我们怎么能够——像我们正在做的那样——以负责任的态度撤出部队和减少军事活动呢？

为了寻找一种温和的办法来代替我们的政策，人们重新开始施加压力，要求为撤退全部美军规定期限。六月七日，《洛杉矶时报》要求我们立即全部撤出东南亚。它说："现在是美国迅速地、毫不含糊地离开越南的时候了。"《时报》毫无根据地说，规定十八个月的期限"将比总统现在奉行的政策危险小得多。"《生活》杂志七月份也跟着说了起来。

不幸的是，主张规定撤军期限的论据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进。期限只有两种：一种是同越南化并行不悖的，那就同我们的政策完全一致，但将剥夺我们在谈判中使用的杠杆。另一种是武断地规定的，那就不过是垮台的一种委婉的说法；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就几乎不可能说明为什么在期限到来之前还要继续拿人的生命去冒险。因此，当我们结束柬埔寨的战斗时，我们还走在撤出越南的漫长道路上，面对着毫不妥协的敌人和国内同样毫不妥

协的反对派。

得失对照表

我国国内这种痛苦局面的最终受害者是温厚的柬埔寨人民。几年之后，当我们支持的柬埔寨政府垮台、被共产党接管时，多年来一直要求抛弃柬埔寨的那些人出于自身固有的利益力图通过各种曲解避免对部分是由于他们的主张带来的可怕后果承担责任。有人断言使西哈努克垮台的柬埔寨内部紧张局势是共产党部队西进造成的，而共产党部队西进据说是我们一九七〇年五月入侵[13]或一九六九年以来的轰炸[14]造成的。事实上，北越部队向西进军是四月初、即我们进攻以前开始的，其起因只是柬埔寨政府居然胆敢要求他们撤离柬埔寨领土。

如果我们不进攻，共产党就会早好几年接管柬埔寨。在那种情况下，这些狂热的空想家的统治不大可能比现在仁慈；对于如此脱离人民、进行可怕的社会改革试验的决心如此之大而又如此死啃教条的暴君，是不能用正常标准加以衡量的。这些人不是被人误解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并不是由于我们五年前的行动在一阵激怒驱使下去屠杀本国人民的。的确有人在根本提不出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发表过一种稀奇古怪的论点，认为红色高棉获胜后表现的残暴是美国和柬埔寨对他们进行了五年抵抗造成的。[15]除了为嗜杀成性的红色高棉曲意辩解的人以外，谁也不能把这个论点当做适当的解释加以接受。西哈努克就不相信；他曾在一九六七年把这些人从柬埔寨一脚踢开，因为他们对国家造成了威胁。一九七九年四月，西哈努克对我说，红色高棉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是"一贯的杀人犯"。[16]红色高棉当权时的行动是几十年意识形态狂热孕育出来的经济理论的有系统的运用。它的领导人乔森潘五十

年代后期在巴黎写的博士论文就说到必须动员“农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力量”反对腐朽的城市，从而改造柬埔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二十年后这个理论以惊人的彻底性和残暴性付诸实施，直到绝灭种族的程度。⑰

河内后来以铁蹄踏平一个同伙的共产党政权，正是由于这个政权希望保持独立。因此，所谓河内本来会尊重中立主义的西哈努克的独立的说法是无法言之成理的；黎德寿同我们的每一次谈话都驳斥了这个论点。我们本来是会在中立主义的西哈努克身上碰碰运气的。不幸到一九七〇年四月底，事态的发展和他自己的愤怒已经使他处于只有作为共产党代理人才能重新上台的地位。六十年代中叶——在统治印度支那的贪得无厌的欲望推动下——入侵柬埔寨、并且早在任何美国炸弹落到柬埔寨国土上之前很久就组织起红色高棉的正是河内；在我们发动有限进攻前的一个月内力图扼杀柬埔寨的正是北越部队；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期间推翻红色高棉的也正是北越部队。如果我们不进攻庇护所，柬埔寨早在一九七〇年而不是一九七五年就给鲸吞了。如果说有什么因素决定了自由柬埔寨人的灭亡，这个因素就是美国的厌战情绪。

可怜的柬埔寨逐渐成为我国发泄灰心失望情绪的对象。我们国内的批评者通过立法结束越南战争的各种计划都遭到挫败，但在迫使我们撤出柬埔寨方面比较成功。同一个敌人正使用柬埔寨作为基地；河内除已增加的部队外已无法继续增援，因此柬埔寨力量的任何增加都必然会削弱河内的力量或使河内处于守势。尽管如此，美国顾问按照法律规定却不准进入柬埔寨，美援也受到严格限制。柬埔寨箝制了河内在南方的大量人力，而我们的援助款项却如涓涓细流，一九七〇年仅约两亿美元，而且附加限制，不得用于“维持朗诺政府”——援助一个国家但不得援助它的政府，真是

一种令人震惊的政策。这种情况既反映了一种恐惧，即害怕我们象在印度支那其他国家一样在柬埔寨“陷入泥潭”，也反映了当时已经流传甚广的神话，即我们正被阮文绍而不是被河内扣作人质。为什么我们的盟友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地位恶化会使我们更容易从越南脱身？这个问题从来都没有说清楚。

我们的大使十分刻板地看待国会不准军事顾问进入柬埔寨的禁令，甚至不让我们的武官前往旅行，以便了解柬埔寨部队的表现。柬埔寨变得死气沉沉了；南越部队在它的边境活动；美国飞机轰炸敌人的交通线——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限制援助的结果，柬埔寨部队越来越软弱，因此更加不得不依靠我们的飞机作为唯一的战略后备。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批评者自称厌恶日益依靠空中力量的情况，但他们恰恰造成了这种情况。任何决定性行动都是不容许的；本来早就可能被逼入窘境的北越现在获得了加强红色高棉军队的时间。柬埔寨军队不得不按照鸽派对尼克松主义的解释维持生存，因此日益失去活力。在此期间，冷酷无情的共产党敌人在为发动全面进攻聚积力量，而照章办事的美国却在逐渐扼杀柬埔寨军队进行抵抗的能力。

柬埔寨的困境甚至触动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两位工作人员——理查德·M·穆斯和詹姆斯·G·洛温斯坦。这两个人每年都要到东南亚访问。他们的访问曾经使我们的官员感到恐惧，因为他们都反对这场战争，而且善于揭官僚们的疮疤。他们半年一次的报告为国会攻击我们的越南政策提供了弹药。但是，穆斯和洛温斯坦一九七〇年底访问柬埔寨时，得出了同我们差不多的结论，并且大胆讲出了这些结论。他们的报告的要点是：美国实际上为柬埔寨干得很少；柬埔寨政府是得到人民广泛支持的；美国在给柬埔寨拆台。报告说：

和南越的形势截然不同，朗诺将军的政府看来在青年和知识分子当中得

到很大的支持，而且在文官和参议院、国民议会的议员当中……明显存在一种民族团结的感觉和目的感，存在不靠外国军队、自己捍卫祖国的决心。……

柬埔寨人感到难于理解造成美国今天在东南亚所处困境的各种曲折复杂的因素。他们回顾二十年来美国在亚洲行事的方式，对美国在武装他们抵抗由中国和苏联装备起来的侵略军这个问题上举棋不定的迹象似乎感到迷惑不解。

过去对流行的成见表示支持的穆斯—洛温斯坦报告都印成花梢的小册子广为散发，这次报告却在委员会里压了好几天。然后，显然是在某些委员的压力下，报告是发表了——不过是以尽可能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发表的。富布赖特参议员只是把它同几篇报纸社论一起塞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国会记录》里，既不叫人注意，也未公开宣读。⑱

是否进攻庇护所是一个有很大风险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诚实而严肃的人完全可能存在不同的意见。但是，一旦北越军队推进到全国，一旦他们建立起受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来推翻金边的非共产党政府（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做出任何反应以前），命运就已经决定了。进攻庇护所防止了柬埔寨的立即崩溃，但不能消除长期的威胁。反对原来决定的人现在力图取消这个决定，办法是阻止对柬埔寨政府提供进一步援助。但是这种做法既没有取消决定，也未能防止战争的扩大；它起的唯一作用是为河内和红色高棉提供了喘息机会，使他们可以增强实力，展开最后的攻势。它使保持一个独立、自由和中立的柬埔寨的最后一线希望化为乌有。一九七〇年辩论的是非曲直姑且不论，也可以提出强有力的理由证明：由于我国的民主政治程序发生了故障，由于政府和批评政府的人都能够阻止对方达到自己的目标、挫败对方的政策，我们不可能采取任何首尾一贯的战略；最后，柬埔寨成了牺牲品。北越的决心、柬埔寨的内讧和美国内部的冲突这些因素揉在一起，使一切事

态发展具有希腊悲剧式的必然性，最后使这个淳厚的国家遭受了并非罪有应得的灾难。这是我们大家谁都没有权利忘却的。

一九七〇年六月，我们还不相信事态注定将以悲剧结束。我们仍然努力保持一种既坚定又和解的平衡态度，使谈判得到最大限度的促进。因此我们请沃尔特斯将军在一九七〇年五月八日发出信件，建议同黎德寿再次会晤。我并未期望河内立即接受。五月六日，河内已经把预定在克莱贝尔大街举行的公开谈判"推迟"到五月十四日，并且发表了一个支持红色高棉的新的声明。但是甚至这次推迟，用我的工作人员的话来说，也是"以比较谨慎的方式"提出的，说明对方希望保持这条谈判渠道——即使目的仅仅是使我们不致有词可借、恢复轰炸也罢。河内拖了几个星期不答复我们同黎德寿恢复秘密谈判的建议。六月五日，它拒绝了我们再次会晤的建议，称之为"暂时中断"。

但是到局势明朗化、战场上出现新的均势的时候，显然会进行新的一轮外交活动。因此我在五月二十五日请各部门研究美国在外交方面可以在印度支那采取什么主动。我还建议总统为巴黎谈判任命一位新的高级代表。这是北越在公开和秘密会谈时都坚持要求的。我从来不认为仅仅指定一位代表就会推动谈判走出死胡同；河内对巴黎会谈的主要兴趣是避免我们以缺乏认真谈判为由恢复对北方的轰炸。尽管如此，我认为任命一位高级代表将使河内丧失一个做宣传的题目。我建议让戴维·K·E·布鲁斯当代表；尼克松欣然表示同意；布鲁斯这位非凡的外交家以他特有的责任感接受了这个职务。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比戴维·布鲁斯更出色的公仆或更优秀的人物。他是马里兰州一个古老家庭的后裔，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都有深厚的根基，不同时期担任过这两个州的州议员。他写过关于美国早期总统的作品，而他的敬仰者发现他本人就具有

许多和那些总统相同的刚毅的品质。他以毕生精力为公众谋福利，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略服务局的工作中证明了自己的勇敢精神。他是一个漂亮、富有、情绪稳定的人，完全没有那些比较藐小的、把公职当成自我表现机会的人那种喜欢坚持使自己的看法占上风的习惯。他的行为举止说明他是为一种超越任何个人生命的事业服务的；他浑身焕发出一种信念，即他的国家代表着各种需要爱护、同时也值得捍卫的社会准则。他的尊严要求第一流的工作成绩；他保持低调的口才证明在品质高贵的人身上内容和形式是无法分割的。他认为耐性和善意——即使是逐步地——将克服世界的缺陷，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类能够通过理性和机智得到改进。

布鲁斯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总统提出的高尚的要求，也从来没有按照个人的利害得失估价这些要求。三十年来他曾为两个政党的总统服务，担任驻伦敦、巴黎和波恩的大使。后来他又在越南谈判中、在北京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工作——一直干得非常出色。他说话坦率，必要时毫不含糊，但是他并不把自己的辛勤劳动当作追求个人地位的本钱。总之，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

戴维·布鲁斯对我的影响是很少有人超过的。当我做某些最重要的决定时，我本能地会向他讨教。我并不是每次都采纳他的意见；但每次我都从他的判断、他的幽默感和他无穷的机智中获得教益。他使我不过分重视自己的作用。他深信为我国前途而工作是一种严肃的职责。这种信念对我永远是一种鼓舞。

一九七〇年七月，已经七十二岁、体质虚弱的戴维·布鲁斯开始执行新的使命，虽然他知道对手的主要目标就是把他搞得精疲力竭。他懂得辩论的技巧并不能代替他的谈判对手如此重视的客观力量对比。他在巴黎得不到什么荣誉；他也不追求荣誉。但是

他懂得国家的荣誉绝不是无足挂齿的小事；我们生存了几百年并不是为了出卖那些信赖我们诺言的人。

我们走在一条漫长的、肯定是痛苦的道路上。但是有戴维·布鲁斯作为旅伴，肩上的负担就不显得那么沉重了。只要他愿意承担一种工作，就可以很有根据地说这种工作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① 沃尔特斯有极为详尽的描叙。见弗农·A·沃尔特斯《秘密使命》(纽约州花园城双日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二十四章和第二十八章。

② 同上，第五八〇页——五八二页。

③ 关于过去越南对老挝和柬埔寨的统治，见伯纳德·福尔《两个越南》修订本(伦敦帕尔马尔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第一二页——一九页，第三三页。

④ 同上，第三八六页。

⑤ 例如：《纽约时报》，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⑥ 西哈努克访问记，见《纽约时报》，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二日。

⑦ 见西哈努克回忆录《我同中央情报局的战争——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回忆录(贝却敌记录)》(纽约万神殿图书公司兰多姆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第二四页。并见第二一页——二二页，第二四页——二六页，第四二页——四三页，第五〇页，第五四页，第二〇一页——二〇二页。

⑧ 威廉·肖克罗斯：《穿插小戏：基辛格、尼克松和柬埔寨的毁灭》(纽约西蒙—舒斯特联合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一六五页。

⑨ 此信全文如下：

总统

致亨利·基辛格的备忘录

假如我在我们今天会议上的想法同我此刻(四月二十二日凌晨五时)的想法一样，我觉得我们需要在柬埔寨采取大胆的步骤，以表示我们是同朗诺站在一起的。我并不认为他会存在下去。不过，他或许有存在下来的某种机会。反正我们必须采取某种象征性行动帮助他生存下去。这次我们可真的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上了当，相信我们如果进行援助，就会破坏他的"中立"，从而给北越人以干涉的借口。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没有接受这样一个教训：共产党进行干涉从来不需要什么借口。一九五六年在匈牙利，他们并不需要借口。那时国务院的专业人员提出了同样的论点，并获得杜勒斯的赞同，因为他那时累了，并且又是在竞选期间。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并不需要借口，那时国务院的人员曾提出了同样的论

点。他们在老挝也不需要找什么借口。在那里，因为我们没有在他们整个攻势开始之前就实施打击，以挫伤他们的锐气，以至坐失良机。他们在柬埔寨也是一样，而我们完全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向参议院声明，我们的大使馆里只有“国务院七个笨蛋组成的代表团”，并且不打算提供任何种类的任何援助，因为我们担心，如果提供援助就会“刺激”他们进行干涉。他们正在那里轻易地取得胜利，过去二十五年来唯一敢于采取亲西方和亲美立场的柬埔寨政府正摇摇欲坠。我正考虑派一个象鲍勃·墨菲那样的人到那里去走一趟，回头向我报告；他要进到那里去，消除朗诺的疑虑。当然，这将同你的活动同时进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结束之后，如果我决定采取这个方针，你将立即同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所谓朋友派来的某些胆小如鼠的大使接触。我们要搞清楚现在谁是我们的朋友，因为如果我们决定在这里挺起身来，剩下的那些人当中的某些人最好迅速跟上。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以后，我要同你谈这个问题。

⑩ 约翰·米切尔给这次会议做了记录，并写了一份简单扼要的仅有两页的备忘录：

会议备忘录(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出席者：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
主题：柬埔寨/南越问题

讨论这个题目的会议是星期二、即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上午十点二十分开始，持续约二十分钟。

总统说，开会的目的是把他就南越和柬埔寨形势的发展做出的决定通知出席者。总统又说，他过去十天不断在考虑这个问题，并考虑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麦凯恩海军上将和他的参谋人员在夏威夷汇报会上提供的全部情报。总统又说，在决策过程中，他还考虑了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反对在柬埔寨使用美军的立场，以及基辛格博士倾向于反对使用美军的建议这个事实。

总统又说，他头一天向邦克大使和艾布拉姆斯将军提出了某些问题。总统宣读了他给邦克大使的电报和星期一深夜收到的大使的复电。

总统又说，根据他对柬埔寨总的形势的研究，他决定不改变美国目前在柬埔寨军援问题上的立场和他授权越南共和国军队进攻鹦鹉嘴的决定。总统又说，为了保护南越的美军，他决定批准授权美国和越南政府部队联合进攻鱼钩地区的南越中央办事处总部。总统表示了这样一种意见，即进攻南越中央办事处的行动是继续执行越南化计划所必需的，这种行动可能有助于、而不是妨碍美国谈判和平的努力。

总统又说，他在决策时考虑了国会某些人士和公众中某些阶层可能产生的不利反应。总统又说，为了把导致这些决定的情况和他在这个问题上得到的劝告记录在案，他在头一天晚上口授了一个录音记录，其中包括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反建议。

总统讲完话之后就离开了椭圆形办公室，到内阁室去参加另一个会议。当总统在场时，其他出席者未就会议主题进行讨论。

(签字)约·N·米切尔

⑪ 见伊丽莎白·贝克尔《柬埔寨：同越南的边界战争一瞥》，载《华盛顿邮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亨利·卡姆《波尔布特证实了尼克松的断言》，载《纽约时报》，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八日第七版。

⑫ 《纽约时报》，一九七○年五月十八日。

⑬ 例如：斯坦利·卡诺《柬埔寨：尼克松就是那个家伙》，载《华盛顿邮报》，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二日。

⑭ 例如：威廉·肖克罗斯《柬埔寨：责任所在》，载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谁"弄掉了"柬埔寨？》，载《纽约时报》，一九七九年二月六日；《穿插小戏》中多处可见。

⑮ 例如：肖克罗斯《穿插小戏》，第三七二页——三七三页，第三八九页。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为红色高棉暴行开脱的肖克罗斯却受到另一位作者的鞭挞。这位作者认为缺乏足够证据说明曾经发生过这种暴行。见理查德·达德曼的文章，载《纽约时报书评副刊》，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某些批评我们的人似乎愿意在自己的政府面前假定波尔布特是无罪的。

⑯ 另见西哈努克访问记，《远东经济评论》，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一日，第一四页。西哈努克在这次接见记者时把波尔布特描绘成一个应对二百万柬埔寨人死亡负责的"刽子手"。

⑰ 弗朗索瓦·蓬肖：《柬埔寨：前途未卜之年》(纽约赖纳哈特和温斯顿·霍尔特出版公司一九七七年版）对红色高棉有系统地运用意识形态理论的情况做了极为出色的分析。乔森潘论文中引出的话见该书第八七页。

⑱ 《国会记录》(日刊)，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六日，S 二○二八三页、二○二八九页，及其后各页。

第十三章

苏联之谜：欧洲、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最高级会谈

捉摸不定

超级大国的表现常常像两个全副武装的盲人，同处一室，到处摸索，都以为对方目光如炬，因而使自己受到致命的威胁。双方都应当懂得，从本质上说，制订政策这种工作经常是没有把握的、妥协的、缺乏连贯性的。但是他们都倾向于认为对方具有已经被自己的经验否定的一致性、预见性和连贯性。当然，时间一长，即使是两个盲人，如果同处一室而又手执武器的话，也能相互造成极大的伤害，更不用说对房间会造成什么破坏了。

美苏关系的困难不仅在于两个相互竞争的官僚机构各有自己的设想和猜测；他们对谈判的看法也是相互矛盾的。美国人倾向于认为每次谈判都有它自己的逻辑，谈判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讨价还价的技巧、善意和善于妥协的能力。但是，如果谈判一方只得到含糊的授权，只有达成协议的一般愿望，谈判可能性——这个漂亮词汇的意思是：了解对方可能接受什么条件——本身就变成了目的，结果必然是坚持谈判的一方不断让步。国内把坚持谈判立场贬为"态度僵硬"、"顽固不化"或"缺乏想象力"。立场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批评者总要求更加灵活，谈判开始不久就有人提出美国有义务通过让步克服僵局。对方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正急于求成，当然有一切理由想要坚持僵硬态度，看看我们还会提出什么

建议。

美国谈判代表的这些特点，加上我们国内的辩论，使我们一九六九年的工作复杂化了。在政府内部，我们不得不同那些希望通过善意的姿态增加谈判势头的人进行似乎没完没了的斗争。例如，不少人提出我们应当放弃反弹道导弹系统和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发展计划，认为否则就会破坏限制战略武器的前景——虽然事实上这两种武器属于我们为数很少的几张可玩的牌。与此类似，有人警告我们说，对中国开放将使对苏关系倒退；事实上这种开放使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在好几个方面打破了僵局。

我们内部的分歧使苏联领导人情不自禁要利用机会对我们进行夹攻。举例来说，克里姆林宫会强调它渴望就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问题开始谈判。当白宫努力按照苏联的全面表现作出反应的时候，政府其他部门却千方百计——从对报界透露消息到非正式暗示——表明它不仅愿意、而且渴望开始会谈。苏联大使馆在老练的多勃雷宁领导下会在记者和国会领袖当中散布说，贸易可以对缓和紧张局势做出重大贡献。当白宫努力坚持必须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而不是在关系改善之前发展贸易的时候，各个部门和国会领导人却坚持要求早日放松贸易限制。因此，我们第一个年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说服苏联和我们自己的官僚机构，使他们相信我们打算根据我们对国家利益的考虑、根据严格对等的原则进行谈判，而不是根据抽象的口号、“姿态”或“讯号”进行谈判。到一九六九年底为止，双方最初的目标一个也没有达到，但是小心翼翼地避免正面接触的阶段看来就要结束了。一九六九年底，“渠道”——我同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的会谈——日益活跃。这通常是出于苏联方面的主动。我们已经成功地使他们明白、稍后又使官僚机构明白起决定作用的是总统的意见。但是一九七〇年初通过“渠道”进行的活动，就像下棋时开始布局的第一着棋那样是看

不出结果的。双方棋手都决心避免犯无可挽救的错误；每一步棋都小心谨慎，尽可能不透露自己的意图，因此使对方甚至更加警惕起来。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当多勃雷宁同我在一起进行一般性讨论时，他以讨好的口吻说，莫斯科料想它将不得不同尼克松再周旋七年。莫斯科要等待我们下台，这段时间未免太长；对河内则肯定太长了。令人惊愕的是，他暗示莫斯科对东南亚实际上并不感兴趣，而是出于"误会"卷进去的；他没有解释是什么误会。据多勃雷宁说，中国是继续战争的唯一获益者。

多勃雷宁列举了他所谓使苏联感到沮丧的事：美国政府坚持要搞反弹道导弹；中东谈判停滞不前；尼克松接见了罗马尼亚的副外长，但拒绝邀请葛罗米柯到白宫去；我们企图使每次谈判都以其他某种谈判为条件(连环套)。最后，他询问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渠道"开始带根本性的讨论，即使我们决定把达成的任何谅解推迟到越南战争结束以后执行也可以。我告诉多勃雷宁，我认为他很可能得到肯定的答复。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日我们再度会晤，借口是苏联就西德议会的一些委员会在西柏林开会一事提出了抗议照会。意味深长的是这份照会是通过"总统渠道"提交的，因此不会大肆宣扬；莫斯科显然不希望中欧出现危机。

多勃雷宁借此机会问到我们同中国人在华沙举行的最近一轮会谈。他希望我理解这是一个使莫斯科感到"神经痛"的问题。我能给他介绍一点情况吗？我现在同当时一样不懂，苏联为什么对中国这么不断感到烦恼；差不多十年之后，在中日条约问题上也可看出同样忐忑不安的情绪。接连不断的询问不可能产生任何肯定的好处。如果苏联真有理由感到不安，也不大可能得到如实的答复；更有可能倒是使我们看到我们在战略上可以利用的机会——

一九六九年确实造成了这种结果。毫无疑问，多勃雷宁在莫斯科的上司官僚主义地认为，只要他们能够拿出一份查询记录，就不能责备他们对华沙会谈一无所知了——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使他们显得多么惶惶不安。

我一直反对把我们同中国人的谈话拿去给莫斯科吹风，因为这样做使苏联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按照他们的版本向北京透露，借以煽动中国人对苏美共同统治的恐惧。因此我回答说，如果莫斯科如此容易“神经痛”，那么他的上司反正也不会相信我对他说的任何情况的。即使不吹风也清楚，我们根本无法“利用”中国作为一种军事威胁。同时，莫斯科必须认识到我们也有自己的“痛”处，这就是越南。我指出最近莫斯科电台播送美国战俘讲话是一种不友好的行动。

不过多勃雷宁这次来访的真正目的是继续就十二月二十二日谈到的使用“渠道”问题交换意见。开始时，他用一种反常的愚蠢办法就最高级会谈问题对我进行试探，问我是否听说日本大使曾经谈到尼克松的目标是在夏末秋初会见苏联领导人。我向他保证，当我们准备举行最高级会谈时，我们是不会通过第三国提出的。

最后，多勃雷宁转达了莫斯科对我们上次交换意见的反应。苏联领导人欢迎通过“渠道”进行严肃的讨论。他建议我们每次谈一个题目。他很快就会提出苏联对欧洲安全的看法；或许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四月复会以前，我可以概述我们的基本态度。我同意这个程序。

由此可知，到一九七〇年一月底，我们似乎已经开始进行严肃的对话。但是，就像苏联人经常做的那样，他们又出乎预料地改变了航程。他们答应举行的关于欧洲安全的讨论根本没有举行；多勃雷宁干脆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也没有进行实质性讨论。相反，多勃雷宁一月三十一日出现在我的办公

室，带来柯西金总理就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军事行动提出的警告。照会说，如果以色列继续深入埃及进行空袭，苏联"将被迫保证使阿拉伯国家拥有供其支配的手段"来"反击"以色列。尼克松在一封冷淡然而有礼貌的信中拒绝了这种说法，并明确地表示美国将抵抗苏联在中东的任何升级*。二月十日，多少经过点磨炼的多勃雷宁重新提到这种指责，辩解说柯西金写信的意图只是说明困境而不是提出威胁。

一个星期之后，多勃雷宁前来提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怨言。这件事再次表现了苏联人天生的不安全感，同时又巧妙地使我们处于防守地位。他指出最近发表的长达四万字的总统外交政策报告中指名提到的外国领导人只有阮文绍总统和齐奥塞斯库总统。他的领导人可能得出结论，认为我们不重视他们。我委婉地撇开这个令人惊讶的论点，多少有点言不由衷地对他说，这份报告主要是写给美国人看的。多勃雷宁接着问到同一报告关于欧洲那一章里面一句无关痛痒的话：世界上"唯一永恒不变的东西"就是"变化的必然性"。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再承认欧洲现有分界线了？我回答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居然反对变化的必然性这种哲学提法是奇怪的。我们并没有对现有国界提出异议，但是我们不承认东德边界是一条国界。我知道苏联人即将同维利·勃兰特总理就德国内部安排问题开始微妙的谈判，我不想给他们增加谈判的资本。

多勃雷宁再次向我保证苏联领导人渴望他能同我继续秘密交换意见，特别是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但是具体谈什么问题，他还没有得到指示。然后，三月十日，在正式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预定开幕时间之前不久，多勃雷宁提出他同我是否应当集中考虑一项"全面的"或"有限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我告诉他主要

---

* 详细情况见第十四章。

问题在于具体化。这次谈话后不到一个星期，我们获悉苏联正在把他们最先进的防空导弹（SA-3型导弹）运入埃及，还有操纵导弹的苏联人员。于是，我在十天之内第二次会见多勃雷宁，坚定地对他说，这使人回想起他们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表现。我们肯定保证要使军事平衡得到维持。四月七日，多勃雷宁又探询了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交换意见的可能性。他说：如果在维也纳提出我们的主张之前我能加以概述，莫斯科将把这看作是表示真诚的迹象。这样做使克里姆林宫最高层领导人可以在各个部的专家把自己搞得毫无伸缩余地以前加以考虑。

我们还没来得及讨论这些问题，多勃雷宁就被调回莫斯科进行磋商去了。在此期间又出现了柬埔寨危机。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已足以说明克里姆林宫缺乏一条明确的路线。它同时试图使用压力及和解两种手段。它提出问题却又不讨论下去，在中东挑起一场对抗却又缺乏显而易见的目的。这种令人迷惑的态度后面隐藏着什么动机呢？

苏联行为之谜

即使在最平静的时期，所谓苏联领导人是根据深刻的长远考虑办事的这种形象也可能是一种过分的渲染。通常由十五名拥有巨大权力的领导人组成的政治局是最后决策机构。当然，党的总书记——从一九六四年以来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可以决定政治局开会的议程；他控制着书记处；他在挑选新的成员时具有决定性影响。尽管如此，自从斯大林死后，任何总书记也不是随心所欲、毫无约束的——虽然勃列日涅夫的地位从一九七一年以来显然已经日益突出。他必须设法取得一致意见；每个问题无疑都存在需要加以调和的、相互竞争的思想派别和

影响中心。

作为决策机构的政治局和政府执行机构的截然分离使这部机器更加笨重。官僚机构只有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才有权表示意见，对其他部门的专业，即使实质上同它有关，看来也无权发言。因此，外交部可以对军备控制建议的政治影响发表自己的看法，对其军事方面则不行。国防部是军事问题的唯一权威，对外交就没有什么发言权。部门之间的一切争议都得提交政治局解决。在一九七三年葛罗米柯和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参加政治局以前，他们主管的外交部和国防部有十年在政治局没有代表。在葛罗米柯提升到政治局去以前，我有时得到一种印象，即我比葛罗米柯更了解苏联军事部署。我们参加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代表当着苏联外交官的面讨论苏联军事部署问题，显然使苏联代表团里的军事官员们很不舒服；在此以前，他们有一位军官曾经私下向我们代表团暗示最好不要在外交官面前提出军事技术方面的问题。

由此可知，甚至在总书记处于突出地位、政治局意见一致的时候，苏联的决策过程也是很累赘的，而在变换领导时期则更加动弹不得。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政策方针一旦确定就会以毫不动摇的僵硬态度加上俄罗斯的固执来执行。权力斗争时期则完全可能采取相互矛盾的方针，直到某种危机使他们不得不做出明确决定为止。苏联曾经不知不觉陷入危机之中。这些危机基本上不是事先策划的，并且对善意造成了威胁。陷入危机的原因是某一事件——例如一次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完全吸引了最高级领导人的注意力，或者使它这部庞大而复杂的官僚机器的某一部分获得了更大的影响。

一九七〇年初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当尼克松就任总统时，阿列克谢·柯西金总理似乎是政治局中负责外交政策的主要人物。来自苏联领导的信件是由他署名的；他还在葛拉斯堡罗会见了约

翰逊总统。凡是在最高级会谈问题上伸出触角时，总是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这个时期勃列日涅夫的影响一直在上升。他似乎把自己的作用从管理党务和国内经济方面扩大到国际政治领域。通常每四年一次的党代表大会预定在一九七〇年举行（事实上直到一九七一年春天才举行）。这是建立勃列日涅夫的突出地位的机会；一九七一年春天以后，几乎所有的高级会谈都是同他进行的。

这意味着一九七〇年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苏联的领导或许全神贯注在内部勾心斗角上，对事态发展只能做策略上的反应。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出现的纷扰又使他们想乘机渔利。

二月二日，我在送呈总统的备忘录中指出，这个调整时期由于苏联国内存在严重而长期的困难而恶化了。主要由于技术落后，经济增长率在下降。赫鲁晓夫倒台后，新的领导人即着手增加消费品供应，同时提高防务费用，包括在中国边境加强军事力量。虽然这种做法使经济陷入紧张局面，苏联领导希望工业改组将会给投资和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刺激，但这些希望已化为泡影。“当然，原因在于苏联领导人不愿意正视他们自己制订的工业改组计划的失败。这些领导人谁也提不出既能刺激经济发展、又能保持中央政治控制的新的改革方案。这是使苏联进退两难的中心问题。”（尼克松在这段话旁边批注：“关键问题。”）

我的结论是，最高层可能因此出现拔河比赛的现象：

> 预计今年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可能使困难达到严重状态。最上层的所有领导人都希望自己的支持者保持关键地位。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老年集团可能力图在党代会上扩大自己的权力，而青年集团则倾向于阻止这种前景的出现。

最后，内部的紧张局势并没有达到破裂点。但是在我称为“青

年”集团的成员中，有两个人——德米特里·波利扬斯基和亚历山大·谢列平——很快就从高位清洗下来。勃列日涅夫看来同意我对谁可能争权这个问题的分析。

克里姆林宫政局的变化无常一直继续到春天结束。在五月五日送呈总统的备忘录中，我列举了苏联政策杂乱无章、自相矛盾的进一步迹象，例如迅速撤回建议，演说中提到已经改变的决定。我指出：

> 得到一些主要学者同意的政府内部人士的一致意见似乎是：领导层事实上已经出现麻烦，但是解决办法，即使是暂时的，是对勃列日涅夫有利的。
>
> 由于全国电视的集中宣传，他的形象更清楚了；他发表的涉及所有重大内政外交问题的内容广泛的演说显然反映了他的信心。而且好几个第二流人物职务的变化……暗示他是高高在上的。

一九七〇年六月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和苏联议会（最高苏维埃）的选举确定了勃列日涅夫的优势地位。六月，我为总统分析了外交政策上可能产生的后果：

> 勃列日涅夫的优势地位和日益增长的力量不会立即表现在政策方面。在代表大会上，他不惜牺牲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而站在消费者一边，提出了自己的“和平纲领”。他在闭幕词中又重申了这两个主题。可能更重要的是：如果他获得更多权力、从而可能获得某种较大的行动自由，他可能因此愿意在我们正在研究的某些国际问题上有所行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柏林问题等等。

但是在苏联确定缓和紧张局势的方针以前，他们还想通过“有选择的缓和”来孤立我们——一方面同我们的欧洲盟国改善关系，一方面对我们增加压力。苏联领导人从西德新任总理维利·

勃兰特的政策中看到了施展这种策略的缺口；有几个月，东方政策(Ostpolitik)占据了舞台的中心。

东方政策

多勃雷宁在一月二十日提出要阐述苏联对欧洲安全问题的看法之后为什么就从此没有下文了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因越来越清楚。莫斯科认为直接同波恩打交道要比把我们牵涉进去干得更好。一九六九年冬天，维利·勃兰特采取主动，对苏联和东德都提出了放弃使用武力、接受中欧现状的建议。苏联领导人及其东德被保护人显然对同三十年代以来德国出现的第一个社会民主党政府打交道的前景感到兴趣。同时，莫斯科已经同北京开始就长期以来接近沸腾的边界争端问题进行谈判。苏联很可能认为存在同时减少两条战线上的压力的某种机会；如果他们能够使勃兰特接受欧洲现状，就会使中国人更加孤立。此外，波恩同莫斯科的直接和解还有另一个有利之处，就是在解决欧洲一个重大问题时把美国排除在外，从而建立一个先例，可能使其他欧洲人越来越面向莫斯科而不是面向华盛顿。逐渐，这种情况必然会削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联系。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已经产生一种看法，认为勃兰特决定修改他的前任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的政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是有益的，但只有在不让苏联支配德国和欧洲政策的情况下才是如此。除非我们设法对这个过程取得某种控制，勃兰特在完成德国这一新政策的目标方面将越来越依靠苏联及其善意。二月十六日，我写信给总统谈到这件事可能带来的后果：

但是，东方政策最使人担心的方面多少是比较带长远性的。只要勃兰特

还在同东方国家谈判当前已经摆在桌面上的那些问题——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奥得—尼斯线、可能为柏林做出的种种安排——他在保持基本上是亲西方的政策方面不会有任何严重困难。……

然而，假若勃兰特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正常化，他或者他的继任者不用多久就可能发现人们企望得到的好处并没有出现。……已经在东方政策上投入大量资本的德国人这时可能认为他们面临痛苦的抉择。应当记住，早在五十年代，不仅舒马赫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内，而且传统上醉心于东方、梦想德国成为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桥梁"的保守派中都有许多德国人反对波恩同西方制度结合，理由是这样做将使德国永远分裂，再也不能在东方起积极作用。关于德国基本立场的这种辩论很可能以更加造成不和的形式重新出现，不仅使德国国内矛盾尖锐化，而且使德国的西方朋友怀疑它作为一个伙伴是否可靠*。

但是，设法破坏勃兰特的政策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有一种选择，就是把不可避免的事导入建设性的方向。勃兰特的联合政府是根据他现正执行的纲领当选的。我们使他的东方政策流产的唯一办法是大规模干涉德国内政，使我们的盟友离心离德，还要（正如蓬皮杜总统担心的那样）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它变成解放东欧的德美同盟。我们也提不出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蓬皮杜和哈罗德·威尔逊正是因为担心德国采取"解放政策"，所以公开支持勃兰特的方针，并且私下极力劝说我们也支持。我国的舆论也无法理解一项违背德国政府意愿而坚持德国重新统一的政策；我们不可能比德国人更象德国人。相反，我们将日益受到指责，说我们破坏了减轻德国分裂造成的严酷后果的富有希望的前景。

因此，我敦促尼克松附合勃兰特的政策，并运用我们的影响把它纳入一个比德意志民族主义更广泛的格局中去。勃兰特也用保

* 在此书撰写过程中，波恩似乎正在出现这种情况。

持密切接触的办法为减少人们的担心做了他应做的事。当然，德国的新政府是通报情况，而不是进行磋商。他们报告进度而不征求意见。不过这种做法也正是我们希望的。我们最不希望有什么人认为我们应该对正在西德成为严重国内问题的德国谈判立场负责。我劝告尼克松，"我们给予勃兰特的任何支持应仅限于一般地赞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东方改善关系——而不要对它的具体行动表示赞同。"

我们并不是没有办法阻止苏联利用东方政策在我们和我们的欧洲盟邦之间制造分裂。举例来说，要奉行一项我们强烈反对的政策，这是西德任何领导人都担当不起的。他在国内的地位经受不住；他自己的信念也与此不符；对利益的任何合乎理性的考虑都不会鼓励这种做法。此外，勃兰特向承认东德方向走得愈远，他就愈需要有一项柏林协定。柏林是解开整个难题的关键。道理很简单。勃兰特同苏联和东德谈判的任何条约都必须经过西德议会批准，而他的联合政府在议会中只有极其微弱的多数。一项增强柏林安全的协议是勃兰特那些引起争议的、实质上表示德国接受分裂状态的条约所能得到的最明确、最有说服力的报酬。显然只有在签订柏林协定的情况下勃兰特的东方条约才会得到批准。而柏林协定需要战时四大强国(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一致同意。这样一来，我们的积极合作就成为关键了；只有我们有力量抵销柏林处于孤立状态这个现实；因此，无论这个过程是怎么开始的，我们终将获得重大的发言权。

我们是在这个范围内支持勃兰特具有历史意义的方针的，虽不热情，但不乏信心。勃兰特在一九七〇年一月十四日发表的政策声明中规定了同东方谈判的六项原则，其中包括保持四大国在柏林的权利和改善柏林的状况。五天后，东德共产党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同意就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而不附加

先决条件。二月十一日，东德总理维利·斯多夫又出其不意地建议双方直接谈判。在地点问题上经过某些讨价还价以后，双方同意两个领导人将于三月十九日在东德的埃尔富特会晤。同两个德国之间的行动平行，波恩也开始同苏联讨论放弃使用武力条约问题。西德驻莫斯科大使进行初步接触的结果是在苏联坚持联邦共和国首先必须承认东德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可以预料的僵局。这时，勃兰特决定使谈判升格，任命他的亲信埃贡·巴尔去领导第二轮会谈。巴尔通过秘密渠道把这个行动通知了我。他从莫斯科回国后，又于二月二十日再次利用秘密渠道转达了他对莫斯科谈判总的说来是乐观的估计。他认为苏联人对签订放弃使用武力条约的可能性是“认真感兴趣”的，并且即将提出经过政治局批准的具体建议。

但是通过谈判巴尔也认识到，把条约同柏林问题套在一起是我们手中暗藏的一张王牌。他向我保证，说他已极力要求葛罗米柯同意使通往柏林的民间交通不受干扰。这是德国舆论要求的必不可少的报偿。葛罗米柯没有做出反应，但记下了这一点。巴尔希望保证柏林问题的谈判不落后于德国问题的谈判。我的看法相反；德国问题谈判一旦完成将大大改善我们就柏林问题讨价还价的地位，因为那时苏联将亟于使东方条约得到批准。

在使柏林问题谈判拖延六个月后，苏联人开始看到同样的现实。二月十日，苏联正式邀请美国、英国和法国在二月十八日开始谈判柏林问题。考虑到盟国之间进行磋商那种像冰河运动般缓慢的程序，这样短促的期限是完全不现实的。但它证明了苏联的迫切心情，并且突出说明只要我们不仓猝行事就有改善我们在柏林的地位的机会。我建议总统接受苏联建议，但要使谈判分阶段进行，以免苏联利用两场同时举行的谈判在盟国之间挑拨离间。这样我们就跳起了一场兢兢业业的小步舞——我们和我们的德国盟

友都不能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勃兰特想要加快柏林问题的谈判，以便利用这场谈判来讨价还价，必要时还可把他的东方政策失败的责任推卸给我们。相反地，我们赞成比较从容的步调，免得他们要求我们以四大国在柏林的权利为代价促进两个德国之间的谈判。

二月二十五日，勃兰特写信给尼克松，正式通报巴尔的莫斯科之行的情况，并委婉地要求早日开始柏林问题谈判。我们等到三月十二日才予以答复；尼克松在信中同意为统一西方立场而努力；我们提出四国柏林会谈可以在三月二十六日开始。柏林问题的错综复杂、西方取得共同立场的必要性，以及多年积累的尖锐对立的观点都使柏林谈判必然旷日持久。勃兰特可以在双边关系中为他的首创精神规定迅速得多的步调；他的主要谈判代表巴尔的作风就使谈判非快不可。所有这一切增加了我们的筹码。用外交辞令来说，我并不认为柏林谈判的拖沓从策略上看是一个不利条件。

勃兰特同维利·斯多夫在埃尔富特的会晤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他受到东德群众极其热烈的欢迎。他们开始有节奏地高喊"维利！维利！"后来想起两位出席者的名字发音相同，就改口高呼"维利·勃兰特！"这次会晤没有达成重大协议，其意义在于处于分裂状态的两个德国的领导人第一次见了面并举行了会谈。以德国重新统一作为解决任何欧洲问题的前提的西方传统立场从此成为历史陈迹。

这就是三个星期之后勃兰特以总理身份第一次访问华盛顿时存在的局面。勃兰特抵达之前，我于四月八日在白宫我的办公室里私下会晤了埃贡·巴尔。他更详细地向我介绍了他在莫斯科谈判的情况，但出于某种理由避而不谈他已经交给苏联、然而从来没有同我们讨论过的三种"新文件"。（一贯乐于钻空子扩大盟国团结中任何潜在的裂痕的多勃雷宁已经对我提到过这些文件了！）

巴尔相信苏联会敦促东德使他们同波恩的关系正常化，相信他们会在柏林通道问题上有所放松。当然，我们要求的不是苏联可以随意撤销的一种行政性姿态，而是能够增加西柏林生存能力的法律规定。勃兰特同尼克松的会晤进行得很顺利，情况我已在第十一章中加以描叙。勃兰特离开华盛顿时得到了对他的政策的泛泛的支持。五月十二日至二十二日，西德同苏联恢复谈判并达成"原则"协议。五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在罗马举行的大西洋联盟外交部长半年一次的会议上，勃兰特获得所有盟国的坚强支持。

在此期间，西德内部的争执一直在增加。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激烈攻击勃兰特的政策。前总理基辛格警告说，再过"五分钟就要完蛋啦"；对基辛格作为反对党领袖的地位挑战正在得手的赖纳·巴泽尔寓意不祥地要求"赶紧悬崖勒马"。埃贡·巴尔的谈判文件也泄露给德国报界，使群情更加鼎沸。这场风暴十分明显地说明，除非柏林问题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否则西德议会就不会批准同苏联签订的任何条约。

由于六月地方选举结果良好而得到支持的勃兰特决定开始同苏联进行最后阶段的谈判，任命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担任首席谈判代表。谢尔到莫斯科十二天之后，同葛罗米柯外长草签了一项放弃使用武力条约（草案）。五天之后，勃兰特也到了莫斯科，在条约上签字，并利用这个机会同勃列日涅夫进行长谈。联邦共和国已经破釜沉舟；它接受了德国的分裂，肯定了中欧的现状。

两天后，勃兰特写信给尼克松，说他对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都强调了解决柏林问题的关键意义。已经一再正式通知苏联，除非柏林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否则条约就不会生效。八月十七日，巴尔再次访问华盛顿，向我介绍了勃兰特莫斯科之行的情况。他主要关心的是强调勃兰特想在柏林问题上取得迅速进展的愿望。我向总统指出，如果这套错综复杂的谈判失败的话，我们有被人当做替

罪羊的危险。但是我认为形势已经发展到不能失败的程度。我们已经成为决定性因素，虽然莫斯科和联邦共和国在其后五个月内都没有完全理解这一点。

苏联一直把柏林谈判拖延到同联邦共和国签订条约之后。他们无疑估计西德那时会给我们施加压力——西德确实半心半意地做了——，要我们解决柏林问题。但是这个算盘完全打错了。波恩的回旋余地有限；它自己能做的让步都已经做了；它也无法逼迫我们做更多让步。对于德国相当大的一部分舆论来说，同苏联签订的条约看来是不公平的；波恩断然放弃了自己的民族要求，换来的只是气氛的改善和两个德国之间接触的松动，而这些接触本来就是不应当中断的。条约在议会中的命运现在取决于苏联在柏林问题上毫不含糊的让步。把条约同柏林问题套在一起显然对莫斯科不利，而不是有利。当然，柏林谈判本来就错综复杂。西方盟国要求从苏联而不是从东德那里得到自由经过东德领土出入柏林的保证，而东德肯定是要抗拒的。但是苏联要克服东德的犹疑还有另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如果我们不同意，就绝对开不成欧洲安全会议。我们已经明确表示，在柏林谈判结束之前，这种会议根本不予考虑。这样一来，我们就给缓和这匹野马套上了笼头，使欧洲安全会议和勃兰特东方条约的批准问题都取决于是否能达成符合我们目标的柏林协议。

在此期间，我们还得约束自己的盟国。勃兰特希望盟国就欧洲共同均衡裁军的标准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以便准备谈判，同时防止美国军队单方面撤退。英国则要求立即建立东西方关系常设委员会。我们撇开德国建议而支持加拿大提出的一套故意含糊其辞的关于双方共同均衡裁军的一般原则。我们也反对英国的整个建议。我们不希望建立任何机构，为要求在虚无缥缈的基础上缓和紧张局势的已经过分强大的压力增加势头。

时间对我们有利；只要我们保持冷静，我们的地位是强有力的。这一点苏联人当时并没有看清楚。他们仍然认为同联邦共和国达成协议是在有选择的缓和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而且想继续利用它来削弱盟国的团结，办法是制造一系列针对美国的危机。因此，需要长达数月的坚定态度才能使克里姆林宫认识到它必须面对的现实。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与防务辩论

但是在同莫斯科举行的谈判中，有一种谈判是单独存在的。这就是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两地交替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赫尔辛基的第一阶段会谈是探索性的，准备一九七〇年四月中旬在维也纳继续进行。苏联主要关心限制反弹道导弹问题——这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因为柯西金在葛拉斯堡罗时曾对约翰逊总统说，限制导弹防御是他曾听到过的最荒谬的想法之一。人们可以言之成理地得出结论，认为苏联看法的转变是因为我们决定发展自己的反弹道导弹系统。遗憾的是这样的洞察力并不普遍。事实上，一九六九年关于反弹道导弹问题的激烈辩论又在一九七〇年基本上重复了一遍，这次辩论的是已经批准的计划规模大小问题。究竟是把我们的反弹道导弹限制在已经由上届国会以微弱多数票批准的所谓第一阶段——即建立两处反弹道导弹发射场来保护民兵式洲际导弹基地——，还是继续进行第二阶段，即按照我们已经宣布的、在出现偶然触发事件或第三国进攻的情况下保护我国人民这个目标进行建设呢？这就是争论的问题所在。

我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三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归纳了相互对立的观点。究竟是美国单方面做出姿态、还是使克里姆林宫面对他们亟欲制止的危险和计划更能使苏联对妥协感到

兴趣呢？这是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个问题把我们从氢弹到B-1型轰炸机等一系列防务问题的辩论搞得混乱不堪。我至今还没有听到过美国单方面克制曾经使苏联做出重大反应或持久反应的任何例证。

单方面姿态的鼓吹者要求暂时停止美国反弹道导弹的进一步部署，提出苏联对限制防御系统是感兴趣的。他们感觉暂停执行我们的方案是表示我们态度认真的讯号，而且还可以使国会里批评反弹道导弹的人缓和下来。如果苏联拖延谈判，我们随时都可撤销暂停。持这种观点的有国务院以及军备控制和裁军署。但是希望继续执行第二阶段计划的人，包括我在内，则争辩说，暂停执行我们的反弹道导弹计划就会破坏达成协议的前景。正是因为我们开始执行这项计划才扭转了苏联对导弹防御问题的态度；我们一旦停止建设，就无法促使他们认真谈判，特别是国会里的反对派在制止第二阶段后必然会设法整个废除反弹道导弹，就更是如此。苏联只要拖延谈判就可达到扼杀我们的反弹道导弹的目标。而且我认为无论苏联如何拖延时间，我们中止暂停都是很不可能的。贩卖暂停主张的人总是满口答应要十分警惕地执行作为暂停基础而设想的条件；实际上，除非出现嚣张到完全无法忽视的挑衅，暂停几乎是从来不会中止的。

一月二十三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未能做出决定；问题已经超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或反弹道导弹的范围，变成了一场关于我国安全的性质的全国性辩论。

对我国防务计划的一切攻击中最突出的口号是：需要“重新安排国家的优先项目”——这是削减国防预算的一种委婉说法，是越南问题辩论在战略领域中的翻版。为限制越南战费的使用而提出的汗牛充栋的修正案很快就扩大到具体的武器系统方面来。乔治·麦戈文参议员建议把B-1型轰炸机削减掉；威廉·普罗克斯

迈尔和理查德·施韦克参议员要求把 C-5 A 型运输机问题推迟到对财政上陷入困境的洛克希德公司调查结束以后再考虑；伯奇·贝赫参议员要求对我国武装部队的整个规模加以限制。爱德华·布鲁克参议员则在进行他一年一度的反对反弹道导弹和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运动。没有人就国防预算可能不足问题提出议案或发表演说。强大国防的信仰者显然是在打一场后卫战。

同越南问题一样，我们陷入了恶性循环。为使国防计划继续得到任何支持，尼克松认为他必须对要求削减国防预算、要求降低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军事目的的比例的压力有所反应。除莱尔德和我之外，所有政府高级成员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他们担心不这样做，国会就会按照国会、新闻界和学术界反对武力的狂热分子的建议，剧烈削减预算。我存在严重的疑虑。我担心的是，当我们正在丧失战略上的相对优势、在东南亚明显实行收缩而苏联军事支出不断增加的时候，坚持削减我们的武装力量会在外交方面造成什么长远影响。

一九七〇年二月二日尼克松宣布的国防预算比前一年减少五十亿美元以上。（当然，这个数字并不能说明整个问题，因为一九六九年的预算也受到同样压力，所以也是不足的。）国防预算约等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前一年则等于百分之八点七；在整个国家预算中，国防预算占百分之三十四点六，而一九六九年则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七。（的确，尽管越南战争还在继续，我们提出的国防预算从实值上说仅比和平时期最后一年即一九六四年的预算增加了百分之七。）在这些限制范围内，梅尔·莱尔德在经营管理和计划工作上创造了奇迹，使全部战略计划——B-1 型轰炸机、三叉戟型潜水艇和导弹、民兵Ⅲ型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卫兵”反弹道导弹——虽然增加不多，但都有所增加。

尽管如此，削减国防预算仍具有潜在影响。它使我们不能对常规兵力方面出现的日益不平衡的状态做出前后一贯的反应，使我们的战略规划只能修修补补、毫无生气，并使五角大楼轻视曾经使我们在国内付出沉重代价、在我们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战略中起关键作用的反弹道导弹计划，因为把钱用在这方面必然会影响其他优先项目。因此，我们的裁军谈判有三条战线：在维也纳和赫尔辛基同苏联谈判；国内，在我们政府内部谈判，并同国会谈判。甚至已经剧烈削弱的国防预算也还受到国会的攻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甚至在反弹道导弹第二阶段计划正式提交国会以前就反对这个计划。一月三十一日，他预言参议院将出现新的辩论。他说："这件见鬼的事还有完没完？会对人们产生什么影响？……钱从哪里来？"J·威廉·富布赖特参议员说反弹道导弹的第二阶段是"一个巨大错误"。二月二日宣布新预算后，批评就真正开始了。曼斯菲尔德参议员表示，新预算虽然比前一年的预算低，但还是远远超过应有水平。他警告说，这个预算为许多新的项目提供了将来会要求更多投资的"种子基金"。他说得是对的，但是在六十年代我们自动停止增加导弹以后，"种子基金"已是新的一届政府在苏联战略力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所能提出的最低限度要求了。

五月，包括乔治·麦戈文、菲利普·哈特、威廉·富布赖特、沃尔特·蒙代尔、克利福德·凯斯和马克·哈特菲尔德在内的一批属于两党的参议员宣布他们打算提出一个替代预算，要求更加严厉的削减。六月十五日，另一批自由派参议员和众议员建议再削减四十五亿美元，明确提出要减少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计划、"卫兵"反弹道导弹第二阶段和海军购买 F-14 型战斗机的拨款。由上届政府的高级官员准备的一份布鲁金斯学会报告概括提出了一个国防预算"低方案"，共五百九十亿美元——比总统

提出的预算减少一百四十亿美元①。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七日，《华盛顿邮报》对形势做了扼要的概括：

过去一度几乎是例行公事的立法手续——通过年度军费法案——，现在变成了涉及几十种军事计划和政策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常常是很激烈的战斗。……（关于反弹道导弹的冗长辩论）掩盖了事实上是国会山上针对一切军事活动进行的、从未有过的最广泛的攻击。

在苏联战略部队和常规部队加速增长的时候，这种紧缩国防的要求更加令人侧目。一九六六年年中，苏联拥有二百五十枚可供使用的洲际导弹；一九六七年年中是五百七十枚；一九六八年九月是九百枚；一九六九年九月是一千零六十枚，从而超过了我们。根据当时的预计，到一九七〇年年底，苏联将拥有近一千三百枚洲际导弹。（实际上达到了一千四百四十枚。）谁也不知道最高会达到多少；在此以前的五年当中，情报方面的估计一直过低。苏联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预计将从一九六八年九月的四十五枚增加到一九七五年的九百多枚。同时，苏联在欧洲和远东的常规兵力也都在迅速扩充和现代化。

国会和新闻界把这些事实当做五角大楼为保持一个膨胀的国防预算而惯用的吓人战术，不予理睬。甚至强大国防的坚定鼓吹者也开始动摇。反弹道导弹的关键性支持者之一亨利·杰克逊参议员要参加改选，因此反对在他的家乡华盛顿州设立任何反弹道导弹发射场。原子能联合委员会有影响的主席约翰·帕斯托参议员反对在国会已经批准的两处发射场以外再建立任何反弹道导弹基地。他说："我们州的人感到纳闷，不知道为什么给教育增加拨款会造成通货膨胀而给'卫兵'增加拨款则不会。"②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颇有权势的主席门德尔·里弗斯众议员主张削减反弹道导弹

而加强海军——说明预算方面的压力如何影响到五角大楼的优先项目。甚至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加强国防的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也抱怨由于重视国防而忽视了国内计划、特别是有关环境的计划。这种批评得到切特·霍利菲尔德、查尔斯·瓦尼克等关键性众议员的响应。

政府不得不在这种气氛中工作，不仅要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防务计划，还要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制订前后一致的战略。后来批评这个谈判的人忘了在七十年代初期即使想要保持最起码的战略计划都是多么困难，忘了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参加了进攻③。政府不得不集中全部力量防止国会把我们试图通过谈判使苏联在对等基础上采取的行动单方面强加于我们。我们在海外军队部署问题上不断受到攻击，每年都要对减少驻欧美军的企图进行斗争。一九七二年当我们就双方共同限制反弹道导弹问题进行谈判时，我们的反弹道导弹计划险些被国会取消或缩减成为毫无意义的样品。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也一直受到攻击，到签订容许武器现代化的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才结束辩论。如果政府想要保持适当的防务计划，它越来越不得不以"谈判筹码"为理由使一个一个武器计划得到支持——也就是说，指出制造这些武器不是为了完成战略目的，而是为了在军备谈判中予以放弃。这种说法可能有助于把必不可少的计划保存下来，但不大可能产生深刻的战略理论。

国内就反弹道导弹展开的辩论说明了我们的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具有高度技术性，是多数门外汉无法搞懂的。同时，它又涉及严重的战略理论问题，是我们同苏联进行军备控制谈判的核心。各种对立观点都在官僚机构和国会中有自己的发言人。他们谁占上风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这个问题是作为防务问题提出来的、还是作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筹码问题提出来的

这样一种偶然性因素。这种情况部分地说明了政府最后为什么要在反弹道导弹问题上采取两种互不相容的立场。以五角大楼为主制订的国防预算提出的立场同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提出的立场很不一致，因为后者是经过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等等部门之间一套复杂程序拟订出来的。总而言之，公开争论的噪音逐渐压倒了系统的考虑。

两届政府为反弹道导弹提出的理由是这种导弹将保护我国人民不受第三国攻击，并为防止意外事件提供某种保证；保卫我们的民兵式导弹是一个次要目标。然而我们的实际计划越来越向后一方向发展。二月七日，我向总统解释了这种困难处境。如果反弹道导弹要完成已经宣布的目的，我们就必须开始实行第二阶段计划，至少在第三国进攻或出现意外发射的情况下使我国人民得到保护。下一步最符合逻辑的做法是着手兴建一个新的导弹场（密苏里的怀特曼空军基地），并在靠太平洋的西北地区兴建一座适应民防需要的发射场。（怀特曼基地靠近圣路易斯，因此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够同时起某种民防作用。）但是，正在竞选的杰克逊参议员拒绝考虑在西北地区建设发射场问题。下一个最好的方案是怀特曼基地加上一座保护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用术语说，这里是全国指挥部）的发射场。但是，如果我们要保护“政客和将军”，已经很激烈的反对派将会喊得更凶，更不用说在华盛顿十五英里范围内寻找必要的地皮的困难了。由于这些原因，莱尔德建议只在怀特曼建立发射场。用保护导弹基地不受苏联袭击的办法执行一年前作为防止第三国进攻的民防工程提出的计划，我对这种逻辑深感怀疑。

尼克松选择了莱尔德建议的怀特曼方案，因为他深信任何其他方案都是国会通不过的，而与其一无所得，不如要一个不符合逻

辑的反弹道导弹工程。由此可见，公众和国会的压力使我们的反弹道导弹计划的性质和目的一年之内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

政府的让步与其说使批评者平静下来，倒不如说使他们得到了鼓舞——情况几乎历来如此。政府内部那些反对整个反弹道导弹概念的人更想再干一场了。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对反弹道导弹的支持最多也只是半心半意的。(正因为如此，尼克松在四月份给我一张便条中提到，杰勒德·史密斯最好是支持反弹道导弹，否则最好辞去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职务。我向史密斯转达这个意思时多少冲淡了一点，因为无论他自己持何看法，他一贯是忠诚而正直地支持政府政策的。但是他并非总能控制情绪激烈的下级私下议论的。)三月十日，甚至以态度坚定的约翰·麦克洛伊为首的总统军备控制和裁军总谘询委员会也反映了当时流行的情绪，建议完全禁止反弹道导弹并暂停试验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一个星期后，即三月十八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核实小组第一次开会研究这些问题时，格里·史密斯提出应当指示参加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代表团设法使双方共同彻底禁止反弹道导弹。

经过几个星期，史密斯、罗杰斯、埃利奥特·理查森以及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代表团的保罗·尼采都敦促我们在谈判中提出一个仅限于华盛顿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主要理由是使我们的计划同苏联部署在莫斯科周围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对称。这样一来，官僚机构和外交工作对这次谈判的要求同我们的防务计划发生了冲突。原来同意甚至建议在我国中部建立三座发射场作为国防预算一部分的高级官员，为了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突然提出了根本不同的、以华盛顿为中心的部署方案，而这种方案从来没有提交国会讨论过。如果苏联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们将不得不拆毁现正建设的工程，一切从头开始。

所有这一切都迫切要求某种协调。在我的要求下，一个跨部门的专家委员会洋洋得意地提出了一套令人头昏目眩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的九种不同方案。在三月二十五日我主持召开的核实小组会议上，我抱怨说现在工作程序正变得有些杂乱无章。为了便于总统决策，我们必须给他提供同我们的全国战略有关的某些总的概念，而不是迫使他就令人头痛的技术性争论做出仲裁。

国家安全委员会三月二十五日举行了全体会议。同我曾担心的情况一样，这场讨论变成了各部门首长就尖端科学问题发表一连串毫不相干的议论。我们如何限制双方的雷达网呢？我们如何保证地对空防空导弹(SAM)不会偷偷升格为反弹道导弹呢*？莱尔德、帕卡德和惠勒将军虽然对反弹道导弹不热心，却热烈赞成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他们提出，如果限制这种运载工具就必须规定现场视察，虽然他们对视察什么和由谁视察也没说清楚。罗杰斯和史密斯则保持他们现已根深蒂固的立场，要求禁止反弹道导弹并暂停运载工具的试验。因为讨论是抽象的，并没有落实为几条明确的可供选择的谈判原则，总统不可能就此做出决定。

三月二十七日，有人把五角大楼的主张透露给《华盛顿邮报》的查默斯·罗伯茨，以便引起公众反应。果然不到两个星期，国务院以及军备控制和裁军署观点的鼓吹者就在四月九日提出了一个表示参议院意图的议案。这个以七十二票对六票压倒多数通过的议案要求总统建议双方“立即暂停部署一切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核武器”。议案是两位共和党人——埃德·布鲁克和约翰·谢尔曼·库珀——创议的，并得到亨利·杰克逊的支持。埃德蒙·马

* 这个问题行话叫做“SAM Upgrade”，因此爱打趣的人说这是我工作班子中一位新来的分析家。(SAM是英文“地对空导弹”的缩写。Upgrade意思是“升格”。两个英文字合起来像一个人名。——译者)

斯基参议员鼓吹实行"战略性暂停"，包括停止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飞行试验。他说：这是一种"谈判代表之间的暂停"，不这样做就会"丧失禁止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和反弹道导弹的一切机会"。甚至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也把这个决议称为可供总统考虑的"一个有益的、非限制性的方针"。

直到下一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预定四月十六日就要在维也纳开幕的前夕，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有的只是杂乱无章的争吵。因为总统曾经责成我来整理这次谈判可供选择的办法(没有告诉其他主要人物)，我决定首先必须把各种不同意见综合成几套明确的方案，使总统可以就总的目标而不是深奥难懂的技术问题做决定。三月二十七日，我指示各部门把各种杂乱无章的看法归纳为四条，供总统抉择。

一九七〇年四月八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四种方案，内容一种比一种全面——有人富有想象力地给它们加上了甲、乙、丙、丁四个标签：

甲方案把洲际导弹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限制在美国拥有的总数一千七百一十枚上，并且冻结了轰炸机的数目(美国五百二十七架，苏联一百九十五架)。它允许设立"卫兵"这类水平的反弹道导弹(十二座发射场)。换句话说，这种方案要求苏联减少导弹力量而毫不影响我们的轰炸机和反弹道导弹计划。各部门毫不费劲就同意了这个方案；至于说服苏联则是格里·史密斯的事了。

乙方案对进攻性武器的限制和甲方案相同，但把反弹道导弹设置范围限制在全国指挥部(即华盛顿和莫斯科)，否则就完全禁止。

丙方案对进攻性武器的限制和甲、乙两个方案相同。和乙方案一样，它也把反弹道导弹限制于全国指挥部或完全禁止这种导弹。但是它还禁止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这是前两种方案没有的)，条件是苏联同意现场视察。

丁方案略有不同。它建议对洲际导弹和潜艇导弹大加削减，从我们现有

总数一千七百一十枚每年减少一百枚，直到一九七八年双方各一千枚为止。这种方案禁止设置反弹道导弹，否则就把它限制在全国指挥部范围；对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则未予禁止。

这些方案说明了政府所处的困境。各部门在反弹道导弹问题上只同意两种办法：一是现有的“卫兵”计划（而我们已经知道，甚至赞成反弹道导弹的参议员也不再支持这个计划了），一是保护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计划，而这是同总统已向国会提出的建议背道而驰的。不仅如此，所有的国会事务专家一致认为国会决不会批准在华盛顿周围设置反弹道导弹。可是这个已被判处死刑的计划却是所有部门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方面能够一致同意的唯一计划。

现在回顾起来，我感觉很难解释为什么当时居然可能考虑这个方案，更不用说通过它了。就此方案达成的一致意见说明，鼠目寸光的官僚主义考虑压倒实质内容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五角大楼担心完全禁止反弹道导弹，因此支持指挥部方案，因为这个方案至少可以保存反弹道导弹技术，为将来扩充提供基础。国务院同军备控制和裁军署认为最好完全不搞这种导弹；但是他们也接受指挥部方案，因为它同苏联的方案对等，因此是“可以谈判的”。不仅如此，他们赞成这个方案是因为国会将加以否决，这就几乎肯定会导致他们希望的结果，即完全禁止我们搞反弹道导弹。就我来说，尽管我知道不行，但还是默认了。这样做是出于一种并不十分高尚的理由：我知道总统不愿就一个如此技术性的问题同负责执行的部门较量。

尽管如此，建议以全国指挥部为中心设置反弹道导弹仍然是一个头等错误，实质上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向苏联提出一个明知国会不会批准的方案，又把一个同它背道而驰的方案提交给国会。

算是走运，这个错误没有造成永久性损害。由于苏联贪得无厌，我们在陷入不可救药的困境之前设法溜过去了。

四月八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情况，同日本歌舞伎的演出同样难以捉摸。各部门都提出复杂的技术性理由，从同样的事实中得出根本不同的结论。每个部门的领导人都提出两种主张——一种是他信奉的主张，一种是作为开局的棋子抛出来的比较强硬的、他估计苏联会拒绝的主张。这样一来，他既可以证明自己是“强硬的讨价还价者”，同时又有他赞成的建议作为后退的依据。所有这些虚张声势、故作姿态的把戏把总统弄得心烦意乱。他木然的表情说明他认为多数理由都是只有他们自己能懂的废话；他力图估计各种方案的政治影响和销路，他的兴趣仅在于了解大概的轮廓。

格里·史密斯为丙方案——少量反弹道导弹、禁止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辩护，但也愿意接受主张削减的丁方案。戴夫·帕卡德和穆勒海军上将分别代表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张以限制最小的方案（限制进攻性武器、但允许制造“卫兵”的甲方案）作为“良好起点”；作为退路，帕卡德令人惊愕地赞成丁方案的削减规划（这样就免得国防部每年为拨款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保罗·尼采认为苏联在导弹投掷重量上占便宜，因此即使冻结导弹数量他们终将获得优势。他赞成大削大减的丁方案。他反对禁止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理由是这样做将使苏联可以在我们现尚领先的少数领域之一赶上我们。约翰·麦克洛伊对他这个主张的评价是“愚蠢”，然而没有解释他是怎么得出这种不友好的结论的。罗杰斯赞成主张削减的方案，但对甲方案也愿意接受。

解开这团乱麻、从中挑选某些建议的愉快任务落到我头上。我遗憾地承认，我在挑选时受官僚主义和政治考虑影响的程度超

过了我在职期间做出的其他任何决定。从根本上说，国家安全顾问是不应玩这种把戏的；他应当就利害得失问题向总统提出他认为最正确的判断，而把政治和官僚机构方面的考虑留给总统去判断。但是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这个问题上，我知道自己的建议将具有不寻常的份量。尼克松根本不会去详细了解那些技术细节，因此也就不可能做出有意义的抉择。在总统密切注视的问题上，我完全准备否决各部门的意见；但在实际上靠我自己做决定的情况下，我觉得从道义上说只能在政府各部门取得一致意见的大范围内行使委托给我的权力。

我认为乙方案——冻结进攻性武器、在双方同意的水平上保持反弹道导弹——最切实可行，也最符合我们的利益。（我赞成用现在的发射场代替全国指挥部方案。事实上这就是最后采取的办法，虽然开始时没有任何部门推荐。）这个方案使我们在现代化方面拥有最大的灵活性。它将制止我们最迫切关心的苏联进攻性武器的增长，并规定了最高限额，可在以后谈判削减。我们可以冻结正在遭到国会扼杀的反弹道导弹计划，以此作为交换，使苏联冻结他们仍在继续制造的进攻性武器。

可是，如果把乙方案作为我们赞成的主张提出来，国会和官僚机构都会闹得天翻地覆。人们就会说我们对禁止反弹道导弹和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问题甚至未予“探讨”。五角大楼的反应也会是冷淡的，因为它虽然并不急于制造“卫兵”，却也不愿用建议限制的办法体现自己的信念。国防部宁愿选择甲方案，因为这个方案限制了苏联正在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却并不限制我们领先的武器（也不限制防御性武器）。尽管甲方案不能成为谈判的起点，如果不成功的话，总是可以归咎于谈判代表的缺乏警惕。无论怎么说，甲方案的国内阻力甚至比乙方案更为严重。

至于两个更“全面”的方案，我深信苏联在试验自己的多弹头

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之前绝不会同意加以禁止；他们也不会接受现场视察。此外，我不相信苏联会接受丁方案关于大量削减进攻性武器的要求；他们必然认为这个方案是想使他们储备武器的计划中途夭折，而对我们的轰炸机实力丝毫不加限制。另一方面，这两种方案都符合我们的安全要求，从许多方面看都比搞军备竞赛要好。

我的解决办法是建议总统以丙、丁两个方案作为谈判的起点。这符合国会和官僚机构中主张禁止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和反弹道导弹的那些人的要求，并使我们能够以赞成全面限制的积极姿态出现。如果苏联接受建议，我们就前进了一大步。如果他们像我坚信的那样拒绝这些建议，我们就可以从对国内和官僚机构来说都更强有力的立场提出乙方案。如果苏联出乎意料地接受我们的建议，结果也符合我们安全的要求。总统同意我的看法。四月十日，我据此发出了训令。

这个时期我同多勃雷宁保持着松散的联系。二月十八日，他问我们打算在反弹道导弹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我们希望达成有限的协议还是全面协议。我们安排三月十日再次会晤。我把我工作班子里的系统分析专家拉里·林恩带在身边，让他解释我们对反弹道导弹的一般看法。然而多勃雷宁只肤皮潦草地提了几个问题，然后就要求同我单独谈话。他以偷偷向我吐露什么重要新闻的语调说，无论是全面协议还是有限协议，克里姆林宫都准备干；全面协议可能更好，因为它可以导致其他政治问题的解决。这一切都是令人动心的，但无实际意义，因为多勃雷宁没有说明苏联如何理解“全面”或“有限”的含意。我回答说，我们现在的主要要求就是具体。

多勃雷宁使美国谈话对手处于防御地位的技巧真是不胜枚举。四月七日，他抱怨说双方即将恢复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然而对

于对方的立场的了解却少到极点；他想不起过去哪一次谈判双方对于对方的目的曾经如此无知。他的论点有些道理。但他似乎认为责任完全在我们这边；他毫不感到尴尬，不想想并没有任何东西妨碍苏联为增进了解做出贡献。就我记忆所及，苏联在整个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期间提出的建议毫无例外都是损人利己、明知对方无法接受的，否则就是对我们建议的反建议。

四月九日，经过总统批准，我对多勃雷宁说（脑子里想到丙、丁两个方案），我们将在维也纳提出几个全面方案。不过，如果苏联决定作为过渡而对比较有限的协议感兴趣，我们也准备加以探讨。多勃雷宁将再次去莫斯科进行磋商。他答应从莫斯科回来后给我们答复。

后来的实际情况是：答复并不是来自多勃雷宁，而是在四月十六日复会的维也纳谈判过程中提出的。我们行将看到，苏联考虑的既不是全面的、也不是有限的战略武器协议，而是一个反华政治联盟。

维也纳谈判陷入了我曾经料到的那种格式。美国代表团心存观望地先拿出丙方案，然后拿出丁方案。苏联谈判代表迅即拒绝了两种方案都包括的限制进攻性武器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们以史无前例的惊人速度——几天之内——接受了我们使反弹道导弹限于两国首都的建议。苏联人见到好东西时是识货的。既能保持自己已有的东西，又把我们钉死在国会绝不会批准的协议上——这样做他们毫不介意。

但是他们有一种情不自禁要过分玩弄自己手中的牌的毛病。他们不是提出一个限制进攻性武器的合理建议，从而拔掉美国战略计划中最使他们担心的钉子——反弹道导弹——而是提出了一个极其片面、甚至最偏激地鼓吹限制的人也无法接受的方案。他们要求为洲际导弹、潜艇导弹和重轰炸机的总数规定一个最高限

额。他们没有提出数字，但坚持把由于地理部署而能达到苏联的一切武器系统都计算在内——换句话说，包括我们驻在欧洲和航空母舰上的全部轰炸机。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部署和生产都要禁止，然而不禁止飞行试验。这种办法当然干净利落：苏联将继续从事这种运载工具的发展和飞行试验，而把我们的部署工作一直冻结到他们能够赶上为止。而且禁止生产是没有可靠的方法进行监督的。

苏联只有在涉及他们盟国利益的问题上才表现出灵活性。我们参加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代表团普遍担心进攻柬埔寨会损害谈判。后来证明这种担心毫无根据。柯西金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语焉不详地发出了点怨言；苏联在维也纳的代表团没有理会柬埔寨问题，而是照常办事。这意味着无穷无尽的内部辩论，因为当时逐渐可以看出，谈判已陷入僵局。

我们的官员越来越烦躁不安，有些人是想得到新的指示以便打破僵局，另一些人则是害怕新的指示。在维也纳率领代表团并同华盛顿保持不断联系的格里·史密斯当时正在同我进行内部谈判。正因为我们互相非常了解，这种谈判是复杂的。他要求更大的自由，而我决心不使他得到这种自由。五月二十日，史密斯通知我说，代表团在指示范围内能做的都已经做了，需要得到超过“圣经”指示内容的“搜查证”。我不准备同意开这种空白支票。我已经意识到代表团某些情绪比较激烈的成员有一种倾向，就是向苏联提出他们自己喜欢的方案。当苏联谈判对手由于迷惑不解或者由于缺乏上级指示而没有做出反应时，代表团成员就亟于报告华盛顿，说俄国人“没有表示不同意”或“表示很有兴趣”，暗示他自己的偏爱显然也是俄国人偏爱的东西。为了制止这种自行其是的做法，我要求史密斯提出明确建议，也要求了解其他部门的看法。

结果不出所料，所有部门都开始倾向于采纳四个星期之前他

们未予理睬的乙方案(冻结导弹、并把反弹道导弹限制在全国指挥部水平)。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应当在容许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存在的情况下,同意把进攻性武器的最高限额规定为大约两千件运载工具。国防部的专家坚持要搞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以便对付苏联在发射核弹的工具方面日益增长的数量优势,穿透苏联反弹道导弹防御网。(总之,大家一致认为苏联要求禁止生产这种运载工具而又允许试验的建议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国务院同军备控制和裁军署要求完全禁止反弹道导弹,国防部要求保留全国指挥部方案(虽然这实际上也会扼杀反弹道导弹)。最有趣的一个建议来自国防部。国防部副部长戴夫·帕卡德坚持必须早日冻结进攻性武器,因为国防预算受到的压力使我们几乎不可能维持现有的战略力量,更不用说加以扩充了④。他要求在现有数量基础上迅速签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换句话说,来自国会和其它方面的压力有剥夺我们一切讨价还价能力的危险;人们要求我们以减少我们自己的兵力作为威胁来制止苏联扩充实力。在一九七二年我们达成协议之后,在批评已经没有什么风险的时候,这些情况就被置诸脑后了。协议规定的数量限制同一九七〇年各部门的要求几乎完全一样,也是五角大楼迫切要求的。但是后来这种限制突然引起了争论。在国会同新闻界的攻击下我们勉强做到了既维持我们已有的计划,又制止了苏联军力的增长。某些人后来却把这说成是美国"单方面让步"。

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一次有关反弹道导弹的表决可以看出我们面临的局面。军委会同意已经授权修建的两个发射场,但只同意为保护民兵式导弹再修两个发射场。作为区域防御系统的反弹道导弹已经完蛋;当授权法案送交参议院全体会议讨论时,这两个发射场也有被砍掉的严重危险。我们现在有一个计划,但需要找一个道理来加以说明;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立场要我们

把已经修建了的项目拆掉，而去修建我们并没有要求的项目。

与此同时，史密斯在维也纳强烈要求提供新的选择，而苏联谈判代表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则建议休会。为了明确苏联的意图，我找了多勃雷宁。更重要的是，尼克松为了同史密斯争夺这次谈判的功劳而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竞争。他要我转告多勃雷宁，谈判问题应当由最高级会谈来解决，而不是维也纳解决得了的。

六月二十三日晚，我在白宫筹划室同多勃雷宁会晤。我说，谢苗诺夫要求早日休会的建议可做三种解释。第一，苏联根本不希望在今年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第二，苏联希望在维也纳达成协议，它建议休会是想使美国提出新的建议；第三，苏联希望达成协议，但不在维也纳达成，所以在那里制造僵局，好让最高领导人去解决。我希望得到多勃雷宁的指教。多勃雷宁回答说：第一种解释显然不能成立。苏联确实希望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尽管我们双方立场接近的程度还不足以预计明确的日期。至于维也纳谈判，苏联认为在现有时间内不可能谈成一项把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都包括在内的协议。他没有收到有关最高级会谈的指示，他必须询问莫斯科。但他明确表示莫斯科宁愿要一项仅仅限制反弹道导弹的协议。我们终于弄懂了苏联给有限协议下的定义。

六月二十五日晨，我随总统前往圣克利门蒂。我们走了以后，多勃雷宁以备忘录形式做出答复，实际上建议立即达成两项协议：一项是把反弹道导弹系统限制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另一项涉及"减少由于意外或未经批准地使用核武器导致苏美导弹核战争的危险"问题。换句话说，苏联想要制止我们真正在进行的唯一的战略计划，同时拒绝对我们主要关心的进攻性导弹施加任何限制。多勃雷宁说苏联代表团已收到按此方式进行工作的必要指示。

至于有关"意外战争"的协议，则很像一个巧妙的陷阱。如果它的目的是防止超级大国自己的武器由于技术失灵而造成危险，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建立快速联系线路和双方同意的反应程序等办法加以解决。但是，如果"未经批准地"使用是指其他核大国的武器，我们就面临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就等于同苏联合作反对英、法这两个盟国——也反对甚至当时我们已在努力建立联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的确是这么想的。这一点到六月三十日谢苗诺夫在维也纳突然开始大谈意外或未经授权发射导弹的危险时就清楚了。七月二日，谢苗诺夫又在私下对我们代表团一个成员说："我们需要采取共同的立场，表明两国政府打算一致行动，以防止来自任何方面的意外的、未经授权的或挑衅性的行动引起战争的爆发。我们需要让他们(其他国家)知道，我们将一起对付任何挑衅企图。"这种做法违背了我们之间建立的、本来应当仅限于在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这一级探索问题使用的"渠道"的规则——原因或许在于苏联人难于理解一个在内部实行分权制度的政府。

无论怎么说，我在七月四日还是把多勃雷宁的建议送给了格里·史密斯，要求他提出意见。七月五日，史密斯答复说，这个建议似乎"局限性太大，因此不符合美国利益。对美国反弹道导弹施加任何限制都应当要求对苏联进攻性武器系统施加相应限制。在维也纳取得积极成果虽然是可取的，但不应使我们过早地投入最强有力的谈判筹码"。

我同意史密斯的看法，然而有一点不同。我也认为仅签订反弹道导弹协议的建议局限性的确太大；但是从意外战争这个花招所反映的他们想搞反华勾结的意图来说，这个建议包括的范围又太广泛了。我的结论是：我们最好是使谈判迅速回到控制战略核武器这个主题上去。经过尼克松批准，我通知史密斯要坚持把限制进攻性武器和限制防御性武器套在一起，因为我们参加谈判的主要目标是限制苏联的进攻性武器，而且我们不会在不对等的情况下放弃我们事实上正在获得的唯一的新武器系统。此外，我们

也不愿意破坏我们富有希望的对华政策，通过签订针对第三国的协议暗示美苏共同统治。最好的对策是提出比丙、丁两个方案更现实的建议，然后我们就可以长期坚持这个立场。

因此，我给总统送去一份长篇备忘录，建议按照乙方案的精神搞一个新建议。但我认为必须删去有关全国指挥部的建议，因为就我们来说这个建议等于禁止反弹道导弹。我主张保持双方实际上正在执行的部署方案。但是，禁止反弹道导弹也比全国指挥部方案要强，因为它至少将取消苏联的反弹道导弹，而据我判断全国指挥部方案的主要受益者将是苏联的反弹道导弹。此外，建议禁止这种导弹同较早提出的丙方案对官僚机构的影响实际上是一样的。这种建议，特别是同冻结进攻性武器联系起来时，肯定会遭到拒绝，从而使我们可以进而坚持继续建设现有发射场。因此，我建议总统授权代表团提出禁止反弹道导弹的建议作为全国指挥部方案的替代物（后者也暂不撤销）。总统批准了我的建议，七月九日发出了相应的指示。在维也纳谈判后期，一直到八月十四日休会，我们的代表团具体阐述了这个需要进一步发挥的建议。

这个主张是一大改进，其中提出的某些因素写入了一九七二年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它容许我们继续发展一种关键性技术（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作为对付苏联日益增加的数量（我们知道他们正在着手增加数量）的砝码，而且不需要放弃我们正在考虑实行的任何进攻性武器计划。它使我们把限制进攻性武器同限制防御性武器坚决套在一起；除非苏联停止增加进攻性武器作为交换，我们就不限制我们的反弹道导弹——如果国会愿意的话。它清楚说明我们不容许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限制我们为保卫西欧和亚洲而驻在前进基地的飞机。此外，建议禁止反弹道导弹还是摆脱令人不舒服的指挥部方案的第一步。

苏联常常过分贪得无厌。这次也是一样。他们认为等到我们

国内要求单方面削减的压力有了结果的时候条件会更好一些。他们想要制止我们的反弹道导弹计划，而当时还不愿意冻结进攻性武器，原因或许是他们自己增加军备的计划还没有进行到这个程度。尽管如此，我在一九七〇年七月底同麦克洛伊谘询委员会开会时预言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将按照我们建议的精神在两年内达成协议。结果提前了两个月。

在此期间，我开始担心一种倾向，即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可能使许多人头脑中产生一种看法，认为这次谈判有它本身的势头；我担心——后来证明是正确的——这次谈判可能不得不承担东西方关系的全部压力。因此，我在七月十三日给总统送去一份备忘录，提醒他注意，不要认为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就会从此天下太平。我指出：即使达成协议，苏联总有一天可以通过增加投掷重量、加强准确性和发展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等一系列办法来威胁我们以陆地为基地的导弹。"苏联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认为他们今后再也不会处于战略劣势地位了。当然，他们将期望从得到正式承认的战略'平等地位'中捞到大量政治好处。"中国人无疑会感到担心，害怕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带来美苏共同统治的局面。"他们料想苏联西部战线将出现全面缓和，并可能怀疑存在一种心照不宣的交易，即美国让苏联放手对付中国。"至于美苏关系，则将继续以威胁和希望含糊不清的结合作为特征，这是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大规模杀戮武器为背景的意识形态冲突的固有特征。我指出：

战后同苏联达成的任何军备控制协议都没有像协议鼓吹者希望的那样成为转折点。不过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即使有局限性，很可能具有深刻得多的影响。

苏联目前正在起草下一个五年计划，并在筹备第二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此外，有大量证据说明最高一级领导可能改组。在这种情况下，达成协议必

然会影响苏联政策总的发展方向。……

同时，我们必须十分明确，如果苏联感到“缓和”的效果破坏他们在东欧的霸权，这种协议并不能阻止苏联领导人在东欧采取激烈行动；它也不能制止苏联在西欧、中东、地中海和其他地方推进他们的利益而损害我们的利益。不仅如此，苏联统治阶层对增加交流、降低妨碍人员和思想自由活动的壁垒给他们社会带来的任何影响仍将是高度敏感的。苏联很可能认为我们在维持协议方面已经下了很大赌注，使我们不得不容忍苏联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特别是在没有言之成理的证据可以说明苏联违犯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实际条款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照我看来，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并非万验灵药。我认为这次谈判是恢复战略均势、并为双方在政治上保持克制创造条件的机会。照我看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如果没有这种克制，危机升级就是不可避免的。从军事方面说，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将推迟苏联扩充军备的计划，从而推迟终将出现的对我国陆基部队的威胁。在越南问题引起的暴风雨般的抗议声中，它可能有助于我们保持国防的基干力量，并在数量上赶上去。谈判可能开创一个相互克制的过程，而如果没有这种克制，人类迟早会面临一场大战。它必然会导致政治态度的某种变化。此外，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必须符合保持西方联盟的团结、留有向中国开放余地的总战略方针。这个谈判确实重要，但我们绝不能使我们的整个外交政策成为谈判的抵押品。

现在只剩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过程中最后一个矛盾需要谈谈了。这是指参议院关于反弹道导弹的表决。我们当时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地位。参议院接到的要求是继续建设一个新的反弹道导弹发射场，并着手准备另外五座发射场。与此同时，我们驻维也纳的代表团却向苏联建议完全禁止反弹道导弹，或把这种导弹系统限制在华盛顿地区——而我们甚至并没有为这个系统要求拨款。

事实上，我们已使苏联初步同意用反弹道导弹保卫首都的方案。这种混乱肯定不是尼克松政府最感到骄傲的。

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采取的立场开始给人吐露出去之后，这种立场同我们在预算方面提出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令人尴尬了。因此，我在七月二十三日会见了参众两院十位起关键作用的议员，说服他们支持政府的反弹道导弹计划以加强我们的谈判地位。参议院是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举行最后表决的。约翰·谢尔曼·库珀和菲利普·哈特参议员提出的抛弃一切进一步建设计划的修正案以五十二票对四十七票遭到否决。这次表决正巧赶上杰勒德·史密斯从谈判即将结束的维也纳给参议员们发来了一封电报。史密斯发来的这份措词谨慎的电报肯定"卫兵"计划对他的谈判是一个重要因素——这几乎是他为了尊重他忠实为之服务的政府在勉强解释自己的信念方面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了。据《纽约时报》报道，史密斯的电报对扭转托马斯·麦金太尔和詹姆斯·皮尔逊参议员的投票态度起了决定性作用。麦金太尔对报界说，维也纳一个地位很高的消息来源"非常清楚地说明谈判的成功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对反弹道导弹不再保持'毫不松动'的态度"。由此可知，正是作为完全禁止反弹道导弹的热烈鼓吹者并在四月受到尼克松愤怒指责的格里·史密斯挽救了"卫兵"计划。

追求莫斯科最高级会谈

从罗斯福开始，历届总统或迟或早都认识到应当同苏联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谈，亲自过问东西方关系问题。渴望在寻求和平的道路上取得决定性突破是人之常情。没有任何人比肩负最后决策重任的总统更清楚地意识到核技术带来浩劫的可能性。由于美国公众感到难于接受存在不可调和的敌对这种状况，而且倾向于

从个别人物的作用上考虑国际关系问题，总统这方面的兴趣就更强烈了。此外，一个能够登上总统宝座的人很少不是异常自负的；他的随从人员也不大可能去纠正他对自己的估价。几乎可以说，总统之所以是总统就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说服力具有极大的信心；这种信心毕竟使他取得了现在的地位。当总统的人对大肆宣传的最高级会谈所能带来的政治上的利益也不是无动于衷的，特别是在选举年。这是最好不过的"上镜头的机会"。

尼克松受这种倾向的影响比大多数总统都要少。他生性多疑，不相信一次会晤就能改变事态发展的方向。他在国际政治方面阅历甚深，不会不懂得大国之间几十年来的紧张局面并不是个人积怨造成的。此外，他也不大喜欢面对面谈判；这种谈判使他侷促不安。对他来说，当时还有——而且从来都有——一种个人因素。他见过约翰逊在葛拉斯堡罗同柯西金会谈之后如何声誉鹊起，而后来由于会谈的结果只是昙花一现名声又如何一落千丈。一度非常担心葛拉斯堡罗会谈会威胁自己当总统的前景的尼克松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他应当避免重蹈覆辙。由于这些原因，尼克松就职时深信最高级会谈必须经过充分准备才能成功。他原来的意图是：只有在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前景能使苏联作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才利用它。

但是，一九七〇年出现了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罕见的情况：他把清醒的估计抛到九霄云外，反而极力要求举行最高级会谈。他深受反战鼓动家的折磨，认为通过一次戏剧性的和平行动就可以使他们偃旗息鼓。在柬埔寨事件后立即会晤苏联领导人可能使河内认识到在一场更大的角逐中是可以把它牺牲掉的；一九七二年的情况正是如此。尼克松还看到会晤对秋天国会选举的好处。因此，他想举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愿望与时俱增。开始是当作一种策略，后来则几乎到了着迷的程度，只是由于苏联永无厌止地亟

欲从谈判中榨取单方面利益，才使我们免于遭受严重困难。

如前所述，最高级会谈这个念头开始是以完全无害的方式提出的。多勃雷宁定期试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日他也这样做了。我按照我们的既定政策给这种念头泼了冷水。但是到了四月，尼克松改变了态度。他预计一九七〇年不能在外交政策方面获得重大成就，因此满怀渴望地转向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念头。

我对此保持严重怀疑。虽然由于我们个性的交互作用，有时在策略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和关系紧张，但在我们交往中，我很少在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上完全不同意尼克松的意见，这次就是其中之一。我认为一九六九年使我们对最高级会谈表示冷淡的那些理由在一九七〇年甚至更加正当。苏联在越南问题上对我们毫不帮忙。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实质上仍处于僵持状态。苏联刚把作战人员运入中东——这是他们战后第一次采取这种行动。同他们举行的任何谈判都没有进展到保证成功的程度。我们对中国采取主动的效果尚在未定之天；只要我们看上去似乎同苏联进行勾结，就容易前功尽弃。因此，最高级会谈可能轻易就失败了；要不然我们为了挽救会谈就会倾向于达成以后可能后悔莫及的协议，或承担这样的义务。最后——虽然我当时不能明说——我并不认为就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举行面对面谈判是尼克松的长处。

但是尼克松坚持己见。四月初，他指示我通过多勃雷宁渠道探索一九七〇年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可能性。我基于策略原因表示异议；不过这件事并不牵涉道德原则问题，所以尽管有种种保留，我还是断然着手进行此事。四月七日，多勃雷宁邀请我去苏联大使馆。他有些关于西伯利亚猎虎的影片，误以为会使我感到兴趣。晚餐时，他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他说，根据他的经验，每届美国政府上任之初总是在美苏关系方面行动过于迟缓，后期又过于仓

猝，而那时采取行动已毫无意义。他提到林登·约翰逊在任期最后半年努力想举行最高级会谈一事作为例证。我小心翼翼地回答说，我们认为最高级会谈是一个实际问题；一切取决于可能取得什么成果。如果我们得到将有具体结果的某些保证，我们原则上并不反对。

多勃雷宁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职业选手，立刻领会了我讲话的意义。他说，到现在为止，他和他的领导人一直按照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以前不可能举行最高级会谈的设想办事。他们想错了吗？我审慎地回答说：如果某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例如越南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即将出现重大突破，就可能举行最高级会谈。不过我现在愿意就一般原则进行讨论。显然并未得到指示的多勃雷宁决定测试我们热心的程度。他暗示最容易的办法是由柯西金总理率领苏联代表团参加秋天的联合国大会，并在这种情况下会晤总统。（当时双方仍把一九七〇年最高级会谈看成是尼克松同柯西金而不是同勃列日涅夫之间的事。）我相信总统不会愿意重复约翰逊以联合国为背景举行会晤的经验。但我对多勃雷宁说，我将了解总统的看法。

我同总统进行了磋商，两天后再次会晤多勃雷宁，正式告诉他我们宁愿把最高级会谈同联合国分开，会议的目的是在已经完成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上签字或者是为了打破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僵局。多勃雷宁现在得到了他需要的情报。他答应等他在莫斯科磋商回来后给我们答复。柬埔寨事件并未使我们停止交换意见。多勃雷宁六月初回到美国时，柬埔寨庇护所仍在美军占领下。尼克松对最高级会谈的渴望同几个星期来公众的冲击成正比。出人意料地以和平缔造者面貌出现，和苏联人坐下谈判而同时狠揍他们的盟国——有什么事更能使他那些大喊大叫的反对派狼狈不堪呢？他决定全力以赴要在国会选举前举行最高级会谈。因此，我

邀请多勃雷宁到总统游艇“红杉号”上共进晚餐，在波托马克河上泛游时对整个美苏关系进行回顾。

我们动身之前，尼克松到白宫情况室同多勃雷宁和我呆了一会。他对多勃雷宁说，他愿意让过去的事成为过去；现在是把美苏关系置于新的基础上的时候了。他准备亲自为此做出努力。多勃雷宁同意说，算旧帐是毫无意义的。他巧妙地回避了关于最高级会谈的暗示，强烈要求美苏在中东合作。苏联刚把由苏联人操纵的先进防空导弹运往中东，从而使那里的局势空前紧张。莫斯科显然希望在举行最高级会谈之前就得到报酬；我们越显得迫不及待，他们要价就会越高。

“红杉号”的航行并未改变这种印象。多勃雷宁热切希望详细讨论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苏联关心的问题。他提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东和东南亚问题，但对最高级会谈则含糊其辞。他声称克里姆林宫的初步反应是有利的，但后来柬埔寨事件使他们认为我们的建议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使苏联默认我们在印度支那采取强硬政策。我否认了这种想法，指出现在柬埔寨行动正接近结束而我们仍然感到兴趣。多勃雷宁和上次同尼克松见面时一样拒绝上钩。他又回到如何处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中东问题方面，要求通过我们之间的渠道继续讨论。显然双方都可以玩连环套的把戏。

六月二十三日我们再次会晤。这次没有直接提到最高级会谈。我简单谈到中东问题——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中阐述——以后，就询问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意图。多勃雷宁说他没有得到指示，但答应早日答复。事实上苏联的反应来得很快。这就是六月二十五日建议早日签订限制反弹道导弹协议并制定减少“意外战争”危险的方案的那份备忘录。

苏联在最高级会谈问题上的真正要价是联合反对中国。它以

最精采的侦探小说的传统方式再次出现。谢苗诺夫在维也纳歌剧院里碰到史密斯，交给他一份无人署名的文件，上面概括了苏联对防止意外战争协议的想法。如果第三国正“准备”进行核“挑衅”，双方应相互通知。如果出现挑衅行动，双方有责任对挑衅国家采取报复行动。双方要就这些问题定期磋商。苏联实际上要我们让他们放手对付中国；这是两国共同统治的明目张胆的表现。

在最高级会谈问题上，尼克松可能愿意违背我的策略判断行事。但是在涉及我国基本利益或整个全球战略的情况下，他无需忠告。他和我一致认为必须立即拒绝关于意外战争的建议。七月九日，我会见多勃雷宁，告诉他谢苗诺夫的建议是无法接受的。我说，意外战争问题有两方面。一是真正出现意外事故的可能性，要求制定技术保障措施和规定通知办法。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愿意同苏联共同探讨。（最后确实导致了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的协议。）意味着对国际阵容作出重大改变并明显针对第三国的政治合作则是办不到的。

多勃雷宁若无其事地假装对谢苗诺夫的建议一无所知，似乎这种念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建议来自谢苗诺夫可能正是为了苏联可以在我们反应不佳时予以否认。）多勃雷宁迅即把话题转到反弹道导弹协议方面来。这时，我提醒他我们从四月以来一直在谈论在最高一级举行会晤问题，至今没有得到答复，现在是停止旁敲侧击的时候了。多勃雷宁含含糊糊谈到柬埔寨问题和莫斯科即将召开党代表大会造成的困难。然后他又转而假装没有充分理解我们的建议。他是否可以向莫斯科报告：（一）总统建议举行最高级会谈；（二）会谈应讨论对美苏关系重新做出基本估计的问题？

多勃雷宁在奉命拖延时是做得非常高明的，他甚至不惜装得有点呆头呆脑。其实，三个月来，我们对他提出的询问已经答复过好几次——最近一次是四周以前总统亲自答复的。我因为知道总

统渴望举行最高级会谈，所以才同他周旋；我向他郑重保证，他可以按照他表示的那种意思去报告。但是这一次他无穷无尽地表示茫然不解，简直使人奇怪他怎么能在苏联外交界爬上这样高的地位。他希望了解我们考虑的是一九七一年还是一九七二年？我回答说：不，我们考虑的是一九七〇年。他严肃地考虑了一会儿。这位十分细致地研究我国民主政治的苏联学者又问：是选举以前还是以后？这是我当时无需坠入的一个陷阱。我回答说，等听到莫斯科对整个计划的反应之后我会告诉他的。

但是苏联迟迟不做出反应。相反地，多勃雷宁七月二十日带来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协助召开欧洲安全会议。苏联领导人显然有一张很长的购货单；在提出整个购货单、看看可以得到多少东西以前，他们不准备满足尼克松的渴望。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有一项安排好的战略；我防守得滴水不漏。

在此期间，多勃雷宁再次回莫斯科磋商，题目同他说曾在四、五月间磋商过的一样。八月初，一名自称和苏联高级人士有联系的美国商人报告，苏联领导人期望在秋天同总统会晤。八月十三日，我以此为借口询问多勃雷宁的副手尤里·伏龙索夫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绕了一圈又回到原处：这是多勃雷宁一月把日本大使牵连进去时使用过的同一手法。得到的反应也是同样的。不出所料，伏龙索夫说他没有得到指示，但他知道这个问题正在莫斯科“紧张地讨论”。

八月十九日，我们收到了正式答复。苏联领导人对最高级会谈持“积极态度”，条件是要认真准备。他们还请我们提出关于议程的想法。他们玩的是一九六九年我们玩过的把戏。八月二十四日，我的副手艾尔·黑格*代表我交给伏龙索夫一份议程，上面列

* 即亚历山大·黑格。艾尔是昵称。——译者

举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欧洲安全、中东、“共处原则”和贸易作为可能议题，但在任何议题上均未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请苏联提出反建议。苏联未予答复。直到九月多勃雷宁终于返回华盛顿以前，我们再也没听到克里姆林宫关于最高级会谈的消息。多勃雷宁回来后，进一步发出积极的鼓噪，同时提出开始进行初步准备的程序性建议。按照这个建议，要到一九七一年相当晚的时候才能举行最高级会谈。在一个充满危机的夏天，苏联人显然是在利用最高级会谈做为对我们施加压力的另一种形式。

这种情况是再好不过了。我一想到一九七〇年如果举行最高级会谈将出现什么情况就不寒而栗。当时我们在国内的地位低落。我们还处于打基础和试探阶段。我们还没有取得一年后使我们得以制定总战略的那些突破和政治上的意外收获。我们将受到极大压力，要我们带回某种程度的胜利，否则我们在国内的处境将变得更糟。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德国条约同柏林谈判套在一起的做法可能受到破坏，而欧洲同莫斯科进行的谈判可能不是得到控制，而是失去控制。要求仅就反弹道导弹达成协议的压力可能达到无法遏制的程度；事实上，尼克松七月十一日明确对我说，为了会见苏联领导人，他愿意付这个代价。我等待他把这种看法变为正式指示再开始行动，但他没有这么做，部分是由于苏联从来没有为他提供机会。然而我思想上毫不怀疑，在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情况下，国会很可能自行其是，把反弹道导弹扼杀掉。中东危机可能加快速度。对中国的主动行动可能夭折。既然事前没有通过仔细研究达成协议，尼克松将被迫进行冗长的、详尽的讨论而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对这种讨论从来都感到不自在。

对我们来说，幸好苏联领导人为了芝麻大小的利益而抛弃了这一切机会。这是值得那些认为苏联一举一动都是精心策划的总计划一部分的人牢记心头的。莫斯科清楚地看到，尼克松追求最

高级会谈的迫切心情使他们显然处于策略上有利的地位。但是尼克松的罗马尼亚之行，他在一九六九年对葛罗米柯的怠慢，以及我们在中东不理会他们的态度使他们满怀不快，而且他们情不自禁想从我们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让步，这就使他们丧失了一个可能的巨大战略机会。他们要事前得到报酬才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谈，然后会上还要得到报酬。他们企图建立事实上的反华同盟，召开欧洲安全会议，并按他们的条件签订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而这一切都不过是进入最高级会谈的门票费。

尼克松并没有迫不及待到那种程度。他也不是一个低能的庸才。他拒绝了所有这些要求，结果苏联一无所得。

苏联领导人表现如此麻木不仁，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已经通过自己在欧洲采取的主动使我们陷入孤立，再则他们幻想我们已经被越南问题搞得动弹不得了。一九七〇年夏，他们很可能认为并不急需同我们打交道，他们估计为促使我们要求在一九七〇年举行最高级会谈而施加种种压力之后将使我们更加迫不及待。不仅如此，他们当时还正在中东制造紧张局势，企图在加勒比海地区进行军事部署，一定认为这样做可能在第二年给他们提供更大的机会。如果举行最高级会谈，则将使这种行动变得极为尴尬。

但是检验政治家的水平，首先要看他是否能对讨价还价关系做出准确估计。一九七〇年夏天，苏联人考试是不及格的。尼克松想要举行最高级会谈，但并不像莫斯科估计的那样不顾一切地想要举行。德国谈判最后必然使我们处于掌握欧洲外交方向的地位。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方面，我们最虚弱的时期已经过去，而在这方面苏联也由于僵硬不化而正中我们下怀。由于他们拒绝了我们的合理方案，我们国内就不再辩论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再辩论反弹道导弹问题了。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直到取得最后突破，而不会在国内碰到无法忍

受的压力。按照中东形势发展的方向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发生什么波折，将日益明显地看出苏联是无法左右局势的。而我们由于对中国采取了主动，还掌握了一张秘密王牌。

将使这些估计受到严重考验的、危机四伏的夏季当时尚未到来。但是危机如果不使政府垮台，就会使政府得到锻炼。从危机中可以识别谁是可以信赖的。危机可以建立国际范围和政府内部的力量平衡。无论尼克松管理政府的方法如何错综复杂，他正是在逼得他走投无路、使他非做出决定不可的压力下表现得最出色。一九七〇年的夏天和秋天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同过去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这个时期也是从中东问题开始的。

① 查尔斯·L·舒尔茨与爱德华·K·汉密尔顿和艾伦·希克：《确定国家优先项目：一九七一年的预算》（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一九七〇年版），第二章。

② 转引自《纽约时报》，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③ 例如一九七〇年三月《评论》杂志上一篇文章，就反弹道导弹计划、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试验以及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在确定限额方面漫不经心等问题谴责尼克松。莫里斯·J·戈德布卢姆《到现在为止的尼克松》，载《评论》杂志（一九七〇年三月号），第三〇至三一页。

④ 我的工作人员把戴夫·帕卡德关于我们迫切需要尽可能快地就限制进攻性武器系统问题进行谈判的建议为我概括如下：

> 帕卡德部长给你送来一份有关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目标和策略的备忘录，要求给代表团发出新的指示，“使我们可以试图在十月中旬或至迟在十一月在维也纳达成协议”。他说，早日达成协议、即使是有限的协议也是重要的，因为即将到来的“对国家预算的紧缩”“可能”造成“防务计划、包括战略部队的大量削减”；这将“对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使用的策略的时间安排发生重要影响”。他说，这是因为：如果谈判取得进展，预算造成的削弱在美国较易为人接受，而对苏联则是一种“表示善意的信号”；但是，如果谈判没有进展，这种削减就会“减少我们讨价还价的杠杆”。
>
> （如果知道国防部打算对战略计划进行什么削减将会在今年秋天“减少我们讨价还价的杠杆”倒是有趣的。）

第十四章

一九七〇年的中东

一九七〇年刚一开始，战神们就在检查各自的军备，因为很清楚，这些军备很快就要使用了。在苏伊士运河沿岸，每天都有战斗。一月，以色列开始用轰炸机对开罗附近和尼罗河三角洲进行“深入内地”的空袭，其目的是为了要证实纳赛尔的虚弱，从而迫使其结束所谓的消耗战。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对访问者说过：只要纳赛尔还统治着埃及，就很难说何日实现和平。在约旦前线，阿拉伯突击队的袭击和以色列的报复行动都在加剧，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在戈兰高地，以色列和叙利亚发生了冲突。最后，在一月底，纳赛尔突然秘密地访问莫斯科。此后，中东问题就开始日益和超级大国的关系纠缠在一起。

在这一段时期，美国由于政府内部对这个问题的性质看法非常不一致，也处于困扰的境地。国务院认为，困难的根源在于阿拉伯和以色列在领土问题上的冲突。专家们认为，一旦这个冲突问题予以解决，激进的阿拉伯人的影响就会下降，而且苏联在中东的作用也就会随之而减弱。这些观点指导着我们一九六九年的外交政策，并且促使我们为全面解决问题而提出越来越具体的建议。

我对于这一类的假定，以及似乎以这类假定为依据的方针，持有很大的怀疑。正如我在一份备忘录中向总统说明的那样，我的估计是，阿拉伯激进主义来自五个方面的因素：以色列一再攻占别国的领土；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对社会和经济状况的不满；对西方国家利益所持的反对态度；以及对阿拉伯国家中的温和派所持的

反对态度。一项解决方案只能对这些组成部分中的第一项起到作用，而其余的四个组成部分依然如故。对于这些激进分子来说，西方资本主义仍然是他们的眼中钉。阿拉伯国家中的温和派照样还是不能接受的。社会和经济不安的根源仍旧继续存在。以色列仍然是这些阿拉伯激进分子企图要予以消灭的对象。以色列人懂得这些。正因为他们把以色列的存在看成是问题的焦点，而不仅是其边界而已，所以他们不愿意放弃对这个国家的进攻。

我也不相信，解决了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苏联的影响一定会削弱。许多问题取决于这项解决方案的方式和细节。一个涉及一切方面的全面解决方案，从本质上来看是对激进分子有利的，因为它会使最不妥协的政府对全过程拥有否决权。如果一项解决方案看来是苏联的压力和讹诈的结果，那末，那些带有反西方色彩和亲苏联倾向的激进主义政权将会得到加强。人们将认为，这是把这些领土归还到苏联代理人的手中。

我们应该争取的不仅是一项解决方案，而且也要表明，我们的朋友根据这项方案最能卓有成效地取得进展；换句话说，温和派是中东和平的关键人物。我深信，我们完全可以使人们懂得这个道理。二月初，我告诉尼克松说："对我们有利的方面是，阿拉伯人将会懂得，能解决他们问题的是美国而不是苏联。"二月二十五日，我在高级研究小组的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到了一定的时候，情况会变得很明显，时间对苏联不利。如果他们不能为阿拉伯人夺回领土，阿拉伯人满可以来找我们。"因此，我们不应该向讹诈低头，也不应该被激进分子的言词所吓倒，忍耐就是我们的武器。由于同样的原因，一旦出现突破，而且温和的阿拉伯人也会转向我们，我们就得采取断然行动，在外交上打开局面。

但是我不能推行这样一种战略。尼克松把中东问题交给了罗杰斯。总统甚至经过再三考虑，还是不愿进行干预。在这个时期，

他也并不认为我的战略是正确的。他仍认为，苏联是在一九六九年战争中政治上的胜利者。他还没有放弃那种隐隐约约的想法，认为美国和苏联可以利用中东和越南问题做交易。他认为，对于犹太选民，他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总统负有的义务都少，并且急于表明，他是不受其压力影响的。他还怀疑，我信奉犹太教，是否会在作判断时产生偏差。按照正常情况来说，我应向总统提供可供选择的战略方案，并给政府部门以战术性指导。但是，直到一九七一年晚些时候，在中东政策问题上一直不让我这样做。

因此，在中东问题上，我们的政策缺乏一种始终如一的指导思想，而这却是尼克松的一贯要求和我的一贯主张。他对事态发展听之任之，认为有我做他的助手，他总是可以在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前，把它接管过去。他给予国务院一定的处置权限，而在其他问题上，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尽管如此，由于总统的信念和我的信念，要比和罗杰斯的信念更为接近些，所以他往往施加种种限制，使得国务院的看法难以前后一贯地得到实施。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接受痛苦的教训，即：只有那些具有明确目标的人，才能控制事态的进程。一个国家貌似谦恭，实际上举棋不定，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因为对手可能把它的善意当作默允，把克制误认为软弱。当我们吃尽了苦头，最后奋起捍卫我们的利益时，他可能会真的感到大吃一惊——的确还感到是受骗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一场危机。

从这十年的情况来看，我毫不怀疑，由于柬埔寨和我们国内处于动乱之年，我们想要避免进一步摊牌；又由于我们渴望解决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又不符合中东各方面的心理需要，结果是招来了苏联觊觎中东之心。我也认为，正是由于我们下了决心要制止他们觊觎中东的企图，才为最后转向谈判准备打下了基础。这种谈判既是关于中东问题的，又是关于整个对苏关系的。

柯西金的信

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一日，多勃雷宁大使在白宫地下室我的办公室里递交了一封苏联总理亚历克赛·柯西金给尼克松总统的信。在通常情况下，这封信本来会被当作特种渠道来处理。然而，我们得知，柯西金也给威尔逊首相和蓬皮杜总统送去了同样的信件。由于英国和法国肯定会和我们商量，所以我们方面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将这封信作为正常渠道来处理。显然，一旦信件来往变成为如此正式，那就必然要公开进行。

柯西金的信里警告说，以色列事实上已经在对阿拉伯国家继续采取军事行动。苏联正在注意观察以色列的行动与“某些大国”的外交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互相配合的。这是一种不太隐晦的暗示，指责我们在一九六九年提出的一片好心的和平建议是在为以色列的深入内地的轰炸打掩护的。该信说，如果以色列继续进行攻击，“苏联将被迫保证让阿拉伯国家拥有必要的手段，借以给蛮横的侵略者以应有的回击。”柯西金呼吁四大国“迫使”以色列停止其攻击，并以“最快的速度从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撤出以色列军队”作为开端，来建立持久的和平。

我把这封信交给了尼克松，并指出，这是苏联对我们这一届新政府的第一次威胁。虽然柯西金并没有威胁要采取任何具体行动，但是，“以色列必须在其他问题解决之前先撤军的这种主张，是苏联一九六七年主张的阴魂再现，而这似乎是对去年夏天美苏会谈所取得进展的一个很大的否定。”与此同时，我把柯西金的信看成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过程表明，我们在中东的地位是比较强大的。

我们坚定不移的政策给他们（苏联）造成了下列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们的建议，他们会一无所获，逐步升级的责任就会落在他们身上，而如果逐步升级导致一场大的冲突，他们的代理人就会失败。如果他们同意了，他们就得按照我们的条件甩掉他们的代理人。我建议采取回击战略，狠狠地惩罚一下苏联的威胁；把以色列的遵守停火协定和另一方——包括非正规部队——相应的遵守停火协定联系起来；迫使苏联明确表态，如果以色列撤军，阿拉伯人将承担什么义务。

这一次，我们政府在如何对付这个问题上是意见一致的。罗杰斯和西斯科同意，我们必须作出坚定的回答。二月四日，我们把总统的复信送交给了苏联。复信坚决地驳回了苏联的指责，指出，双方都违反了停火协定；埃及在一九六九年初就开始采用消耗战，故意使战争不断升级。尼克松的复信警告说，苏联威胁说要增运军火，如果这样做，必将把几个大国都更进一步地卷进这场冲突之中："美国正密切地注视着中东力量的相对平衡，必要时，我们将毫不迟疑地向我们的友好国家提供军火。"这封信的结尾驳回了苏联的下列主张，即：在任何别的和平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以色列必须撤军。

同一天，我写信告诉总统我对苏联照会的进一步看法。我认为这个照会是一个奇怪的招数，因而是令人不安的：

不用费什么脑筋就可以预料，至少美国（如果不是法国和英国）会作出答复，它主张在对等的基础上恢复停火……。因此，苏联行动的结局将是把恢复停火的责任放在纳赛尔和阿拉伯人身上，从而也就是放在苏联人自己身上，而不是放在我们和以色列人身上。

两天以后，在送交总统的一份关于中东战略的基本问题的很长的分析文件中，重申了我的观点："既然他（纳赛尔）已经投奔莫

斯科，指望我们会去迫使以色列停止轰炸，他即将看到，莫斯科无力使他摆脱困境。”

正因为柯西金的信是这样冗长，又不要求实际上解决什么问题，我就开始认识到，这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必定是一个更大的计划的一部分，几乎可以肯定是战场上要采取某些具体行动的前奏。这封信的含糊其词，可以被解释为他们不希望得到一个可能会干扰他们业已作出决定的答复。从安瓦尔·萨达特和穆罕默德·海卡尔的自传中我们现在了解到，当纳赛尔一月底在莫斯科的时候，苏联已经作出决定，要把最先进的防空导弹送往埃及。柯西金的信不是一个警告，而只是一个烟幕。

二月的第一个星期，有迹象表明，苏联可能把新式武器送往埃及。我对尼克松说，我怀疑，单是军事装备会有什么用处。如果这批新式武器只是增补了现有的军火库，以色列可以将它们摧毁掉；如果这批武器是较为先进的，埃及人也不会使用。这就引起一个不祥的可能性：如果苏联企图采取某些有效的措施来反对以色列的进攻，“看来这就几乎肯定会使苏联军事人员卷入。”尼克松在阅读我的分析时，作了这样的眉批：“我认为现在是和苏联人直接谈这件事的时候了。艾奇逊让战事平息下来的想法不能实现*。国务院的‘任何讨论会式的谈判’已不顶事了，我们必须设法进行一次双边会谈，看是否可以获得一项对我们有利的交易。”

为了实现尼克松的愿望，我在两条战线上采取行动。国务院指示我们的驻莫斯科大使雅各布·比姆通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美国准备就恢复停火问题进行谈判，并讨论限制双方军备的问题。不出所料，葛罗米柯于二月十一日给比姆的答复是不明确表态。他说，苏联不能考虑停火问题，除非以色列首先停止其深入内

---

* 这里指迪安·艾奇逊在一月的来信，该信主张我们在处理中东问题时“不该管的就不管”。当时，尼克松表示，他总的来说同意艾奇逊的看法。

地的轰炸。他不反对讨论限制军备问题，但是只要以色列还占领阿拉伯的土地，就不能进行讨论；换句话说，以色列必须从一九六七年占领的一切土地上撤出。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两大国的会谈中加以解决，苏联准备恢复这种会谈。

葛罗米柯答复闪烁其词的原因无疑是，苏联已经在研究关于美国立场的一份更有权威性的声明。因为在前一天，二月十日，我代表总统和多勃雷宁会谈；而当比姆和葛罗米柯会谈时，苏联方面还没有能够分析透我所传递的信息。我告诉多勃雷宁说，"我们希望苏联领导人认识到，我们将会以最严重的关切来看待苏联把战斗人员引进中东这件事。"我们选择了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因为我们不希望造成正式的对抗。同时，我遵照尼克松的指示，告诉多勃雷宁说，我们愿意通过特种渠道开始举行关于中东问题的双边会谈。

多勃雷宁即使没有接到明确的指示，他也从来不会放过利用会谈的机会，这次也是如此。他转而重复他那埋怨美国采取的行动的老生常谈；经验告诉他，在华盛顿传统势力中有无数的受虐狂患者*，他们对每次所陷入的绝境都急于引咎自责。他利用了这一特点；他反对围绕柯西金信件而掀起的宣传（当然，这是由于苏联在巴黎和伦敦同时采取的行动而引起的），并且也反对国务院的公开立场；他认为，这一立场曲解了莫斯科在十二月对我们关于边界问题的建议（"罗杰斯计划"）所提出的答复，并错误地把这一答复解释成为一种拒绝。看过莫斯科在十二月份递交的照会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显然当时都没有看出多勃雷宁所说的后一点。而且对于我们把他们的答复解释为拒绝了我们的方案这一点，苏联人以前也没有进行过争辩。

---

* 指以受虐待为快的人。——译者

差不多将近一个月，没有从苏联人那里听到什么动静。预料苏联将有一些重要的活动——几乎可以肯定要把军事人员送进中东——我便利用这个间歇来制定应急计划。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各次会议都再次暴露了笼罩着一九六九年进行的国内辩论的意见分歧。我的意见是，如果苏联运进军事人员，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奋起抵抗，不管是什么事情触发了苏联这一行动。除非我们准备听任阿拉伯的激进分子拥有决定性的力量，否则我们就不能容忍新的苏联军事力量进入。如果苏联要以报复行动来威胁以色列，我们打算重新研究一下我们的计划；如果苏联采用由他们自己的军事人员操纵的尖端武器，我还要要求采取措施来防止以色列的空军受到损失。

政府各部门对此不太热心。政府中的大部分人把僵局归咎于以色列所持的不妥协态度。所有的人(除了我以外)都认为，在这个时候对以色列大规模增加援助，会“引起轩然大波”。至于应急计划，没有一个人能想得出一个言之成理的理由，来反对未雨绸缪。但是事情很明显，对于苏联任何重大的行动所采取的军事对抗，会面临官僚机构大规模的反对。国防部提出了一个正式的备忘录，强调指出，它倾向于政治解决——这就意味着，如象在越南问题一样，别的部门将揹起这个包袱，并将承担风险。它并没有说明，我们将如何使以色列全部撤军(这刚好就是谈判桌上的唯一政治解决方案)；或者，如果苏联作战人员出现在中东，这种撤军看起来会不会象是苏联施加压力的结果。

尼克松由于受了国际和国内各种考虑的影响，态度是自相矛盾的。他同意我的地缘政治学的分析，在我的一份备忘录上他批示道：“‘不偏不倚’是正确的政策——但我们的利益毕竟是——要给苏联造成最大的麻烦——不要因为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就忘掉了这个利益。”同时，他倾向于政府部门的意见，认为根本的困难

在于以色列的政策。他怀疑，苏联所表现的无能为力，会不会使得阿拉伯人真正地丢掉幻想。我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出的这种可能性，他在上面批注说："我根本不同意这个结论——苏联人知道，阿拉伯人的谈判能力是很强的——我们一直在得意地注视一九六七年以来苏联在中东的'失败'——国务院和其他部门都说，六日战争是苏联的一次'失败'。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成了阿拉伯人的朋友，而美国却成了阿拉伯人的敌人。从长期看，这符合他们的利益。"

当然，问题是如何使尼克松的两个批注一致起来；我们默认他们作战人员进入，让他们在这个地区以优势的姿态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给苏联人制造麻烦呢？尼克松从来不用抽象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宁肯等待一个需要作出决定的时机。他在持有不同意见的下属面前往往表现为自相矛盾——既鼓励他们，而又只是当他涌进他的办公室时才表态；在中东危机在国内的影响问题上，他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尼克松总统认为，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犹太社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反对他的。他曾开玩笑地说，那一小部分投票支持他的犹太人一定是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即使他和以色列闹翻了脸，他们也可能会紧紧地跟随着他。他老爱对他的同事和来宾们说，"犹太人院外活动集团"影响不了他。

尼克松这样看他自己，但是不幸的是，他很少有机会在实践中证实他的这一理论，因为差不多在所有的实际问题上，他那不动感情的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最后所得出的见解，与其他人根据种族集团政治所得出的见解相去不远。对于他认为是反对他的任何选区，他在私下威胁着要进行可怕的报复。他会作出姿态表明——部分是做给他自己看的——他不受那种曾约束过其他总统的传统影响的束缚。但是，最后，当他面对着中东的强权现实时——经过一番迂回曲折和令人苦恼的对抗之后——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会奉行同样的战略：缩小苏联的影响；削弱阿拉伯激进分子的地位；

鼓励阿拉伯的温和派分子以及保证以色列的安全。所以尼克松和我往往是先走一段不同的道路，然后在中东问题上要作出决定的时刻，我们又会汇合在一起，取得一致意见，并在行动上互相支持。

二月，我国政府正在研究以色列要求购买军援物资的年度清单。在一九七〇年，清单上有二十五架 F-4 鬼怪式战斗轰炸机，一百架 A-4 隼式攻击型轰炸机，以及一大批坦克和装甲车，所有这些军用物资都用不同方式的美国贷款来支付。政府部门的一致意见认为，未来三到五年，不用增运大量武器，以色列也能保持其军事上的优势。这种看法得到各部门的支持，这种支持是以深奥诡秘的综合分析为根据的，它非常符合这些机构领导人的政策意图。（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的中东战争表明，尽管在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三年运送了相当数量的军火，中东的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变得比我们任何一个分析家所预料的要危险得多。）我们的官僚机构本来就不太愿意向以色列增运武器，由于在阿拉伯世界的朋友——如摩洛哥国王和约旦国王——来信提出警告，它就更加不愿意了。

因此，当发生了一件事情，而这件事尽管与整个问题不直接关联但却会促成问题的解决时，政府的考虑总是倾向于作出一项最低限度的反应。二月底，法国总统蓬皮杜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尼克松对这次访问是非常重视的。由于蓬皮杜对于美国国内可能发生的反应不太敏感，也可能是对此漠不关心，蓬皮杜于一月份和新成立的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的革命政府签订一笔军火交易，在四年内卖给利比亚一百多架海市蜃楼式飞机。从国家需要来说利比亚是不需要这么多的飞机的，的确，在那个时候，整个利比亚也只有少数几个飞行员能够驾驶这种高级性能的飞机。显然，这些飞机是打算供其他的阿拉伯国家用的，也可能就是埃及。可以预料得到，美国国会中的以色列支持者发出了非常强烈的抗议。

在蓬皮杜和他的夫人所访问的每一个城市都发生了示威游行。在芝加哥，发生了一起非常恶劣的事件，一些示威者对蓬皮杜夫人表现得极其无礼，以致蓬皮杜断然中止了他对芝加哥的访问，回到了纽约。有好几个小时，看来他还想取消在纽约的逗留，乘机返回法国。蓬皮杜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不可原谅的事件；从那以后，他对待美国的态度一直是受此事影响。

尼克松怒不可遏。他作出两种反应：一种反应是落落大方，另一种则是气量狭小。他的落落大方的表现是，他出人意料地飞往纽约出席三月二日招待蓬皮杜的宴会，还在宴会上发表了一篇既热情而又得体的演说。他的报复性的反应是，他通过约瑟夫·西斯科给国务院直接下达了一道总统命令——显然是要想避开我——无限期地推迟考虑给以色列军火的整个计划。如果他征求我的意见，我肯定会强调说，为了美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所采取的行动而去惩罚一个外国，并从而使苏联有可能从中渔利，这是不明智的。

尼克松在下达命令给西斯科之后的几小时内，象通常一样，已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这时我向他提出的就是上述的看法。事实上，他要霍尔德曼告诉我，这不算最后的决定，他要在乘飞机去纽约参加蓬皮杜宴会的途中解决这个问题。当霍尔德曼接受这样一个任务时，人们可以肯定地认为，总统不是在说着玩的。霍尔德曼的含蓄而有涵养的对实质问题的冷漠态度，排除了进行争论的可能性。霍尔德曼还是起了折衷的作用，他开辟了转达反对意见的途径，但并不拥有实现这些意见的手段。我无法接近总统，便警告霍尔德曼说，总统的行动已经增加了中东发生爆炸事件的可能性。抛弃以色列将使我们同时面临和苏联人以及和以色列人对抗的局面。以色列人难免会惊慌失措，并可能会先发制人。苏联人见到我们和我们的盟国之间显然发生了关系破裂，一定会胃口更大。我们知道，苏联人正在策划某种军事行动，在这个时候，总统

下令要中断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是不适宜的，因为苏联人迫在眉睫的行动就是针对着以色列的。霍尔德曼长期以来在他的大发雷霆的上司，和那些对实质问题持认真态度、脾气暴躁的人——霍尔德曼对这一点不能理解——之间忍气吞声；这时他要我放心，事情会解决的，但没有说如何解决。事实证明他是看错了。

当国务院接到一个为官僚机构所赞同的命令时，它是个效率高得出奇的机构。当它想把固执己见的上司拖垮时，备忘录的草稿可以在迷宫式的渠道里成周累月地旅行，但是当它接到一个它认为是明智的指示时，只消几小时文书工作一下子就完成了，官僚机构马上变得行动神速起来。因此，在尼克松的命令送交给西斯科的三十六小时之内，罗杰斯就发出了一个备忘录告诉尼克松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手边已有一个方案，可以用来"贯彻你那推迟增派飞机给以色列的决定"。

我认为，在我们没有弄清楚苏联在中东下一步的打算之前，就宣布这样一个决定，是非常不明智的。这时，我对尼克松改变主意的习惯已有经验，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一定会——用霍尔德曼的话来说——设法加以补救。因此，在把罗杰斯的备忘录送交给总统的时候，我指出，这一建议中的行动对国内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在国外，向苏联的压力低头的这种表现，光靠简单地否认是解释不了的。"因此，我建议，修改罗杰斯的建议来减轻一下对以色列的打击。或者是，我们同意补充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期间损失的飞机（补充到一定的数量为止，以免以色列人任意进行代价高昂的空袭）；或者是，我们保留一条生产流水线，并拨出一定数量的可以立即交付给以色列的鬼怪式和隼式飞机，如果苏联运进的大量军火破坏了军事均势的话。甚至西斯科也对我（私下）说，他同意我的看法。为了避免因推迟交付飞机而引起的不良反应，我建议由国务院而不是由白宫来宣布这件事。

我的建议表明，在中东问题上我并不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充其量不过是，我的建议能使总统停下来再作一番考虑。这样，当苏联正在决定下一步行动的时刻，我们将避免了一件会引起他们冒险的事情。

不久，苏联的这一行动就开始了。

苏联士兵和导弹出现在埃及

三月十日，多勃雷宁带着克里姆林宫的复信来到白宫。这是一封对我的二月十日警告苏联不要将战斗人员派往中东的外交函件的答复。由于某种原因，筹划室不能使用，我们便在总统的军事助理人员办公室里会晤。军事助理人员办公室是在白宫的东翼，距决定政策的地点很远。真正起作用的工作人员和助手的办公室，多数都聚集在西翼的椭圆形办公室附近。衡量白宫助理人员的重要性有一条标准，要看他们离权力中心多近。许多助理人员宁愿呆在西翼的一间小鸽子笼式的房间里办公而感到沾沾自喜，而不愿意呆在三百码以外的东翼中的较为宽敞而雅致的房间里，或者是街对面的政府办公大楼里，去冒失去地位的风险。当然，衡量他们的重要性，还有别的更糟糕的标准，但是正因为东翼的办公室大部分是用来办理社会性或后勤性事务的，所以它是一个避人耳目的开会的好地方。

多勃雷宁的表情是和颜悦色的。对于美国关于停火的好意规劝，他转达政府领导人的信念说："如果以色列停止对阿联（埃及）的轰炸，那末阿联方面也将在行动上表现出克制的态度，当然，就用不着发表什么官方声明来表达这个意思了。"换句话说，多勃雷宁是在提出一个沿苏伊士运河实行事实上的停火的建议。而且，多勃雷宁还愉快地宣布说，他已被授权和罗杰斯重新恢复双边会

谈。他还预先告诉我说，在这次双边会谈中要提出的两点"让步"：第一，解决中东问题不仅要结束战争状态，而且还要建立和平秩序；第二，阿拉伯各国政府也将设法约束游击队在他们领土上开展的活动。

实际的"让步"要比所看到的内容少。这个建议——认为和平解决方案可以建立和平秩序——是当作一种让步而认真地提出来的，它说明中东政策的前途是多么渺茫。要求以色列从占领的一切土地上撤军，而又不能保持同多数国家通常享有的和平关系，这是一件荒谬的事情。我们怎么也不能把在和平实现之后停止游击队的出击这件事说成是一种牺牲；任何人都不会持与此相反的主张。但是，多勃雷宁的停火建议看来似乎仍有足够的重要意义，它使我没有能一眼看出，苏联的复信没有回答我们二月十日谈话的主要问题，即：我提出的对于他们派战斗人员进入中东的警告。复信中对此避而不提的原因，很快就真相大白了。

我向总统提出的报告后来证明是高兴得太早了："多勃雷宁作了一系列重要让步……。在关于埃及问题的谈判中，我们政策比较坚定，这在所有有争议的问题上都收到了效果。苏联已经走了第一步棋——虽然这步棋的步子迈得不够大——至少它说明了寸步不让的方针是正确的。"总统对于苏联这种表面退让的态度作出了反应，他修改了原先关于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尼克松懂得，如果拒绝以色列关于军援的要求，我们是无法向以色列提出停火建议的，因此，在同一天，尼克松批准了我提出的关于补充以色列损失的飞机的建议，其总数在一九七〇年不超过八架鬼怪式和二十架隼式飞机。我提出，暂时搁置一揽子交易的坏消息是由国务院发出来的，他对此欣然同意，只是把尼克松式的手法加上：由我把尼克松决定补充以色列损失的飞机这件事立即通知以色列驻美国大使拉宾。

三月十二日，我和拉宾会晤，把多勃雷宁的停火建议告诉了他，并且也把总统的决定转达给他。同时，我要求以色列停止作深入内地的轰炸，并同意实行不公开宣布的停火。总统将发出一封备忘录，对我们的要求和保证正式加以确认。

拉宾有许多不寻常的优点，可是却不具备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天赋。如果我国把整个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无偿地作为礼物送给他，他会(一)，装模作样地认为，以色列总算拿到了他应该拿到的东西；(二)，他会从飞机上找出一些技术上的毛病，显得他接受这批飞机，是对我们作了一次老大不愿意的让步。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他没有接受这个补充飞机损失的方案。事实上，拉宾把梅厄夫人写的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亲笔写的)交给了尼克松。这两封信是根据外界已公开流传的报道来写的，认为我们可能推迟或拒绝以色列的关于飞机的一揽子要求。梅厄夫人写道，这一决定将会使以色列在军事上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同时将进一步鼓励苏联和阿拉伯的侵略。她担心一种被人"遗弃"的感觉将会使以色列人更加感到绝望，因此也就更容易铤而走险，"人们对于这种形势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怎样说也不会过分。"

拉宾对于停火一般来说也是不太热心的。停火对纳赛尔有利，但并不解决什么问题。然而他认为，这项建议是重要的，值得亲自带回到耶路撒冷去。拉宾飞回以色列，五天后带回了内阁的复信：以色列将在下列条件下同意实行不公开宣布的停火，即：同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补充飞机的数字增加一倍；尼克松公开宣布保证维持以色列的空军力量和中东的军事均势。(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以色列人的谈判策略。他们结合使用顽固坚持的态度和迂回曲折的策略，从而使他们的谈判对手疲惫不堪，最后只剩下一点为签署最后文件所需要的清醒头脑。)

然而和以色列的交道还没有打完，我们就发现苏联人打算对

埃及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就在以色列接受停火的那一天——三月十七日——拉宾通知我说，大量的苏联军火运抵埃及，其中包括最先进的苏制防空系统——SA-3 地对空导弹。这种武器从来没有给过任何一个外国，连北越也没有给过。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和这种导弹一起运来的还有一千五百名苏联军事人员。显然，这仅仅是苏联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第一部分。这一行动标志着苏联政策的一种不寻常的转变：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用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为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去冒险。在我看来，很明显，随着苏联增派武装部队，并对这些部队加以保护和显示他们的行动成果，这就成了一种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了。

所有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苏联的军事行动一开始时往往是试探性，必须及早毫不含糊地予以抵制，而抵制的方式应使苏联领导人有一个撤退的理由。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机，他们的行动规模就会越来越大，除非经历一次很大的危机，否则就无法加以消除。但是，当他们的挑战还不太明朗化的时候，要组织一次强硬的回击就特别困难。从下定义的角度来看，证据不可能是确凿可靠的。进行一次军事集结，在早期往往要受到一些限制，即必须建立一个后勤基地。情报机构——同那些把情报机构神话般地看成是不顾一切的冒险家的看法正相反——倾向于作出保险的预测；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小心谨慎地谈设想。根据我的经验，几乎在每次危机中，在开始时都会有些争论：到底我们是否真的面临着一次挑战；这场争论很快就会从政府各部门蔓延到国会中去。那些反对作出强烈反应的人认为，政府的“行动过火”了。如果由于政府的及时行动，避免了危险，他们会感到，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他们没有认识到，真正的选择在于：或者是采取表面过火的行动（把挑战遏制住）；或者是听任事态发展。到了威胁的真正规模已经变得很明显时——当每一个人都认为事情的性质已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

时——往往已经为时太晚，无计可施了。至于引起苏联采取行动的原因到底何在，在整个过程中，这个问题倒变成无关重要的了；美国的政策必须针对其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因此，一九七〇年春天，苏联的导弹和战斗人员出现在埃及时，尼克松政府的反应也是这样。由于把精力都集中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问题上，由于被国内的动乱弄得心神不定，还由于基本上认为是以色列的好战激起苏联采取军事行动；以致美国政府一直是摇摆不定，把遏制挑战的时机都放过了。

我们作出的第一个反应的方向是对头的。三月二十日我召见了多勃雷宁，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我说，我们是非常认真地看待苏联三月十日的信件的。事实上，我们已向以色列提出了停火的建议，以色列在原则上也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就在我准备找多勃雷宁来商定停火的时间安排时，我们得到消息说，苏联把SA-3导弹和战斗人员运进了埃及。尽管我对于这样一个步骤的危险性事先已提出过明显的警告，但军队还是运进去了。我说，你们这种手法使我联想起古巴的导弹危机。除了终止关于停火的一切努力，并把此事相应地通知以色列外，我们别无其他选择。

直到四月七日，多勃雷宁才回答这个问题。他问道，如果苏联的武器的部署仅限于亚历山大港、开罗和阿斯旺，我们对此是否会持不同的看法；对于战斗人员，他就含糊其词了。我问他，这算不算一个正式的建议。他说他以后告诉我。但后来他一直没有告诉我。

我们一旦接受了挑战，下一步的行动就应该紧紧跟上。对于苏联运进先进导弹和战斗人员的正确回答应该是对以色列增加军事援助——而不光是答应给一些补充飞机。这种做法将会表明，我们将奉陪苏联的武器升级，而且苏联的军事压力不是解决中东政治问题的办法——这是一个首要的条件，以促使苏联采取温和的

态度，实现我所主张的恰到好处的战略。比尔·海兰，我的工作班子里的一位苏联问题专家，于六月八日恰如其分地阐述了我的看法的基本原理：

> 苏联所崇拜的是权力和实力，他们最懂得军事力量。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一心想打仗，或者是说，他们主张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武力。但是，他们不懂得克制，他们鬼迷心窍，最后使他们得出结论说，可以得寸进尺。
>
> 如果美国不用军事援助示威性地支持以色列，苏联就会捉摸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的道理。最后，他们会得出结论说，是由于国内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或者是由于军事升级的结果，我们吓得停步不前。

我没有能力使这样一种战略得以采纳。我们的政府机构责备以色列，认为他们应对苏伊士运河沿岸的紧张形势负责，认为——不是没有证据的——以色列的深入内地轰炸惹起了苏联的反应。它们主张对苏联军事行动的"解决办法"是迫使以色列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把宝贵的时间在枝节问题的争论中浪费掉了。我们的情报界集中精力试图估量，如以重武器进行精确的计算，军事平衡是否实际上已经被打破。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抓住要害。不管人们对于以色列采取较大的灵活性持什么样的看法，我们首先必须挫败苏联人和阿拉伯的激进分子，不然，以色列的让步就会被看成是由于运进了苏联军事人员的结果。随着他们的要价逐步提高，我们的处境就会越来越坏。一旦苏联在中东站住了脚，而且又有了战斗力量，而我们又承认了这种力量，那末政治平衡就会急剧改变，军事平衡也随时会被苏联打破。对于目前的状况，以色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我们只能在战胜了苏联的军事挑战之后，才有可能去对待政治问题。

由于当时我任总统助理的时间还不长，而中东问题实际上又

是国务院管辖的范围，因此，我的这种观点就占不了上风。无论如何，在我的白宫生涯的那个时期，当各政府机构的意见不一，而总统又没有他自己的定见时，我的影响就最大；但当各政府机构之间的意见一致时，特别是在中东问题上，我的观点占上风的可能性就最小。在目前这个问题上，尼克松对问题的估计和政府各部比和我接近得多。他在柬埔寨问题上花去了大部分时间；他对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寄予很大的希望；他希望中东这个问题会自行消失，如果不消失，他和我以后还可以强行解决。

事实上，尼克松早已决定暂行搁置援助以色列军火一揽子计划的想法——在一种迥然不同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把他束缚住了。国务院已经着手通过繁琐的手续，草拟了一项关于军火问题的决定的公开声明。甚至在得到关于苏联军事行动的最新消息之后，他们还在和国会的主要领导人进行磋商。他们的想法是，我们的行动会使阿拉伯人看到我们的诚意；至少，如果我们继续运进额外的重武器，就会使我们的政府机构认为不可避免的那种爆炸性事件不至于出现。由于以前已经碰过钉子，而且由于深信总统的决心已经下定，我只好听任事态的发展。回忆起来，我认为我的错误在于没有更多地强调我的看法。因此，在三月二十三日——在我们得知苏联派战斗人员进入埃及后不到一星期——罗杰斯宣布说，“根据我们的判断，以色列的空军力量是足以应付目前的需要的。因此，总统决定，现在暂时搁置以色列对军火供应的要求……。”

诚然，声明补充说，“如果对方采取可能打破现有平衡的步骤，或者根据我们的判断，政治局势的发展提出了要求，总统将毫不迟疑地重新考虑……。”这句带有条件的话是安定人心的，其用意不言自明。口头保证说得再好听也掩盖不了下列事实：在苏联将战斗人员派进中东不到一个星期，也就是取消了和多勃雷宁关于停

火问题的会谈的三天之后，美国公开拒绝给以色列飞机。这个决定甚至似乎还暗示，最尖端的苏联制造的武器和苏联的战斗人员并不影响军事平衡，也即几乎是暗示他们可以增加军事力量。

计划已久的约瑟夫·西斯科中东之行——表面上说是要和大使们磋商，实质上去试探和平的可能性——加深了人们的印象，说明美国对于苏军的进入埃及并不太介意。苏联显示实力之后不久，西斯科就去进行这次使命，这似乎又暗示，苏联战斗人员进入埃及并不是什么障碍，甚至还可能推动美国努力去寻求和平。以色列受到来自苏联和美国两方面的打扰，暂时停止了深入内地的轰炸，采取了一种更加有选择的报复性策略。这种姿态，在几个星期之前可能有助于改善气氛，现在则反而变成对苏联军事讹诈的一种让步。错上加错的是，尼克松选择了当时这个时机，主动提出了美苏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倡议，这就消除了苏联仅有的顾虑。一九七〇年四月，并非是尼克松最引以为自豪的一个月份。

由于我们的回答软弱无力，苏联就必然会进一步施加压力。苏联的导弹增多了；战斗人员的数字亦在急剧增加，在其后的六个星期内增加到约一万人。拉宾于四月二十四日通知我说，苏联的空军驾驶员在埃及内地的上空执行防御任务。因此，埃及的空军可以腾出手来对苏伊士运河沿岸的以色列阵地发动进攻，并变得越来越放肆了。苏联和以色列之间要进行一场空战实际上已成定论了。

最后，美国政府着急了。白宫宣布“立即全面地”研究形势。尼克松于四月三十日（就在他宣布对柬埔寨采取行动的那一天）授权我通知拉宾，尽管他先前已作出了决定，他还是要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飞机。但他仍然十分担心阿拉伯国家的反应，因此，要求不要公开此事，因而使这项决定失去了某些威慑作用。由于尼克松没有表明他心目中想要提供的飞机数字，因此有好几个星期，他被纠

缠在政府各机构之间的纷争之中，那些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出售任何飞机给以色列。因为即使是苏联的空军驾驶员出现在埃及，也没有改变官方的小心谨慎的看法。情报界一致认为，苏军所执行的战斗任务纯属防御性的。但是情报界又不打算发表一个明确的声明，以免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只是提出一条保留条款，警告说，"然而，形势一旦转变，就可以事先不经宣告而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任务"——当然，这就是问题的核心。

五月十二日，在人们受到柬埔寨问题极端困扰的情况下，我忧心忡忡地为尼克松总结了一下这种越演越烈的僵局：纳赛尔深信，他能耗得过以色列人，而梅厄夫人则认为，同纳赛尔不可能谈和平。梅厄夫人准备坚持到底，直到阿拉伯人回心转意时为止。以色列希望美国更加坚定地顶住苏联，给以色列更多的飞机。甚而至于西斯科——由于他这次出访的结果——现在也建议要重新估价一下美国战略的一些主要设想。西斯科是正确的，因为这些设想全部都错了：

⊙我们曾设想，大国之间的谈判可以打破僵局。事实上，谈判并没有显著地改变任何一方的立场。

⊙我们曾设想，苏联为了缓和形势并减少对埃及的卷入，对于迫使纳赛尔妥协会感到兴趣。相反地，莫斯科增加了他们的军事义务，从而鼓励纳赛尔对以色列进行消耗战。

⊙我们曾设想，以色列最后会赞同美国的公平合理的倡议。但是以色列断然拒绝了我们的各种方案，而且要求我们，不管谈判是否取得进展，都得给他们以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支持。

⊙我们曾设想，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可以当作一个难民问题来解决。相反地，他们已成为一支半独立的力量；在约旦，甚至在黎巴嫩，在政策问题上他们已拥有否决权。

我的备忘录建议从根本上重新检查一下我们的中东政策。周围的环境不允许我们集中精力进行这样一场战争，为了袭击柬埔寨，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花的代价太大了。在水门事件爆发之前，尼克松还没有像目前这样憔悴和狼狈过，他不准备再为他自己增添麻烦了。当我们再次研究中东问题时，那是以国务院提出的一项和平倡议为基础的；而这项倡议的实际结果是，默认了苏联军队的集结。

结果，中东危机加深了。纳赛尔在五月一日的演说中向尼克松作了公开表示，他以命令式的语气清楚地说明，我们的地位是在下降。美国"必须命令以色列人从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去"。纳赛尔要求我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只要是以色列还占领着我们阿拉伯领土，就不要给以色列以任何新的支持，不管政治的、军事的或者是经济的支持。"否则，"阿拉伯人就会得出必然的结论，认为美国希望以色列继续占领我们的领土，以便将投降的条件强加在我们头上。"苏联可能在中东取得主宰地位，这并不是神经质地想象的结果；这一点从下列事实可以看得很明显，当时纳赛尔曾对一位著名的美国访问者、前世界银行行长尤金·布莱克说，他希望美国的任何外交倡议都通过苏联再提出来；他对于同我们直接打交道不太信得过。

在这种气氛下，政府各部拒绝执行尼克松的继续供应以色列飞机的决定（当时，现行的飞机交货合同在七月份期满），所用的办法是在实施过程中加以拖延，以及钻尼克松决定的空子，说他没有将总数讲清楚。这个问题最后和中东战略的全面辩论结合在一起了。表面上，争论竟变成了个空泛之谈，主要争论究竟我们应该采用一种"政治战略"，还是和"苏联进行对抗"。每逢争论陷入这样的格局，高级决策人就应该注意了。没有一个意志正常的人不希望政治解决；对抗不可能作为一个政策目标来追求。然而，我们在一

九七〇年所面临的中东问题却很不一样。问题在于：如果不首先使苏联和他们的激进的朋友弄清楚，军事压力不顶用，那末，政治解决能否成功也成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把对抗作为一个原则而加以抛弃，那末“政治解决”这个词，就变成为以接受对方条件来解决问题的一种委婉的说法。正如我在五月底高级研究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愤然表示的那样：“苏联害怕的就是我们和他们对抗。我们必须想办法把这种敢于对抗的思想告诉他们。”

但是，当时我们对形势的这种估计，时机还不成熟。政府由于被公众的抗议弄得心神不安，由于精力都集中在越南问题上，以及由于对莫斯科会谈还抱有一线希望，因此一方面预感不祥，另一方面又心存侥幸；一方面面对苏联挑战的现实，另一方面又害怕出现各种并发的危机，心理状况十分矛盾。六月五日，罗杰斯召见了多勃雷宁，向他宣读了下列不寻常的声明，就反映了这种矛盾心理。他既没有通知我，也没有通知尼克松(据我所知)：

苏联表示，在阿联的苏军活动将保持其防御性。我们希望明确表示，我们将不把苏联的战斗人员从空中或地面进入苏伊士运河战斗地区一事看成是防御性的，因为这样的行动只能是支持阿联所宣布的政策，而这个政策是违反安全理事会所规定的停火决议的。我们认为，苏联的军事人员进入微妙的苏伊士运河战斗地区(在离运河两岸三十公里以内的地区)，只能导致无法预料其后果的严重的升级，对此，美国不能置之不理……。

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个强硬的警告。然而，实际上这一声明所起的作用是给了苏联一张空白支票；它默认，除了不得进入最靠近苏伊士运河的地区外，苏联的战斗人员可以进驻埃及。事实上就是告诉苏联，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埃及集结大量的部队，只要他们不直接进入战斗地区。他们的确集结了部队。在两个月

内，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能够将他们的作战部队迅速地推进到战斗地区去。我的同事比尔·海兰总结了这次日趋严重的危机：

苏联人看到我们的立场和以色列暂停深入内地轰炸的做法，一定得出了结论说，我们已经默认了他们的直接干涉。诚然，他们满可以把我们最近的声明（罗杰斯对多勃雷宁的声明）看作为我们已经接受了苏联关于"防御性"活动的说法，只是认为向运河推进已不是"防御性"活动，因而感到关切……。

一般认为，苏联人可能还不会向前推进，主要因为怕冒和以色列作战的风险。然而，有若干迹象表明，他们的确是已经"慢慢地向前"推进了（运河沿岸的工地）。而且，按照苏联战略的逻辑推断，看来他们也会这样做。苏联在中东的近期目标是破坏西方的影响。主要的敌人不是以色列，而是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然而，苏联现在要想取代西方的办法就在于，以行动表明他们不仅能够保护他们的代理人，而且还能够补偿他们在一九六七年所受的损失……。

光靠警告已经不够了。诚然，因为我们已经提出过几次严重警告，我们提得越多，其可信程度就越差。断绝接触不管用，而调动军队至少目前时机还不成熟……。由于派遣飞机到以色列去已成了衡量我们政策的象征，也许不幸的是，这已成了当前唯一的迫切问题。

只有当我们表明甘愿作出这种选择之后，我们才可以期望使以色列人相信，作出一些政治让步是必要的，也才可以使苏联人和阿拉伯人相信，我们是不会被他们最近的行动所吓住的。

但是美国政府还不准备采取这样的方针。而我们拖的时间越久，要付出的最后代价就越高。我们痛苦地、尽管是缓慢地理解到了这一点。事态的发展终于迫使我们采取行动。在这年秋天，出现了一系列的对抗，在这个过程中，苏联的推进起初是遭到阻截，最后是被顶了回去。

美国在外交上的一项倡议

我们的第一个行动是与对抗相反，它是另一个和平倡议。我曾设法利用六月十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来对我们的战略进行一次根本性的研究。国务院先走了一步，把这次会议变成一次对于策略性决定的讨论。罗杰斯准备了一个复杂的方案，其中包括提出一项美国外交倡议，要求交战双方"停止射击并开始谈判"。要求以色列和埃及都接受九十天就地停火，并在联合国代表冈纳·贾林*的主持下举行间接谈判。为了鼓励以色列，美国将在七月和八月提供——作为对其军火需求的答复——三架鬼怪式飞机，以后每月提供四架鬼怪式和隼式飞机作补充之用。然而，这些供应安排得看"谈判是否……开始，并显示成功的迹象"而予以重新考虑。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国务院的建议是鼓励以色列把谈判引向失败；而出售飞机只有在谈判"显示成功的迹象"时才会加以重新考虑。拟议中的方案根本就没有谈到苏联战斗人员出现在埃及的这个严重问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之前，我曾向尼克松提出过我的忧虑。我强调指出，必须把最近的苏联行动——而且还在继续着——与谈判联系起来考虑。

苏联在阿联的行动的性质是不应低估的。你可能会听到（国防部）这样的论点，即：认为这种行动是由以色列所造成的，或者认为它纯属防御性的，因此并没有威胁到以色列的安全。这些论点都没有谈到点子上：这是苏联政策一个不寻常的转折——苏联从来没有为了一个非共产党国家的政府，而把他们的武装力量投入危险的战斗之中。

---

* 冈纳·贾林，瑞典外交家，一九六七年被任命为联合国调解中东危机的特使，他与阿拉伯和以色列的领导人举行了多次会谈。——译者

有人认为，苏联现在已经挽救了纳赛尔，他们双方都可能突然改变态度，准备认真地进行谈判。这种说法看来是可疑的。苏联在心理上取得了胜利而没有受到明显的惩罚，一般来说，他们的策略首先是巩固他们已取得的胜利，然后向前推进，边探路边前进。

在六月十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总结了恶化的形势。苏联在埃及有四至五个团的SA-3导弹和三至五个中队的苏联驾驶员驾驶的米格21型飞机；这些数字是不用怀疑的。自三月份以来，苏联所派遣的战斗人员现在总计达一万人之多，埃及摧毁以色列飞机的能力大大地加强了。日益增加的损失将对以色列造成新的心理上的压力。由于他们失去了先发制人的能力，以色列便很想控制苏伊士运河沿岸地区。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苏联会不会将他们SA-3导弹运进运河地区，并在那里驻扎空军，如果苏联这样做了，以色列会不会不向他们挑战。无论如何，苏联的综合性军事力量只要突然向前推进，形势便会很快地变得对以色列不利。

罗杰斯于是便阐述了国务院关于立即停火和通过贾林进行会谈的方案，好像赫尔姆斯没有作过上述的情况介绍似的。实际上他的这个建议像他六月二日和多勃雷宁谈话一样，默认了苏联战斗人员进驻埃及。

尼克松在会上只谈晦涩的哲理，这说明他不准备讨论基本设想。他在思索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对自以为是一个世界大国的英国的影响。他认为没有处理好阿拉伯难民问题，是战后时期的一大错误。甚至当我们在考虑一项美国的单方面倡议时，他还在思考一个美苏联合计划的可能性；毫无疑问，他对我在那天晚上将在“红杉号”总统游艇上和多勃雷宁举行会谈，讨论他对最高级会谈的设想，寄以希望。所有这些无目的的闲谈，主要是一个烟

幕，以便尼克松能够拖延而不作出正式决定。尼克松并不真正相信，国务院的外交方案会行得通，但是他也不想否定罗杰斯。尼克松私下对我说，他认为目前的中东方针会把我们引向灾难。我同意他的看法，并补充说，最坏的方针是投入"一点军火加上一点建议"。(这并不排除尼克松向罗杰斯表示相反的观点。)

六月十日晚，我在"红杉号"游艇上和多勃雷宁的会谈并没有结果。多勃雷宁重新提出他的请求，要我们利用特种渠道来谈判中东问题。为了使尼克松出席他所珍视的最高级会谈时手中有几根胡萝卜，我没有立即拒绝举行这种谈判的可能性。但我坚持说，只有苏联要求它的阿拉伯朋友作出和我们敦促以色列在领土问题上所作的让步相称的牺牲，谈判才有可能奏效。再说，苏联战斗人员进驻中东是美国最关切的事。因此我们非常需要知道，苏联是否准备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撤出武装部队。多勃雷宁回答说，他要请示国内。

和多勃雷宁交换意见，更进一步加深了我的信念：我们的路线错了。为进行有效的谈判所必需的力量均势根本就不存在。六月十六日我向尼克松送交了另外一份形势分析，就所提出的倡议提出警告：在作出对"停止射击并开始谈判"这一建议的评价时，必须考虑到我们去年所提的那些强制性的和平倡议的情况，"它们使那些对边境不断施加压力的阿拉伯人胆子更大了。以色列开始对埃及进行深入内地的轰炸，而这又转而促使纳赛尔引进大量的苏联战斗人员和势力。"在我看来，新的建议也包含着同样的危险；我们最多只能赢得两个月的时间。

国务院的办法是要我们迫使以色列退回到战争以前的边界线，而在夏季之后，他们将得不到更多的飞机。还将要求他们同时放弃两个安全因素——他们的缓冲地带和得到更多的飞机的可能性。和平将在边界处于更加容易受到进攻的状况下实现，随着这种和平的临近，他们编制内的飞机总数将会

减少。另一方面，如果以色列认为，只要谈判进行得不顺利，它就会得到更多的飞机，它将不想把谈判顺利地进行下去……。

纳赛尔会把我们的行动解释成为一次半途而废的行动。他会深感怀疑，我们能否真正在只给六架飞机或者以后还会再给一些的基础上，迫使以色列撤军……。

在苏联人看来，在他们继续不断地扩充势力的情况下，国务院的建议是一个软弱的姿态。我们的方案在军事上的影响很小，而且非常犹豫不定，以致会使他们不相信，我们会打算在这个地区对他们的逐步升级采取相应的行动。他们认为我们的三月声明是靠不住的；他们将以同样的态度看待这个倡议。

首先，我认为现在提出一项重大的倡议是不合时宜的，除非它能解决苏联战斗人员进驻的问题，而我看来这是问题的核心。因此，我提出了一个代替办法：我们应明确地告诉纳赛尔，只有美国才能促使以色列撤军，所有其他的道路都是幻想，而且我们将保证使这种情况保持下去。只有美国运送大量军火给以色列，以确保以色列的安全，而且埃及也愿意谈判和平的细则，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促使以色列撤军。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苏联的战斗人员必须撤走。

我认为，通过提出详细的安全措施，缔结一项和平条约和撤退苏军，这样的做法将会鼓励以色列去进行谈判，它将使埃及有更大的可能性收复西奈半岛。苏联因以色列得到充分武器供应而面临战争升级的危险，以及一项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而留下的应急退路。但是我告诫尼克松说，接受我的方案将会引起官僚机构内部的一场可怕的争吵："我们在柬埔寨的遭遇刚发生不久，你将不得不压制一下内阁高级顾问的建议，并把一项迥然不同的政策强加在一个非常不愿意加以执行的官僚机构的头上，然后责令他们贯彻执行。"

几乎可以肯定说是出于这些原因，尼克松决意不在这个时刻来正视这个问题。我建议中所包含的政策，将需要三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得到他的同意。六月十八日，总统采纳了国务院的建议。他认为，这个建议反正会被拒绝；他宁愿应付一个僵持局面，也不愿意去和他的官僚机构再进行激烈的争论。因此，在我们拒绝了停火建议后的三个月——由于苏联第一次在中东进驻约一千名战斗部队而引起的——我们却接受了另一个停火建议，尽管自那时以来苏联人员已增加到了一万人。这个简单的事实一直是我们中东问题上的特点，直到苏联最后在九月份因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而失算，给了我们一次新的机会重新恢复心理上和物质上的平衡。

对于尼克松的决定，国务院欣然表示接受。关于停火和在贾林主持下进行会谈的建议立即私下转交给以色列、埃及、苏联和约旦，并于六月二十五日公布。

第一个吵吵嚷嚷的反应来自以色列。以色列对于延迟交付军火，以及美国对苏联进驻战斗人员的软弱反应，已感到惊恐不安；现在它对我们方案中的一系列条款表示反对，尤其反对我们关于供应飞机的诺言含糊其词。尼克松于六月二十日发出了一封由国务院起草的信给梅厄夫人，但这没有减轻她的担心，因为该信相当清楚地表示，运交军火要选择时机，取决于谈判的进展，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认为有助于谈判，我们就可以推迟已经同意了的军火供应。以色列认为（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一例外条款在很大程度上使承担义务失去意义。尼克松根据长期的竞选活动经验，把诺言看成是处理明天的问题的手段，他有一种典型的尼克松式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私下告诉我说，我可以去见拉宾，并且“告诉他们，我们写这封信是为了记录在案。除非有什么大变化，否则我们将着手进行飞机的事情。”（对于“大变化”一词怎么解释，这也是没有准的。）

接着，轮到莫斯科了。六月二十三日，多勃雷宁对我们的中东建议的反应较为冷淡。我问他，对于我所提出的关于撤退苏联战斗部队的问题，莫斯科是否有答复；多勃雷宁回答说，我提出的问题太多，他脑子里没有记住。多勃雷宁满以为可以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国务院的正式倡议没有提到苏联军队的问题。他表示，他被他所谓的美国想"单方面地"掌握中东的外交行动的企图感到义愤。他宣称，谈判才是我们当前的问题，但是他认为我们以后会不得不回到莫斯科去。他不知道，到那个时候，可以作出什么样的"让步"。六月二十九日，在莫斯科，葛罗米柯告诉美国驻苏大使比姆说，苏联研究了我们的建议，没有发现有什么新的东西，以前建议中的缺点，这里面全有。

埃及继续保持缄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把问题说清楚，总统的行动并非出于软弱，苏联的军队是个严重的问题。六月二十六日，在圣克利门蒂的一次背景情况介绍会上，我主动地对苏联军队进驻埃及提出质问。我说，苏联把战斗人员派遣到中东的打算是没有道理的。即使原先派遣他们去为了支援纳赛尔，现在他们继续留驻在那里便构成一种必须认真加以对付的战略性威胁："我们正设法按照这样的方式寻求解决办法，即：加强温和派的政权，而不是激进派的政权。我们正设法*驱赶进驻的苏联军事人员*，不全是指的顾问，而指的是参加战斗的驾驶员和战斗人员。在他们牢牢地站稳脚跟之前就把他们赶走（楷体是我标的）。"

描述这次反应最确切的——如果不是最文雅的——用语是"举座哗然"。国务院和宣传机构的权威性的评论员都对我加以责难，说我是要破坏和平倡议，是在作出无法兑现的虚张声势的恫吓。批评来自除了苏联以外的四面八方；这些人只有在认为自己很有把握时，才往往是带有挑衅性的，而且他们在私下里听到这些

说法已经有三个月了。六月三十日，在一次关于在柬埔寨采取行动的背景情况介绍会上，就所谓的我的威胁"驱赶"俄国人的问题，向我提出质问，我坚持自己的看法，表示苏联军队进驻埃及形成了新的危险形势。我说，也许我还应该用一个比"驱赶"更难听的词；但是，苏联战斗人员的出现是与和平不相容的。而且"在苏军进驻中东的某个时刻，将会有一些当地的阿拉伯势力，出于自己的理由，并不希望以一种殖民主义来代替另一种殖民主义。"三年以后，我们使这一预言应验了。

到七月一日，尼克松从柬埔寨问题的痛苦中基本上恢复过来。虽然当时他还没有准备过问阿拉伯和以色列的问题，但是对于苏联战斗部队进驻埃及所引起的地缘政治性的危险，他心里是明白的。当时罗杰斯正出国访问，尼克松便利用一次电视讲话的机会，表明他基本上同意我的分析。他警告说，两个超级大国可能在中东问题上引起对抗，美国不会容忍那里的军事均势遭到破坏。"一旦力量均势有了变动，以色列比它邻国弱一些，这就会发生战争。因此，维持均势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当苏联派驻军队支持阿联时，这就使美国有必要来估量一下苏联的作为；而且一旦力量均势遭到破坏，我们就要做我们认为必要做的事，以便来维持以色列与其邻国相抗衡的力量。"

国务卿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从欧洲发出强烈的抗议，说"他的"和平倡议正在遭到破坏；他甚至在七月十二日的一次电视讲话里谴责西斯科支持了尼克松。

但是苏联的神经并不那么脆弱；他们的分析是建立在他们对自己利益的估计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感情气氛上的。由于莫斯科觉得我们真的想谈判了，多勃雷宁在七月七日和九日两次会议上的表现简直是再高兴不过了。他流露出愿意合作的样子，他表示不久将就中东问题发表讲话。他没有提到我们的警告。结果证明，

我们的警告一点也不早。因为在七月初，苏联的导弹混合部队，在为开罗、亚历山大港和阿斯旺提供了保护以后，不顾罗杰斯于六月二日给多勃雷宁的警告，开始逐渐向苏伊士运河推进。七月二十二日，我把所知道的情况向尼克松提供了一个综合报告：苏联人和埃及人正在大致与运河平行的地带构筑起一个新的防御屏障，与运河相距约有二十至三十海里之遥。该屏障包括三个SA-3和十一个SA-2发射场，当然这些发射场还可能增加。屏障和运河挨得很近，足可以保护向运河对岸发炮的埃及炮兵阵地。至少，埃及进行一场消耗战的能力是大大地加强了；如果这个导弹武器系统规模扩大了，并继续向前推进——迹象表明已经这样做了——它就可以为埃及进攻西奈半岛准备条件。

总之，在尼克松政府内，我们是第一次经历到了苏联利用驻军来加强他们的地缘政治影响的计谋。在苏联所认为的势力范围内，克里姆林宫会大规模地、迅速地和无情地使用军事力量。但是，当它在超越东西方分界线的地方采取行动时，它的行动就非常小心谨慎了。起初承担的军事义务往往是有节制的，其防御性的动机还可以说得过去。在那个时刻，只要下决心和他们对抗，迫使其撤退，这相对地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当苏联人没有碰到抵抗时，他们在行动上很快就会升级。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近乎公式化的做法——从埃及到安哥拉到埃塞俄比亚——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人们同样的怀疑和踌躇，这种怀疑和踌躇远不能使苏联有所节制，却反而只能使苏联军事力量大规模地卷入。

一九七〇年七月在中东也是同样的情况。起初作为对以色列深入内地轰炸而采取的保护性行动，几乎改变了整个战略态势。我们的一些综合分析人员开始认为，以色列更加需要适合于抵抗越过运河的入侵的装备，而不是徒劳无益地消耗飞机来破坏运河那一边的日益加强的防空系统。这些论点忽略了这样一点：防御性

的战略包含有消耗战的意思，对于一个和其周围的力量对比是一比三十的国家来说，这样一种前景根本上是无法接受的。以色列正濒于绝望的边缘，有可能被迫在力量均势遭到无可挽回的局面之前，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纳赛尔可能由于过分乐观而不顾一切。对于激进的阿拉伯人来说，苏联正成了不可缺少的依靠对象。美国似乎还没有能够看到危险的实质，那就是，苏联在埃及军事地位的加强以及这个地区力量均势的变化。由于在不合适的前提下开始谈判，而且也由于我们向双方都付以报酬——给以色列以飞机和给纳赛尔以暗示，让他知道我们在领土问题上会给予支持——来换取一个他们比我们需要得更迫切的和平谈判，因而我们的威信受到了损害。我们对每一方都给得太少，这样反而使紧张的形势更加复杂化了。

七月一日，果尔达·梅厄夫人给尼克松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她指出，苏联人正在设置SA-2和SA-3导弹群来控制苏伊士运河，并说："当这些事态在发展时，有人告诉我们说，力量均势仍然没有变。"她警告说，以色列除了轰炸这些设施外，别无其他选择。但是，如果以色列对一个部分地由苏联战斗人员操纵的导弹设施发动进攻，苏联显然就有可能会用他们的飞机来保护这些设施。以色列和苏联之间直接发生冲突，这是我们不能再置若罔闻的一种危险。我召集了一些缺乏热情的政府机构办事人员着手草拟应急计划，而这些人却还在嘀嘀咕咕地谈什么要迫使以色列人在谈判中持更加灵活的态度——这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接着，在七月二十二日——正当一场军事冲突似乎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时候——纳赛尔突然接受了我们的关于停火和举行谈判的建议。

停火和停止一切军事活动

为什么纳赛尔在这个时刻接受我们的建议，这件事要等到把埃及和苏联的档案弄到手之后才能搞得清楚。他也许是害怕以色列人进行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他和他的苏联顾问可能把尼克松和我发表的白宫对报界的声明理解成为美国有介入的危险。根据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来看，很有可能，他和苏联人可能从一开始就想利用停火建议，正像利用流产的三月建议那样，作为一种掩护，以便冒最小的风险来推进其导弹设施。

尼克松政府感到很受鼓舞。罗杰斯声称他有功，因为是他想出的倡议——西斯科私下对此表示异议，他坚持说，是他首先想出这个主意的。尼克松认为，是他在七月一日的强硬讲话发生了作用。谦恭并非是我的长处，但我不愿意把某些“成就”归功于我在六月二十六日和三十日的强硬的背景情况介绍和我与多勃雷宁的谈话。或许我们都有些对的地方。不管怎样，后来事情很快表明，我们高兴得太早了。

早先的过分乐观是被多勃雷宁于七月二十三日故意激起的。他利用白宫对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的欢迎仪式的机会——多勃雷宁以外交使团代理团长的身份出席——把他将在下午在国务院发表的讲话事先向我打了招呼：苏联对临时停火的态度是积极的，而且苏联也赞成重新恢复贾林代表团的活动。但是，莫斯科深信，贾林应对联合国决议的含义作具体的指导，因为他应该促使联合国的决议得以贯彻执行。因此，多勃雷宁主张，应加快两强和四强会议的进展，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寻求解决办法。为了表明苏联人精通我们的复杂程序，多勃雷宁也给罗杰斯带来了一份特别函件。多勃雷宁在国务院把这份照会正式递交给罗杰斯，并告诉

罗杰斯他事先已告诉了我，苏联人同意在停火协议中包括停止一切军事活动。为了弥补疏忽，他随后亦给我送来了一份备忘录——罗杰斯不知道这件事——是对我在六月十日和六月二十三日关于苏军在中东继续驻留问题的质问的最后答复。照会说，苏联——在取得一项全面政治解决之后——将"可能"考虑撤军，只要撤军是一种双方共同的义务。当我指出我们在中东没有军队时，多勃雷宁起初说，这样我们就更好办了。写上双方共同的义务，原则上也是为了装饰门面。后来他又对此加以补充说，美国必须从伊朗撤出其军事人员。

如果我们对形势了解得更清楚些，我们本应懂得，我们只是刚刚跨过了最低栏。我们安排的会谈一定将陷入僵局，因为埃及仍要求恢复一九六七年的边界线，而且以色列也还是坚持要大幅度地调整领土。埃及希望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而以色列则在"反对强加于人的解决方案"的口号下，要求放手让它自己干。尼克松还没有拿定主意，当会谈僵局变得很明显时他到底怎么办。苏联的照会也不能令人放心，因为它没有明确表示"停火"，也没有明确表示"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它只是重复阐明苏联对贾林代表团的工作原则的解释，而这些原则在所有主要的问题上是与那个激进的阿拉伯方案相一致的。关于愿意讨论撤军问题，它用了"可能"这个词作为挡箭牌，并且把它与要求美国军事人员撤出伊朗的荒谬要求扯在一起。尤其是，苏联人可能完全是在重演三月份所耍的花招。停火建议现在可能作为掩护，以便其接着就可能保护它的导弹设施向运河地区推进。

在那个时候，这样一些考虑往往是被人摒弃的，因为我国政府当时正全神贯注在以色列对我们倡议的反应上，而以色列又是非常顽强的，它言词尖刻，行为粗暴，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因为两千年的苦难把对悲剧的预感，深深地铭刻在以色列人民的心灵中。

以色列这个小国家，人口只有二百五十万，处在近一亿潜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而这个地区又是屡经帝国兴衰，一再易主。它的处境时刻都在提醒每一个以色列人，历史是瞬息万变的。以色列人的生存范围是这样的狭窄，以致于它的领导人对于高尚的外交姿态或惊人的外交行动都不轻信。他们把生存和深思熟虑看得密切不可分割，而这在外界人看来似乎是(有时的确是)过于谨小慎微，冥顽不灵了。即使当以色列领导人接受和平建议时，他们首先总是拚命反对一番，其目的是要表明，他们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从而使那些想进一步要求以色列让步的人感到踌躇不前。而且，当他们接受建议时，往往附带一系列无休止的要求，包括各种保证、谅解性的备忘录和秘密解释等；所有这一切都是设法用来限制位处五千英里以外的一个较为多变的盟国的行动自由，而这个盟国却在供应其武器，支援其经济，庇护其外交地位，并且似乎还在不断地强迫其提出和平方案。

这种倾向由于其政治制度而更加严重。在这个政治制度中，政府往往是由好几个政党和独立小集团组成的动荡不定的联盟。这样一种制度不能很快地作出决定，也不能执行灵活机动的外交政策。任何一个主张让步的领导人都有可能遭到他的同事的攻击，并在国会被强烈地谴责为，如果不是卖国贼，那末至少也是狡猾的(或愚蠢的)美国人的应声虫。以色列的每次内阁会议都很适合于对和平建议吹毛求疵，使之不能通过，而不适合于制订一项长远的政策。有时，以色列发现，把作出困难的抉择的责任推卸给它的伟大的盟国，比由它自己去作出决定要更容易些。当许多以色列领导人心中明知必须去做某事时，就用“美国压力”当作一种托词。

要求以色列热情地响应停火建议并开展谈判，这就完全不符合它的本性了。为了得到一个差强人意的答复，几乎用了两个多

星期的时间去交换外交信件和由总统亲自过问。七月二十三日，尼克松给梅厄夫人写了一封信，力劝以色列利用阿拉伯人接受美国倡议这个时机，同时他向她保证说，我们将不会强迫以色列接受阿拉伯人对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二号决议的解释，作为贾林代表团开展工作的指导原则。幸好这封信以后才公开发表，因为当停火建议送到阿拉伯人手里时，他们所得到的印象恰恰与此相反。

以色列的回信要求增加军事援助，特别是用来对付苏联地对空导弹的武器。我们表示将给予同情的考虑。以色列要求我们就撤军和难民等问题，进一步澄清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答复并没有能把问题说清楚，因为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立场，而且那些了解底细的人也怕把事情说清楚，唯恐说了之后会引起以色列人不同意这个倡议。七月三十日，尼克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胆地宣布说，以色列可以满怀信心地进行谈判，“不用担心，由于谈判，它的地位在那个时期就会受到损害，或者是处于危险之中。”最后，在七月三十一日，我们得知，以色列内阁原则上已决定予以“肯定的”答复。一个正式答复很快就要出笼了。总统从圣克利门蒂发表声明，欢迎这个决定。

以色列人的担心远非没有根据。显然，苏联人和埃及人正在利用停火之前这一段时间，沿着运河迅速地集结导弹部队，而这是违反关于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规定的文字和精神的。这些导弹部队不但很快地能够保护运河西岸的埃及炮兵阵地，而且还能越过运河，掩护埃及人登陆。而根据停火协议，对这些导弹部队是不能加以还击的。

八月五日，拉宾匆匆忙忙地赶来，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总共有十四个导弹发射场，已经移到离苏伊士运河五十公里的范围内，三个隐藏的导弹发射场，已经移到十至二十公里的范围内。七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和三十日，苏联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已经和

以色列的飞机交战。在七月三十日，四架由苏联飞行员驾驶的飞机被以色列的空军击落。拉宾重申，以色列决心不允许导弹设施向前推进。在八月五日晚上的一次会谈中，拉宾非常强烈地强调了这一点，以致我认为，在停火前，以色列可能对挨近运河的SA-3导弹发射场发动一次地面进攻；我把上述情况告诉了尼克松。在最后一分钟，以色列内阁决定不采取这样的行动。我一直没法得知，究竟是拉宾过分地夸大了这种进攻的可能性，还是耶路撒冷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主意。无论如何，以色列于八月六日正式通知我们说，他们接受了停火建议。罗杰斯和西斯科想赶在人们没有改变主意之前，赶紧把这件事办成，在关于贾林代表团的问题上草率从事。这种做法使得以色列人很为恼火。

八月七日，停火协定开始生效，条文原来就规定得含糊不清。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有一个停火协议，规定在运河两岸各五十公里的一个地区内停止一切军事活动；遗憾的是，所达成的协议文本，对于什么行动是在停止一切军事活动规定的禁止之列，措词很不明确。以色列和美国之间达成了一个单独"谅解"，设法弥补这个缺陷，办法是概括地提出我们的共同看法，说明什么行动算是违反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协议。*

我们的驻开罗使馆的代办奉命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中的一些范例告诉埃及人，但是又说，这些范例只是违反停止一切军事活动规定的行动的"说明"而已。人们很难说得出来，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协定怎么能够束缚得了埃及和苏联，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严重的计算时间的问题。埃及人于美国时间八月七日早晨正式

---

* 规定禁止下列几点，其中有：(1)不得向这个地区输进、向前搬移、建立或另外安装导弹；(2)不得为部署导弹建造任何混凝土结构；(3)不得为建造任何新的导弹发射场而进行任何工程建设；(4)尽管同意维持现有的设施，但不得对现有的导弹发射场或设施作任何改进。

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而停火则于开罗时间八月八日凌晨一点开始生效。但是，由于同以色列在谅解的某些条件上讨价还价，国务院的代表一直到开罗时间八月九日下午二点五十分（三十六个多小时以后）才将可能违反停止一切军事活动规定的“说明性”目录通知开罗。事实证明这是很重要的；以色列人后来声称，埃及人在八月八日至九日期间违反了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规定，尽管埃及人那时还没有来得及确切地弄清楚，我们到底对于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应作如何解释。

这些文件和“说明”也送交给了苏联。但是莫斯科是一个既非停火又非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正式缔约者。随着对违反规定的指责越来越多，苏联越来越坚持说，尽管它在七月二十三日表示过同意，但该规定对它并没有约束力。

自一九六七年以来的第一次关于谈判的倡议就是在这个不稳固的基础上发出的。尽管以约旦为根据地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发誓不遵守这个倡议，停火的第一天，苏伊士运河沿岸还是平静无事的。苏联人利用这个机会再一次要求以色列撤出它的全部军队，但是他们也公开地把停火描绘成为“重要的第一步”。美国政府开始为贾林主持的会议作准备，并研究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要求。西斯科甚至于在八月十二日告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小组说，为了给贾林所主持的会谈早作准备，他已着手草拟了一个包括明确规定最后边界线的“全面协议”。我们内部关于是否给以色列以军事援助的辩论，很快就成为一场抽象的辩论，辩论中心是支持什么样的以色列战略。这就起了推迟决定的作用，因为武器的种类要看各机构间关于军事原则事先取得的一致看法而定。这些带有神秘味道的讨论，很快就被以色列关于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协议正遭到违反的指控所压倒。

关于苏联和埃及初期的行动的消息是混乱的；毫无疑问，以色

列的报纸对此大事渲染。使人感到惊奇的事实是，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开始时间是午夜，当时侦察机或人造卫星即使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采取行动，也无法把动静看清楚，尽管如此，但并没有放松核实这些消息的努力。但是毫无疑问，从埃及接到美国的建议，到开始实行停火以及停止一切军事活动之间，有将近三个星期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埃及—苏联的防空设施曾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几乎可以肯定，停火开始生效的那个时刻还正在建造的一切工程后来都建成了。这可能是由于他们没有把遵守协议放在眼里，也可能是由于苏联人和埃及人被我们的官僚机构以不寻常的速度发起停火的行动搞得措手不及了。

到了八月十三日，以色列对苏联—埃及违反协议的指控传到了我们的新闻界，梅纳赫姆·贝京把他领导的反对党从一九六七年的紧急状态中组成的联合政府中撤了出来，并对果尔达·梅厄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说她首先就不该同意美国的方案。然而，国务院采取的方针是，坚持认为美国还没有得出象以色列所说的违反协议的"结论"。我们驻以色列的大使沃尔沃思·巴伯奉命劝说以色列政府停止公开讨论这件事。而且，我们还要求以色列迅速指派代表参加贾林所主持的会谈。

八月十五日，拉宾大使到白宫来见我。他递交了一份果尔达·梅厄的外交文件，历数证据，指出在SA-3配合下的拥有十四枚SA-2的导弹部队进入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地区。结果，以色列损失了五架鬼怪式飞机（这就是发生在中东停火时期的怪事）。换句话说，我们在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协议开始生效时刻的前后，向苏联的第一次推进行动作出了温和的反应之后，苏联人和埃及人作了进一步的部署，显然，这是违反协议的。梅厄夫人要求当面向总统本人陈述她的看法。国务院认为这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正急于想要促使贾林所主持的会谈开始。与此相反，我

则给拉宾安排了一个机会，让他把以色列得到的情报给尼克松看。拉宾利用这个机会把我们的情报界不愿意接受以色列所提供的证据狠狠地数落了一番；他说违反协议是千真万确的事。其结果是，尼克松批准将伯劳鸟式导弹迅速运交以色列，用来对付SA-3导弹设施，而且随后又同意于九月份会见梅厄夫人，那时她将到美国来出席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

拉宾抱怨美国的情报界不愿意承认违反协议的事实。他的抱怨是有些道理的。我向总统说：

事关以色列的生死存亡，因此它冒不起这个风险……。以色列的处境必然会影响到他们对一些尚未明朗化的事情作出他们的解释。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却总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看到这些违反协议的事实存在，其后果是令人不愉快的。既然发生了违反协议的情况，我们就不得不进行下列的选择：或者采取行动，对付这些情况，从而使我们的倡议冒失败的风险；或者无所作为，从而背弃我们对以色列许下的诺言，造成一个迫使它采取军事行动的局面。因此，除非证据确凿，我们倾向于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避免得出结论说，阿拉伯人违反了停火协议。

不管是什么原因，很有可能，我们迟疑不决的初步反应鼓励了纳赛尔加速其把导弹推向前进的步伐。事实上，我们亲眼看到春季一些事件的重演：苏联采取了有限的行动，随后便停下来巩固阵地，并分析我们的反应，接着是一阵急速而令人惊奇的集结。诚然，八月前半个月所发生事情的证据是不明确的，即：有争议的活动到底是发生在停火生效之前不久还是在之后不久。然而，毫无疑问，不论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它是对国务卿于六月二日对多勃雷宁提出警告的蔑视，这个警告说，苏联在运河三十公里以内部署导弹不能被认为是防御性的。

到了八月十九日，收到了新的证据，正如以色列人所指出的那

样，违反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协议的事情的确是存在的。这就迫使国务院采取正式行动。但是公开的反应——采取由国务院新闻发布官发表一项声明的办法——调子又是如此之低，以致使人们认为我们正在寻找借口，避免采取行动，而不是寻求补救办法：

我们断定，苏联的地对空导弹在停火协议开始生效前后，已向前推进到苏伊士运河西岸地区之内。有一些证据表明，这种行动在停火期限之后还在继续，尽管我们的证据还不是结论性的。……我们正在研究（从以色列发来的一些补充情报）……目前我们不打算在这件事上作进一步的公开声明……。

为了配合公开声明，我们还把所掌握的某些证据材料通知埃及。但是，由于这种证据“不是结论性的”，我们告诉埃及人说，我们将不作公开指控。我们把我们所认为的违反协议的事提醒他们注意，并警告说，类似这样的行动如果继续下去将会危害到和平谈判。我们还把我们在开罗的做法通知了苏联。最后，还花了很大的力气，说服以色列人行动要有节制，不要用宣传去为将来制造麻烦。八月二十二日，当我们提出了“无可辩驳的”违反协议的证据时，我们在开罗又采取了第二个措施。

如果美国对一个问题表示抗议，它就必须强有力地把它提出来，并把它所希望采取的补救行动作一番描述。用哀伤的语调最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反应；它使人认为，抗议只是为了记录在案。它使违反协议的国家在国内没有改弦易辙的借口。当这是一个在政治上很敏感的问题而政策又不容易改变时，这就特别重要。八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贾林宣布开始和平谈判，其成员包括以色列、埃及和约旦的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埃及断然拒绝了我们对违反协议的指控。开罗所持的立场是，认为它的行动与它对协议的理解是一致的；它将不把额外的导弹引进该地区，但是保留“轮换”

它们的权利；它将不建立新的导弹发射场，但是保留"维护"和"修理"现有的导弹发射场的权利。开罗认为，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并且还认为美国人把军火供应给以色列，这是与罗杰斯所作的保证以及停火协议背道而驰的。

在这个时候，我告诫总统说，我们把以色列人对我们的全部信任都放在一边，只是为了在谈判开始之前达成停火协议。而这些谈判肯定甚至会把根深蒂固的意见分歧带到桌面上来。苏联人和纳赛尔可能会"想入非非地认为我们愿意默认他们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尽管我们对他们直接进行过警告，并对以色列许下过诺言。这对我们当前在中东问题上的倡议，中东在长时期内的一般前景，以及美苏关系，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采取一项较为强硬的路线来反对违反停火协议，并使苏联人明白他们所承担的责任，这是十分必要的。

过去十八个月所形成的特殊的外交程序，以及罗杰斯和我个人之间的对立，使得合理地讨论这些问题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尼克松喜欢通过他的助理们而不是通过他的内阁进行工作，只要白宫的确控制得住局势，这还是能够勉强对付下去的——如果不嫌气氛紧张的话。但是当极为微妙的谈判不在白宫的控制之下，这个制度的弱点就变得突出了。国务院对总统的思想不很了解，无法鞭辟入里地执行其政策。它倾向于把事情纳入其偏爱的轨道，并把总统的指令解释成为适合其先入之见的东西，这就把事情搞得更糟了。因此，也不可能在有把握理解和实行总统指令的思想基础的情况下，草拟这些指令。

如果我和罗杰斯之间的关系较为融洽，我还可以充当一个调解人。但是，到了一九七〇年夏天，罗杰斯知道得很清楚，除了中东问题外，几乎在所有问题的重要决定上他都被排除在外了；要不然，他就是很迟才被邀请进来，以致他只能认可而不能参与决策。

诚然，罗杰斯一定会注意到，总统的许多决定，都是在他出国访问的时候作出的，这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他的自尊心又不允许他承认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他的老朋友总统的身上。因此，他就责备我。他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尼克松不信任国务院，希望一些微妙而敏感的事都由白宫单独来处理。但是，由于我的存在，使这种双渠道的做法成为可能。我很愿意挺身而出，同我的小工作班子一道去解决难题，而不需要各政府机构间进行什么联络工作。罗杰斯对这种做法很恼火，显然，这是由尼克松煽动起来的；同样明显的是，我是助长这种做法的。罗杰斯和我都没有这种气量设法走出一条我们应该认识到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死胡同。如果我们愿意克服我们那并非不严重的利己主义，我们本来可以弥补彼此之间的不足。当然，即使如此，在政策和策略问题上，我们还会存在着许多意见不一致的地方。

中东问题并不是罗杰斯被授权和负责处理的唯一的问题。而中东停火看来象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是尼克松政府在外交政策中的第一个无可争辩的成就。完全可以理解，罗杰斯是不愿意面临这项成就可能遭受失败的前景的。对于白宫任何一点干预的暗示，他都非常敏感。他把我的关心看成是企图夺取他的荣誉。西斯科被夹在中间。他表现得很勇敢，设法在两种对立的、有时是势不两立的观点之间，选择自己的航道，并对国务卿和总统都保持忠诚。他常常把船稳住了，但是，他无法使船有一个明确的前进方向。

只有总统能够掌握航向，但他已决定在中东问题上不依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班子，而且也不信任国务院这个机构，因此他就没有可以赖以持续地执行政府行动的工具。他对于处理他的顾问中所产生的矛盾经常用的办法是拖延。在白宫所控制的工作领域内，这还不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在总统不得

不作出决定之前，我还能够设法应付几下子。但是在中东的这个易动肝火的问题上，采取这样的办事程序，就有措手不及的风险。由于尼克松每年照例要到圣克利门蒂去逗留几天，这样危险就更加甚了，因为这减慢了所有要总统来解决的问题的运转步伐。加之，尼克松还没有认真严肃地考虑他是否应亲自过问和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这个问题。

八月二十五日，在圣克利门蒂，总统、罗杰斯、西斯科和我举行了一次会议，罗杰斯指责我对于违反停火协议这个问题揪住不放，企图制造一次危机。因此，会议没有结果，不欢而散。但是否认产生危机的事实，或者指责带来坏消息的人，都不能避免一场危机的发生。到八月底，事情开始按照它们自己的逻辑发展；正因为我们佯称可以通过不遗余力地表示善意，以拖延作出决定的时间，我们就处于失去作出决定的回旋余地的危险中。

八月八日，美国在给苏联人的一封信中通知他们说，我们将用U-2侦察飞机对停火进行监视。苏联人在八月二十八日抓住这个机会，明显地在这场争端中站到了纳赛尔一边。（当时我认为那封信是一个错误，因为这将鼓励苏联人主张为监视协议的执行而采取必要的行动。一般来说，在外交行动中，当我们还不准备接受很可能得到的回答时，就提出一个问题，那是不明智的。）他们在分送给华盛顿的西斯科和莫斯科的比姆的复信中，在U-2飞机的飞行问题上对我们加以指责，把它描写成为“新的复杂因素”；在苏联人看来，U-2飞机的飞行是与停火协议的条文相抵触的，侵犯了埃及的领空，牵涉到“极其严重的复杂情况”，而且也是“冒了特别令人感到惊异的风险”。我向总统提出了报告，并指出，苏联人可能有充分的理由要求由主持公道的人来核实停火。如果关于违反停火协议的指控，只是以以色列人的监视为依据的话，那末苏联人和纳赛尔将会轻易地加以拒绝。

到八月二十九日，国务院的情报研究局局长雷·克莱因断定，在运河地区三十公里范围内现在已不只是存在一个SA-2导弹发射场——对此，我们在上星期已提出了抗议——而是七个或八个SA-2导弹发射场，以及三个或四个SA-3导弹发射场。根据他的判断，几乎可以肯定，这些大多数导弹发射场，都是在停火协议开始生效后建造的。八月三十一日中央情报局的一份估计也证实了这些判断。

现在，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罗杰斯、穆勒、莱尔德、赫尔姆斯和我——不得不召开一次会议。会议于九月一日在圣克利门蒂举行。总统指示，在开罗和莫斯科都发出非常强硬的抗议，他要求以色列派一名代表出席在纽约由贾林主持举行的会谈。九月三日，国务院公开证实了违反停火协议的事实。这一次不那么含糊其词了，但措词还是相当克制的，表示我们只通过外交渠道来处理这件事；与此同时，国务院一个劲儿地催促贾林召集的会谈赶快开起来。

埃及和苏联两方面都继续拒绝我们的抗议，九月四日，开罗否认指控，与此同时，还反对我们不断地给以色列以军事供应，认为这与我们所说的保证克制不相一致。九月六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维诺格拉多夫告知比姆说，苏联并没有和美国缔结停火协议，因此，对任何违反协议的事不负责任。维诺格拉多夫指出，美国为了监督停火作了“奇怪的安排”，没有得到埃及方面任何请求，就飞越西奈半岛上空，侵犯了埃及的领空。大约在同一个时间里，苏联代办在华盛顿递交了一封信，信中对于据称以色列即将对导弹发射场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表示关切。苏联人要求我们采取步骤对此加以制止。我们没有掌握这样的证据，我认为这是苏联长期以来要把我们置于守势的努力的一部分。我通知西斯科把这个警告不加评论地转达给以色列，但不要让苏联人知道他已这

样做了。让他们充当阿拉伯人的保护人，从而在开罗得分，那是没有道理的。

以色列谢绝谈判

经过这场争论和违反协议的事情之后，毫不奇怪，以色列于九月六日宣布，它不能参加贾林所主持的解决争端的会谈。加之，九月六日，巴勒斯坦游击队劫持了三架飞机。在一个月之前开始走向和平的一步，突然发展成为一场对抗的局面。我倾向于同意我的工作班子中的苏联问题首席专家哈尔·索南费尔特的观点——他在当时和以后都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合作共事者——他于九月份给我送来一份分析材料，把这次事件与古巴的导弹危机相类比：

……我深表担心的是，在当前的中东形势中，我们可能（无意地）使苏联人误以为，在停火问题上搞点欺骗动作，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而且我们还可能加深了一场潜伏着的更为深刻的危机……。我们停火倡议的性质、提出倡议的时机和速度，条文的相对松散，整个倡议不够完善，我们起先不愿意对违反协议的事作出让步，后来在违反协议的事开始之后我们又发表了一些声明和采取了行动；这些都可能促使苏联人得出结论说，对于我们来说，最关重要的是在选举前的一段时间里实现停火，在这段期间，我们不希望面临继续进行公开战争这样一种棘手的选择。……后来我们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明显地表示了真正的愤慨，这使得他们大吃一惊（与此同时，他们为阿拉伯联邦共和国和他们自己继续违反协议的行为大开绿灯，从而使他们的威信遭受损失）。或者，他们可能甚至还会认为我们只是在演戏而已。

与此同时，我的工作班子中的中东问题专家哈尔·桑德斯向我提出报告说，我们在九月初提出抗议后，苏联人和埃及人违反协议的事实际上是加剧了。桑德斯是第一流的分析家和客观公正

的顾问，并不是以反阿拉伯的偏见而著称的。但是，他写信告诉我说，在我们九月初在莫斯科和开罗采取的外交行动之后，根据U-2 飞机所拍摄的照片：

> ……看来很明显，埃及人在继续进行萨姆导弹的活动，这是违反停火协议中停止一切军事活动这一条规定的。他们没有采取行动来恢复或调整到我们所抗议的二十四个导弹发射场前的形势。……自从八月十日以来，我们至少看到装备齐全的萨姆导弹发射场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活动还在有增无已……沿运河建立起来的防御性导弹设施，对于埃及人来说，似乎比和平谈判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以色列人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他们在停火前的形势没有得到恢复之前，不能继续谈下去。……

即使在当时，还有头脑顽固的分析家，编造适合他们胃口的事实，决心要想恢复和平倡议。国防部的一位富有想象力的专家提出这样一种离奇的理论，说什么或许纳赛尔根本没有违反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规定。他认为，并不排除有这样的事情，即：在停火开始生效之前，这些导弹就已隐藏在五十公里地区之内，只是在以后才显露出来。这些导弹并不是被“引进”这个地区的，因此并没有违反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规定。但这种高明的推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当允许埃及人进行部署的时候，他们却把导弹隐藏了起来；而当禁止他们进行部署时，他们又将它露出地面来。通过飞机所拍摄到的照片也没有发现大到足以能装得下这么多物资的导弹棚架或仓库，而把它隐藏在沙地里就需要有金字塔这么大的一个孔穴。

事情已无可挽回，到了九月中旬，我们的倡议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在这场交易中，我们满足了自从三月以来就被搁置起来的以色列人的军火要求。我们增加军火供应的结果，与其说是赢得以色列

在和平谈判方面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不如说是阻止他们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进攻，以制止埃及人把导弹向前推进——这是我们自己无法加以制止的。我们并没有因此在以色列赢得赞誉，而且还加深了阿拉伯人的不满。苏联人在埃及建立起了一支已经威胁到以色列生存的战斗部队，这支部队对于以后和纳赛尔串通一气，反对任何温和的阿拉伯政府将是有用的。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并没有能控制事态的发展，它们随着事态的发展而发生，而且往往似乎是被事态的发展所压倒。最大的危险在于：苏联人明显地误解了我们的坚定性。

几乎不可避免的是，更大的危机于九月份降临到尼克松政府身上。我们同时面临着几个问题：约旦的内战，苏联企图在古巴建立一个潜艇基地以及智利的阿连德政府上台。这既是新政府的最危险的时期，又是新政府的决定性的时期——局势比入侵柬埔寨时还要危险得多，尽管后者引起了一阵歇斯底里的攻击和受到了新闻界的重视。只有在我们战胜了这场风暴之后，经过一年半的苦心经营，我们的全球外交政策的各个组成部分，才逐步完备起来。

第十五章

多事之秋：约旦

在一九七〇年九月的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有三大危机降临在尼克松政府头上，它们发生在相距数千里的世界上的几个角落里。

这三大危机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第一次危机是发生在一个沙漠王国里——约旦——的内战，交战的一方是王国政府，另一方是企图取得进攻邻国的基地的武装游击队。第二次危机是苏联突然企图在古巴的西恩富戈斯建立一个核潜艇基地，这可能引起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第三次大危机是南美一个大国——智利——的总统选举，引起与共产党人联合的激进分子可能接管政府的危险。这些事件的起因，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相同的，它们在美国政策方面所引起的关注也是不相同的。然而，这些事件却代表着——或者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代表着——共产党人的全球性挑战的不同的侧面。没有共产党人的策动和鼓励，这三次危机都不可能成功。苏联在军事上进入埃及，而且它煽动阿拉伯的激进分子，这引起了约旦的危机；苏联在古巴的海军基地是一次苏联的直接挑战；而智利的选举，尽管情况还不清楚，却说明一个国家在历史上首次通过民主程序有加入到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可能性。

约旦危机

有史以来，中东的边界是随着流沙而变动的。在公元六二二年伊斯兰教诞生以后的五百年中，阿拉伯国家在政治建设上

曾经有过一段光荣的历史。而在以后的几乎同样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它却发现它自己是处在不同的外国统治者的支配之下。国家地位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概念，差不多是预言家脑子里的幻想，也是一场激励着狂热的信徒和英勇的行动但却是难以实现的梦想。这些外国统治者的最后一个帝国——奥斯曼帝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被驱逐出这个地区。可是，接替它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如像许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相反地，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东在欧洲列强的保护下，分裂成为若干个半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各自在为争取独立而斗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后来它们全都赢得了充分的主权。

哈希姆约旦王国就是这些国家中的一个。哈希姆约旦王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叫外约旦，它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一个国家，*当时国际联盟给予英国以委任统治权，管理巴勒斯坦——那时的巴勒斯坦包括从伊拉克直到地中海的所有的土地。一九二一年，英国从其委任统治地分割出一块渺无人烟的沙漠地带，为和英国站在一边的哈希姆小酋长国创建了一个王国，因为这些小酋长国在别的地方的希望都落空了。就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一些有才能的统治者和勤劳人民共同建立了约旦人的国家。而且从它建国之日起，它在中东就成为一个克制、进步和稳定的因素。由于巴勒斯坦的分治，哈希姆王国的统治延伸到了约旦河的西岸。它在这里以其特有的开明政治治理国家，直到它出于过分地讲阿拉伯团结一致、以致卷入到一九六七年的纳赛尔的鲁莽的冒险活动为止。**结果，它那人口稠密和土地肥沃的约旦河西岸就被以色列占

---

* 一九二一年，英国以约旦河为界，把巴勒斯坦分成两部分，西部仍称巴勒斯坦，东部称外约旦，英国在外约旦建立了在它统治下的外约旦酋长国。——译者

** 这是指第三次中东战争，也即“六·五”战争。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和苏联的纵容下，对阿联、约旦和叙利亚发动战争。六天之内以色列占

领了。

阿拉伯游击队——从多次阿拉伯和以色列战争中流亡出来的巴勒斯坦难民——在约旦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组织，特别是在一九六七年以后，他们建立了牢固的基地，并从这里对以色列和以色列所控制的土地发动了袭击。另外，代表最激进的阿拉伯政权的一万七千名伊拉克军队，仍驻扎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中保存下来的约旦东部。国王侯赛因如果把上述两股势力中的任何一股从他的国家赶走，就会被斥责为缺乏"阿拉伯团结精神"。这些激进的武装力量的存在，既说明了在纳赛尔时代阿拉伯激进主义的抬头，也使侯赛因的权威长期处在虚弱的地位。阿拉伯游击队和伊拉克人在施行他们的威力方面也毫不手软。游击队不顾为约旦带来的风险，袭击以色列；伊拉克人也在约旦境内进行军事调动。

约旦军队是传奇式的阿拉伯军团的后代，这个军团是由英国约翰·格拉布爵士将军（格拉布帕夏*）在四十年代训练出来的。这支军队大部分由狂热地效忠于侯赛因国王的贝都因人**组成。但是，在一九七〇年，这支部队发现它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要保护国王侯赛因，对抗阿拉伯游击队员（和伊拉克人）；又要保卫约旦领土，防御由于阿拉伯游击队袭击以色列而引起的以色列人的报复。约旦（以及六年之后的黎巴嫩）理解到，收容游击队的国家要冒很大的风险。他们是经常处在不能控制自己命运的危险之中，因为别人在决定着他们的战争和和平的问题。实际上，如果游击队成长为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他们早晚要取代东道国政府的权力。

领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西奈半岛、戈兰高地等大片土地，阿拉伯国家战败，被迫接受停火。——译者

* 帕夏是当时土耳其等高级军官的头衔。——译者

** 贝都因人是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译者

到一九七〇年夏季，这位年轻、能干而有胆识的国王是处在严重的危难之中。游击队对于他努力促进和以色列人在政治上解决问题感到极为不满，因而就不断地对他的军队进行袭击。六月九日，曾阴谋要暗杀他。侯赛因免去了他的军队中若干领导人的职务，并亲自出来担任指挥。但是，他不愿意得罪巴勒斯坦人。因为这些人在一九六七年以前曾在他的统治之下，并希望和约旦王国重新联合在一起。安曼的情况在恶化。六月十一日，我向尼克松提出报告说，我们的临时代办（我们的新任大使迪安·布朗当时还没有到任）认为“局势已陷于崩溃”。我们驻安曼大使馆已奉命撤退眷属和非必要人员（如果全都决定要撤离，大约有四百人）。

就在同一天，我召开了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这是我们应付危机的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构。我们面临着两大紧急事件：第一，撤离美国人员，如果必要，则使用军事运输工具；第二，如果侯赛因请求援助，以使他的政府有能力对抗阿拉伯突击队，或者是来自伊拉克或叙利亚的外来干涉，而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甚至比纳赛尔更加激进和更加亲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作出什么样的答复。

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关于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是否明智，而且是否实际可行，意见很不一致。如果约旦军队对机场失去控制，那末撤退美国人员就可能需要空运一些部队去保护，对于这个前景，不管是政治领导人也好，军事领导人也好，都没有很大的热情。如果国王请求美国进行干预，以保证他的统治能继续下去，那末，问题就更大，阻力也更大，甚至制订应急计划也有点犹豫不决。我们在柬埔寨采取的行动还没有结束，我们的兵力分散在世界各地，白宫周围的示威纠察线表明，我们国内存在不团结。在约旦采取军事行动，从技术上来讲也是很困难的，因为自从一九五八年在黎巴嫩登陆后的十多年以来，我们既失去了当时可供利用

的中转地区(利比亚、希腊和土耳其),也失去了利用这些地区供中东战争之用的权利。人们不愿考虑美国进行军事干预还由于,许多人认为,即使干预取得成功,也会使得侯赛因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区丧失信誉,或许等于宣判他在政治上的死刑。

如果可能,我倾向于支持侯赛因。纳赛尔一直死心塌地依靠苏联,并支持所有的激进主义运动,正如我想要设法整一下纳赛尔那样,现在对我来说,似乎同样重要的是要表明,和美国保持友谊是会受益的。侯赛因一直提倡温和有节制,反对激进思潮,避免空喊流行的反西方口号。他处在困难的境地之中,是因为他不愿意让游击队放手去乱干一气。他的垮台会使整个中东趋于激进。以色列不会默认在约旦边界沿线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基地。爆发又一场中东战争就会成为非常可能的事。因此,在我看来,约旦是对我们控制这个地区事态能力的一次考验。尼克松同意我的这种看法。六月十七日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

> 我们不妨假定,在夏季晚些时候,我们会接到来自黎巴嫩或约旦希望能得到援助的请求,或者,黎巴嫩出了一些事情,我们该怎么办?……有这么一天,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可信赖的程度将受到考验。真正的问题将是,我们会采取行动吗?我们的行动必须根据这种观点来加以考虑。我们必须作好准备……这个问题真正是一个军事问题呢?或者是我们作为在那个地区的一种力量是否可以信赖呢?

六月二十二日,我重新召集了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利用总统所表示过的愿望,使一些计划最后得以完成。那时,迫在眉睫的危险是缓和下来了,各个部门也正在准备计划,应付他们认为不会发生的紧急事件。虽然撤退美国公民的事情还在进行,但是由于这次危机,侯赛因的地位已大大削弱。我的工作人员哈尔·桑德斯在七月初为总统起草的一份报告中,通篇尽是不吉祥的

词句："哈希姆政权的权力和威信还会继续下降。约旦的国际信誉将会遭到进一步的损害……。由于阿拉伯突击队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这无可避免地将使约旦河流域的停火遭受更大的破坏……。侯赛因面临着一个吉凶未卜的前途……。"

因此，在约旦问题上的考验时刻似乎迫在眉睫了。我们的应急计划——尽管是半心半意制订的——却帮了我们的大忙。到了九月初，星星之火突然蔓延成为一场火灾，而且几乎酿成一场遍及中东的燎原大火。

伊拉克和约旦摊牌

在各届政府的经历中，事件往往是在情报机构没有预测到的情况下发生的；说实在的，它们也许是不能预见的，因为事件的受害者，尽管最热衷于预防事件的发生，但也会感到意外。在平衡遭到破坏时，一开始是件小事，其不断扩大的波浪使它发展成为一次危机，而这种危机如不变成无法控制的汹涌波涛，就会突然转变成风平浪静的沉寂，表明新的平衡又形成了。在危机时期，构成制订政策的因素突然变得不可捉摸。在由危机引起的动乱中，政治家们一定是在经常性的压力下采取行动。说起来好像很奇怪，这种情况赋予人们的一种不寻常的进行创造性活动的能力；一切事情突然取决于控制局势的能力和澄清混乱的而且似乎是偶然发生的事件的能力。按照理论来说，这种情况的发生应该不以使用武力为前提；然而，人们有时只有威胁着要使用武力，才能避免动用武力。

有人可能会想象，处理一场危机就像人们都发了狂似的；关键的决策人物乘坐高级轿车云集白宫；神经紧张的助手们，手持刚刚收到的火急电报冲进房来，向已慌了手脚的官员提出各种问题。我

发现这种想法并不确切；当然危机时期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但是，它也具有异常平静的特点。所有日常琐事都被搁在一边，推迟处理，或者由下级官员代办。个人冲突减少了；往往由于成败关头，事关重大，以致于平日的嫉妒心理也收敛起来了。在一场危机中，只有最坚强的人才努力负起责任；其余的人都裹足不前，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事情失败就需要找一个替罪羊。许多人以一致意见作为屏障，他们不愿意拿出自己的意见；其他一些人则全力以赴地把他们的反对意见记录在案，以便事后为自己开脱。少数准备同形势作斗争的人，往往迎着风暴，从容不迫。他们的四周虽是一片动乱；但他们则在极度的沉寂中独自工作，随着危机临近解决，沉寂将转化为疲惫、欢乐或绝望。

九月一日，巴勒斯坦游击队企图在三个月内第二次行刺国王侯赛因，袭击他的汽车队，这件事在约旦激起了所有的部队大动干戈。战斗立即就在效忠国王的军队和巴勒斯坦游击队之间爆发了。伊拉克人威胁说，要动用驻扎在约旦的部队，"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保护巴勒斯坦游击队的行动"。前一天晚上，国王已经通知我们大使馆的官员，说他可能被迫采取更加剧烈的措施。国王表示希望，他可以指望美国给予支持。侯赛因认为，美国公开发表一项强硬的声明，可能会制止外国的干涉；如果和苏联共同发表一个联合声明，那就更好了。

国务院对这个信息的复电简直没有一点儿急迫感。负责的官员所关心的是要保持他们的和平倡议，不愿在一个已经装满了埃及违反停火协议行为的盘子里，再加上约旦问题。因此，他们并没有（据我所知）立即将这件事提交给白宫，或者甚至进行各机构间的商谈。相反地，第二天却发出了一份态度不明确的复电，通知国王说，由美国出面发表公开的警告，会牵涉到许多复杂的问题，必须加以慎重考虑——一纸陈词滥调，没有给那位被困扰的国王侯

赛因以什么帮助。他们起初持这种冷淡态度的原因之一是，一些中东问题专家的传统看法认为，阿拉伯人都很容易激动，以致任何一个警告都可能驱使他们采取疯狂的行动。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是把善于言词和反复无常混为一谈；在危机中，我发现大多数阿拉伯领导人都是谨慎行事和深思熟虑的。

九月一日傍晚，伊拉克发出另外一个最后通牒式的警告说，如果约旦不在夜晚十一点停止炮击巴勒斯坦游击队，伊拉克军队就将采取行动，加以制止。国王的亲信顾问赛义德·拉菲(过去在哈佛大学曾经是我的学生)通知我们的大使馆，重新提出了国王的请求，要求大国发表声明。他还向我们打听我们是否知道，如果伊拉克采取行动，以色列将会怎么办。

后面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伊拉克是最激进的阿拉伯国家，以色列绝对不可能允许伊拉克的军队向以色列的边境移动。在巴勒斯坦游击队占领约旦河流域的情况下，以色列也的确不可能一无举动。但是，对于国王来说，有以色列的武装部队加入到他的战斗行动中来，那就不是一件小事情了。他在维护其政治独立性的同时，无意毁坏他在阿拉伯世界的道义地位。关于以色列的意图问题并不是个新问题。这个问题起初是由侯赛因方面于八月四日提出来的，当时伊拉克军队以一种讹诈的姿态驻扎在约旦东部，拒绝按照规定的时间停止他们的军事调动。我们驻以色列的大使当时向华盛顿提出报告说，如果伊拉克军队向西推进，以色列有可能进行还击；他没有向以色列政府提出这个问题。国务院近东司对于这个问题三心二意，在那个时候，对于约旦提出的质疑没有加以答复。由于形势缓和了下来，答复的必要性也就暂时消失了。

到了九月，如像惯常的没有解决好的争端那样，问题又重新出现了，因此有必要对于以色列人的反应作出判断。国务院采取了

老一套的拖延做法，也许因为它不希望使对付埃及—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努力进一步复杂化。九月二日，我们驻莫斯科大使雅各布·比姆拜访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维诺格拉多夫，态度很平和地请求苏联对他们的伊拉克朋友施加影响，要他们克制一些。维诺格拉多夫装出一副很关心的样子。他说，苏联对于维护有利于和谈的条件是很感兴趣的，但是他对伊拉克的最后通牒却一无所知，因此莫斯科很难拿出一个官方的主张来。维诺格拉多夫表示了他个人的看法，认为伊拉克不会干涉约旦的事务——但是他接着又说，中东的事情，谁也无法预料。总之，莫斯科保持着行动的自由。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在整个夏末都留在莫斯科没离开这一事实，就令人毫不怀疑地认为，苏联人不想在平息局势方面投下什么本钱。因此，这件事还得用战争来解决。

九月二日，在安曼，赛义德·拉菲又向我们的大使馆提出报告说，伊拉克人进行威吓之后，没有采取行动。三天后，他又重申，对于大国发表声明，力促对方采取克制态度一事，表示兴趣。我们的临时代办反映了国务院的看法，以一项异乎寻常的声明答复了约旦重新提出的关于以色列意图的质疑；声明说，他不能想像约旦会接受其敌人以色列的帮助，来反对一个阿拉伯兄弟国家。当然，国王非常机灵，他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并且也非常聪明，不会需要美国官员就他自己提出的质疑的含义给他上课。

就在这个期间，安曼的形势不断有所好转；约旦政府和温和的巴勒斯坦游击队领导人之间开始举行谈判。九月三日，比姆在莫斯科对苏伊士运河沿岸发生违反停火协议行为提出我们的抗议。在那次谈话过程中，维诺格拉多夫把约旦的事情描述成为不好也不坏；他没有提到关于苏联为伊拉克进行调解的事。为了强调我们对约旦事态发展的重视，尼克松于九月四日在圣克利门蒂接见了我们的新任驻安曼大使迪安·布朗。

九月五日，危机似乎平息了。出现了另一个迹象，苏联人突然向我们提出警告，要以色列不要越过运河，他们说以色列人快要这样做了。（正如以前所描述过的，这也起到了转移人们对埃及人和苏联人违反停火协议的注意力的作用。）苏联人的老一套手法是，在一场他们不愿插手的危机快要平息下来的时候，发出一阵威胁；很明显，他们希望在事后给人们以一种印象，即苏联在解决问题方面起了主要作用，从而提出要求补偿。（例如，一九五六年，在英国已经很明显地作出了撤出运河的决定时，苏联向伦敦和巴黎送去一份言词严厉的警告，要求停止入侵苏伊士运河。）尽管阿拉伯突击队接管约旦的行动受到阻遏，然而国王的权力已远不能恢复如旧了。伊拉克军队仍在约旦调动，这使人很容易想起，国王在他的国家里的权威已不如往昔了。美国的态度——只限于神经紧张的说教——是模棱两可的，远没有采取任何能具体影响形势的行动，更不用说控制形势了。不管怎样，平静只是假象，实际上事态现在正像脱缰之马般地向前发展。

劫持飞机的危机

从来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说明阿拉伯突击队为什么在这个时期采取他们自己后来说成是“黑九月”这样的行动。在这个月初，纳赛尔和苏联人成功地把他们的导弹系统移到运河地区。美国正准备敦促以色列参加约旦已决定要参加的谈判，希望以色列从西岸撤退。如果一切顺利，谈判对于阿拉伯人有许多可取之处，以色列在运河沿岸的军事优势被打破了。一旦谈判开始，以色列所受到的压力会成倍地增加。但是阿拉伯突击队中的极端分子则瞩目于其他方面；他们的目标不是同以色列实行和解，而是要把它毁灭掉。他们还没有被承认是一个政治实体——在国际上他们

被当作难民看待；在阿拉伯世界，他们被当作既可怕而又要加以迎合的对象；而在以色列人看来，他们则是些恐怖分子和罪犯。他们并不追求政治解决，因为在政治解决中，他们对提出的要求要作出妥协。他们寻求建立一个由他们控制的基地，并利用这个基地，以便能够对以色列发动决定性的进攻，并把它消灭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反对在外交上取得进展的图谋是有其理由的。另一方面，巴勒斯坦人也逐渐在约旦取得了一些地盘，他们正走向自治。由于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而遭到失败，他们毁了他们自己的前途，最后被赶到黎巴嫩去了。而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所制造的危机，却给了美国一个机会来收回大部分上个月由于举棋不定而失去的东西，并且为后来几年的外交行动开辟了道路。

这场危机于九月六日爆发了，当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这个阿拉伯突击运动中最极端的一派中的几个成员，劫持了几架飞机。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747珍宝喷气客机飞往开罗机场，飞机上的乘客被释放了，而飞机在着陆后不久就被炸毁。一架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波音707和一架瑞士航空公司的DC-8飞机由阿拉伯突击队分子驾驶，开往离安曼约三十英里的道森机场的一条泥土跑道上。九月九日，一架英国子爵10号飞机也被劫持，和别的飞机一道飞到道森机场。一架以色列飞机遭到劫持，但未成功，因为机上的保安人员把劫持者制服了。

这些劫机事件牵涉到好几百名乘客，其中有瑞士人、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和其他一些人。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是以色列人和有双重国籍的人——也就是说，那些既持有以色列护照又持有美国护照的人。九月七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提出要释放除以色列人和双重国籍的人以外的所有的乘客，用来交换被囚禁在瑞士、德国和英国监牢里的阿拉伯突击队员。他们把以色列和双重国籍的乘客扣下，用来交换被监禁在以色列监牢里的游击

队员。他们限七十二小时内答复。

美国眼下所关心的是，在其他人质被释放之后，要防止美国人和以色列人一道被扣留不放。我们也不能让外国人把美国人民分成若干等级。我们知道，以色列的政策是决不向讹诈低头。它担心的是，一旦让步，就不能再囚禁游击队员了；而恐怖行为将更加猖獗。我们自己的看法也大致相似。欧洲的有关国家则认为，他们不能采取这种不妥协的态度。我们敦请他们至少办交涉要一致行动。

九月八日，罗杰斯在他的国务院办公室里召集了一次晨会，应邀参加的有莱尔德、赫尔姆斯、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乔·西斯科和我。

在第九章中已经讨论过关于 EC-121 飞机被击落一事，也提到所谓的"情况室综合症"，其中有时包括这样的指责，说官员们制造一些危机，以便实现他们在军事上的英勇和男子气概的浪漫主义的想法。这完全是一派胡言。首先，正如我已经谈到过的，情况室并不舒适，布置得并不雅致，而且实际上空气是很沉闷的。再者，这里的讨论往往是高度技术性的。由于附近就有最先进的通讯设备，那些在情况室里商议事情的人，都能立即获得最新情报。因为他们一般都是内阁的下级官员，很有可能通过系统地分析，作出一些决定，然后送交上级机构进行审议。

轻率地作出决定的危险并不出在这里，而是出在椭圆形办公室、内阁会议室或者是内阁成员个人办公室里召开的特别会议上。那里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把听起来似乎有理的事，误认为是真理，滔滔不绝的讲话压倒了冷静的分析。就在这里，在没有工作人员从事具体工作的情况下，可能会作出没有事实根据的决议，在这说话需要精确的关键时刻，有些人说话只是为了哗众取宠，而不是在说明事实真相。这里比情况室更使人易于根据短暂的和表面的

意见一致来批准没有经过检查的设想，这里既存在无所作为，也存在不顾一切后果的危险。头头们不能真正地了解他们提出的建议会带来什么后果，除非用作战中的专门术语来说明才行。

在罗杰斯办公室里开会的情况也是这样。不切实际的想法支配着漫无头绪的讨论。譬如说，人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讨论用某种神经毒气对付飞机劫持者的可能性，这种神经毒气能使中毒者在不知不觉中瘫痪。由于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军火库里有没有一种合适的毒气，这就使得他们无法讨论下去；同样地，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去施放这种毒气；特别是如何组织军事行动或者如何维持这种军事行动。罗杰斯在会议结束时所得到的信念和他召开这次会议时的信念一样——没有办法。动用美国部队在军事上是行不通的，侯赛因不会采取军事行动来反对巴勒斯坦人，而以色列的干预可能成为侯赛因的催命符。

在下午召开的有总统参加的一次会议上重复了同样的论点。莱尔德、罗杰斯、约翰逊、西斯科和我都出席了，一道出席的还有J·埃德加·胡佛和约翰·米切尔，他们谈到了劫持飞机在国内产生的影响。总统没有作出决定。他早先曾私下对我说过，应把劫持飞机当作摧毁阿拉伯突击队的一个借口。在这次会议上，他没有发表这样的意见。他倒是说过，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宁肯美国出面进行军事干预，不要由以色列人来干。罗杰斯表示反对，他说我们将为一个实质上是无益的行动付出巨大的代价。

总统转而问我，我回答说，我们面临着两个问题，即人质的安全和约旦的前途。如果阿拉伯突击队能够利用约旦作为他们的主要基地，并在这个过程中破坏了国王的权威——他是这个地区少数几个以温和和亲西方著称的统治者之一——则整个中东将会走向革命化。在我们提出和平倡议后的两个月，运河沿岸的军事平衡，可能会由于欺诈行为而被改变；也就正在这个时候，沿约旦前

线的政治平衡也会被武力所破坏——我们不能够对此加以默认，站在圈子外面干着急，搓着手叹息，一个劲儿地主张恢复和平谈判，从而表明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由于没有人急于想对付这种分析所牵连到的复杂情况，讨论便转而谈到防止劫持的问题。梅尔文·莱尔德谈到将来利用电子装置来保证机场的安全。总统下决心说，他赞成既要使用武装警卫，又要使用电子装置；他转而要我"协调"这个困难的尝试，并要求莱尔德担负起"主要责任"。他指示罗杰斯加紧提出外交倡议。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对此正感到困惑不解的时候，就在会议结束后十分钟，尼克松走进我的办公室，并说，他认为我们有一个"可怕的官僚主义问题"；所有的内阁官员们都希望要"干点什么"；他就让他们每个人都有点事干；我应该想出个办法来。他没有说如何做到这一点，或者甚至他到底打算做些什么。

与此同时，我们收到来自安曼的令人不安的报道。据说，约旦军队由于受到他们认为的阿拉伯突击队的侮辱和挑衅，实际上已在举行兵变。他们效忠于国王，但是拒绝作进一步的妥协，他们威胁着要为了国王的利益自己来处理这些事。要求侯赛因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的压力越来越沉重地加在他的身上了。

由于得到了总统的批准，并要结束这场官僚主义的混乱局面，我于九月九日把国家安全委员会处理危机的机构开动了起来。在那以后的十七天里，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每天开会，而且至少每天开一次会，讨论可供选择的方案，准备应急计划，并在一个互相协调的基础上执行各项决定。这不止是个程序性的步骤，它是对官僚机构的一个警告，如果约旦形势恶化，不能再像过去在违反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协议问题上那样摇摆不定了。我担任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主席这一事实就是一个警告，即任何得不到解决的争端将会被提交尼克松。

在一次危机中，总统是个关键性人物。他亲自过问整个进程，以推动作出最后决定；可是他又不应该过分地陷入到细节中去，以致忽视对可供选择方案的彻底研究。在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时，肯尼迪明智地把自己置身于初步的讨论之外。尼克松在一九七〇年的约旦危机中，以及几乎在他的总统任内的所有其他危机中，都遵循了同样的做法。事实上，在这种形势下，他的才智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他并没有紧张地干预战术性的细节问题，或者正在形成的构思，借以装得好像是在行使总司令的职责。他把这些方案的拟订工作交给了在我照管之下的政府机构。在他表态之前，他总是犹豫不决的，有时到了令人恼火的程度。但是，他很会选择时机，他本能地懂得，什么时候最适宜于作出决定，这时他就果断地采取行动，特别是，如果他能够置身于过多的个人矛盾之外的话。

在约旦危机的开始阶段，我每天至少给总统送交一两份、有时三份形势报告。这些报告所提供的材料包括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建议、安曼事态的发展以及有关释放人质问题谈判的进展情况。由于有关单位都参加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可以认为，全部报告都到了内阁有关官员的手中，他们当然有机会向总统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在危机紧张阶段——特别是最后三天——尼克松每天召开主要负责人会议来审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建议。

九月九日，主要的问题是要确定一个方针。在我看来，一项成功的政策必须至少由三个部分组成：一项仔细的分析，以便确定实际的选择范围；细致的准备工作以及早日采取主动。在危机中采取消极态度会使人越来越无能为力，因为人们是被迫对争端作出反应的，而且是在情况变得对自己最不利的时候。与此相对比，采取主动的一方能够使对手的精力都花在进行分析上面。由于对手总是往最坏的方面设想，甚至较小的行动也会起到重要的警告作

用，除非这些行动是非常明显地虚张声势，以致引起人们的鄙视。为了取得最好的效果，人们的行动必须坚持不懈，必须表现出坚韧不拔和坚贞不屈。犹豫不决或者慢慢吞吞会招致别人采取相应的行动来考验你的决心。

九月九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从上午十一点三十分起在白宫的情况室开了一个小时的会。情报部门介绍的情况表明，关于人质的期限延长了，但我们还不知道会延长多久。我们一致同意，美国必须施加压力，防止欧洲国家企图去单独打交道；而这将使得他们别无旁的选择，只有向劫持者屈服。这将使美国陷于孤立，除了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外，没有办法来使我们的公民获得自由；而以色列认为——和我们一样——向恐怖主义者的讹诈屈服是决不可能的。实际上，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那位干练的代表安德烈·罗查德——正同巴勒斯坦人进行谈判——和我们持有同样的看法。他给有关政府递交了一份照会："如果出现巴勒斯坦人不予合作而不释放人质的情况，本委员会将被迫放弃委托给它的任务。"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防止谈判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在我看来，我们就必须表明我们的决心，并开始施加压力。采取有气无力地责骂几句的态度，只会延长我们忍受痛苦的时间。对于人质的命运以及国王的生存来说，美国的决心同样都是事关重大的。实际上，国王和人质的前途已经开始令人难以理解地结合在一起。如果成百个人质在约旦的土地上被杀害，那末约旦王室威信的下降就将成为世界上有目共睹的事。每次接踵而来而又没有得到解决的危机，都进一步削弱了侯赛因。事态正在发展成为摊牌的局面。不是无计可施的侯赛因对阿拉伯突击队采取军事行动，就是阿拉伯突击队推翻他。

在解决这个难题之前，没有任何和平倡议会取得成功。以色列决不会和一个不能控制其国家的政府讨论边界问题。由于每个

人都认为营救人质的行动只能留作最后一着，我列举了需要作好准备来对付的三种意外事件：阿拉伯突击队袭击人质，需要作紧急营救；安曼的秩序遭到完全破坏，需要撤退美国侨民；侯赛因和阿拉伯突击队之间进行摊牌，可能会把叙利亚和伊拉克都卷进来。对我们的军事能力进行分析后表明，我们只有四个旅可以很快地调到约旦，而这样行动将要动用我们所有的战略后备力量。调动驻在德国的那个旅需要四十八小时，从美国调动第八十二空降师需要七十二小时。用这些部队进行干预，将需要取得飞越别国领空的权利，或者是在地面上通过别的邻国的权利。我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二十四小时内提出计划，以加强欧洲驻军的戒备状态；研究一下美国长期在约旦作战的实际后果，每次危机需要动用多少部队，以及遏制苏联干预所需要作的有关部署。

与此同时，有必要通知各个方面，我们在认真对待这件事。尼克松下令第六舰队航空母舰"独立"号东驶，就停在黎巴嫩的海岸以外，四艘驱逐舰随同前往，二十四小时后再派二艘驱逐舰参加。六架C-130运输机停在土耳其英瑟利克空军基地，供撤退美侨之用。这些措施是在没有公开宣布的情况下采取的。我敢说苏联的情报机构可能由于美国国防部泄露出去的情报帮了他们的忙，将把这些消息公布出去。我们一声不响会使他们感到这些措施带有不祥之兆的味道。

当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考虑这些部队在什么情况下才动用时，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了。当好几十万美国人还在东南亚作战时，谁也不乐意再在别的地方搞军事行动。我们必须调动我们全部的战略后备力量，并空运给养。我们将在别的地方容易受到苏联的突然袭击。军事行动将很难继续坚持下去；我们的供应线很长，而且还必须穿过好几个国家。战争打的时间越长，我们的处境就会越复杂。如果以色列依靠自己的力量对约旦进行干涉，

我们就会为了不同的目标而同时在约旦进行作战。如果我们陷入困难的境地，我们可能还得请求以色列来帮助我们摆脱困境，这对于我们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和威信来说，甚至就更加糟糕了。

基于所有这些理由，我认为，为了我们的长远利益，有必要把我们的军事行动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区分开来。我的看法是，在撤退美国侨民时应该动用美军，因为这件事可以速战速决，而且也是代表美国的切身利益。但是，如果由于伊拉克或叙利亚的行动挑起一场较大的冲突，我主张让最直接有关的国家担负起主要责任。由于我认为以色列几乎肯定会对伊拉克或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作出反应，所以我认为在那个意外事件中能够最有效地利用我们的力量的地方，还在于阻止苏联干涉以色列。围绕着这些问题，人们的意见逐渐趋于一致。

我向尼克松提出了报告。他仍旧坚持他早先的看法，要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只有美国出面；他想要我们单独采取行动来对付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干预，或者是对付阿拉伯突击队的动乱，要把以色列排除在外。

当总统安全事务顾问与总统的意见不一致时，他的地位是非常微妙的。总统必须有这样的信念，相信他的顾问将按照他的意思行事，并保证使他的愿望会由各个政府部门加以贯彻执行。另一方面，如果他的命令是带有危险性的，他又必须指望顾问向他提出警告。这对尼克松来说特别重要，因为他容易在一时冲动之下宣布命令，而他又不希望这些命令得以贯彻执行。在约旦危机中，我同时准备两种应付意外事件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方案体现了总统的意愿，由美国单独采取行动；另一个方案则反映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一致意见，美国应该高举反对外来干涉的旗帜。这样，在需要总统作出决定的时刻到来时，他将能够进行选择。

九月九日，苏联代办尤里·伏龙索夫通知（通过西斯科）

我们说，他们已竭力劝说约旦和伊拉克采取克制态度。然而，苏联的规劝语言是很难指望能扑灭战火的。莫斯科告诉阿拉伯人说，节制政策很有必要，因为他们之间发生了冲突，只会帮助他们的敌人，特别是"以色列侵略者和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这是对我们的粗野的辱骂。在我看来，克里姆林宫是在玩弄约旦危机这张牌，正如它玩弄过停火协议这张牌一样。他们表面上在一本正经地唱高调，但对扭转走向危机的趋势，却没有作出任何建设性的努力。苏联通知约旦说，它把我们看作是阿拉伯人的敌人，这是对约旦的传统政策的基础进行攻击。把这样的外交文件送交国务院而不缓和一下其中的语气，这也是一种挑衅。莫斯科显然还不认为，它是在冒一场严重的风险。

九月十日下午，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再度开会。巴勒斯坦人这个时候已改变了他们的要求，部分是由于我们设法保持住了联合阵线的结果。英国、瑞士和德国表示，只有在所有的人质被释放后，才同意交出被监禁的阿拉伯突击队的俘虏。巴勒斯坦人于是建议用所有的妇女、儿童和患病的乘客来交换被扣留在欧洲的阿拉伯突击队员；而所有的男人则要用那些被扣留在以色列的所有的阿拉伯突击队员来赎回。

我们加速制订我们的应急计划。一旦政府各个部门知道白宫的态度是认真的，当他们认为这种行动方针是风险最小时，他们往往可能会想出你所想象不到的行动方案来。在九月十日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上，海军上将穆勒报告说，以前所一致同意采取的戒备措施，使我们在欧洲驻军作出反应的时间几乎减少了一半。他调集了两艘潜艇，并把它们派往地中海去尾随苏联的舰队。在克里特岛以外举行的两栖演习订于九月十四日结束。参加演习的部队，包括一支海军陆战队，可以停留在黎巴嫩沿岸一带，如果危机继续没有解除。我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一下美国是否能够和如

何能够在约旦维持一项军事活动，如果总统想要按照他的意愿由美国单独采取行动。我知道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是反对这样一种方针的，但是我并不希望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总统在“我们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事情……”的情况下就发布命令。赫尔姆斯认为，侯赛因由于害怕叙利亚或伊拉克进行干预，很可能要设法避免和阿拉伯突击队摊牌。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说：“那将意味着他的末日。对于他来说，不通过战斗，他就无法重新取得控制权。”我认为，即使政府和阿拉伯突击队之间达成了一项新的休战协议，对抗也还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项争议，事态的进展将很快地提供答案，因为不需要在抽象的讨论中加以解决。我们做了可能做到的事，来迎接即将来临的风暴。

九月十一日，前两天的戒备措施开始收效了。有关美国舰队调动的传闻被安曼的谣言公司解释成美国即将出面干预。红十字会代表罗查特报告说，“古怪的紧张气氛”笼罩着阿拉伯突击队总部。他认为，他们很可能要采取某些行动来表明他们不会被吓倒。所有的飞机周围都拦上许多铁丝网，以免被炸，但作为人质的乘客已被转移走了。到了这天晚上，我们的威吓不无效果，这已经很明显的了，当时阿拉伯突击队释放了八十八名人质，其中有些美国人（但是没有具有美、以双重国籍的美国人）。

这一天，在对待危机的办法上，我与罗杰斯之间的意见分歧尖锐化起来。罗杰斯认为有必要让那些神经紧张的敌手放心，我们是无意伤害他们的。我的看法则相反，认为我们一旦进行对抗，坚持到底是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行动方针。罗杰斯认为平静一下气氛将有利于解决问题；我深信，促使人们寻找迅速解决的办法的原因恰恰在于：危机可能使局势变得无法收拾。这时，罗杰斯向国会领袖们作了情况介绍，所持的论点还是三天前和总统谈话时的论点一样，即：我们考虑了一切可能用来营救人质的军事措施，结论

是：没有办法——因此，军事行动的冲击无效了，而原来安排这些军事行动恰好使人得出了相反的印象。幸运的是，巴勒斯坦人相信的是我们的行动，而不是我们的语言，他们可能把国会的情况介绍会看成是对他们的欺骗。

那天早晨，总统、莱尔德、罗杰斯和我在椭圆形办公室会晤国会领袖。我突然被激动得发了狂似的西斯科叫出了会场，他带来了一份报告，上面写道，由于第六舰队威胁性的行动，巴勒斯坦人威胁着要杀害尚未释放的人质。我们尽快结束了和国会领袖的会晤，没有引起惊惶失措。总统要罗杰斯和莱尔德留下来，并把西斯科叫了进来参加我们的讨论。西斯科和罗杰斯强烈要求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明确表示美国将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我表示反对。向阿拉伯突击队再次提供保证只会怂恿他们蛮横地进行威胁，提高他们讨价还价的地位，并给我们自己今后如果要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行动留下了难题。相反地，我主张通知阿拉伯各国政府，说明杀害人质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尼克松支持我的建议。

结果，我草拟了一份经过细心推敲的含糊其词的声明交给龙·齐格勒去宣读，这个声明只是提请人们注意红十字会发表的声明，后者宣称：我们没有“打算”采取军事行动。这是一份作怎样解释都可以的声明。西斯科和我又给阿拉伯各国政府起草了一份关于人质问题的警告性照会。尽管发这份电报是总统命令的，电文内容也是经他批准的，但国务院的阿拉伯问题专家最后还是出来进行干预。他们认为这种威胁可能恰恰触发容易被激怒的阿拉伯人走向我们原来意图的反面。我没有坚持，并劝告总统不发也就算了。当时不是为了一份电报展开剧烈争论的时候。事情取决于行动，而不是言词。

经过总统的许可，我通知海军上将穆勒，第六舰队不必过分小心，不妨使用自己的无线电通讯。这样一来，苏联很快就会知道我

方舰队的行动；我们用这样一种方式来传送警告，比用外交照会要厉害得多。九月十二日，巴勒斯坦人炸毁了三架机上无人的飞机，在公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们继续把人质扣留在安曼几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尼克松和我谈到，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得把应急计划付诸行动。我提醒总统说，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中各个部门的一致意见认为，美国地面部队最好是用来供作撤退侨民之用，但是，万一国王和伊拉克部队支持的阿拉伯突击队之间进行摊牌，我们应当让以色列打头阵。总统仍旧不愿意让以色列插手；他希望由美国地面部队来应付这两种意外事件。当时，我们没有必要急于来解决这些分歧。但是，由于尼克松的意愿确有其现实上的重要意义，我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上提请调动更多的美国部队进入这地区，而且速度要比在其他地区更快些。

九月十三日至十四日，我们最关心的是，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至少是德国人、可能还有英国人，将不顾在谈判中的联合阵线，而着手为了自己的国民单独地打交道。巴勒斯坦人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是将把美国人质和以色列人质一样对待，这种担心就更加剧了。苏联的军舰开始尾随黎巴嫩海岸以外的我国第六舰队；不过就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对比而言，压倒优势显然是在我们这一边，而且这种优势还在与日俱增。自从九月九日以来，我们和苏联没有进行过外交接触。克里姆林宫似乎认为，对它最有利的方针就是，站在局外观看约旦王国的分裂和美国日益窘困的处境。

事实证明，苏联的这个算盘是打错了。每次危机总有这样一个关口，其中一方必须决定，究竟是占了一点上风就住手，还是继续赌下去。如果苏联在九月十日左右敦促释放人质和执行停火协议，阿拉伯突击队的收获本来是会很大的；国王的威信将会大大削弱。约旦的不稳将会使苏伊士运河沿岸的不安全状况更为严重。苏联的威信将会显示出来，并得到提高。但是，由于苏联人越来越

贪得无厌——没有在约束其代理人方面助一臂之力——他们在力量均势发生根本改变之前给了我们恢复平衡的机会。

九月的第二周周末，巴勒斯坦人毁坏了全部的四架飞机，但是既没有从美国方面也没有从以色列方面取得根本性让步。我们的语调越来越坚定；尤其是我们几乎每小时都在这个地区增强我们的军事力量。在这个时刻，不知道是因为我们的准备措施给他以心理上的鼓舞，还是因为他已濒临绝境，顽强而身材矮小的国王决心与阿拉伯突击队进行全面对抗。我们之中有些人所预料的和另外一些人担心的摊牌，最后终于临到我们头上了。

和游击队摊牌

九月十五日晚上，新上任的我国驻约旦大使迪安·布朗从安曼发来一份急电，电文说，侯赛因已决定要在首都重建法律和秩序。国王将派亲信部队包围全城，然后在九月十六日清晨宣布成立军政府。他不愿意对争端施加压力，但是如果阿拉伯突击队进行抵抗，他准备动用必要的力量来确保他的权威。侯赛因急切地要求美国运用其影响，使以色列不要插手，或把局势搞糟。国王还提到，如果其他的阿拉伯国家要进行干预，他可能要请求援助。迪安·布朗加上他自己的估计：尽管事态比以前更接近于摊牌，但是国王可能是在吓唬人，也可能是在为一次复杂的谈判采取打开局面的行动，以求最终妥协。布朗并不认为伊拉克或叙利亚可能会进行干预。我则不是这样看这个问题。我认为，摊牌现在是不可避免的。明天的事态发展将会证实这一点。

布朗电报到达时，我正在乘直升飞机飞往弗吉尼亚州的艾尔利庄园的途中；它是东海岸许多早年私人庄园之一。现在已捐赠出来供慈善和学术活动之用。梅尔文·莱尔德在众议院供职时，曾对

公共卫生事业有所贡献，为此，他是这次宴会的主宾。莱尔德邀请了他所有的同事和朋友，还包括了在华盛顿的所有有影响的人物。整个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都身穿礼服出席，其中有帕卡德、穆勒、赫尔姆斯、西斯科和我。正当晚餐开始时，我收到艾尔·黑格打来的电话，他把迪安·布朗的电报内容告诉了我。不久，大约晚上九点钟左右，我又收到一个电话。黑格通知我说，英国外交部的常务次官丹尼斯·格林希尔曾设法与我联系。由于我不在，他便将女王陛下政府的意见通知了黑格。该政府认为，约旦军队和阿拉伯突击队之间的一场恶战似乎是避免不了的。他代表希思首相想了解一下我们作何打算，特别是，如果国王侯赛因处于困境的话。我们对待以色列人进行干预持何态度，首相可能希望在当晚晚些时候和总统亲自通话。

这是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它使得最高级领导人在官方渠道之外能够非正式地交换意见。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警告信号。布朗的电报使人将信将疑，但是除非英国认为形势严重，否则希思是不会考虑要和尼克松通话的。如果总统要和希思通话，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想法整理一下。经与莱尔德、帕卡德和西斯科商量后，我便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成员，乘直升飞机返回华盛顿。

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在白宫情况室里开会，从晚上十点半一直开到接近午夜，以后又在我的楼上办公室里接着开下去。我们都穿着讲究的晚礼服，研究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国王和阿拉伯突击队之间爆发战争；伊拉克的介入（不知什么原因，在安曼和华盛顿，都没有人认为叙利亚会进行干预）；或者美国至少是为了撤退侨民而进行武装干涉。这次会议证实了上周的一些看法。国王可能会打败阿拉伯突击队。如果阿拉伯突击队看来要得手，以色列几乎肯定会进行干预；如果伊拉克采取行动，它也肯定会这样做。

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以色列采取行动，美国应该不介入，但是应该阻止苏联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为了表示支持，我们应该立即对国王提供物资援助。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得加强戒备。

九月十五日午夜前后，我通过保密电话 * 和格林希尔通话，这种电话是可以防止窃听的。防止窃听的办法是，让谈话双方都几乎听不清对方的话，促使谈话人大声叫嚷，以致于在谈话人的声音所及的地方别人不能充耳不闻。因此，就安全问题而言，这就造成额外的危险。我告诉格林希尔说，我们非常重视侯赛因的生存。总统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但不能排除美国在没有别的办法时会进行军事干预。

我对于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一致看法的形成是有影响的。我认为维持侯赛因的统治是十分必要的。人们和西方保持友好和执行一项温和的外交政策，将会得到美国的有力支持，向世界表明这种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必须抑止中东的逐步激进化，而苏联把导弹和战斗人员运往埃及却加速了这种激进化。必须表明，纳赛尔利用苏联的威胁来对美国进行讹诈的手法，是枉费心机的。

依我看来，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迅速地和带威胁性地加强我们在地中海的军事力量，来遏制激进的阿拉伯政权对约旦的干预；对侯赛因国王给予心理上的支持；对苏联的反应进行较量和加以制服（如果必要的话包括进行军事干预）。应该在地中海集结我们的军事力量，发表使人捉摸不透的声明，长侯赛因国王的志气，灭他的对手的威风，以及遏制苏联。

于是，第二天早晨，即九月十六日，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又一次召开了简短的会议，对决定进行研究之后，我发出一道指令，

---

* 所有美国政府使用的绿色保密电话机，通常都钉有一块红色的圆牌，上面写着"保密电话"的字样。由于我的工作人员爱开玩笑，我的保密电话机上刻着语法上有错误的德文"使人安全的电话"。

要求有关单位作出详细的外交和军事计划，来应付下列意外事件：为约旦部队提供物资援助；为撤退美国侨民进行武装干涉；如果发生外来干涉，为了支持侯赛因，美国将进行空袭或地面攻击（这是总统的选择）；美国默认以色列的空中或地面打击（这是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选择）。我也要求对现有的“遏制苏联干预”的计划作相应的修改，以适应形势的变化。所有的计划和方案都将在九月十八日中午以前加以研究。

那天早晨，我还给总统送去了一个报告，把昨晚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的结论作了一个概述。出乎意料的是，他竟大发雷霆。他满脑子想的是竞选运动，对于莫斯科的最高级会谈仍寄予希望。他怀疑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究竟有什么必要开紧急会议，并在我的关于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意见的报告上写满了怒气冲冲、字迹潦草的批语。他写道，他倾向于完全不搞对抗，如果避免不了对抗，他想动用美国武装力量；他反对以色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除非事先经过他的特别批准，而他却又强烈地暗示，他决不会这样做。对于他宁愿直接地和单独地显示美国力量，我是不感到惊讶的。这是他的一贯见解。我深信，一旦研究了这种做法造成的影响，以及我们的财力、物力，他就会改变主意。已经没有时间来进行讨论了，因为尼克松马上就要动身前往堪萨斯城、堪萨斯州立大学和芝加哥去作一次竞选旅行。

九月十六日平静无事。西斯科和我飞往芝加哥，为中西部的编辑和广播人员作背景情况介绍。国王按计划宣布成立军政府，但没有在安曼采取军事行动。然而，他的确向布朗提出过，他特别担心叙利亚，而不是伊拉克，可能进行干预。布朗在他的报告情况的电报中，对这件事轻描淡写，政府中也没有人认真对待这件事。我们的担心仍集中在伊拉克，因为它在约旦有一万七千名驻军。在劫持飞机问题上，我们努力维持西方国家的联合阵线，反对欧洲一

再提出的为了他们自己的国民单独搞交易的要求。

九月十七日，这些都成了基本上是理论性的问题了，因为侯赛因大胆地命令其军队开进安曼。大规模的战斗爆发了，而且扩展到约旦北部巴勒斯坦人聚居地附近的伊尔比德镇。那一天，我两次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会。我们指示布朗大使通知侯赛因，美国对于他的努力表示同情，布朗将迅速地传达任何关于物资援助的要求。我们还告诉布朗说，不排除美国给予军事上的支持来对付外来的干预。我们还指示驻以色列的代办听取以色列对形势的估计。(不管怎么样，尼克松定于十八日会见果尔达·梅厄。)我们通过经常与格林希尔通电话，和英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将我们对形势的估计告知伊朗国王，因为在任何一次中东危机中，他的支持都是关键性的。

但是，我们决定不同苏联联系。我告诉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说，我们和莫斯科谈得够多的了，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让他们来找我们。"而且，我在一次和尼克松的谈话中——在这次谈话中他批准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建议——也表达同样的论点："我认为，我们应该一句话也不说，叫他们莫测高深。他们会了解到(我们的军事活动)。"

既然约旦爆发了内战，那末迅速部署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于打消对方任何冒险的念头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本来停泊在马耳他岛的海面上，奉命驶往黎巴嫩沿海和"独立"号会合，并有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十二艘随同前往。第三艘航空母舰"约翰·F·肯尼迪"号也被派往参加第六舰队；它由波多黎各启程，要航行九天才能到达那里。不过这艘航空母舰的行动，苏联的情报机关一定会很快发现的。包括一千二百名海军陆战队的两栖特遣部队刚刚在克里特岛演习完毕，奉命停驻在离黎巴嫩沿海三十六小时航程的地方。巡洋舰"斯普林菲尔德"号将与它会合。

运载直升飞机的航空母舰“关岛”号和随同行动的特种混合舰队正开往勒任营，去接运另一批海军陆战队。这些舰只都奉命要赶紧开往地中海。

尼克松当时在芝加哥，我和他详细地讨论了所有这些问题。他很热情地批准了所有的部署；这些部署是很符合他的浪漫主义性格的：“主要的是，要不时搞点小对抗，小刺激，这是再好不过的了。”只是费了很大周折，才说服他不对外公布我们所有的军事行动，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引起很严重的危机气氛；对外公布这些事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恶果，因为这样做就必须在公众面前做许多消除疑虑的工作，会部分地抵销我们军事部署的效果。这一天下午，尼克松改变了主意。这时他同意，最好不发警告，继续调动军队，用冷漠而满不在乎的态度对待苏联。

他尽可以大胆地慷慨陈词，因为那天早晨他与《芝加哥太阳时报》的编辑们进行了一次不许作记录的谈话，他把所有的消息都说了。我曾极力要求霍尔德曼使这次新闻发布会成为一般化和低调的，但是在外旅行的白宫官员对于低调一词的定义的理解是难以逆料的，特别是在大选之年。当尼克松开始会见记者时，他刚好得知约旦爆发内战的消息。尽管他的自我克制能力很强，但也经不住在高度紧张时刻的感情冲动。由于这个消息以及他刚批准过的军事行动使他感到激动。尼克松开始告诉那些感到惊异的编辑们说，如果伊拉克或叙利亚要干预约旦，只有以色列或美国才能够制止他们；他宁愿由美国来担负这个责任。（他写信告诉我说不进行对抗，这也是他的主意。）由于被这个场合的情绪所激怒，他又说，他要让俄国人为他们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用导弹来冒险的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我们的干预能起作用的话，我们就要进行干预。”这样耸人听闻的新闻能不被人记录下来，那是很难以办到的。《太阳时报》很快就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照登了。尽管由于齐格勒坚

持要按照不准记录的规定办事，当时即予以收回，但这却恰恰提高了这一新闻在外交政策上的影响。*

尽管在那件事之后，尼克松感到后悔，我则认为，总的来说，他的声明还是有益的。当我从美国新闻署署长弗兰克·谢克斯皮尔那里得知这件事时，我告诉他说，这件事并没有使我感到有什么不安。首先，它将向我们的官僚机构表明，我强力要求在地中海集结军队，这是反映了总统的想法，而不是反映我个人的特质。实际上，这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真正选择在于：或者是各机构之间进行正常的规划；或者是以专题讨论的方式解决，但是他们却不能参加这种讨论。有一次，我设法使罗杰斯相信，我并没有要尼克松这样做，这件事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一个短时期的改进。

至于对那些和我们关系最大的国家，如苏联和激进的阿拉伯国家，尼克松声明的影响可能是有益的，因为它表明我们的态度是认真的。下午我向尼克松报告说，当约旦军队歼灭他们附近的阿拉伯突击队时，伊拉克部队袖手旁观，没有动静。而这一天美国的行动，包括总统的声明，却一定加强了我们的那位勇敢的朋友约旦国王的决心。

九月十八日星期五是穆斯林的安息日。这一天，约旦军队有步骤地恢复了对安曼的控制，尽管进行得比较缓慢。约旦军队在北方曾遇到顽强的阿拉伯突击队的抵抗，实际上，巴勒斯坦人在这里宣布成立了一个“解放区”。十英里之外的叙利亚发出了恫吓的叫嚣，伊拉克军队仍旧按兵不动；约旦军队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纳赛尔则一声也不吭。

这天白天，尼克松在白宫接见了果尔达·梅厄。他们之间的谈话多半是涉及到以色列人的援助要求，以及苏联和埃及在苏伊

* 事实证明，尼克松并没有为此而很生气，他事后还向这篇文章的作者彼得·利沙戈尔表示祝贺，称赞他巧妙和谨慎地处理了这一报道。

士运河沿岸违反停火协议的事。这说明，这两位领袖都已经深信约旦国王可能会占上风，危机快要过去。尼克松说，他希望以色列不要鲁莽行事，梅厄总理则向尼克松保证，以色列不会不通知美国就采取军事行动，而且也看不出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

这一天，报纸也在集中猜测总统在芝加哥所作的评论的含意。不利的反应是，人们纷纷提出警告，如果我们打算要执行总统的战略性选择，来一次美国的单独军事行动的话，我们将面临困难。那位受人尊敬的乔治亚州参议员、拨款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强硬路线的一贯支持者里查德·拉赛尔，打电话给罗杰斯，告诉他说，他坚定不移地反对在中东使用任何美国军队。

九月十八日，莫斯科显然也已经得知美国的行动。苏联代办伏龙索夫打电话给助理国务卿罗杰·戴维斯，传达了苏联政府的口信。莫斯科对待指控他们在运河沿岸违反就地停火协议的那种傲慢而又冷淡的态度烟消云散了；一周之前，它极力主张用来遏制各方的那种煽动性的对帝国主义危险的诅咒，也销声匿迹了。相反地，苏联表示关注中东日益“复杂的”形势；言论中却不带责骂的口吻。莫斯科表示“希望”美国同意苏联的看法，所有的国家“包括那些不属于这个地区的国家”都谨慎行事。它还进一步“希望”美国在这方面对以色列施加影响。至于苏联方面，它已力促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政府共同来结束约旦的内战。“我们（指苏联人。——译者）也正在寻求一些办法来把我们的观点传达给巴勒斯坦运动的领袖，提请他们注意”——从而让我们明白（亦可能是真话），莫斯科和阿拉伯突击队已经失去了联系，与他们的行动没有牵连，特别是关于人质问题。

当苏联贯彻执行其外交政策的风险较少，或者当力量均势对它有利时，苏联外交政策的主题中就没有关于可怕的后果这样的“警告”，也没有任何关于美国与约旦国王勾结之类的指责。他们

的语调里带点儿哀怨之气，再次保证，苏联政府"一如既往"，主张在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二号决议的基础上解决中东危机。塔斯社的一篇评论也持类似的语调，它警告我们不要干预，但用词是模棱两可的，克里姆林宫在中东的代理人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一点。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证实一种分析，这种分析是我的工作班子里的哈尔·索南费尔特在那一天的早些时候作出的，他预料苏联可能对我们的部署和外交政策作出反应：

实际情况是，苏联人看到美国在这个地区使用军事力量是决不会甘心的。他们一定会对此加以诋毁，找我们的麻烦（包括胡闹一气，并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为基地，对第六舰队进行近距离侦察），并全面地反对我们。最使他们感到担忧的先例是，我们表现出能够而且将要使用海空军力量的样子，使得他们忧心忡忡，总是在掂量，在其后的一次新的危机中，我们对以色列的支持会达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在国际上的一般姿态将会是怎么样。（如果我们的军事行动是成功，或者看来是成功的话，这样的情况对我们可能是有利的。）

我们深信，苏联是在寻找解决办法，这种看法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和美国驻苏大使比姆，于九月十九日的一次谈话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就在九月十九日这一天，约旦军队在对阿拉伯突击队的作战中取得虽然较慢但却是无可否认的进展。库兹涅佐夫再度表示"希望"我们不要干预约旦，因为这将为所有对这个地区感到关注的国家带来"困难"。他探问第六舰队集结的目的何在。比姆回答说，关于我们军队的部署情况，他并不知情。这既是事实，也是最可能加深苏联的不安的回答。

在我看来，最好的策略是不提供保证，而是造成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只有促使其激进的朋友不进行干预和使危机确实结束，才能感到日子好过些。这就是为什么我主张暂时不给予

答复的原因。毕竟，苏联让我们等待了十天，才对我们提出的关于违反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协议的照会作出答复。提出保证会事与愿违，而坚决不妥协又会变成一种挑衅；在这两者之间，沉默是最好的折衷方案了。

总的来说，我认为危机正接近于尾声。我们的信誉已大大恢复。九月十九日傍晚，我打电话给尼克松——他当时在戴维营——把苏联方面的信息向他作了报告。我认为这是一种即将退却的征兆。尼克松对于好消息总是不敢轻信，表示怀疑。他说，什么时候苏联人自愿地作出保证，那一定又是在搞鬼。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九月二十日星期日上午，叙利亚的坦克侵入了约旦。

叙利亚入侵

在情况瞬息万变的时刻，那些处于决策中心的人被潮水般的报告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些报告中有推测、消息、希望和焦虑。必须运用他们自己的主见，把这些成份筛除出去。很少见到一幅有连贯性的图景；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政策制订者把事态联系起来，才能得出连贯性；由于正确估计了形势和他自己创造性行动的限度，他抓住了这种挑战，并把它变成一种机遇。在危机中，这种敏捷性类似一个运动员的敏捷动作。决定必须很快地作出。身体的耐力和洞察力一样，都同样受到考验，因为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弄清楚，国内或国外的每个关键性人物都是在同样的情报和目的的基础上来进行活动的。不论平时在官僚机构内部如何钩心斗角，在危机时刻，我确信每个机构都得到同样的情报，而且所有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主要同僚在全面的规划中都是志同道合的合作者。

在约旦危机期间，从杂乱无章的报告中分辨出事情真相，是特

别困难的。在国王的军队开进安曼之后，我们大使馆和宫廷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国王和里法伊偶而和大使通电话。我们大使馆和宫廷之间断断续续地进行无线电通讯，但这是公开的电讯，很可能被窃听，因此不可靠。幸运的是，我们有迪安·布朗驻在当地，他是我们的最能干、最勇敢和最有学问的外交家之一。他不时地坐在装甲车里去寻找国王和里法伊，显然，这种通讯办法是快不了的。英国人则运气比较好，他们的使馆比较靠近宫廷，因此，国王偶而可以通过伦敦给我们送来信息。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在传递过程中会产生延误，因为英国还想加上它自己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伦敦有点儿担心我们可能鲁莽地采取行动，所以他们就更要这样做了。这种判断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得到这种印象却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至少白宫认为，如果伦敦告知别的国家首都，事情有发展成为不可收拾的危险，这样做倒可以制止一场轻率的行动。伦敦巧妙地掩盖了他们对我们的疑虑，而且也没有对我们提出来，它主张采取一种比较稳健的步调。

九月十九日，星期六，我们收到的第一批消息说，叙利亚坦克已经开进约旦二百五十码左右，占领了阵地。但是由于消息来自在开罗的一位英国官员，而伦敦方面又认为不必要直接通知我们，因此我们并不认为英国政府很重视这件事。我们也一样不重视它。尽管通讯困难，我们相信，如果侯赛因十分担心的话，他是会想出办法来通知我们的。

但是，在九月二十日星期日发生的事情已是无可置疑的了。大约在华盛顿时间上午六点左右，国王和里法伊分别和布朗通了电话，报告说叙利亚坦克两次大规模入侵腊姆萨。约旦军队击毁了三十辆坦克，并把叙利亚军队打退了。侯赛因请求美国援助，但却没有提出具体要求。在华盛顿时间下午十二点三十分，里法伊讲得较具体些了，他代表国王，请求美国进行侦察，以判明叙利亚是

否增兵了。差不多与此同时，又有两个叙利亚装甲旅越过约旦边境，并在广阔的战线上发起进攻。直到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才证实了这个消息。

我毫不怀疑地认为，对于这种挑战必须予以还击。如果我们一无行动，中东的危机就会加深，因为激进分子和撑他们腰的苏联就会采取主动。如果我们成功了，阿拉伯的温和分子就会获得新生。总的来说，我是乐观的。从局部和总体来说，力量均势对我们有利。那天傍晚，我向总统表示了这种看法，苏联"不是控制不住局势，就是要想强行摊牌。如果他们是控制不住局势，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取得胜利。"我毋需再说，如果他们决定要摊牌，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

罗杰斯、西斯科和我进行了一番会商，并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西斯科和我共同起草了一个声明，用罗杰斯的名义发表，断然要求立即撤退叙利亚军队，并且警告说，冲突有扩大的危险。那天下午，西斯科召见了伏龙索夫，并且将一封责骂性的信交给了他。形式上是给苏联九月十八日信件的回信，我们照会中的要害部分内容如下：

在这个时刻，由于叙利亚装甲部队已入侵约旦的领土，并在沿约旦边界的叙利亚境内进一步集结了进攻性部队，局势是进一步地而且是危险地加剧了。美国政府谴责这种入侵约旦的行径，并要求入侵部队立即撤退。叙利亚的这种令人不能容忍和不负责任的行动，如果不立即停止和退回，就会使得目前的冲突扩大化。美国政府呼吁苏联政府使叙利亚政府知道它目前行动方针的严重危险性，并且必须从约旦领土上毫不拖延地撤出这些军队，并停止进一步干预约旦。苏联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冲突扩大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美国方面来说，美国政府正促使这个地区的所有各方都采取克制态度。

星期日下午，我建议——总统在戴维营批准了这个建议——

把驻在德国的空降旅从演习地区调回到它的基地登机处。而那是在九月十八日危机似乎趋于缓和时，我们批准这个旅进入该演习地区的。早就计划好的这次演习活动，把这个旅作出反应的时间延长到十小时，而在它的原驻地，按照它的戒备状态，其反应时间将减少到四小时。一个营奉命准备空降。下午五点，我们要求我们驻波恩大使馆将这个空降旅的活动通知德国政府。我们解释说，由于可能要从约旦撤退美侨，这个旅有必要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个旅奉命进行迅速而公开的活动，但并没有采取任何保安措施；我们希望苏联的情报机构很快地就注意到这种情况。德国政府很有可能把我们的活动转告给欧洲的各友好政府。迪安·布朗奉命将我们的公开声明和我们给苏联的照会通知侯赛因，并且不把美国可能进行干预的大门关闭。

下午，叙利亚新的进攻的规模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一直不断地在根据美国或以色列作出军事反应的设想来策划我们的行动；政府里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两个国家不应同时采取行动。九月十七日，我将总统主张主要由美国军队抵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干预一事，转告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我要求都必须根据三条标准来审议行动方针：谁具有较为充分的采取行动的理由？谁能够更为有效地把其行动坚持下去？谁拥有防止逐步升级的最大能力？我还要求提出主张美国采取行动的最充分的根据，以及主张由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而美国则不直接出面和遏制苏联的最充分的根据。这些文件于周末送到了总统手里，我不知道他是否看了。

为了向总统提出一份最后的建议，我于九月二十日星期日晚上七点召开了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从这时起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对我们在华盛顿的人来说，危机表现为几乎不停顿地开会和打电话。要能最精辟地描述这种情景，只有一小时一小时地回顾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

从傍晚七点十分到七点五十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主要负责人在白宫地下室的情况室开会，主要是彼此汇报过去几小时内所发生的事情，再次审议应付突发事件的计划。情报和军事情况介绍表明，情况不相上下。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就琐碎事情上进行讨论。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毛病。应国王的要求，将派去两座流动野战医院。所争论的是，这两座医院究竟应该作为美国的捐赠，还是应该由几个国家联合主办。我们迅速地研究了美国进行干预的利弊；我们的信念增强了，我们的军队最好使用于牵制苏联，使它不能干预以色列的行动。如果由我们单方面采取有效行动，我们就必须动用我们全部的战略后备力量；这样，我们就会在两个相隔得很远、几乎无法联系的战场上分布我们的军队，并在新的突发事件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我们的军队只能在没有重型装备的情况下开进去。只能从航空母舰上得到空中的支援。我们唯一的陆上供应线是通过以色列，这就把我们和以色列联系在一起，但是主张由美国采取行动为主要理由，却是要把以色列和约旦隔离开来。如果我们碰到困难，我们还得请求以色列给以协助。总之，如果约旦的形势失去控制，所能采取的补救办法，只有对叙利亚进行大规模打击，而以色列部队是最适宜于用于这一目的的。

晚上七点五十分，总统从戴维营回来，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里去。这个星期天下午，他和我经常保持着联系。以前我曾多次按照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一致意见的精神，一再谈到我对美国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的担心；这一天晚些时候，他改变了看法；就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会之前，他曾告诉我说，如果要在军事上作出反应，不应该由我们来出头。我很快把最新情况告诉了尼克松。我建议他把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高级成员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把他的一些想法告诉他们，并在心理上为他们鼓劲，这种效果只能来自总统的领导地位。尽管他现在的看法与华盛顿特别行动

小组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主张他不要透露出他改变了的看法，以便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能够重新提出全部可供选择的方案，不要受想迎合总统的意愿这种心理的影响。这样他就肯定能作出最正确的判断。他可以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结束后再作出正式决定。

一旦到了要作出决定的关头，尼克松就会以一种怏怏不乐和不顾一切的勇气去行事——一方面他对国际上的现实情况有他自己的见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本能地认为，不管他碰到什么事，最后总是注定不会圆满的，他就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况中弄得心力交瘁。在那个时刻，最大的问题是要防止让勇气变为鲁莽行事，防止让坚定的态度变为虚张声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顾短期的政治上的好处，他要做的，是他认为国家的利益要求他所应该做的事。对任何总统来说，这已经是尽到最大的责任了。很多总统还做不到这一点。

从晚上八点到八点二十分左右，尼克松会见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亚历克西斯·约翰逊、托姆·穆勒、迪克·赫尔姆斯、戴维·帕卡德和乔·西斯科。他对他们进行了一次鼓舞士气的讲话。对他们的努力表示赞赏。他说，他们的工作就是拯救国王，使他免受外来干预。他希望，他们不考虑他们原来认为总统的意愿是什么，自行作出判断。他强调，我是他的代言人。

晚上八点二十分，相当受到鼓舞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成员离开了总统办公室，在楼下情况室继续进行他们的审议工作。我留下来用十分钟的时间和总统一道研究了可供选择的方案。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如果我们继续保持坚定，但不表现为好战，如果我们把手中的牌打好，我们是会占上风的。

晚上八点二十分左右，丹尼斯·格林希尔也用保密专线打来

电话。由于我在椭圆形办公室，是黑格在情况室接的电话。格林希尔传来的是那天早晨侯赛因给美国大使的口信，而且侯赛因在两小时之前又重复过了一遍：鉴于形势恶化，国王要求立即进行空袭。

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我又参加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这次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九点十五分左右。英国人传达的口信加强了我们原先的倾向，即我们按兵不动，让以色列采取行动。我们没有掌握足够的情报或军事目标情况，因此不能动用美国武装力量来迅速对国王的请求作出反应。同时如果美国牵制苏联，使之不进行干预，就必须加速我们的准备工作；这样，我们也可以提高我们进行空战的能力，以防备万一事实证明以色列并不像我们所估计的那样愿意采取行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批准了下列送交总统的建议：

⊙再进一步提高驻德国空降旅的戒备状态；

⊙命令第八十二空降师处于全面戒备状态（这个消息毫无疑问会泄露出去，从而迫使莫斯科和大马士革迅速作出决定）；

⊙命令一架侦察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飞往特拉维夫机场，去摄取目标情况（毫无疑问，这会被苏联和埃及的雷达发现，他们会认为这标志着美国的军事行动就快要来了）。

换言之，我们加强了美国或以色列快要进行干涉的印象。

在我看来，在一次危机中，看来似乎是“稳健的”和“安全的”办法往往是最危险的办法。渐进的逐步升级诱使敌对一方在每次活动中要赛过对方；谁打算带点儿温和作风行事，就会被解释成优柔寡断；提出保证可能被理解为提供了一张一目了然的清单，从而鼓励对方伺机而动，延长了固有的危险形势。一个领袖必须仔细和深思熟虑地选择，在什么问题上进行对抗。他只应该为了重大目

标才进行对抗。一旦这样做了，他就负有迅速结束对抗的责任。为此，他必须表现出不可动摇的决心，他必须准备迅速而又勇猛地逐步升级到如此的程度，致使敌方不能再赌博下去。

晚上九点二十七分左右，我邀西斯科一道同我去向总统提出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建议；他是处在所有电报往来中心的官员，让他了解白宫想法的细微差别是十分重要的。这也会帮助罗杰斯及时了解情况，他决定留在家里守着电话等待事态发展的消息。首先，我们必须找到总统，因为尼克松决定去玩滚木球。我们在特工人员的帮助下，最后在行政办公大楼地下室的一间不引人注目的滚木球室里找到了他。尼克松安详地听取了我们的汇报，批准了我们的建议。这时候，他手里不协调地拿了个滚木球，他没有穿上衣，也没有打领带，这副模样是难得见到的。他说，不管怎么做，必须成功；他下决心要制止叙利亚的进攻。他同意，我们必须立即和以色列大使建立联系。我告诉他说，我将立即打电话给拉宾。

晚上十点左右，我回到白宫我的办公室里，打通了电话。原来拉宾正在纽约出席招待果尔达·梅厄的晚宴。必须把他从宴会大厅主席台上请下来，叫到一个相当安全的地方；尽管如此，在整个通话过程中，我还能听到远处乱哄哄的讲话声。我先告诉拉宾，西斯科也在电话机旁。我问道，关于叙利亚的行动，以色列掌握了什么情报。拉宾说，以色列估计，大约有二百辆叙利亚坦克开到了伊尔比德地区。我告诉拉宾，我们接到了请求援助的要求，但是没有掌握什么情报。以色列能否在黎明时派飞机去侦察一下（按中东的当地时间，再过三小时就是黎明了），并把他们的看法告诉我们。拉宾是个不受人愚弄的人，他问道，如果侦察得到的情况表明，叙利亚军队明显地向前推进，我们是否赞同以色列进行空袭。我回答说，我们还是分析了侦察的结果后再作计议。我们正在讨论这件事的过程中，我又接到国王传来的紧急口信，这一次是直接

给我们的。我告诉拉宾说，我过一会儿还得给他打电话。

侯赛因的口信是两小时之前通过电话传给我们大使的。其中说，在叙利亚的一次新的大规模入侵（两个旅在中午发动进攻）之后，情况严重地恶化了。约旦军队已被切断彼此间的联系；伊尔比德被占领了。首都的军队感到动荡不安。在国王看来，要拯救约旦，非得立即进行空袭不可；他可能很快还会要求地面部队也采取行动。侯赛因一反他以前的习惯做法，要求我们把他的困境转告给英国。

晚上十点十分，西斯科和我在我的办公室一起打电话给罗杰斯，把和拉宾的通话以及国王刚传来的告急口信，告诉这位国务卿。我们说，我们倾向于向总统提出建议，同意以色列进行空袭。罗杰斯也认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晚上十点十二分，西斯科和我现在认得路了，于是就又返回到滚木球室去。（自从那个命运交关的夜晚之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滚木球室。）我们把国王的请求和总统自己的高级顾问们的一致意见告诉了总统。他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并批准我们去找拉宾。晚上十点二十五分，西斯科和我又回到我的办公室。

晚上十点三十五分，我又给拉宾打电话，西斯科也在电话机旁等着，刚好打完电话，尼克松的木滚球也打完了。他像往常一样，衣着整齐，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我把从约旦得来的消息告诉了拉宾，但没有详细说明来源。在同总统和国务卿讨论过之后，我现在能够告诉他，如果以色列的侦察结果，证实了他对我说过的那番话，我们就赞成以色列进行空袭。我们将补偿以色列的物资损失，并尽我们的最大努力，阻止苏联的干预。拉宾小心谨慎地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以肯定他没有听错。他还得请示总理。

晚上十点四十五分，鉴于以色列有可能在我们的夜晚时间采取行动，我就把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召回来开了一次午夜会议，并

要求我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哈尔·桑德斯和理查德·肯尼迪)集中所有的有关情报。然后，我打电话给英国大使约翰·弗里曼，把国王的口信转告给他。我告诉他，我们和以色列大使进行了接触，但没有详细地谈。尼克松仍在我的办公室里，在我不打电话时他就和我闲谈。

晚上十一点十五分，我用保密电话和希思首相的私人秘书通话，把国王的口信念给他听，并告诉他我们和以色列大使进行了接触，以色列将派飞机侦察，以决定下一步所采取的行动。尼克松建议我不要用保密电话，因为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听到我大声讲话的人，可能比在公开电话中窃听谈话的人还要多。

晚上十一点三十分，拉宾将梅厄夫人的答复用电话告诉了我们。以色列在天一亮就派飞机去侦察。伊尔比德附近的情况"十分令人不愉快"，以色列的军事领导人深信，空中作战已经不够。以色列将在详细研究侦察到的结果后，再把它的想法告诉华盛顿；但是不经过进一步磋商，决不采取行动。尼克松也听到了我这边的答话，但他没有说什么。接着，他就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午夜，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再次在情况室召开会议。我把上次会议以来所发生的事情向他们作了简略的介绍。我们讨论到，如果以色列在尔后二十四小时内发动进攻，我们将怎么办。我要求今晚就下列四个问题进行紧急研究：如果苏联采取行动，有何对策；对以色列和约旦进行援助，以补偿其损失；对国会作情况介绍的方案；向盟国作情况介绍和敦促苏联不要介入的外交计划。关于苏联人，我强调说："我们有两个目标：一是，叫他们对叙利亚施加影响，要他们撤退；二是，让他们懂得，他们不要以为，只要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就可以使他们避免处于以色列采取行动的困境……。我认为，现在多唠叨将给我们今后多添麻烦。"

凌晨十二点四十五分，我打电话给呆在家里的罗杰斯，把和拉

宾的谈话以及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开会情况告诉了他。我问他有没有什么问题。他说没有。这一次，我们高级官员之间是团结一致的。凌晨一点左右，我打电话给尼克松，把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开会情况向他作了一个简略的汇报。他听取了我提出的关于各政府部门预测苏联会作出什么反应的情况归纳。当我告诉他，国防部担心苏联会对以色列发动一次空中打击来进行报复时，他哼了一声说，"我不相信。"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一，凌晨两点，我回家睡觉。

凌晨五点十五分，我被黑格叫醒，他刚刚接到拉宾的一个电话。尽管还没有收到关于侦察结果的报告，拉宾说，以色列人认为，单靠空袭已经不够了；可能也有必要采取地面行动。以色列希望在两、三小时内知道美国的看法。

凌晨五点三十五分，我打电话叫醒总统，把拉宾的初步反应告诉了他。我敦请他推迟作出决定，先召集他的高级顾问在上午七点三十分开个会。但是尼克松知道，以色列提出的关于采取地面行动的请求，会引起严重的争论，他不想让这种局面出现。他说，"我们现在就作出(决定)。"他和我就以色列进行地面攻击的利弊作了简短的审议。他要我打电话给西斯科，了解他的看法。

我先和黑格商量，不经过罗杰斯而直接打电话给西斯科是否明智；我刚得出结论说，我必须先告诉罗杰斯，这时，尼克松回电话了。尼克松已决定批准以色列进行地面攻击，并且口述了一个经过认真考虑了的口信，转给拉宾。他说，"我已经决定了。别再问别人了。告诉他(拉宾)，'干吧'。"

我不想让总统不先同高级顾问商量，就冒同苏联进行一场重大对抗的风险。以色列采取地面军事行动，可能触发一场中东战争。我对尼克松负有责任，应该先和罗杰斯及莱尔德进行磋商。而且情况也没有紧急到这样的地步。不经过一番动员，以色列肯定

是不能够采取地面行动的。我打电话给西斯科，他说他同意总统的决定。我又打电话给罗杰斯，他有很大的保留，特别是由于约旦并没有正式请求给予地面支援。莱尔德的态度不明朗，他要研究一下情报。在打这些电话的间歇中——这些电话都是在我家里打的——尼克松不时地打电话给我，为他的决定补充细节。早晨七点十分，我再次敦请总统召开高级顾问会议，因为他们的意见不一致。这次他勉强同意了。黑格通知拉宾说，要到上午九、十点钟，美国才能给他答复。

从这时开始起已没有必要逐小时地加以叙述，因为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已把主要问题交待清楚了。我们的政府成员一致同意以色列进行空袭，但对以色列采取地面军事行动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要求立即作出决定，虽然以色列威胁着要进行地面战争，使情况更加复杂化，但它的答复也提供了一次政治解决的机会。因为，如果以色列认为有必要采取地面行动，它就必须进行动员。动员至少需要四十八小时的时间。而以色列不动员是不行的，因为不管我们的反应如何，它不能容许叙利亚取得胜利。因此，我们就有一段喘息的时间——如果约旦国王能够顶得住——而在这段时间里，对叙利亚施加的压力将会增强到如此程度，以致不用进行战争，也许危机就会自行消除。当叙利亚看到以色列部队在戈兰高地包抄它进攻约旦的侧翼时，它一定会感到非常不安。纳赛尔很可能要求结束军事行动，因为这次军事行动可能会使他很快面临难以应付的进退两难的局面，而这种局面曾导致一九六七年的灾难：要末袖手旁观，从而破坏了阿拉伯国家的团结；要末进行干预，甘冒另外一次蒙受耻辱的失败。而且这种相似的考虑也一定压在苏联人的心头上。总之，以色列的动员，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军事部署，会把我们所有的敌人弄得“心神不定”，并且也提供了不经过战争而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时间。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上午八点四十五分，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了会议。尽管会上讨论的主要是一个突出的实际问题，即如何回答以色列所问到的我们对地面军事行动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但实际上又发展成为一场如何处理危机的哲理性辩论。罗杰斯主张，如果要进行逐步升级的话，则应非常缓慢而有分寸地进行。尼克松和我却认为，那样做才最可能使危机变得无法控制。罗杰斯基本上反对以色列采取地面行动，他举出许多理由，其中包括怕和苏联人进行对抗。尼克松和我则认为，如果我们想避免同苏联人对抗，那就必须迅速造成一种他们不愿意面对的捉摸不定的险情，而不要让他们想逐一对付我们的循序渐进的行动。罗杰斯则要看叙利亚人是否从伊尔比德向南移动，再作出最后的决定；在我看来，只有叙利亚人从约旦北部的"解放区"全部撤出，危机才能结束。尼克松最后决定，西斯科可以通知以色列，美国原则上同意以色列采取地面军事行动，但还要看约旦国王的意见而定，而且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要商量一下。

我对于征求侯赛因的意见一事表示怀疑。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约旦人濒于崩溃的情况下，以色列才应该进行干预。我们不应该把国王在阿拉伯世界的已经处于不稳的地位作为抵押品，向他提出一些他难以回答的问题。有些事虽然侯赛因没有提出要求，但是却很可能默认。对于目前应付危机来说，不论是要求还是默认，都没有什么关系。以色列已经悄悄地开始动员，再加上我们的军事部署，这将构成一种威慑力量并成为一种现实。

如果以色列政府真想打仗，我们附有条件的答复可能会引起它的一些疑虑，而这些疑虑还会传播到我们的敌人那边去。幸好以色列有它自己的战略估计，不用征得我们的最后答复，它就自己进行动员，其步伐恰好也是我们所希望的。由于以色列政府寻求保证的要求是不可能满足的，实际上它已表现得非常小心谨慎，它

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问到万一发生战争，美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为回答这些问题就花了大半天时间进行准备。在那段时间里，没有必要作出关于采取地面军事行动的决定。在此期间，两个以色列旅正在开往戈兰高地，威胁着在约旦的叙利亚部队的侧翼。

那天早晨，收到了法国总统蓬皮杜打来的电报，他对于美国有可能进行干预一事，表示"非常关切"，并敦请尼克松作决定时要慎重考虑。这个电报并没有什么特别可取之处，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法国想要在一次危机中疏远我们。然而，它起到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表明我们的军事部署正引起人们的注意。使巴黎感到担忧的事也可以使莫斯科和大马士革感到焦虑不安。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一的其余时间是用在参加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会议上，讨论加强我们的军事准备工作，并为以色列所提的问题起草一封回信，在一定程度上，不让以色列在我们与第三国关系上拥有否决权。

那天晚上，一件最重大的事情发生了。苏联代办尤里·伏龙索夫会见西斯科，递交了苏联对我们前一天给他们提出的要求叙利亚立即撤军的照会的复文。复文的速度——与上次答复我们抗议违反停火协议拖延了一个星期相比，这一次仅用了二十四小时——表明克里姆林宫的确是焦虑不安的。考虑到我们的威胁性、几乎是公然炫耀的军事部署，复文的语调是非常温和的。苏联政府注意到，我们似乎和他们同样关心约旦形势的恶化，而且我们"也"（原文如此）认为，别的国家干预约旦的事务是不能容忍的。苏联人先这样转弯抹角地把自己打扮成反对叙利亚干预的样子，然后表示他们"希望"——一种非常柔和的外交言词——我们也敦促以色列采取同样的方针。为了明确表示它在强迫叙利亚撤退，苏联的照会还补充说："苏联政府在和叙利亚接触中，也奉行同样的方针。"

西斯科巧妙地使苏联人的预测陷于混乱，他是按照要使苏联人最大限度地担心美国可能采取军事行动这一战略行事的。当伏龙索夫问到约旦是否请求我们给予援助时，西斯科回答说，他没有被授权讨论我们与约旦国王交换意见的事。当伏龙索夫探听第六舰队活动的目的时，西斯科只把这个问题记了下来。总的来讲，我认为伏龙索夫的外交姿态是令人感到鼓舞的。苏联人是在表示，他们是在促使叙利亚停止入侵，除非他们是在欺骗我们。当我们每天都在地中海加强我们的实力，而且以色列也在动员时，要想欺骗我们，那是十分愚蠢的事。

下午六点，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另一次会议，这也是会上的一致的看法。会议只是介绍了一些事实，并认为在明天之前毋需作出什么决定。

这二十四小时过得十分紧张，也可能是具有深远和决定性意义的时刻。本来约旦眼看要垮台，现在形势开始扭转过来了。首先，这应归功于国王和效忠于他的军队的英勇。但是，也是由于我们的军事部署和保证给予物资援助，加强了他的决心，同时也在他的敌手中间引起疑虑，从而使他们举棋不定。我非常有信心地告诉总统说——在他快休息时我们通了两次电话——不要取消原订于九月二十七日，即下一个星期天开始对地中海国家的访问："如果以色列人星期四不采取军事行动，那末局势就安定下来了。"

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二，早晨八点半，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正在开会，喜讯传来了。由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给约旦人壮了胆，再加上叙利亚空军（在一个名叫哈菲兹·阿萨德将军的指挥下）显然不参加战斗，约旦人便开始从空中攻击伊尔比德周围的叙利亚坦克。据估计，叙利亚损失了一百二十辆坦克，其中六十至九十辆被约旦火力摧毁，其余的在技术上出了毛病。伊拉克部队——这是我们原来所担心的——仍然按兵不动。埃及通知我们，苏联人作了很大

的努力，让叙利亚重新考虑它在约旦的行动方针。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继续增加部队。由于军事局面稳定下来了，西斯科和我一致同意，我们应再次要求拉宾，在没有事先商量好之前，以色列不要采取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为了保持压力，我们也进一步加强了准备。我们增派飞机前往欧洲，战斗机和运输机都有。所有的联合指挥部都处在加强收集情报的戒备状态中。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两个营，处在六小时即可赶到出事地点的特殊戒备状态中。

我的日程表记载了我和总统反复开会。中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只进行了一个半小时，会议结束时，总统作出了一项决定，给侯赛因送去一封表示鼓励和支持的信。正如我告诉总统的，基本上说来，我们已达到做了所有可以做到的事的地步；我们应付突发事件的计划基本上已经完成，不管他选择哪一个方案都可以应付。所有可能采取的最大限度的压力都调集起来；最后的决定取决于别人如何估计这些压力和如何作出反应了。

那天下午，我们收到了两份复电，一份来自约旦，另一份来自以色列。侯赛因对于以色列的空袭，心情矛盾，对于以色列的地面部队支持则持否定态度。以色列通知我们说，他们如果采取地面行动，只限于在约旦境内（那就是说，他们不攻打叙利亚）。以色列也要求进一步澄清我们的意图——这是要我们相信，以色列并不急于要卷入。这两份电文是互相抵触的。但是，那时莫斯科和大马士革将作的最后选择，取决于已经出现的事态发展，即：我们军事力量的增强和以色列的动员。

和苏联代办的一次谈话增强了我的乐观主义情绪。我一反过去从不出席使馆招待会的做法，决定参加九月二十二日晚上在埃及使馆举行的一次宴会，以表示我们的政策不是反阿拉伯的。伏龙索夫兴致勃勃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我叫住，问我为什么不回答苏联昨天的照会。我说，除了星期日我们提出的要求之外，我们再

没有别的可说的了；叙利亚军队必须撤出。伏龙索夫问我，如果叙利亚停留在他们现在的地方，我们是否认为已经满足了。接着伏龙索夫就假装出一副关心我们处境的样子。他断言，约旦并非是苏联的重大利益所在，而美国的干预则会使自己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中陷入可怕的困境。我打趣地说，“假使是那样的话，你们该轻松了，因为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你们都会赢。”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其他客人都可能听得见的情况之下，包括记者在内。显然，伏龙索夫急于想使他的观点让大家都知道。《华盛顿明星报》记者乔治·谢尔曼于第二天写道：

> 伏龙索夫异乎寻常地坦率，说苏联希望叙利亚结束干预。
>
> 他说，苏联和叙利亚的接触还没有结束。而在对他提出问题的情况下，他明显地把叙利亚以及以色列和美国都包括在一个范围里；他用一种笼统的说法表示：“我们认为不应该存在任何外来干预。”

全世界的苏联外交官都发出类似的论调。一个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在约旦事件见分晓之前，这些压力是否会对大马士革发生作用。

在设法结束任何一次危机时，问题在于调准压力，以便既能使对方最大限度地产生解决问题的愿望，又不能使对方产生这样的印象，即一次对抗是无法避免的。令人感到矛盾的是，也许最关键的时刻，就是对方看来准备解决问题的时候；这时容易出现松劲情绪，而且也许会做出一种善意的姿态来缓和一下事态的进程，那是很自然的事。这几乎是个经常发生的错误，要知道，只有克服了危机，并且实际上已达成一种解决办法之后，才是进行和解的时机。此时，温和的态度才能被视为宽容和友善；在此以前，温和的态度则会使充满希望的前景化为泡影。因为对方到了最后一分

钟，仍有可能怀疑是否有必要付出那样的代价来解决问题。一九五一年在朝鲜，在停火谈判开始时，我们就停止了军事行动，几乎可以肯定，这反而延长了谈判的时间；现在回忆起来，我对一九六八年在越南停止轰炸这件事，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虽然我在当时持有不同的看法。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三，即使叙利亚已有可能撤退，我还是强烈要求加强我们在地中海的力量。九月二十三日是关键的一天。如果叙利亚部队还不撤退——例如，如果他们只是就地固守——压力的高峰就会过去。这时，要末以色列不惜一切进行干预，要末我们被人们认为是虚张声势。这样，战争就有可能再打起来——否则叙利亚人就会在约旦保持一个“解放区”，把国王的生存当作抵押品。我认为，最聪明的办法，是加大压力，直到我们事实上已确知叙利亚军队已经撤退为止。现在就停止行动，则肯定会暴露秘密，并可能在关键时刻给叙利亚送去一个错误的信号。因此，四艘驱逐舰奉命驶离美国，开往地中海；还指定了两艘攻击型潜艇于九月二十五日和九月二十九日驶过直布罗陀海峡。当天早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继续拟订反对苏联干预的应变计划。

这就是在那天早晨晚些时候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罗杰斯和我所产生的分歧的实质。随着危机趋向于解决，罗杰斯突然发现，两天之前总统当他的面批准的支持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的保证，是一种无尽头的义务，要求正式予以取消。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现在不是进行争论的时候，因为争论便肯定会被泄露出去，并将不可避免地使以色列人、苏联人和叙利亚人对于我们的决心产生疑问。在我们确知叙利亚人的坦克撤走之后，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弄清楚这一段经历。而且昨天我们就表明，我们不赞成以色列单方面采取行动，而以色列除了非常小心谨慎之外，也没有

任何别的表示。总统支持我的看法，但是他要求西斯科对拉宾重申我们的要求，没有经过商量，不能采取行动。以色列在那天晚些时候，无条件地作出这项保证。

根据我的记录，从上午九点三十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到下午两点五十分之间，我和总统单独会见了五次。到了下午两点五十分，我们收到了确凿的消息，叙利亚的坦克正从约旦撤退。

一切都已过去，留下的只是胜利后的一片欢乐。我打电话给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每个成员，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我特别赞赏西斯科的作为。他是国务院和白宫之间不可缺少的联系人，此外，他还迅速而有效地进行了外交活动。侯赛因打电报给总统，表示了他的感谢和敬仰；我们还安排了向国会和新闻界介绍情况的会议。

甚至安纳托利·多勃雷宁于九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也回到了华盛顿，好象是在说明，正常状态已经恢复了。他于九月二十五日拜会了我，对于我们没有答复苏联九月二十一日的照会，他表示痛心。我指出，一年来，苏联的每个照会之后，接着而来的便是与照会不相称的不友好行动；因此我们只好等着观察事态的发展。多勃雷宁向我提出保证说，苏联对于叙利亚入侵约旦的事一无所知。他向我保证说，在叙利亚部队越过边界线之前，苏联的顾问就已经离开了叙利亚！这简直是不打自招了。他表情轻松地说，克里姆林宫的想法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并表示希望商谈中东的问题。我回避了这个问题，并说要把它转告给总统。与此同时，我也向他提出保证，除非其他外来势力进行干预，否则美国不会在约旦采取军事行动。

那一天，我们也给以色列发出下列电报：

根据最近所获得的情报，入侵约旦的部队已撤回叙利亚。我们认为，以

色列所采取的措施，对于这次撤退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以色列对于我们的部署，作出迅速而积极的反应，我们为此表示感谢。如果出现另外一次进攻，情况将会不同；因此，我们认为，我们之间就叙利亚入侵约旦问题所交换的一切意见，已不再适用。我们想，以色列是会同意的。如果出现新的情况，我们必须得重新交换意见。

中东的温和派力量得到了保存。侯赛因国王凭自己的勇气和果断取得了成功。但是，要不是他和美国为友，这一切都会是徒劳的。苏联人退缩了，这使得日益认清莫斯科面目的阿拉伯人，对莫斯科看得更清楚了。

约旦危机过去了。但是平静并没有维持多久。在叙利亚坦克撤出后的四十八小时内，我们又面临另一次危机——这次是由于苏联在古巴建立海军基地。

① 参见亨利·布兰登：《美国实力的撤退》（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第一三四页。

第十六章

多事之秋：苏联在西恩富戈斯的潜艇基地

来自莫斯科的信息

一九七〇年秋，时局紧张，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驻华盛顿的代表是尤里·伏龙索夫。此人聪明和善，小心谨慎，但却毫无权力。多勃雷宁大使奉召回国磋商。我后来才知道，多勃雷宁的离开反映了克里姆林宫的愿望，不想举行什么重要的会谈。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是特别表明，甚至不想谈关于我们正在盼望的最高级会谈问题。伏龙索夫的级别很高，但是这样的外交家却很少有什么决定权；他们一般都是呆若木鸡般地递交照会，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答复记下来，讨论也只限于几个浅显的问题，不敢表示己见。因此，当伏龙索夫显得轻松愉快时，人们可以肯定，那准是奉命行事；当他的表情严肃时，也准是克里姆林宫在皱眉头。

七月底，我在圣克利门蒂接到伏龙索夫打来的一个电话，他说，一旦我回到华盛顿，他有一个照会要立即递给我。我猜想这可能是关系到苏联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谈的事。我们于八月四日在白宫内我的办公室里会面，伏龙索夫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他没有带来莫斯科关于最高级会谈的消息，但是他知道正在积极而赞许地加以考虑；他认为我们两国的关系正在"好转"。他这次是来转达他的政府的愿望，重申一九六二年肯尼迪—赫鲁晓夫关于古巴的协议："我们愿意强调，在古巴问题上，我们一如既往，按照以

前对这个问题所达成的协议行事，我们希望美国方面也严格地遵守这个协议。”

我对此感到迷惑不解，并且作了这样的表示。关于古巴，我没有觉察到有什么特别紧张的地方，我们并没有作出异乎寻常的举动，苏联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没有什么理由的。伏龙索夫态度和蔼，要我放心。他说，最近又有新的传闻，说美国计划要加强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防务，还说苏联在古巴有什么军事活动；他读了一段照会给我听，抱怨古巴的流亡分子在佛罗里达州加强颠覆古巴的活动。我问他，莫斯科希望确认一九六二年协议中的哪一方面，以及伏龙索夫认为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他说，只要我口头表态就行了，他对这个协议的理解是，我们不应以军事力量入侵古巴。我说，我要和总统商量这件事，并在商量后通知他。

我立即要国务院把一九六二年协议的档案和解释找出来。亚历克西斯·约翰逊把肯尼迪—赫鲁晓夫来往信件的内容摘要，以及约翰·麦克洛伊和华西里·库兹涅佐夫随后的关于苏联导弹和轰炸机撤退的安排的会谈纪要，送了过来。看起来，既没有口头的也没有文字的正式协议。但是，来往信件很长，也很详尽，足以构成一种互相保证。我向总统汇报说：

赫鲁晓夫—肯尼迪的来往信件清楚地表明，存在着一个心照不宣的协议，即：如果苏联在联合国的监视下，从古巴撤出其进攻性的导弹，并作出适当的保证，保证不再把这样的武器系统运进古巴，我们就同意提出不侵犯古巴的保证。然而，这个协议从来没有明确地加以完成，因为苏联不接受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检查制度（因为卡斯特罗反对），而我们也从来没有提出正式的不入侵保证。麦克洛伊和库兹涅佐夫之间的会谈，本来打算是要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正式的肯尼迪—赫鲁晓夫“协议”，但最后却不了了之。

因此，我们和苏联的这个“协议”是一个心照不宣的协议，从来没有正式

地讲清楚。事实上，苏联撤走了他们的导弹，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还将运进这些武器；当然，我们也没有侵犯古巴。

美国也把它的看法公开地记录在档案上，而且从来也没有引起争论。关于海军或是潜艇基地的问题只是短暂地出现了一下。约翰·麦克洛伊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向库兹涅佐夫提出了这个问题，声言美国反对苏联在古巴建立任何军事基地。库兹涅佐夫说他理解了。

对于尼克松来说，古巴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当他在一九六〇年竞选总统时，在他和肯尼迪进行著名的电视辩论中，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在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前几天，肯尼迪主张用美国军队进行干预，推翻卡斯特罗；在那些日子里，一种强硬的姿态并不被认为是与自由派的政治哲学不相一致的。尼克松是知道那个后来失败的猪湾入侵计划的；他感到不便否定肯尼迪的这个主张。他的目的究竟是要掩护这个秘密进行的计划，还是如他所说的，他是要与肯尼迪的"缺乏经验"相对照，表明他自己在政治上的老练，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他后来自己承认是他爱国主义的自我约束导致了他的失败。在他的回忆录里，尼克松带点儿辛酸的味道写道："在那次辩论中，肯尼迪给人以这样的形象——给六千万人——他对卡斯特罗和共产主义比我要强硬些。"① 尼克松下定决心，再也不让人对他作这样的指责。

尼克松并没有在一九六〇年古巴问题上一劳永逸地摆脱了。一九六二年，当他竞选加利福尼亚州长时，古巴导弹危机在竞选运动的最后三周中占了主要地位——尼克松一直把这个阶段，看作是对选举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刻。虽然当时他的选票已经落在后面了，但他还是认为，是这次危机使他失去了挽回败局的机会。

他一直认为肯尼迪特地挑选这个摊牌的时机，以便在中期选举中改善民主党人的处境。对于尼克松来说，古巴问题和竞选运动凑巧碰在一起，便引起了一阵阵的不祥之兆和怨恨之情。在他看来，在一个国会选举年，没有什么比要避免一次古巴危机更重要的了。

但是在一九七〇年八月中旬，在我们的脑子里已不再有这件事了。尼克松和我甚至还在推测，伏龙索夫递交的照会，可能是苏联好心好意要改善今秋最高级会谈气氛的一个迹象。我们的自满情绪反映在我们对联邦调查局报告的反应上，而这个报告碰巧在八月五日送到我们手上；该报告声称，迈阿密的古巴流亡分子雇用了两艘船，企图击沉驶往古巴的一艘苏联油船。尼克松向来是同情那些古巴流亡分子的，却立即同意派遣两艘海岸警卫艇尾随这艘油船，并在必要时对它加以保护。从迈阿密驶出两只船对一艘苏联油船进行袭击，这在莫斯科送来了照会之后，是无法解释得清楚的。结果，袭击的情况一直没有出现。我们没有其他理由要特别担心。U-2侦察机定期执行飞行摄影任务，已经注意到在古巴境内和古巴周围，苏联的军事活动在增加。但是它们没有侦察到足以说明违反"协议"的行为。

八月七日，我把美国的复照交给了伏龙索夫。复照对于苏联政府保证一九六二年的协议仍然全部有效表示满意。我们认为，这等于规定，在古巴领土上，禁止装置任何类型的进攻性武器，或任何进攻性的运载系统。我们重申，我们方面将不会用军事力量来改变古巴政府的结构。我还加上一句"个人的"意见，说苏联曾用改装了的轰炸机在我国的东海岸外的海面上空作侦察飞行，而且是以古巴作为最后目的地的。在我们看来，这已经到达协议规定的极限。把这种飞行减少到绝对最低限度，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肯定大有裨益；如果苏联对于它在加勒比海的海军行动大加约束，

我们同样也会注意到。

伏龙索夫对我所谈到的这些意见的良好用心，表示赞赏。他相信克里姆林宫接到我们对一九六二年协议的确认，将会很高兴。他重述他先前说过的印象，认为我们双方之间的关系有明显好转。

就事论事来看，伏龙索夫或者是他的主子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实在难以逆料。在外交政策上要拙劣的花招往往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甚至以马基雅维里式的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国际关系，只要失去了信誉，那就需要做一些很明显的好事才能弥补过来。而明显的转变是很难争取到的。可以肯定，一九七〇年夏季晚些时候，苏联在古巴的所作所为，它所冒的风险，与它所可能得到的好处是不相称的。

一支小舰队驶往西恩富戈斯

在古巴的南海岸，有一个名叫西恩富戈斯的海港。只有一条航道能通到这个港口，而这条航道是通往一个小岛林立、并有陡峭山丘环抱的海湾的。在这些小岛中其中有一个名叫卡约·阿尔卡特拉斯的岛屿上，一架U-2飞机于八月二十六日拍摄到了新的施工活动照片，而在十一天前的一次飞行中还看不出这些活动。看来这一活动已进行了好几天了；能够确切地识别得出的全部情况，只是在一个码头上和若干个新营房中进行的施工活动。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什么异常现象。使得这件事变得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另外一件情报：一支苏联小舰队正在驶往古巴；其中包括一艘潜艇供应船，一艘导弹巡洋舰，一艘导弹驱逐舰，一艘远洋救护拖船，一艘重型

---

* 指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政治家。——译者

打捞舰，一艘商用油船，以及一艘载有两只八十英尺长的海军专用汽艇的两栖登陆艇。这种类型的供应船和汽艇，通常是为了维修潜艇用的。这支特遣队的组成是前所未有的。其规模似乎已超过一次礼仪性的访问。突然，大半年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具有新的意义。

卡斯特罗认为，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行为是卑鄙的投降。莫斯科和哈瓦那的关系急剧地恶化。一九六七年，卡斯特罗甚至竟到了公开攻击苏联的地步，说苏联人在六日战争*中，没有给他们的阿拉伯朋友以有效的援助。他反对苏联想要把中国开除出共产主义运动的努力，并在没有苏联帮助下继续在拉丁美洲执行其“输出革命”的激进政策。柯西金于一九六七年会见了卡斯特罗，但是就在那年十一月苏联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古巴只派了一个低级官员代表团前去莫斯科，实际上，这是对那次庆祝活动的抵制；这个代表团没有受到任何苏联高级官员的接见，几乎立即就离开了莫斯科。然而，一九六七年十月，切·格瓦拉逝世以后，两国关系有了改善。一九六八年春，签订了一项新的贸易协定，包括三亿多美元的苏联贷款。一九六八年八月，古巴赞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尽管时间迟了些并附有条件。在一九六九年早些时候，苏联首次恢复了按年度定期运送军事援助物资，他们也重新补助古巴对苏联的贸易赤字。到了一九六九年六月的各国共产党会议时，古巴代表竟大言不惭地说，如果出现“对苏联人民的挑衅或侵略，不管它来自哪里”，哈瓦那将支持莫斯科。这是在中苏争执中古巴首次站在苏联一边。

下一个月，即一九六九年七月，苏联海军对古巴进行了首次访问。七艘舰只，其中包括两艘柴油动力和一艘核动力的攻击型

---

* 指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至十一日以色列向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发动的战争。——译者

潜艇，访问了海港，接着在墨西哥湾进行了若干次演习；苏联海军在访问了马提尼克和巴巴多斯之后，离开这个地区。与此同时，一艘苏联新型的Y级弹道导弹潜艇开始在北大西洋进行首次巡逻。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苏古在军事上的关系又前进了一步。苏联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对古巴进行了一次大肆宣扬的访问，同行者是苏联海军副参谋长。事后看来很可能就是这次访问，导致我下面所要谈到的事件。在格列奇科访问后的一个月，至少是，苏联在古巴境内和古巴周围的军事活动增加了——几乎使我们感到，苏联海军出现在加勒比海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一九七〇年四月，古巴国防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对格列奇科的访问进行了回访，并在苏联逗留了五个星期，还会见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四月二十二日，在一次纪念列宁诞辰的讲话中，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他准备和苏联建立更加密切的军事联系。其后不久，远航程侦察机开始从苏联北部飞往古巴；这些都是明显可见地装有电子设备的Tu-95喷气轰炸机。在它们进行了三次飞行之后，苏联海军特遣队又对古巴进行了第二次访问。这是在四月份，在一次在北大西洋举行的大规模苏联海军演习（Okean）之后紧接着发生的事。这一次，七艘舰只抵达西恩富戈斯，作了为期两周的访问。这七艘舰只中包括有一艘潜艇供应船，一艘核动力E-II级潜艇，上面装有用于攻击海运的短程巡航导弹。

那时，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都没有发出警告，而苏联海空军日益加紧其军事行动的步伐却令我非常担心，一九七〇年六月一日，我为此给总统写了一份综合报告：

尽管苏联海军的访问，可能是近年来苏联海军日益远离苏联国内的海港进行活动的整个趋势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访问也可能是，通过逐渐建立苏联的舰队和空军部队进行访问和加油的先例，企图使华盛顿“习惯于”苏联更多

地使用古巴。可以想象，苏联人希望在加勒比海和南太平洋比较永久地保持一支海军。它以古巴作为加油和获得供应的地方……。注意这个形势将是非常重要的。

六月下旬，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我的一位拉丁美洲问题工作人员维龙·P·瓦基提醒我注意中央情报局的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认为，不管是如何小心翼翼，苏联可能打算在古巴建立新的军事设施，例如，为舰只或侦察机提供维修服务的设施。

以这个报告为背景，我们注意到，一支苏联舰队于九月九日抵达西恩富戈斯。第二天，一艘商用油船又加入到这支舰队之中。U-2飞机奉命每天作侦察飞行。在第一个晴朗的日子就开始飞行，这一天是九月十四日。

美国政府在那个时刻对于这支舰队比对这些新的岸上军事设施更为担心得多。梅尔·莱尔德以一种不寻常的姿态，于九月二日把常驻五角大楼的记者邀请到他的小餐厅喝咖啡，举行了一次即席记者招待会。莱尔德历数包括中东在内的一系列争端问题。但是，成为头条新闻的却是他关于古巴的谈话。他提醒大家注意，苏联的舰只正驶向加勒比海，有关消息应该公开，因为有迹象表明，苏联海军特遣队装有能够发射到美国的武器。但是，他又说："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次危机"，因为美国有足够的核力量来遏制进攻。② 但是，这个报道没有受到新闻界的长期重视。苏伊士运河沿岸的违反停火协议事件以及笼罩着约旦的危机，大大地超过了古巴问题。这可能就是苏联人为什么不急于要帮助平息中东问题的原因。当约旦局势十分紧张而苏联又在古巴建立潜艇基地时，美国参议院却从美国的防御性战略部署是具有挑衅性的前提出发，正在辩论反弹道导弹问题；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

古巴对我们U-2飞机的每天飞行作出反应，这表明不寻常的

事正在酝酿中。九月十四日，我们的第一次飞行，由于米格飞机紧急起飞尾随，不得不放弃。另外一次在该岛周围的飞行也受到拦截，被迫停止执行任务。九月十五日，美国海军反潜艇飞机遭遇到米格飞机的拦截，并被跟踪了六十英里，米格飞机还作过几次俯冲。九月十六日，我对此感到十分关切，就警告苏联说，携带导弹的潜艇或核武器在古巴进行活动或维修，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我是利用在芝加哥召开的一次背景情况介绍会来发出这个警告的。由于我们还没有掌握任何具体的证据，或者是一项既定的政策，我就没有作直截了当的指控，说苏联人确实是在干这些事，看来最好还是要给他们留下一条后退的路。

碰巧，就在那一天，U-2飞机搜集到了确凿无疑的证据。照片表明，在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里，苏联已经把相当重要的岸上军事设施赶建完成。两座新营房和行政大楼突然矗立在一个月前还是荒无人烟的卡约·阿尔卡特拉斯岛上。娱乐设施也在这个岛上很快地建立起来了，包括一个篮球场和一个足球场。在我看来，这就无可否认地说明它是一个苏联的基地，因为作为一个老足球迷，我深知古巴人是很少踢足球的。更为重要的是，潜艇供应船永久性地系在海湾的四个浮筒上。供应船旁是两艘汽艇，这是从两栖登陆艇上卸下来的。这样，供应船就能维修潜艇了。反潜艇的网已布在港口，作为防卫之用。在古巴本土，在离西恩富戈斯市几英里地方，建立了一个新的船坞、燃料贮存库以及大型通讯设备的初期工程。毫无疑问，这是用于和莫斯科进行无线电联系的设备，由地对空导弹和监视雷达加以保护。总之，我们看到了一个永久性的苏联海军基地所具备的全部特征。

九月十八日，我整理了一份情报材料，并把和伏龙索夫交换意见的概要说明，一并写成一份备忘录送交给尼克松。我在结尾中说：

今天的照片分析证明，尽管伏龙索夫和我交换了意见，苏联还是匆忙地采取行动，在西恩富戈斯湾建立了一个军事设施，它可能用来当作加勒比海的一个潜艇补给基地。因为局势严重，我让中央情报局在今天十二点半给我安排一个新闻发布会。到那时，我们将仔细地估价现在所掌握的全部照片证据，以便更加确切地断定苏联在古巴活动的全部规模。我也将紧急地召集工作人员对这种发展的战略含义进行详细分析。

那天晚些时候，我收到的情报分析报告断定，苏联人是"（在西恩富戈斯）为其海军在加勒比海和大西洋的活动建立一个补给站。"情报分析报告又不祥地指出，"苏联的海军，包括核动力潜艇在内，可能很快地在古巴的西恩富戈斯港外进行定期活动。"我们的海军专家指出，苏联在古巴有了永久性的军事设施，这样，其潜艇花在长途跋涉到大西洋活动区域去的时间，就可以大大缩短。结果是，苏联弹道导弹潜艇停留在能够射达美国的地点的时间可以增加大约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任何时候，同时驻在该地的潜艇的数目也可以增加大约三分之一左右。这将是苏联对美国作战的战略能力的一次大飞跃。

摊　　牌

正当我们在谈判释放被扣在安曼的人质之时，正当侯赛因的军队慢慢地向阿拉伯突击队挺进之时，正当美国军队有的快速地开往地中海，有的也在进行动员之时，正当苏伊士运河沿岸不断发生违反停火协议事件之时，正当我们设法计划要对智利阿连德掌握的多数作出反应之时，苏联在古巴建立海军基地的确实消息传到了我们的耳边。我们面临的状况对政策制订者来说是一场可怕的恶梦：在全世界广泛的各不相连的地区同时发生危机。

高级官员的反应说明了这种情况。九月十八日——这一天华

盛顿证实了关于西恩富戈斯的情报——国务卿罗杰斯告诉我说，我们必须防止"高度紧张"。他希望公文数量要限制到最低限度内，以便不要"在公众的思想里造成一次危机"。当然，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公众的思想里有无危机，而是客观上是否存在着危机；我们是否能够接受，苏联除了在埃及派遣军事人员之外，又在古巴建立永久性的海军基地——不管其眼前的军事重要性如何。我告诉罗杰斯，我将要在明天安排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秘密会议，以便有机会来集中一下大家的想法和一些新的情报。

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于九月十九日按预定时间开会。碰巧正是叙利亚入侵之前、约旦的战火暂时平息的日子。因为有关西恩富戈斯的情报还只限于一定的范围内，所以工作人员还没有做实际的准备工作，因此意见也只是在随便交谈的方式中打转转。对于事实本身并没有什么争论；大家一致认为，苏联人正在建立一个能维修核潜艇的基地，并企图绕过肯尼迪—赫鲁晓夫协议，把他们的大多数设施建立在沿海岛屿上。关于苏联的行动是否违反了"协议"，却产生了一些争论；我提醒小组说，一九六二年肯尼迪总统作出反应，并不是因为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是"不合法的"——事实上，它当时从技术上讲是"合法的"——而是因为他认为这种做法是对美国安全的一个威胁。于是，该小组就设法精确地测算，一个彻头彻尾的作战基地，将会影响战略平衡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在一九六二年导弹危机时也曾进行过争论）。

这些反应，反映了美国在应付苏联模棱两可的战略中遇到的困难。我们面临的显然是一个新的海军设施。它是在不到三周的时间里用欺骗的手法建成的。即使是不再进一步增加设施，它也将增加苏联把弹道导弹潜艇保持在战斗状态的能力。如果加以扩充，它就可能使苏联针对我们而设的海上发射导弹力量实际上增加一倍。如果苏联按照惯常的做法行事，我们对最初的部署如不

加以抵制，那末，接着而来的便是苏联进一步迅速增加其部署。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导弹集结的经验将会重演，而这次却是针对我们的。如果我们对最初的设施默不作声，他们再加以扩展，我们就难以抵制了。但是，由于到当时为止，我国政府对于苏联到底要干什么，还不十分清楚，因此我们的反应也是犹豫不定的。由于总统和国务卿都希望在我们没有定下行动方针之前，避免造成危机气氛，我便要求出席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每个部门，在九月二十一日之前非常秘密地提出他们的估计和建议。国务院还特别征求了卢埃林·汤普森大使——当时是我们的首席苏联问题专家——的意见。

卢埃林·汤普森回答说，苏联的行动主要是象征性的。这是他们自卑心理*的一种征兆。尽管苏联对我们在意识形态上进行恶骂，我们还是一个苏联想要竭力仿效的大国模范，他们在发展上落后于我们十五年。换句话说，汤普森认为，苏联现在是在模仿我们十五年以前在海外发展海军基地的做法。国务院建议的办法是，罗杰斯和葛罗米柯利用他们一个月的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常见面的机会，在纽约进行一次私下谈话，届时罗杰斯可以指出我们的担心。汤普森并没有说，如果葛罗米柯打守球的话——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我们该怎么办。

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估计却与此完全相反。他们把西恩富戈斯的潜艇基地看成是对美国的一种战略性威胁；在他们看来，它将使得苏联的潜艇能够延长他们在海上的作战时间，并提高苏联海下舰队在墨西哥湾的作战能力，从而使美国有更多的地区暴露在弹道导弹的袭击范围之内。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从技术上进行解释，这样的基地将如何用于作战。当然，他们建议撤除

---

* 指心理上的一种病态。——译者

这个基地，但是正如许多军事计划文件所建议的那样，它让政治领导人去想办法，怎样来完成这样一个彻底清除的目的。有人提出一种措施，推迟我们的一些海军舰只的退役时间；但这样的建议怎么能表示我们的决心，或者使苏联撤出古巴，这只好留待人们去想象了。一九七〇年秋提出了另一种有眼光的建议——在我们在柬埔寨采取行动后的六个星期提出的——是征召预备役军人。

我认为苏联行动的含义已超出军事范围；我把这种行动看成是他们正在世界各个不同地区对我们进行试探过程的一部分。当我们对苏联派军队进入中东作出的反应是促使以色列接受停火建议时，克里姆林宫也许觉得壮了胆。我强烈地主张立即应付这次挑战，以免苏联人误认为我们会持宽容态度，并把他们的活动升级到只有通过一次大的危机才能撤除基地的地步。我反对那些浪费时间的活动，如像等待葛罗米柯和罗杰斯在一个月后去进行会谈。苏联人知道，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西恩富戈斯拍照；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他们一定会认为我们是默许了。如果后来我们突然进行对抗，他们可能就没有回旋的余地；随之而来的危机可能会加剧，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故意羞辱他们。而且我们还在期待他们对我们关于最高级会谈的建议会即将作出答复。如果苏联的答复是肯定的，我们将更难以和他们进行对抗。如果我们和他们进行对抗，我们必定会做得很粗暴，而且其粗暴的程度将会损害双方最高领导人的威信，甚至使得制止危机变得更为困难。

苏联这么多的装备都用轮船海运，在我看来，这个事实就表明，他们已为他们自己安排了退路；如果受到挑战，他们会准备格斗；也可能讨价还价；不过如果让他们下得了台，他们就会撤退。要把他们这种策略说得让总统信服，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确，我一直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一次偶然事件就触发了最后的摊牌。

在大选期间碰上古巴危机，这最使尼克松感到头痛。任何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苏联在古巴建立海军基地，不管为时多久，他也绝对不能容忍的。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在这件事上他是采取强硬立场的。查尔斯·里博佐从一股拉丁民族的狂热出发，痛恨卡斯特罗，尼克松和里博佐的友谊，使他必然会受到主张强硬路线论点的影响；他在他的老朋友面前从不示弱。迟早他会回击，而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但是我们现在正处在约旦危机之中，叙利亚的坦克刚刚开进约旦，尼克松完全知道，危机可能导致和苏联摊牌。总统把全副注意力集中在眼前这次挑战上。而且，尼克松认为，正如越南战争使新闻界和国会诋毁总统的信誉那样，在大选之年，一次新的古巴导弹危机将会引起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不满。最后，尼克松定于九月二十七日前往地中海旅行，他对此寄予希望，特别是寄希望于第六舰队的火力演习。如果我们正处在古巴危机之中，他不知道，他怎么能够离开这个国家。尽管如此，尼克松的策略思想还是倾向于等到大选一结束，再和苏联人进行对抗。他接受了我的分析，但是眼下还是采取了罗杰斯的安抚拖延政策。

我把九月十六日 U-2 飞机执行任务的结果，写了备忘录送给了尼克松，他的初步反应的确是很强硬的。他的亲笔批示如下：

我希望看到一个应急报告，说明：(1)中央情报局有什么办法去支持任何使卡斯特罗感到烦恼的行动；(2) 我们能采取迄今没有采取过的什么样的行动，来抵制与卡斯特罗有来往的那些国家；(3) 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秘密的或公开的，来把导弹设置在土耳其——或者在黑海设置潜艇基地——或者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来为我们搞到一些做交易的本钱。

但是，经过详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些都是花费时间的办法。跟卡斯特罗为难，六十年代已试过，并失败了，这件事要花费好几个

月才能准备就绪；“激怒”卡斯特罗对于苏联的基地不会有什么影响。加紧抵制古巴，甚至见效更慢，这与我们盟国的现有政策趋势背道而驰，而且短期内也不会见效。上次由于古巴导弹危机而撤除了在土耳其的导弹，现在重新装置，就难以很快实现。而且即使成功，如果土耳其人认识到，我们只是利用他们当作“做交易的本钱”，那么就会动摇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九月十九日，当我把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讨论结果汇报给尼克松时，他叫我把这件事不要声张出去。他说，他不希望有些“小丑似的参议员”在大选期间要求封锁古巴（如像一九六二年一些共和党参议员所做过的那样）。我们是处于一种非比寻常的状态。总统打算进行对抗，但是他那想拖延两个月再摊牌的愿望，却大大地增加了危险。

每逢我的个人劝说不顶用的时候，我就去求助于霍尔德曼，他总是会不掺入个人意见地把我的想法忠实地和不加夸张地加以转达。去找霍尔德曼还是有风险的，因为他很可能把严重的关切，解释成为一种感情脆弱的表现。他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心，认为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用搞好公共关系的办法解决的。但是他肯定会把我的不安情绪转告尼克松，即使他认为我把事情看得过分严重了。我告诉霍尔德曼说，总统没有把全副精力放在真正的问题上。如果十一月或者十二月出现了危机，我们就非常难以说清楚为什么不在九月份没有采取措施。由于我们同时仍在进行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苏联人可能产生错觉，以致于采取会把局势弄得不可收拾的步骤。

九月二十三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有助于统一高级官员的思想。有些情报表明，我们还有点时间来应付，有些则强调了危机的紧迫性。站在乐天派这一边的有赫尔姆斯，他认为，如果苏联打算在古巴建立永久性的弹道导弹潜艇基地，他们还需要更多的重

型设备，特别是大型的起重机。到现在为止，西恩富戈斯还没有这种装备。此外，我们没有听说这个地区有携带导弹的潜艇。在另一方面，别的一些情报显示，核武器可能就装在其中的一艘舰只上。结果，总统决定按照他私下向我暗示过的方针办事。他要求为下列行动制订应急计划：在西恩富戈斯布雷；封锁古巴；跟踪苏联舰只；取消对古巴流亡分子的一切限制。这些计划在将来的某个时期将加以贯彻执行。在这段间歇时间里，他下令采取一种低调的公开姿态，只限于指出说，我们了解到了所发生的事情，并正予以密切注视。梅尔·莱尔德指出，这绝不会管用，很多人都知道内情，消息总会走漏出去的。

必须指出，在九月二十三日国家安全委员开会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叙利亚坦克已经撤退，约旦的危机已经结束了。因此，总统的拖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还是感到非常不安。我认为，我们拟订的政策，可能会诱使苏联人在加勒比海的行动升级。我不能理解，如果苏联在古巴的军事设施仍旧没有拆除，我们怎么能从九月份的低调姿态，转而在十一月份进行对抗；或者是，如果苏联采取逐渐扩张的办法，我们又怎么去为进行摊牌作出解释呢？如果在这期间，苏联人接受了我们关于最高级会谈的建议，问题将会变得几乎无法处理了。总之，我们拖的时间越长，当我们向苏联人提出挑战时，对于我们和苏联来说，作出抉择将会越困难，而且控制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也就更加困难了。

九月二十四日——在叙利亚坦克撤退后的第二天——我在情况室召开了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贯彻执行总统关于古巴问题的决定，虽然我很不同意这个决定。讨论的内容全都是关于新闻发布的原则，假定西恩富戈斯的军事设施的消息被捅出去了，而总统又还在欧洲的话。会议决定，如果这个问题被公开提出来了，国防部将摆出基本事实，但不加评论；国务院将表明对于把

进攻性武器运进古巴表示“关切”；而白宫则仅仅声明，总统已经接到报告，并正在注意事态的发展。把事实详情向政府各部门的新闻发布官们作了介绍；其目的是想让他们了解背景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而不是供他们发布新闻用的。正当我们在设法执行总统的决定的时候，由于官僚机构的极度混乱，这个决定已经成为无关紧要的了。

首先，多勃雷宁在离开七个星期之后又回到了华盛顿。他于九月二十四日傍晚拜会我，脸上流露出友善之意，带开玩笑地说，我违背了答应他在他离开的时候不制造危机的诺言（指约旦）；还说，他带来了一封关于约旦和关于最高级会谈的信件；他奉命要把这封信亲自交给总统。我把这件事汇报给总统，但尼克松不愿意接见多勃雷宁。他唯恐苏联人会拒绝最高级会谈，他不希望亲自接受这个断然的拒绝。我告诉他说，苏联人可能不会拒绝他而是想要戏弄他，把最高级会谈推迟到一九七一年。可是，我们两个人都一致认为，让总统等待六个星期之久，才得到对于一个八月间提出的要在十月间召开最高级会谈的建议的答复，这是一个无礼的行为，不应得到总统的亲自接见。尼克松也不想在接见多勃雷宁时不谈古巴问题，他也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讨论西恩富戈斯问题而不激起令人讨厌的危机，或者使人不留下一个我们予以默认的印象。最后决定由我来接受多勃雷宁的信件；这是我们给苏联人以冷遇的最好的示意。当我告诉多勃雷宁时，他推托说他还得请示莫斯科。

最后，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上午十点，与往常一样，多勃雷宁和我在白宫筹划室会晤。我以总统即将启程去欧洲，时间紧迫为理由，没有和多勃雷宁作一般性的讨论。多勃雷宁的信件不出我所料，苏联原则上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谈，我们八月二十四日所提出的议程被接受了。多勃雷宁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花费这么长的

时间才得出这个意味深长的结论。不过，苏联政府仍然倾向于在一九七一年春天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之后举行这一最高级会谈，这实际上是指不在六月以前举行。接着，多勃雷宁想知道，总统是否想把莫斯科当作举行会谈的地点。但是，当我多次表示，总统的脑子里确曾有过这种想法时，多勃雷宁却并没有提出真正的邀请。他说地点和时间可以以后再作进一步讨论。他还告诉我说，柯西金总理将不参加一九七〇年十月的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因而也就堵绝了在国会选举之前举行一次高级会谈的机会。多勃雷宁也带来了苏联领导人对于约旦危机的反应，这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我冷淡地回答他说，我将在以后再和他接触。

当我回到办公室时，出现了一阵混乱。那天早晨，专栏作家C·L·苏兹贝格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里，以《南方的乌云》为标题，提出警告说，苏联可能在西恩富戈斯建立潜艇基地。国防部发言人在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违背了我们原先仔细计划好的新闻发布方针，当有人提问时，他把所有的详细情况都透露出去了。这是华盛顿的一次典型的把指示搞错了的事例。五角大楼新闻发布官知道应急计划中的指导原则，可是他不懂得，只能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运用这些原则，而且不应提背景情况。因此，他自动地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把过去几个月来苏联的建筑工程和海军活动情况，一古脑儿地说了出来。

新闻界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美联社带头报道说："今天五角大楼说，有确实的迹象表明，苏联正在古巴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潜艇基地。"合众国际社报道说："今天国防部说，有证据表明，俄国人开始在古巴建立一个潜艇基地。"毫无疑问，晚上的电视新闻和第二天的早报定将绘声绘色地进一步大肆渲染。总统两天之后将离开这个国家，而对于这次新的"危机"，白宫如果不发表声明，这是不可想象的事。尽管梅尔·莱尔德和戴夫·帕卡德打来电话，为这

次五角大楼粗心大意的新闻发布会表示歉意，但是事情已经搞糟了。莱尔德建议由国防部采取强硬的方针，以便让白宫表现出和解的样子。但是我不赞成这样办："我们可以不加重视，并说这完全是自然的事，以便可以照常进行这次旅行。但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怎么能够和他们进行对抗呢？而总统要做的却正是要进行对抗。"

可是，尽管如此，五角大楼这次所出的洋相倒却帮了我们的大忙。原来计划的只发表基本事实的新闻发布方针是太克制了，肯定会让苏联人认为我们是默认了。总统出国旅行将为他们完成基地建设提供一个机会；而最后的无可避免的对抗，对双方来说都将是痛苦的，而且风险更大。可是现在我们将被迫执行我们所主张的行动方针。我告诉总统说，我们现在除了压倒苏联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在做法上，我们应给他们留一条出路。我建议利用那天下午已安排好的关于尼克松的地中海之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对苏联人发出一个强硬的警告，反对他们在古巴建立潜艇基地；我将不提基地是否已经存在，以便给苏联人留一条明显的退路。于是，我便召见安纳托利·多勃雷宁大使，假装要回答他关于最高级会谈的建议，然后直接向他提出抗议，并告诉他，我们认为西恩富戈斯是一个进攻性基地，因而将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坚持要把它拆除掉。总统的旅行将为完成此项目的提供了一个间歇时机。

当要明确地作出抉择时，尼克松往往是果断的。他立即懂得，模棱两可只会增加美国的危险。他批准了我的建议，并要我去请海军上将穆勒调一艘驱逐舰到西恩富戈斯附近去，以强调我们的警告。尼克松在执行外交政策中的特点是果敢；他在启程出国旅行前夕，正是以这种果敢的态度下令对苏联进行挑战。因此，我就到白宫东大厅去召开白宫新闻发布会——表面上是为了总统的旅行，当预料中的古巴问题出现时，我回答说：

对于苏联在加勒比海的海军活动，当然我们正注视着苏联在那里的海军活动，以及可能进行的工程建设的发展情况。我们非常密切地注视着这种情况。苏联可以毫不怀疑，我们将以最认真的态度，对待在加勒比海地区建立战略基地这件事。

我希望大家注意肯尼迪总统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他的讲话如下：

"就我们方面来说，如果在具备充分的核实和保证的情况下，所有的进攻性武器都从古巴撤出去，将来也不进入西半球；如果古巴不再用于输出侵略性的共产主义的目的，那末加勒比海将会有和平。"

当然，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如果所有的进攻性武器都从古巴撤出去，将来也不进入西半球。"

当然，本届政府仍然奉行这种政策。

在新闻发布会上后来有人问我，总统现在出国旅行，时机是否不合适。我回答说：

我们在注视着古巴事态的发展。在这个时刻，我们还不能准确地说出事态的真正含义。我们将继续监视他们，并在适当时候采取看来是必要的行动。我们有精良的通讯系统。不可能出现急转直下和戏剧性的事态，我们将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

我举行的关于总统出国旅行的这次新闻发布会是不供报纸发表的——在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之前不供发表，最早也得在总统离开的那天星期日见报。新闻记者们要求龙·齐格勒准予立即发表我的这次古巴问题声明。我同意了。

下午五点三十分，我的新闻发布会结束后两小时，我在筹划室再次会见了多勃雷宁。我召见多勃雷宁的托词是答复他就最高级会谈所询问的各点；我们也能够利用关于最高级会谈问题的讨论，

把对抗情绪缓和下来。我告诉他，我们原则上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谈，建议在一九七一年六月或九月举行，视准备情况而定。可以在莫斯科举行。

然后，我便转向会谈的正题。毫无疑问，多勃雷宁已从通讯社的电讯中，看到那天下午我在新闻发布会中所谈到的背景情况。我字斟句酌地暗示，美国还没有弄清楚苏联在西恩富戈斯行动的确切性质。我希望他懂得，我说这番话只是给他的政府体面地撤退而不必进行对抗的机会。我们认为，西恩富戈斯的工程明白无误地是一个潜艇基地。莫斯科不应该存有幻想；我们将以"最认真的态度"来看待继续建造这项工程这件事；基地不能保留。如果出现不得已的情况，我们将不惜采取其他措施，包括公开的措施。如果这些舰只——特别是潜艇供应船——离开西恩富戈斯，我们将把这件事当作一次训练演习而了结。

多勃雷宁完全是个外交上的行家。他通常是和颜悦色、和蔼可亲的，但是他也懂得，什么时候和颜悦色是无补于事的，什么时候他惯用的历数我们罪行的故伎是不适用的。现在的争执是关系到两个大国的重大利益的交锋。因此，他一本正经地设法弄清楚我们提出问题的程度和范围。美国是否在声称，一九六二年的协议已被违反？我反驳他说，这是想钻法律条文的空子，为自己辩解。一九六二年肯尼迪采取行动时，并没有声称是因为违反协议。对我们来说，古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我们把这一连串的事情，从伏龙索夫八月四日的花招开始，看成是极端背信弃义的行为。这些设施是以最恶劣的欺骗手法建成的，不能予以保留。多勃雷宁问，我们是否将在这个问题上掀起一场大的新闻攻势，他显然是在估量，如果撤退，会丢失多大的面子。我回答说，我们并没有打算这样做；总统离开美国去欧洲旅行十天，这段时间内，在这个问题上将不再举行新闻发布会。这样，苏联就有机会考虑，是准备和

解呢，还是要进行对抗。我们作了两手准备。我们已下定决心，不允许苏联在古巴建立潜艇基地。不论一九六二年协议的措词如何，其实质不可能是以海上导弹基地来代替陆上导弹基地。多勃雷宁冷冷地说，他将向莫斯科汇报，并再和我们进行接触。

我们遵守诺言，没有举行政府新闻发布会。罗杰斯和莱尔德随同总统去旅行，因此比往常更容易保持新闻政策的连贯性。事实仍然是，在叙利亚对约旦的入侵结束后四十八小时，我们又濒临另一次对抗，这一次是和一个超级大国对抗。

消 除 危 机

当然，我们无法阻止由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而引起的新闻界和国会中的猜测。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警告赤色分子在古巴建立潜艇基地》的文章。但是新闻的中心仍是总统即将启程去地中海旅行一事。关于古巴问题的传说慢慢地在传开，对于尼克松在危机中出访并没有提出批评。《华盛顿明星报》引用巴里·戈德华特参议员的话，认为五角大楼透露的苏联可能在古巴建立核潜艇基地一事，“是苏联令人担心地争夺世界统治权”的一个证明。该报也引用了迈克·曼斯菲尔德参议员的话说：“我的确是以焦虑的心情来看待这件事的。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所发表的声明说，进攻性武器不得进入西半球，以确保‘加勒比海的和平’。根据这段话来看，这件事给我们提出了最严重的问题。”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于九月二十七日以《古巴问题和冷战已再次出现》为题的一篇文章的提要中写道：“美国和苏联领导人之间现在产生了一些非常严重和危险的问题。他们显然在东南亚、中东和古巴问题上彼此错误地估计对方，这对于他们和世界的和平来说，可能是个悲剧。”

但是，这正是越南战争的年代。几乎立刻出现了攻击政府的第二批反应。九月二十七日，星期日，正当尼克松一行离开华盛顿之时，J·威廉·富布赖特参议员在电视节目《问题与解答》中表示了他的怀疑："差不多每年正当我们即将在参议院讨论拨款法案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一类的报道；因此，它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不是真实的。"他谈到，说苏联无权到古巴来，这是一种"站不住脚的提法"。他怀疑，我们能否把苏联人从古巴吓跑，因为他们现在拥有"均势地位了"。我们官僚机构中的怀疑派的看法出现在九月三十日《纽约时报》头版的一篇报道中，是由塔德·苏尔克写的：

美国官员今天声称，美国只拥有没有把握和过了时的情报可以说明，苏联可能打算要在古巴建立一个战略性潜艇基地。为此，这些官员——包括情报机构的成员在内——说，他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白宫选择上星期来警告莫斯科，反对他们建立这样的基地。

弗兰克·丘奇参议员也谈到同样的话题。他在十月一日一次情报简况介绍会之后谈到，目前的证据并不能得出这样或那样的言之成理的结论。十月四日，我们的官僚机构中的另一派人的怀疑论点，由《纽约时报》尼尔·希恩加以报道："军事分析家们说，他们还不能肯定，西恩富戈斯陆上的新建工程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们说，它可能是一个供潜艇人员住宿和文娱活动之用的一个小规模设施……。总之，这些分析家认为，俄国人不需要，可能也不希望在西恩富戈斯建立任何大型基地，供'扬基'级核潜艇*之用。"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并不持这种观点；促使苏联建造他们想建造的东西和要扩充他们正在建造的东西的原因，正是由于我们无所作

* 指苏联的一种 Y 级的核潜艇。——译者

为，这也是很明显的。

这些评论家都没有注意到，苏联人一言不发，既没有否认，也没有措词剧烈的抗议。在整个期间，只发表了一篇不大象样的评论，抗议敌对性的宣传。

苏联人认真地对待我们的声明。当我们于十月五日回到了华盛顿，多勃雷宁就立即十分迫切地要求接见。多勃雷宁在第二天带来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是保全面子的信，是为了给他们的阿拉伯代理人看的。信中对我们九月二十五日提出的保证表示满意，我们在那封信里说，如果别的国家不插手，我们也将不干预约旦。克里姆林宫愿意把我们重申的一贯不变的立场，说成是一种建设性的贡献，或许还要把它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成果送给他们的阿拉伯代理人。我认为没有必要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在外交上，只要对方愿意表示今后持克制态度，人们就乐得接受。

苏联的更为重要的一封信涉及到西恩富戈斯。信中一开头就提出过去来往信件所重申的一九六二年协议，信的结尾是一项明确的保证，没有在古巴建立基地。

苏联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在古巴——包括在西恩富戈斯港地区——采取违反上述协议的任何行动。

照会在重弹苏联抱怨美国在海外基地的老调，并指出苏联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已经提出过的限制弹道导弹潜艇的活动范围之后，在结尾中写道：

无论如何，我们愿意重申，苏联方面将严格遵守古巴问题协议的苏方部分，将来也将继续遵守，其前提是美国方面，正如尼克松总统已经重申的，也要严格遵守协议中的美方部分。

多勃雷宁还口头补充说，他虽然不能保证，苏联潜艇永远不访问在古巴的港口，但他准备代表苏联政府断言，弹道导弹潜艇将永远不在负有作战任务的情况下访问此等港口。我回答说，我们应确保两国政府对"基地"一词作一致的理解。我不久将再和他会唔，提出一些明确的看法。

苏联的答复语调显然是积极的，保证他们不在古巴建立海军基地——即使这个定义到当时为止还是含糊不清的——而且苏联的行动也是与此一致的。在我发表了对报界的声明后，港口设施的建设停止了，供应船开到了码头停泊，而不是充当浮动维修设施。第二天，舰队中的两艘舰只也驶离了。

十月九日，我把关于作战性质的"基地"的书面定义送交给多勃雷宁，这是伦布兰特·C·鲁宾逊上尉和我共同拟订出来的，他是我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联络参谋。这个定义是：

> 美国政府理解到，苏联将不在古巴建立、利用或准许建立任何设施，以此用来补给和维修能够携带进攻性武器的苏联海军舰只，即潜艇或装有可以安装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的海面舰只。

这个照会接着特别阐明五种根据协议不得进行的活动。为了强调我们的决心，我们加上了"总统的照会"这个标题。

多勃雷宁接受了这个文件，并说他得等待莫斯科的指示。然而，他可以先告诉我，塔斯社很快就要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十月十三日这篇声明发表了，重申了苏联十月六日照会的主要精神。国务院发言人把这一行动说成是"积极的"。而它也确实是积极的；关于潜艇和海军舰只上的进攻性导弹问题，便首次成为一九六二年协议内容的一部分。

两周之后，我们有趣地深入观察到苏联人是怎样考虑问题的。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于十月二十二日拜会了总统。十月二十三日，我在纽约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里和多勃雷宁谈了一次话，因为尼克松还没有放弃寻求在大选之前就最高级会谈问题发表公告的努力，这是一种注定——对我们来说是好事——要令人失望的努力。多勃雷宁提出古巴问题，他说，葛罗米柯感到惊异，因为总统在稍为提到这个问题之后，就一直没有再谈过它。当然，葛罗米柯想要知道其中的情由。我们会不会策划什么新名堂呢？对于那些鬼肚肠多而思想上一贯好猜疑的苏联人来说，总统不谈这件事一定会有极为不祥的含义。事实上，尼克松之所以没有继续谈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不希望在他的国务卿面前，多谈这个敏感的基辛格—多勃雷宁来往信件问题。我问多勃雷宁，如果总统继续谈这个问题，葛罗米柯将如何回答。多勃雷宁说，葛罗米柯已奉命要说下面一段话："我们在古巴没有基地，我们也没有建立海军设施。我们不打算建立海军设施，我们将严格遵守一九六二年的协议。我们还想把八月以后的来往信件变成一九六二年协议的一部分。"多勃雷宁还说，我们列出的不准进行的活动，不能构成一项正式协议，因为没有对等的原则；但是，苏联懂得我们所指的基地的含意。换句话说，"总统的照会"变成了这个协议的一部分。

但是，苏联人做事是决不会干脆的。苏联的潜艇供应船和救护拖船，由四艘商船和五艘古巴巡逻小汽艇伴随，于十月十日的确驶离了西恩富戈斯港。然而，十月十五日，它们又驶进了古巴北海岸的马里尔港。它们到十月三十一日才驶离了马里尔港。然后，向东驶去之后，它们沿了这个岛国转了一圈，又于十一月七日再次回到西恩富戈斯港。

我于十一月十四日愤怒地向多勃雷宁提出了抗议。十一月二十四日，到处乱窜的伏龙索夫告诉一个新闻记者说，一艘潜艇供应

船的任务就是照料潜艇；这就是它的工作，不过是在海上而已。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告诉多勃雷宁说，在古巴港口或沿海维修潜艇将会“导致美国和苏联之间最严重的局势”。一九七一年一月四日，总统在一次电视谈话中发表声明强调："如果核潜艇在古巴港口或沿海进行维修，那就是违反协议。"一月五日，白宫详细地阐述了这个声明，强调要禁止“在海上任何地方”由古巴开出的潜艇供应船来维修潜艇。③

潜艇供应船于一九七一年一月三日驶离了加勒比海。但是，另外一艘潜艇供应船却代替了它，该船于二月二十四日随同另外一支苏联海军特遣舰队抵达古巴，其中包括一艘核动力攻击潜艇。我向多勃雷宁提出了三次抗议，并在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之后，于二月二十二日递交给多勃雷宁一份照会，表明一艘供应船在过去一百六十六天中，有一百二十五天呆在西恩富戈斯，这是违背协议的。供应船和潜艇驶离了。但是，另外一支苏联舰队于五月又来到了古巴，这次是一艘供应船和一艘核动力巡航导弹潜艇，在一次“训练航行”中，到那里作了一次“短期休假”访问。显然，苏联人认为，访问港口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空子，要无情地加以利用。各种可以想得出来的编队方式都试过了——除了最重要的一种，即一艘供应船和一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编在一起。

我们又提出了另一次严重抗议。于是这艘供应船再次驶离。

必须记住，所有这一切几乎全都是通过秘密的外交途径来处理的。其过程主要是通过总统的渠道来进行一系列书信往来，并得到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内的各机构协同配合的支持。我们认为，为了给苏联体面地撤退的机会，最好的办法是采用静悄悄的外交，而不是学一九六二年的做法，进行戏剧性的对抗。当苏联进行初期工程建设时，我们便采取了坚定的立场，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危机，并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军事工程已经停工，高射炮掩体也拆除

了，通讯设备一直没有使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穆勒海军上将，于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九日能够告知底特律经济俱乐部说，苏联在古巴没有潜艇基地。

当然，苏联人钻了访问港口的空子，给我们带来了一阵子麻烦，但是没有岸上的设施，访问港口在策略上来说是无用的。而正式地禁止访问港口将广泛地牵涉到美国海军的调动，以及我们关于海上自由航行的原则。一九七〇年我们对古巴的担心是，苏联依仗其在加勒比海的基地，扩展其针对美国的弹道导弹潜艇的能力。这是要加以制止的。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所进行的欺骗。我们也不会忘记这个现实，即苏联的克制——在这种克制已经实现的时候——也只是我们对于争端施加压力和坚定不移的决心的结果。尼克松政府曾多次告知莫斯科，我们准备实现一个时期的互相克制和妥协。一九七〇年秋，莫斯科决定想要考验我们一下，究竟这种愿望是反映了优柔寡断、还是由于越南战争而引起的国内虚弱，或者还是一个持严肃态度的政府所采取的策略。莫斯科在得到了回答之后，才又把西恩富戈斯理所当然地冷淡了下来。

① 理查德·尼克松：《理查德·尼克松回忆录》（纽约格罗西特和邓拉普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第二二〇——二二一页。

② 例如，一九七〇年九月三日《巴尔的摩太阳报》中的报道。

③ 《纽约时报》，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

第十七章

多事之秋：智利

一九七〇年九月四日，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在总统选举中获得了多数票，但票数仅占选民投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在竞选总统的三个候选人中，比仅次于他的候选人多三万九千张选票。奇怪的是，他这次得票的百分比反而比一九六四年那次总统选举有所下降，他那次得票比重为百分之三十八点九，却输给了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但是，一九七〇年，按法律规定，孚众望的弗雷不得连任，而反阿连德的选票尽管增多了（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七），却分散在两个候选人名下。按照法律规定，如无候选人获得过半数的选票，即由智利国会投票决定总统人选。按照传统，国会一般都是支持获得较多票数的候选人的。这一次，人们预料它也会这样做，选定萨尔瓦多·阿连德为智利总统。

原先为肯尼迪所任命的官员、一九六七年以来一直任美国驻智利大使的爱德华·科里报告说：

智利平静地选举产生了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府。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自由地有意识地作出这种选择的国家……。*他所得到的票数比仅次于他的那个候选人多百分之一左右，而按照智利宪法规定，这就足以使他稳操胜券。*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智利的武装部队会发动内战。也没有理由可以认为会出现什么从中作梗的奇迹，把他的胜利化为乌有。这次智利是在全国选民中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百分之三十六）的人赞成走共产主义道路的情况下作出这个选择的。这个事实令人痛心，但却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这件事势必对拉丁美洲以至更大范围产生深远影响。我们遭到了惨痛的失败，其后*

果既将在国内也将在国际上显露出来。有些国家会立即感受到它的影响，另一些国家过些时候也会感受到它的影响。

当我把科里的报告送交尼克松时，他在报告中的一些异体字句子下面划了线。科里确信，“在西方民主世界里，唯独智利具备了这样的客观条件，它的独一无二的宪法容许它过渡到阿连德政府统治下的共产党国家。”他引证说，在智利，马克思主义政党力量雄厚、组织严密；智利总统一职权力很大；国家干预经济部门的趋势已经很普遍，并且还在发展；而智利的民主力量却已陷于一片混乱。

恰好在智利选举揭晓的时候，莫斯科和开罗驳回了我们对中东违反停火协定的行为所提出的抗议；约旦担心伊拉克军队很快就要对约旦国王采取行动；一支苏联海军舰队正开往古巴。九月八日，美国一个部际委员会首次讨论了智利局势的发展情况。也就在这一天，有几架飞机在中东被劫持，苏联舰队已快要开到西恩富戈斯港。六天以后、九月十四日，这个委员会再次考虑智利问题，其时约旦局势已进一步恶化；古巴的米格式喷气飞机截击了企图在西恩富戈斯上空拍照的美国U-2侦察机，这次飞行不得不半途而废。在随后的若干周里，美国政府不是孤立地郑重考虑在智利发生的事件，而是联系叙利亚入侵约旦和我们迫使苏联拆除在加勒比海给核潜艇加油的设施这一背景来考虑问题。必须联系这个总的背景来考虑作何反应。

不管怎么样，阿连德的当选确是对我们国家利益的一种挑战。要我们甘心同意在西半球存在第二个共产党国家，那是不容易的。我们确信，这个共产党国家很快就会煽动别的国家采取反美政策，把西半球的团结一致当作攻击对象，跟古巴志同道合，而且早晚会和苏联建立起密切的关系。阿连德的当选意味着一下子打破了智

利由来已久的民主传统。他竟然可以利用智利政治制度中的缺陷，而不是靠真正的多数票当上了总统。这就更加使人痛心疾首。本来，百分之三十六的选民票根本不应成为一种授命的表示，可以据此不可逆转地改造智利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这正是阿连德下定决心要做到的。

前任两届美国政府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两届政府都断定，一旦在智利出现阿连德政府，那是违反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的。我们在一九七〇年也得出了大体上一样的结论。

萨尔瓦多·阿连德

阿连德后来以身殉职，他的政治色彩倒不那么显目了。他虽然自己标榜为社会党人，但是他的最终目标和哲理跟欧洲的社会党人毫无共同之处。阿连德是智利社会党的创始人。智利社会党之所以不同于共产党，在于它的纲领更加激进，而其根本理论则同共产党一样不讲民主。他倒很愿意先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然后再进行革命。但是，他后来允诺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和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没有多大不同。社会党纲领的主要原则是：根本取消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惯例。这也就是开宗明义地说，从他以后不会再有民主选举了。

阿连德当时是共产党和他自己的社会党联合组成的人民联盟的候选人。其他一些激进的小党派也参加了人民联盟。人民联盟的纲领保证要摧毁现存制度，实现“革命性的”、“深刻的”变革。它谴责“帝国主义剥削”和“美国垄断集团”。它号召全面没收土地、基础工业、商业和银行系统，还号召“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并建立“一个提高大众文化的全国制度”。人民联盟纲领的大部分内容简直是逐字照抄智利共产党的政治纲领①。智利共产党是东欧以外

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表示欢迎的极少数共产党之一，可见它对莫斯科路线是俯首听命的。人民联盟从共产党人那里搬过来的各条政纲当中，有一条主张实行一院立法制度，主张司法部门从属于“人民代表大会”，其目的是根本废除智利宪法所规定的传统制度，即由两院立法、司法独立、彼此权力分开而互相制约的制度。在人民联盟纲领中，有些段落是社会党加进去的，那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谴责美国“侵略”越南，要求“积极声援”越南北方和宣告“声援已成为拉丁美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先锋的古巴革命”。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段落是把美洲国家组织斥之为“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工具”。

阿连德在一九六七年时是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组织的基地在哈瓦那，其政治信条，用那位盲目崇拜历次革命的罗吉斯·德布雷的话来说，是“基于这样一个概念：在整个美洲大陆开展反对北美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其基本职能是：声援、协调和支持整个美洲大陆的民族解放斗争。它的会议在闭幕时发表宣言，正面攻击拉丁美洲一些左翼政党的改良主义立场。宣言指出，‘革命的武装斗争是拉丁美洲革命的根本路线’”②。阿连德一九七〇年开展竞选运动的时候曾声明说，他本人确信：“在加勒比海地区有了古巴，在南美锥形地区有了社会主义智利，整个拉丁美洲就会出现革命形势。”

的确，要是有人把阿连德称为民主改良主义者，那他准会非常愤怒地加以驳斥，他最痛恨这种人。对于一个献身革命的人，如果硬要污辱他正直的人格，说他是他本人一贯坚决否认的那种人，那实在是大可不必。一九七一年他和罗吉斯·德布雷谈话的时候，——当时他事实上是根据宪法当选的智利总统——他坚持说，一九七〇年他同意那些民主保证措施，是为了说服智利国会批准他当选，说服军方同意他就任总统，是“策略上的必要”，③那并

不影响他为掀起革命运动所承担的基本义务。阿连德指出，"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是取得对政府的控制权"④。他说这个策略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人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后那几年容许私营企业存在的决定差不多，也近似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关塔那摩*所采取的克制态度⑤。

人们可以从中得出的唯一推论是：阿连德勉强同意实行的各项民主保证措施，如他自己说的，不过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一有机会就要把它们搞掉的。他十分明确地说，他的政府不同于以前在智利出现过的人民阵线政府（近似本世纪三十年代在欧洲出现过的那种政府）。人民阵线政府包括各民主党派，而阿连德却以轻蔑的口吻把各民主党派称为"资产阶级政党"⑥。他一九七一年对德布雷说，"过去，在人民阵线里，一个多数派政党占主导地位，那是资产阶级的激进党。现在，在人民联盟里，没有占主导地位的政党，有的是两个工人阶级的党、两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同志，智利共和国的总统终于由一个社会党人担任了。这么一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就任总统是为了在智利实现经济和社会改革，打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全面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⑦

德布雷听了这些话疑信参半，便问道，"那么是谁利用谁呢？谁诈骗谁呢？"阿连德回答道，"那肯定是无产阶级。要不然的话，我就不会在这里了。"⑧阿连德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解释说，"至于目前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正图谋战胜它。把它推翻！"⑨

关于阿连德这个人，我们感到不安的是，他公开宣告敌视美国，他实际上显然打算建立另一个古巴。他明确提出的纲领和确实长期的目标是建立不可逆转的独裁制，从而对我们在西半球的

---

* 美国海军基地。——译者

地位提出永久性的挑战。就在出现西恩富戈斯港口问题的那个月，认真对待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另一个盟国在军事上意味着什么，这不能说是荒谬可笑的。我们对阿连德感到不安的出发点是我们的国家安全，而不是经济利益。

把美国人所拥有的财产收归国有并非问题所在。我们从未反对容许为公共目的实行国有化这条国际法原则，虽然我们确实强调我们希望得到立即、适当和有效的赔偿(这也是国际法所要求的)。战后历届美国政府都曾设法劝阻发展中国家不要没收外国公司，如果非实行国有化不可，则鼓励它们在做法上要设法限制它对总的投资气氛的不利影响。而且美国国会根据一九六一年的对外援助法(希肯卢珀修正案)规定，一旦美国人的财产被无偿没收，即停止经济援助。

但是，我们曾煞费苦心不让没收问题妨碍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因此，一九六九年，阿连德上台以前，科里大使曾经给予合作，实际上等于协商同意了对安纳康达公司实行国有化。同年，尼克松政府在对秘鲁关系上，为了使国际石油公司的开采业务实行国有化这个问题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避免援用限制性立法条款，曾把我们的立法故意加以引伸，几乎到了破坏法律的地步。我们一再找借口暂不使用希肯卢珀修正案，并说清楚，我们准备接受低于国际石油公司实际产值的补偿，以便维护同一个重要国家的友好关系——虽然当时统治秘鲁的是一个左翼军政府，它的民族主义倾向很严重，并且正倾向于第三世界中更加激进的分子。我们坚持耐心地做工作的结果，终于同秘鲁政府订了临时协定。

阿连德向我们的政策和利益提出的挑战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不仅仅是把财产收归国有；他宣告效忠于极权的马克思主义。他十分钦佩古巴的独裁制度，并且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在他就任总统之前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公开宣布的目标一直是在必要时

用暴力破坏我们在整个西半球的地位。因为智利是个大陆国家，它这样做的能力比古巴大得多。而古巴本身已经是个不小的挑战。事实上，阿连德当选的时候，美国正在同古巴在西恩富戈斯一带对峙着。智利和阿根廷、秘鲁、玻利维亚接壤，这三个国家又都大受激进运动的折磨。阿连德的成功也会对西欧的各共产主义政党的前途产生深远的影响。不管这些政党的社会地位是多么起伏不定，它们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削弱西方同盟。任何一位负责的美国总统都不能对阿连德上台执政泰然处之。

在我们政府中，对阿连德象征着什么没有争论。谁也没有对科里预测阿连德当选的后果的第一封电报提出异议。唯一的不同意见是，阿连德在面对着国内抵抗的情况下是否有能力达到他的目的，以及如果科里的预测证明是对的，美国能采取什么对应措施。

施加影响和干涉：第四十号委员会

美国是否应当图谋影响别国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做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包括人们对国家利益的概念。在整个战后时期，两党所选出的历届总统都感到有必要在灰色区域采取介乎正式外交与军事干涉之间的隐蔽的活动。我总觉得把讨论隐蔽活动的内容印成文字很不雅观。但是，参议院研究政府情报工作委员会（即所谓的丘奇委员会）发表的一个关于一九七五年智利发展趋势的报告已经公布了这个材料。看不出有什么迹象表明，这个报告的作者曾认真考虑过阿连德胜利的问题，而这一点我们当时已经很敏锐地感觉到了。

有些人过去曾大声疾呼谴责他们所谓的对智利的“干涉”，然而，正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却最坚决地要求政府对阿连德以后的

执政者施加压力，这岂非咄咄怪事。美国对阿连德倒台以后的政府给予援助所施加的限制，要比阿连德执政时期严厉得多。这些措施虽说是公开的，但并不因为它是公开的就能改变它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不符这一事实，而过去对隐蔽活动的抨击，至少有一部分是根据这一原则提出来的。说也奇怪，自从中央情报局的隐蔽活动受到抨击以来，美国对别国内政的干涉反而增加了许多倍，而且也不那么区别对待了。早先在“冷战”时期，中央情报局的活动遵守一定的限制。它所遵守的标准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而这种受威胁的情况不是很多的。新的理论为无限的干涉辩解，而干涉的目的是，不分敌国还是友好国家，都要促使它们的内部发生变化。有些受到干涉的国家并没有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甚至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国。

当然，隐蔽活动在哲理上和实践上都有其难言之隐，特别在美国是这样。我们民族的气质和传统都不适于搞这种活动。我们的政府制度也不是能自发地做到象隐蔽活动所要求的那样保守机密或不露声色。我们缺乏我们敌人所拥有的那一套精心策划阴谋活动的机构。那些热衷于把我们的情报机构搞掉的人要找出外行的或让人一眼看穿的行动的例子并不困难。但是，那些受过训练去执行秘密任务的男男女女，他们所能利用的物质条件通常比我们敌人的条件差得太多，而且活动受到种种严格的限制，他们是应当受到国家的尊崇的，而不应象现在这样受到无情的攻击。这种攻击势必使我们在有关国家安全的这一极其重要的领域里陷于无法保护自己的境地。因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生活在意识形态对峙着的世纪里。苏联领导人在和平共处的每一个阶段都坚持说，这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斗争有所缓和。世界各地执行苏联路线的共产党在国内的政策问题上偶尔和在莫斯科的大伙伴有分歧——经过无情的政治角逐才达到显赫地位的那些具

有坚强意志、一心要掌权的人有不同看法是可想而知的。但在国际问题上，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分歧。甚至西欧和拉丁美洲最明显地"独立的"共产党也几乎毫无例外地在对外政策上追随苏联。一些例外的情况也往往是一些共产党过于激进，以致克里姆林宫认为太不策略了。

问题也不仅仅是各国共产党造成的。当今世界上激进的政治势力还包括遍布全球的许许多多同情它们的组织和团体。这些组织和团体进行恐怖活动或资助这类活动，运送武器，打进宣传部门，图谋左右政局的演变过程。资金怎样从正式的共产党渠道转到那些外围组织手里是难以跟踪的。例如，我们驻智利的大使一九七〇年九月间便报告说，他之所以确信阿连德会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原因之一是，"在圣地亚哥这个仍然自由的社会里，有三个电视频道，一个完全由智利大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控制，第二个由天主教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教民主党的极左翼联合控制，第三个归国家控制"（所谓国家控制，在阿连德上台执政以后，当然也会成为由激进分子控制）。一九七〇年全年我们都接到可靠的报告说，来自古巴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大量隐蔽的资金和援助正源源不断地运送给阿连德。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支持智利内部那些力图与激进派的控制相抗衡的民主力量，不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说得过去的。任何一个负责的国家领导人，都不可能有与此相反的做法。美国想使各民主党派能够维持可进行竞争的广播电台或电视台或报纸并非坏事。这些考虑曾诱使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为阿连德的对手、改良主义的有才干的爱德华多·弗雷竞选而提供了三百万美元（显然弗雷并不知道此事）。鉴于阿连德就职以后无所不用其极地开展威逼、恫吓和施加经济压力的运动以图迫使反对他的宣传工具和民主党派倒闭、解散，这些

考虑就更加紧迫了。在本书下一卷中我将更详尽地论述这个问题。

不过，读者有权简要地了解，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我们是怎样保持对隐蔽活动的监督以保证使这种活动继续和我们国家的伦理和目的相符。

我们就职的时候，隐蔽活动是由所谓第三百零三号委员会负责监督的。该委员会是以一九六四年六月总统发布的一个指示编号（第三百零三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命名的。这个指示申明了它的组成、职能和责任。自从一九四七年通过国家安全法、创立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以来，这种部门间的协调机构一直是以不同名义存在下来。在尼克松政府早期，有一篇新闻报道提到了第三百零三号委员会这个名称。在那个时候，人们的想法都很简单，既然泄了密便有必要更换名称。第四十号国家安全决定备忘录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七日重申了这个委员会的职能，给它贴上了一个新的标签，以这个指示的编号命名[10]。

当时，第四十号委员会的成员有：司法部长、副国务卿、副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全事务助理任委员会主席。凡是准备要在那里进行隐蔽活动的地区，负责该地区的助理国务卿几乎毫无例外地出席委员会会议。换句话说，除司法部长外*，第四十号委员会的组成情况跟高级研究小组及白宫安全顾问组一样，是由负责处理我们国家安全的日常事务的高级官员组成。正是这些人对我们对外政策的全部细节都一清二楚。（它和高级研究小组不同之处主要是它的工作人员不出席会议。）

会议的议程一般由中央情报局和我的办公室协商提出。中央

---

* 至少从肯尼迪政府以来，司法部长就一直参加该委员会监督隐蔽的行动。现在他已成为这个委员会的正式成员。

情报局通常总是非正式地把议程送国务院审阅通过，它往往把一些议程项目推迟到消除了国务院的反对意见为止。例如，这次在智利问题上就是这样。(因为在现场的大使在技术上是中央情报局站长的监督者；中央情报局懂得，要有效地开展活动，它需要有国务院的支持。)熟悉正在讨论的项目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向委员会汇报情况。除了所讨论的地区的国务院的专家外，再没有其他工作人员出席会议。派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去作记录的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负责保管会议记录。

绝大多数隐蔽活动都是中央情报局或我国驻外使节建议开展的。在我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期间，白宫很少提出这类议程项目。智利问题是白宫提出的项目之一，但总统只不过是催促一下第四十号委员会早已在进行的工作。我对沿袭下来的那一套程序所作的唯一改变是，要求第四十号委员会每年至少审查一次每项批准进行的隐蔽活动或侦察行动。这是为了防止由于官僚主义办事不力，在事过境迁之后，这种行动还在继续进行。

一旦第四十号委员会同意批准某一项隐蔽活动——通常是同时授权拨给一定数量的经费——，该项活动即由中央情报局负责进行，但须经总统批准。第四十号委员会并不监督它所批准的每项活动的日常事务工作。通常只是某一个计划已经完成或在一年一次的审议会上或要求增加拨款的时候才向它汇报情况。在象阿连德得胜后第一个月那样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定期汇报倒是比较多。事实上，我们开展隐蔽活动程序上的主要弱点是，尽管这类活动是经过全面审查对外政策后才采取的，但此后政府最高级官员即不再以同样关注的心情去加以控制，委员会下面也没有小组负责监督这些活动。第四十号委员会只管授权不管监督。在理论上，凡是在其驻在国开展隐蔽活动的美国大使，都应负责进行监督。但是，大使们很少有那个时间，也缺乏这种专门知识*。就智利问题来

说，关键性的问题是，智利阿连德政府上台执政是否确实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因而第四十号委员会参与其事是理所当然的。

一九七〇年的智利大选

前已指出，前两任政府已得出结论，认为萨尔瓦多·阿连德和他所凭借的力量对我们的利益确是个严重的威胁。因此，在一九六四年的大选中我们为了反对他竟花了将近三百万美元。那是对的。近在一九六八年，我们的前任还曾偷偷地拨了几十万美元，为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举行的智利国会议员选举中击败阿连德那一派的势力助一臂之力。在弗雷政府执政期间，我国政府给智利的对外援助总数远远超过十亿美元，这在拉丁美洲按人口平均计算是最高的，比任何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高得多。这部分地是为了加强反对阿连德的民主力量。因此，尼克松就任总统的时候，阿连德政府的出现威胁到我们国家利益，这已经是大家都懂得的常识了。

十分奇怪的是，尼克松政府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像它的民主党前任那么积极反对阿连德；一部分原因是它忙于应付许多其他危机；另一部分原因则是错误地估计智利大选的可能结果。当时还欣然同意了错误的估计，因为它得出一个十分令人欣慰的结论：这么一来就用不着硬着头皮去作出一种棘手的抉择，而这恰好是在一九七〇年的条件下，我们非作不可的。

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积极支持弗雷，因为他是智利最孚众望

---

* 我看了一些由丘奇委员会公开发表的中央情报局的内部文电，特别是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以后发表的那些文电。看过以后我确信，我们本应坚持，这些文电须经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办公室审阅，这和国务院的重要文电须经此办公室审阅是一样的。

而又有才干的人。这个决定在道义上说是简单明了的，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够既反对共产党同时又站在绝大多数智利人所支持的改良主义派和进步力量一边。但是，到了一九七〇年，我们就不那么顺利了，我们不得不有所抉择了。智利宪法规定弗雷总统不得连选连任。他的基督教民主党在一九六九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失利，所得票数减少了百分之十一。保守的国民党相应地多得了选票。基督教民主党发生了分裂，当它拒绝接受极左的那部分党员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结成"人民联盟"的要求的时候，这些人便宣布退党，党的机关落入反弗雷一派势力手中。这一派势力更加喜欢大喊大叫，不那么愿意忠于开放社会和民主传统，不是真心实意的改良主义派。它更加敌视美国。

弗雷尽管有美国慷慨援助计划的支持，一九六九年初，在左派压力下还是被迫采取了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步骤。这一迹象表明了智利政局的两极分化。弗雷在面对着激进派学生抗议的情况下取消了纳尔逊·洛克菲勒州长的访问，而洛克菲勒州长这一次是尼克松派到拉丁美洲访问以协助制订对西半球的新方针的。弗雷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坚持要重新谈判和几家美国铜公司签订的一项协定。这个协定是他自己的政府在仅仅两年前缔结和实施的。根据这个协定，智利获得数量很大的铜矿所有权的股份，但并不都具有控制权。他现在要求立即得到多数股票，剩下的美国人的股票也要逐步归智利所有。然而，由于我们及我们的前任对智利温和的民主派寄予最大希望，并且非常愿意加强它的力量，因此指示科里大使从中协助，设法安排双方都满意的条件。这里所谓"满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公司方面已知道，如果不同意这些条件，那就是干脆没收。（和许多一般都缺乏政治远见的多国公司一样，安纳康达铜公司因早已签有协定，觉得有恃无恐，也是为了省得交保险费，便允许其没收保险到期作废，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它讨

价还价的地位。）

可见一九六九年间将要发生风暴的讯号很不少。智利基督教民主党愈来愈左倾，它的群众基础日益缩小，因此，各个非革命党派已不大可能象在一九六四年那样联合起来只提出一个候选人。明摆着的前景是：一个保守派的候选人，一个软弱无力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和激进左派的阿连德这三方面进行票数接近的竞选，最后由国会决定。在国会中，阿连德这一派比较接近于多数。但是，一九六九年间白宫忙于处理越南问题及由此引起的国内动乱、对苏联的关系、西欧问题、同日本的冲绳谈判以及对华关系开始采取的各种行动。我对智利的情况很不了解，对专家们的主张提不出什么意见。

政府中没有一个部门提醒我们注意局势已很严重。有些人本来也许会主张美国起更积极的作用，但因国务院早已明言反对积极进行隐蔽活动，他们也就不愿意再提相反的意见了。智利问题确实是个典型例子，它说明，重大事件在一件件发生而白宫却毫不知情，原因是决定方针路线的政府部门未能就这些事件的意义取得一致意见。各部门遵守所谓"互不侵犯条约"，避免相互竞争，以免作出不利于它们的决定，这样就使智利问题在一九六九年整整一年的时间内提不到白宫这一级来考虑。中央情报局确实在若干场合指出过，如果要在一九七〇年认真努力办事的话，那就必须在一九六九年开始做准备工作。一九六九年四月该局曾估计，激进的左派在竞选总统中胜负的可能各半。但是，当时并没有作出决定，象一九六四年那样进行干预，这个切合实际的判断也只是表明有必要做些什么，而并不是一个采取行动的建议。而且，任何这类的建议肯定会遭到国务院拉丁美洲司的坚决反对，该司就是不肯正视智利的政治现实。一九七〇年已找不到一个可以支持的基督教民主党的改良派了。这个党已分裂，它的候选人软弱无力，并且

和激进的左派相互利用。要想制止阿连德当选，那只有保守派的豪尔赫·亚历山德里才能做得到。虽然他的民主政纲是无懈可击的——他确实在弗雷以前当过总统——，但是，拉丁美洲司不喜欢他，口头上说他太老了，而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不够进步。拉丁美洲司里有些人把社会改革和地缘政治混为一谈；他们并不认为阿连德当选总统有那么大的危险，因而必须克服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对亚历山德里的偏见。

说也奇怪，美国人把政治和技术上的经济发展混为一谈的倾向，在约翰逊政府执政的后几年竟然无意中起到了削弱改良主义那一派政治力量的作用，而这一派正是我们的官员真正喜欢的，也是抵抗各革命政党所必不可少的。一九六八年——阿连德得以上台执政的那次总统选举之前两年——美国终止了对智利的无偿经济援助，理由是，智利的经济已大体上可以自己维持了。这在技术上可能是正确的，但这正是错误地根据经济上的理由作出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决定的一个明显例子。骤然断绝了美国的援助在智利是不得人心的，它削弱了弗雷所代表的温和派，为执政党中比较激进的反对美国的那一派所利用。这一派所提倡的经济纲领与各激进政党的经济纲领大同小异。这就使选举的形势更加混乱。

正当从技术的角度看待事态发展的观点十分盛行的时候，又出现了反军国主义的教条主义观点。一九六七年间，美国的政策变得对智利军方(以及本半球其他友好国家的军方)愈来愈不友好。当时的理论是：应当鼓励这些国家把用作军事费用的资金转到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这一理论的前提是，这些国家无需设立国防机构。对我国出售的武器也规定了不得超过的最高限额。无偿赠与的军事援助计划已经停止。弗雷受到鼓励，要他提出拉丁美洲的各种非军事化和裁军计划。到一九六九年十月间，智利军方对于迟迟不实行专业化和军饷过低的不满突然爆发成为一次要

推翻政府的未遂政变。弗雷当即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军方不稳的谣言继续传开。尼克松政府在智利继承下来的既有一个激进化了的基督教民主党，又有智利军方对美国以及基督教民主党人的极大的反感。这几乎肯定助长了阿连德在他任期的头几年“收买”军方或使之中立的能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对智利的政策最清楚不过地——甚至最可悲地——表明，把我们高级研究院里的抽象理论用于外国社会内部的复杂情况是多么危险。认为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会自动地产生政治稳定的想法——所根据的是美国新政*的经验——在两个激进党都下定决心不要改革而要根本推翻现存制度的一个国家里，其适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正在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学教授之间的一场辩论。由于我们不肯正视这个现实，致使我们从一九六四年是左右政局的因素到一九七〇年变成了只能站在旁边急得咯咯乱叫的老母鸡。

好像这样大出洋相还不够似的，拉丁美洲司竟然在这个时候大肆攻击说，根本就不应该暗中支持外国的民主党派，而这一做法正是我们长期以来在智利工作的中心内容。他们竟振振有词地说，从今以后，阻挡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上台执政的资金可以而且应该完全由智利内部提供。拿这个题目真可以写篇很好的大学期终论文，但在一九七〇年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来，所冒的那种风险却使人无法接受，而避免这种风险也正是决策者的本份。这样一种政策必然使我们正要给它打气的那些力量泄气。那些受到美国支持的人会由此推度出一种新的冷漠态度。在得票接近的选举中，由此所产生的心理上的微妙变化是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

我对一九六九年的这些倾向不大了解。事实上，在阿连德九

---

* 新政是美国罗斯福政府为挽救三十年代大经济危机造成的严重后果而采取的政策。——译者

月四日获胜之前，第四十号委员会在整整二十一个月的时间里只对这个问题研究了四次。一九六九年四月它对可能需要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未作任何决定。一九七〇年三月，在距离选举只有五个月的时候，它为支持民主党派的候选人拨了一笔微不足道的宣传费。一九七〇年六月下旬，为了同样的目的拨了稍微多一点的款子。但是，合计拨款总数仍然只有美国在一九六四年为进行隐蔽活动所花的钱数的百分之十五。所拨的款到达智利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距离选举日期只有四个星期。一九七〇年八月，第四十号委员会决定，在选举之前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换句话说，在四次会议中有两次会议没有采取行动。另外两次同意作一种象征性的努力*。开初还说明了一下无所作为的理由，因为还没有提出候选人。因此，他们便说，还没有可以据以作出判断或施展战略的基础。但是，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初的时候，这种借口已经根本不能成立了。保守党派提名智利前总统亚历山德里为候选人，他年过七十，很有声望。基督教民主党人提名他们左翼的代表拉多米罗·托米奇为他们的候选人。托米奇的纲领和阿连德的纲领比较，主要在程序问题上有所不同，还在于托米奇真诚地致力于维护民主程序。共产党人和阿连德的社会党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盟，推选阿连德为这个联盟的候选人。我已叙述过，阿连德的一九七〇年纲领是激进的，是恶毒地反对美国的。现在出现了一个三人竞选的局面。民意测验表明，亚历山德里遥遥领先，美国政府部门为此感到自慰。因此，他们认为，美国没有必要插一手。

主要由于负责执行政策的部门象跳复杂的三角小步舞一样，相互扯皮，贻误时机，使问题提不到高级机构中来审议，因而我在

---

* 参议院特别委员会根据在十八个月的时间里所开的四次会的情况——其中只有两次会议作了决定——隐晦地指责说，智利问题列在“第四十号委员会的议程上的时间超过一年……。”⑪

一九七〇年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集中注意危险的局势。科里大使认为，如果阿连德获胜无异于共产党接管政府；如果我们不把阿连德政府当作另一个卡斯特罗政府来看待，那就不是慎重的态度。而事实上，阿连德政府可能比卡斯特罗政府更坏。但是，国务院的拉丁美洲司不同意这个看法；它不认为存在阿连德取胜的可能和危险。它不想设法帮助保守的亚历山德里。中央情报局倾向于赞同科里的看法，但没有达到要求白宫出面解决分歧的程度。它知道，没有国务院的强有力的支持，它就不能有效地进行工作。就这样，几个部门间的“互不侵犯条约”使我有四个月的时间根本不知道原来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间驻圣地亚哥的大使馆和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曾联名提出过发动一个制止阿连德上台的运动的建议。我也不知道．为考虑这个建议而召开的部际会议，结果是同意把各种矛盾的观点都写进一个说明现状的报告里去，然后提交给第四十号委员会。而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又没有抓紧时间办这件事。又过了两个月它们才对一项报告取得了一致意见。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它们终于设法联名向第四十号委员会提交了一个对阿连德采取“破坏性”行动的计划。计划的内容是：由美国援助制定反对阿连德的标语、传单和广告，但不同时支持亚历山德里。所建议并获得批准的拨款总数为十三万五千美元*。但是，国务院明令禁止各项隐蔽活动不得有赞助亚历山德里的倾向，如有此倾向国务院立即停止支持，这就进一步限制了这笔钱的用途。既要击败一个候选人而又不帮助他的主要对手，这个想法倒是蛮新颖。但是，怎么能够做到既击败阿连德而又不让亚历山德里从中得到好处，那就不明确了。这笔拨款和这个禁令互相抵销了。

现在回想起来，显然我当时的警惕性太不够了。一个真正尽

* 所有这些数字都已经由国会的一些委员会公开发表。

忠职守的总统安全事务顾问决不能只是圈阅、核准一下官僚机构协商一致的意见。他应该是个吹毛求疵的人，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一个对不言自明的事也要反复推敲的人。可惜我自己当时对拉丁美洲这个地区缺乏专门知识。民意测验的结果预言亚历山德里会取胜和几个政府部门协商一致的意见使我麻痹大意了。而拿几个部门的一致意见来说，要是在我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的地区，我是不那么轻易听信它的。此外，在那年春天和夏天，柬埔寨问题占去了我绝大部分的注意力。

待到智利问题再次提到第四十号委员会的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那已经是六月二十七日，离投票选举只有两个月时间，要想在智利的总统选举中起有效作用已经来不及了。科里大使担心阿连德获胜的不安心情更加严重了，因为我们现在又面临着另一种危险：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专家们都突然出其不意地下断语说，除非亚历山德里在选举中取胜的票数——当时仍确信他能取胜——比阿连德的多百分之五以上，否则，即使阿连德输了，他在智利国会中的支持者仍然可能占上风。因此，科里提出一个分两阶段进行的计划：增加业已批准进行的破坏性活动的费用，然后花钱去影响国会的投票。

国务院对这两个建议都提出了反对意见。它认为唯一还有些道理的论点是科里提的这么一个问题："假如阿连德掌了权，有人问起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怎么回答?"为竞选运动还剩下的很短的时间批准了一些费用，这些费用，如前所述，按一九六四年标准是很小的。对于那些想要了解官僚主义那一套的人来说，应当指出，所投的票都是全体一致的；拉丁美洲司宁可不把它当时所鼓吹的观点记录在案，从而保持它不论结果如何都能加以应付的伸缩性，并在一旦有人在阿连德获胜后再度提出科里的那个问题时可以保护它自己。关于第二阶段——谋求影响国会的阶段——的

决定推迟到选举以后再作。拉丁美洲司特别注意保证科里不致于因为批准了费用而发生误解。它通过秘密的渠道通知他，它既反对选举前(第一阶段)的计划，也反对选举后(第二阶段)的计划。反对是有理论上的根据的，它以十分明确的语言重申它反对把批准使用的钱中的任何一部分用来帮助亚历山德里。我们由于过度热情或提出了很明确的战略计划而在智利自找麻烦的危险根本不存在。反对阿连德而又不帮助亚历山德里意味着加强软弱的基督教民主党人托米奇，这么一来就减少了唯一有可能取代阿连德的人的选票。因此，可以蛮有道理地说，我们官僚机构的反亚历山德里偏见保证了阿连德的胜利。

如果说三月份批准的款项实在太少了，那么六月底勉强同意拨的款已经是为时太晚了。(钱数也是太少。)六月二十七日的会议离开选举投票只有两个月。由于须经总统批准，其后还有文书手续要办，这些款子要想在七月下半月以前送到智利是不可能的。况且已给大使馆发了禁令，使这些款子几乎无法有效使用*。

尽管民意测验的结果很乐观——在六月二十七日开会的时候，民意测验仍然预示亚历山德里会得到超过其他候选人相当多的选票——，我是愈来愈不安了。因此，我在七月下旬发了个指示，要求分析一下，一旦和各种预测相反，阿连德赢了，我们能有几种选择。我要求紧急回答下列问题：

一、阿连德政府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其政策目标是什么？在阿连

* 我后来才知道，中央情报局的代表在七月下旬和八月间曾非正式地通知一些美国企业公司在选举期间向什么地方送钱。在白宫和国务院都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不管怎么说，这也同样太晚了。我自己的态度是：在智利的隐蔽活动统统应由我国政府进行。这不是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基于这个理由，我拒绝接受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为帮助影响智利选举而提供的一百万美元。我也许会同意这个目标，但肯定不会同意用这个手段。

德政府统治下，智利局势发展的可能途径有哪几种？

二、这些发展途径，不论从眼前还是从对我们的长远目标和地位的影响来说，其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属何性质，程度有多大？

三、针对这些问题，可供美国选择的有哪些办法？

与此同时，第四十号委员会八月七日再次开会研究讨论智利局势，并重申了它六月二十七日的决定。现在距离投票选举的时间很短了，不论作什么决定都起不了多大作用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一旦要求执行第二阶段计划，是否应授权同智利国会进行试探性的联系。看来事情暴露的风险很大，而好处不大，因此，会议暂不作决定。

由于我提的政策问题不涉及隐蔽活动，这些问题就由高级研究小组来审议。我已指出过，这个研究小组的成员和第四十号委员会相同，只是少一个司法部长。研究小组容许工作人员出席会议，会议文件分发的范围也广得多。我所提的问题，由国务院担任主席的一个部际小组拟好文件来回答。这个文件所下的结论含糊得出奇。它一方面说，美国在智利境内没有重大的国家利益。但是，“智利境内”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另加解释，后面的分析也没有为所下的结论提供佐证。我提的一个问题是，阿连德上台对于美国在西半球的利益形成何种威胁，部际小组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所提出的结论令人难以理解，怎么能说我们的国家利益没有受到影响。我的工作人员把那个结论概括如下：

地位稳固的阿连德政府会给美国造成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巨大损失：

（一） 西半球的团结一致将受到威胁。

（二） 反美政策的一个根源将在西半球巩固下来。

（三） 美国的威信和影响将受到挫折，而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的威信和影

响则相应提高*。

高级研究小组八月十九日开会，但在九月四日举行选举投票之前没有作结论，也不可能作结论。我们只能在智利选民将如何投票的预兆纷纷出现的情况下等待。

我这样详尽地论述了我国政府讨论的情况，那是因为我们以前调查这个问题时这些情况基本上被忽略了——也许是由于这些情况和先入为主的结论大相径庭吧。毫无疑问，在智利举行投票选举之前，美国只是以非常谨小慎微和无效的方式采取行动。不仅所拨的款子不足以产生任何显著影响，而且由于我们坚决不支持唯一有可能击败阿连德的候选人，因而分散了资金，这样也就很可能使反对阿连德的选票更加分散。美国参加进去本来就很勉强，更不愿意被说成是站在一个德高望重的民主派前辈的候选人一边。在我们的官僚机构看来，这个候选人的主要缺点是，他是保守派。（尼克松政府内部竟有人持这样的看法——更不要说这种看法占上风了——这再一次表明，哪怕是总统也很难把他的观点强加于根深蒂固的官僚机构。）

到举行投票的时候，我终于认识到我已被人作弄到与自己的信念不符的地步——而尤其重要的是也不符合尼克松的信念。若是我在一九七〇年的春天和夏天就认为阿连德很可能获胜的话，

---

* 科里大使对阿连德胜利的后果不抱幻想。他在回答是否有可能达成某种临时协议这一问题时说，"有意识地努力达成临时协议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理论假设。阿连德政府在开始的时候在国内会慎重行事以图维持一种按宪法和法律办事的外表。但是，正如阿连德所说过的，他将坚决执行把美帝国主义当作西半球'头号公敌'的政策。有些具体行动，包括把美国工业公司收归国有，承认古巴、越南北方等等，使美国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同阿连德订立临时协议。除此之外，由于智利国家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很可能需要树立一个外部'敌人'来证明加快进行革命是对的……。阿连德这一派势力必然作这样的结论：一旦他就任总统，美国只好承认它自己无能为力。"

我就有义务让总统有机会考虑开展象一九六四年那种规模的隐蔽活动，这就包括支持一个候选人。我感到愤慨的是，这个选择甚至未经讨论就被否定了。先是有人争辩说，没有必要搞大规模的计划；后来是因为要搞也来不及了。八月十九日提交高级研究小组审议的那个一致的分析说明了阿连德胜利所引起的种种问题，但如果那个分析哪怕有一部分是正确的话，那么不去及早研究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也是不可原谅的。那个分析是我们官僚机构的哲理上的偏见，再加上把经济发展和对外政策目标混为一谈，就把事情搞糟了。当时我国政府中风行一时的看法显然是：激进派的候选人接受古巴和其他共产党国家提供的经费是可以的，但美国却不应该去援助一个最有希望成功的民主派候选人，尽管他的纲领不象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带有改良主义色彩。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向总统概述如下：

国务院主张的真意是，如果想要加强亚历山德里，那么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也阻挡不住阿连德。智利这次竞选的情况是，阿连德和亚历山德里所得票数一直十分接近，基督教民主党人托米奇一直落后很多，因此国务院反对加强亚历山德里，就使我们的工作毫无效果。虽然不能肯定说，推行一个不那么受限制的隐蔽计划会使亚历山德里得到取胜所需要的较多票数，但赫尔姆斯还是认为，推行一个扩大的计划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若是亚历山德里获胜，也可能给我们造成一些问题，但是显然不会象阿连德的胜利那样威胁到我们的利益。我们现在同一个智利的马克思主义政府打交道所面临的这些严重问题至少有可能推迟也许六年的时间。

要公平合理地估计我们后来对待智利的行动，那就必须以这个序言作为出发点。

绝非政变

前已指出，在一九七〇年九月四日的选举中，阿连德所获得的票数的百分比和一九六四年比下降了。在一九六四年的选举中他输给了弗雷。但是，一九七〇年，反对阿连德的票数的百分比尽管较高，却是无可救药地分散了。按照智利宪法，既然哪一个候选人都没有获得多数票，即由国会联席会议于十月二十四日、即过了五十天之后在两个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中选定。

争取国会决定性投票的活动接着马上开始。九月五日，阿连德在记者招待会上为他的胜利欢呼，并保证执行他在竞选中提出的激进的人民联盟的纲领。但是，为了减轻国会议员的担心，他开始去掉一些他的保证。他宣称，他"永远不会"赞成在智利实行一党制。他说，他会保留智利在美洲国家组织中的成员国资格（尽管他在人民联盟的纲领中"谴责"这个组织）。他还宣布说，他将要求重新安排智利欠美国的八亿美元债务的偿还期。（他后来跟罗吉斯·德布雷解析说，他留在美洲国家组织内是为了缓和一下美国的反应，而他真正信赖的是他参与发起的以哈瓦那为基地的拉丁美洲团结组织。）⑫第二天亚历山德里的支持者表示他们不会承认阿连德的胜利。但是亚历山德里没有在他们的声明上签字，因为他在竞选的时候宣布过，他将承认赢得票数最多的候选人。九月七日阿连德会见了弗雷总统，弗雷同意安排与阿连德商谈经济问题（他也为亚历山德里作了这种安排）。弗雷虽然拒绝阿连德要在政治问题上建立类似联络的要求，但确实同意采取措施防止智利出现经济恐慌。

至于人们在华盛顿的反应，夏天的时候听到民意测验的结果聊以自慰，现在简直是目瞪口呆。官员们对不愉快的前景的反应

往往是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总希望这种前景会自行消失。不愉快的前景往往是自行消失的。事实上，并不是所有预言的大难临头都统统应验的。只是当人们凭借一般常识宁可不采取行动的时候却不曾想到如何应付无可挽回的局势。而一九七〇年九月那么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这种无可挽回的局势。

尼克松大发雷霆。十多年来他一直抨击民主党政府容许在古巴建立共产党政权。而现在他所认定的——并没有弄错——另一个古巴却在他没有得到机会去作决定的情况下在他自己执政期内出现了。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反应特别强烈，他坚持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无论什么措施来纠正以前玩忽职守的弊端。他责备国务院和科里大使（责备科里大使是不对的）应对所造成的事态负责。因此，他千方百计设法限制官僚们的权力。其实，他大可不必采取这种态度。因为现在要做什么也来不及了，而且各政府部门正一个劲地拼命重新估计形势。有些人为早先作了乐观的估计或因循拖延而忸怩作态。全都感到灰心丧气。现在终于一致认为应当采取某种行动——他们这样做也是因为总统已下定决心这样做。不幸现在为时已经很晚。要是在九月四日以前花点力气去支持一个候选人，也许可以防止现在这个新局面的出现。现在我们却被迫在时间十分紧迫而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临时凑合。当时时间是那么紧迫，我们手忙脚乱在所难免*。

九月八日第四十号委员会开会审议智利问题，智利国会在这个时候显然已不大可能作出反对阿连德的决定。毕竟，这时离国会表决只有四个星期的时间了，即使亚历山德里获得较多的票数，

---

* 我在这里想要讨论的是：白宫是否知情，采取什么态度，作出什么决定并参与其事，而不是完整地阐述中央情报局的全部文电。我认为公布第四十号委员会的讨论情况是违反公共利益的。不幸，这里所提的第四十号委员会文件早已由丘奇委员会公开发表。

国会也仍然可能投票选阿连德。希望智利国会在智利的温和派仍占压倒多数的情况下会行使其独立选择的权力，不让一个少数派的候选人、一个提出激进的、几乎肯定反民主的纲领的人当总统，这种想法不能说是荒谬可笑的。不过，我们知道这是不大可能的。由于捉摸不定，我们决定指示科里大使写一个报告，“冷静地估计”一下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估计一下“将来在智利组织一支有效地反对阿连德的力量”时有多少人赞成和反对。

九月九日亚历山德里宣布，他怎么也不会退出在国会中的竞选。于是，制止阿连德上台的一线新的希望油然而生。亚历山德里还宣布，如果他在国会中当选为总统，他就辞职。这样就不得不重新选举。在新的大选中一九六四年弗雷和阿连德竞争的那种局面可能再度出现。另一个人插进来任总统，尽管时间很短，弗雷再参加竞选也就符合宪法的规定了。他几乎肯定会赢。至于军方，据报道，九月十日陆军总司令雷内·施奈德将军对一群军官说，陆军不介入选举过程。但是，陆军将要求阿连德“保证”，以后陆军仍然保持职业军人建制，不得政治化。科里大使报告了他自己的信念，他认为这种保证简直是一钱不值。

我本来已决定九月十四日召开第四十号委员会会议。九月十二日，应总统要求，我通过秘密渠道请科里坦率地提出“美国在目前形势下应采取何种切实可行的行动方针”的建议。尼克松对他所认为的官僚机构办事拖沓和国务院四平八稳地照常规办事的作风愈来愈不安，因为这使他想起我们早先对卡斯特罗麻痹大意的情景，他一直认为这是个教训。（这事实上是不公平的。在智利大选之前，不论国务院是怎么因循拖拉，它还是大力支持和积极执行第四十号委员会作出的每一项决定的。）科里作了满怀希望的答复。据报道，弗雷已对阿连德接管政权的前景警觉起来，正想方设法避免出现那种局面*。科里大使向我建议找个华盛顿的高级官

员把有关智利问题的深刻背景事实公诸于美国大众，也把我们深为关切的心情传达给迟疑不定的智利人。

九月十四日第四十号委员会审议了我们当时以“鲁布·戈德堡”为代号的精心策划的一着：先使亚历山德里当选然后辞职；这么一来，按照宪法规定，弗雷就可以在随即举行的特别选举中再次参加竞选。第四十号委员会同意授权科里去探讨这个可能性，并为支持这一着的各个项目拨了二十五万美元。九月十五日，由国务院的副国务卿亚历克斯·约翰逊将这个决定用电报通知科里，还要求他让他大使馆中的全部适当成员加紧进行和智利军方联系的工作，“其目的是保证我们获得必要的情报，以便我们能够独立估计军方支持弗雷再次当选的决心有多大”。

九月十六日我们得知侯赛因国王即将着手和巴勒斯坦突击队摊牌；西恩富戈斯正被建成一个潜艇基地也在这一天变得明显起来。也就在这一天，我在芝加哥向一部分美国中西部的编辑和广播人员介绍供正式发表的背景情况，其中除谈到其他问题外，还特别按科里的要求，谈到我们对阿连德上台执政的看法：

智利选举已揭晓，共产党支持的人选（而且很可能他本人就是共产党员）获得的票数最多，比仅次于他的那个保守派的候选人还多了三万张。他获得了百分之三十六点一的选票。这样，他就得到了较多的票数。

两个非共产党派，共获得了百分之六十四的选票，可见非共产党派的票数仍占多数，而共产党只是比其他候选人得到较多的票。我这样说只是为了把情况弄清楚……。

现在谁要预言，如果阿连德得胜，他就可能会在今后若干年内建立起某种共产党政府，那是相当容易的。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建立起来的那个共

---

* 弗雷后来坚决否认他会做任何违反智利宪法的事。科里的消息是从弗雷的助手那里得来的。这些助手很可能是未经授权擅自提供消息的。我们不管怎么样必须根据我国大使馆所确认的事实办事。

产党政府，不是在我们海岸外面一个岛屿上和拉丁美洲没有传统联系、也没有影响的政府，而是一个拉丁美洲大国。而且这个国家的邻邦，比如，和智利有很长的共同边界的阿根廷，已处于四分五裂；秘鲁，本已出现了难以对付的倾向；另一个邻邦玻利维亚，即便没有出现这种种事态，也已经是更加左倾，更加反美了。

因此，我认为，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地说，一旦阿连德在智利接管政权，对我们、对各民主派和在拉丁美洲的亲美力量，以至整个西半球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这时候尼克松已经亲自处理智利问题。在九月十四日，他采取的行动是听信了很有威望的智利日报《水银报》的发行人奥古斯丁·爱德华兹的意见后当机立断采取的。爱德华兹特地到华盛顿来要我们注意一旦阿连德接管政权后所造成的后果。他当时住在百事可乐饮料公司总经理唐·肯德尔家里，肯德尔正好那天和他父亲一起去见尼克松。（我和爱德华兹，还有米切尔一起吃早饭。我还要求赫尔姆斯会见爱德华兹以了解他所掌握的内幕情况。）

尼克松见了肯德尔以后于九月十五日下午一两点钟要求赫尔姆斯、米切尔和我去会谈。他和我们谈了不到十五分钟，在谈话中，他告诉赫尔姆斯，他想下大力气，看能否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阿连德上台执政，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把阿连德搞掉，我们也应当试一下。如果赫尔姆斯要一千万美元，他亦会批准。对智利的援助计划应予削减，应对智利在经济上施加压力，直到它“受不了”为止。他叫赫尔姆斯绕过科里，直接向白宫报告工作，由白宫作最后决定。当时在执行上的目标仍然是代号“鲁布·戈德堡”的那一着。尼克松事实上没有提出具体的行动计划，他只是在灰心丧气之余，毫无重点地、满腔热情地希望有所“作为”而已。

现在人们已把这次谈话看作是后来称为第二轨道的开端。而第四十号委员会的正式决定，为区别起见后来就成为第一轨道。

关于第二轨道的情况，国会委员会津津乐道地加以揭露，但是，能公诸于众的东西并不太多。我已在本书中多次阐明，尼克松老是喜欢发表夸大其词的言论，但一旦当他看清了这些言论的影响，他并不坚持己见。霍尔德曼担心一些粗心大意的来访客人会以为这些言论当真是代表总统的政策，他之所以那么小心翼翼地不让人们随便去见总统，这确实是原因之一。比如，就拿第二轨道来说，不但没有一千万美元的开支，而且根本也没有拨出什么专款。如果说有过什么开支，那不过只是区区几千美元而已。即便以赫尔姆斯所能见到的来说，所做过的事无非是试探一下，探讨探讨各种可能性罢了。

再说，总统的热情迸发，虽然无疑对于接近军方和执行“鲁布·戈德堡”计划起了推动作用，使事情更加迫切，但对各部来说，只不过促使它们得出相同的结论而已。驻智利大使馆通过第四十号委员会（第一轨道）的正常系统所接到的指示，与赫尔姆斯跟总统会谈后命令中央情报局进行的活动极为相似。第二轨道的出现，表明尼克松对国务院系统很不信任，他怀疑国务院不会考虑他的愿望。拿这件事来说，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阿连德在大选中获胜之后，各部门的意见并没有多大分歧。

中央情报局秘密活动的头子托姆·卡拉梅西尼斯多次就第二轨道向尼克松汇报过情况，每次汇报都是悲观的。中央情报局向黑格和我提出的报告同样也是消极的。我在后面还要阐述，一个月以后，十月十五日那天，我下令停止这种活动。这是经尼克松批准的。得到国务院全力支持的第一轨道，图谋鼓励军方采取行动，以便按照类似总统所希望采取的路线，在智利再举行一次大选。这一轨道同样未获成功，在同一时间被弃而不用。这次是第四十号委员会放弃的。

不论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是放在第一轨道（第四十号委员会的

正式方案)还是放在第二轨道(中央情报局单独提出的方案),讨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智利军方的作用上面。到九月二十一日，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弗雷并没有推行能使他重新当选的任何行动计划。科里枉费心机地转而采取另一套手法——显然是经弗雷的密友同意的——令内阁主要成员辞职，并诱使他们的同事们也辞职。假如弗雷愿意的话，这就可能使他有了让军官们去接替这些阁员的借口。换句话说,这么一来,弗雷就有办法可以造成一次宪政危机,这样,和其他各项计划一样,其目的是再来一次选举,使智利能在弗雷和阿连德之间任择其一，能在民主制度和潜在的独裁制度之间任择其一。弗雷是否愿意这样做当时是有疑问的。而当时有目共睹的主要障碍是陆军总司令施奈德将军;他认为,是政客们把智利弄得一团糟的,他们有责任解救智利。据报告,另一个障碍是：军方担心，如果他们行动起来，他们亦会遇到希腊军政府所受到过的那种对待——那就是说,美国立即停止军事援助,世界各地的左派也会大肆攻击它。

因此，第四十号委员会授权科里同选定的一些军方领导人接洽。科里可以向他们说清楚,不因为他们的介入而有失掉美国军事援助的危险。我不能根据我的记录断定这些信息是否已传了过去，是什么时候传过去的,传给了谁。

从九月二十六日到十月五日,我不在华盛顿,我先到巴黎去和南越副总统阮高其会谈,还同北越人举行了秘密会谈,然后于九月二十七日晚又到罗马去和尼克松会合，出访地中海各国。尼克松一有机会就鼓励友好国家政府利用它们在智利的影响阻止阿连德上台,或至少不过早地认为阿连德的胜利已成定局。他发现,和他一样关心智利前途的大有人在。

九月二十九日,第四十号委员会在我未能出席的情况下开会。主持会议的是副国务卿约翰逊。会议得出结论，智利军方只有在

害怕发生经济危机和如不采取行动美国就会停止军事援助的情况下，才会采取行动，要求重新选举。已通知军方，确有这种危险；为了强调这一点，中断了运送军事援助的工作。这些步骤是我不在的时候批准的。总统回来后，第四十号委员会又于十月六日开了一次会。会后，我们和出国访问前一样还是迷惑不解。弗雷不但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而且他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止基督教民主党代表大会于十月五日有条件地赞成智利国会选举阿连德为总统。代号为"鲁布·戈德堡"的那一着，现在肯定是寿终正寝了。智利国会肯定会选阿连德当总统。用内阁辞职的办法来造成宪政危机也来不及了。剩下的唯一可能是，军方接管政权作为重新选举的前奏，以此来阻止阿连德上台。亚历克斯·约翰逊和我按照全体一致意见通过秘密渠道联名通知科里——按第一轨道——要求他再向军方强调阿连德就任总统的严重后果，并授权他重申：如果军方行动起来，美国保证继续提供军事援助。

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事实上行将合而为一。十月十日中央情报局向黑格将军报告——作为第二轨道的一部分——发生军事政变的前景比以前更加渺茫了。十月十四日中央情报局的代表托姆·卡拉梅西尼斯向第四十号委员会报告——作为第一轨道的一部分——说，"目前不存在政变的气候"。我向这个委员会指出，看来我们简直毫无办法去这样或那样影响智利局势。十月十五日，我接到卡拉梅西尼斯的一份类似的情况汇报。这是第二轨道的一部分。现在唯一还存在的可能性是由罗伯特·维奥将军阴谋绑架施奈德将军，把他送到阿根廷去。但是，维奥将军对这种绑架的事很不在行。我向尼克松报告说："今天我看见了卡拉梅西尼斯。看来那一着毫无希望。我让他们停下来了。搞一次流产的政变比什么都更糟。"尼克松表示同意。他现在觉得也只好任由阿连德去当总统了。他主要关切的事是不让国务院在阿连德执政的情况下，硬

要他同意恢复援助关系。他下令，如果阿连德没收美国财产，就立即按希肯卢珀修正案行事。

卡拉梅西尼斯在十月十五日和我会面时，即奉命要维奥将军的政变阴谋立即停下来，同时还交给他一个一般性的任务，只要将来出现其他机会（显然很渺茫），就要“维护我们在智利的资产”。中央情报局十月十七日把这个指示传达给了维奥集团；我们派驻圣地亚哥的情报站劝告他们，他们的计划会失败，因而反受其害，所以不要执行了。

参议院特别委员会以调查所谓美国政府的暗杀阴谋的名义，在它的一九七五年的报告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吹毛求疵地论述，是不是艾尔·黑格或我作证时向委员会提供了错误的情报；是不是中央情报局擅自轻举妄动。我和黑格作证时说，策划政变的工作已于十月十五日结束。实际情况是这样。除维奥集团外，参议院特别委员会还发现了另一个阴谋集团。中央情报局和这个集团有联系，这个集团也计划要绑架施奈德将军。我和黑格从来未听说过有这么一个阴谋集团，理由很简单，他们什么事情也没有干。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我下令立即停止政变的策划工作时，尼克松、黑格和我都认为，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都从此结束了。在智利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显然以为这道命令只对维奥集团适用。他们觉得，他们仍然可以放手和第二个阴谋集团继续干，而白宫对这个阴谋集团毫不知情。他们于十月十九日甚至没有通知白宫的任何人，便给了他们三挺轻机枪。对于需要外国武器来搞军事阴谋的人，这样做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这些人确实是这样的。在一场台柱子警察部队*似的错误百出的喜剧中，阴谋者准备要在十月十九日晚宴后，在施奈德的汽车里绑架他。但他们没有抓住他，因为

* 《台柱子警察部队》是本世纪十到二十年代在美国流行一时的一部无声影片。这支台柱子警察部队在执行任务时，大打出手，错误百出，大闹笑话。——译者

施奈德乘了另一辆小汽车跑了。第二天，他们再次想抓住他，但是，施奈德的小汽车在圣地亚哥来来往往的汽车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三挺轻机枪没有用过就还给了我们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这些阴谋者也就心安理得地不再露面，他们的英勇行为，后来才由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出面把它弄得臭名昭著。

随后，十月二十二日，中央情报局于十月十七日曾明确地通知维奥集团停止活动，但它却违反中央情报局的指令，背着我们自行活动。它试图劫持施奈德将军，但由于行动鲁莽，施奈德立即拔出手枪自卫，中弹受重伤。施奈德将军之死，是他们鲁莽地搞绑架阴谋所造成的。对此我们曾下令停止，我们既不支持又不赞成，既不援助又不同意。而这却是参议院委员会调查美国政府阴谋暗杀外国领导人的特别事件之一。参议院委员会进行了各种影射攻击，却反而证实了美国没有阴谋暗杀施奈德将军。确实没有谁有意要暗杀他，连维奥将军也无此意图。在我因公出访期间，第四十号委员会的任何一次会议，从未讨论过暗杀或在这类问题上有所暗示，也从未把它当作第二轨道的一部分审议过。绑架是维奥策划的。我们曾劝他不要这样干。第二个阴谋集团什么事也没有干。不论是第一轨道还是第二轨道的一切计谋，哪怕是涉及军方的复杂计谋，其用意都是要重新举行大选，考验智利人民在两个人的竞选中是想选一个民主总统还是选一个标榜马列主义的总统。几乎可以肯定，在这两个人的竞选中，智利人民是会选择改良主义民主派爱德华多·弗雷的。

十月十五日以后，我们的注意力已转移到阿连德上台后怎么办这个问题上。十月十七日，我召开了高级研究小组会议，讨论阿连德就职后可供选择的方案。十月十八日——在上述各种阴谋活动之前——我送交总统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在美国政府最高一级的官员中一切搞政变的想法都已放弃。

备忘录说："现在看起来，阿连德肯定将在十月二十四日国会决定性的选举中当选为智利总统。"

我们估计了阿连德当选总统对我们的利益以及对西半球所造成的危险。我们的估计是对的。我们所寻求的解决办法是促使人民有机会在民主力量和集权力量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为努力实现上述这一解决办法助一臂之力是对的。有人说，美国被排除在灰色区域之外，未能采取介乎外交和军事干涉之间的行动，而在这个灰暗的世界里，我们的敌人却以政党为工具，所拥有的外国资金也不知大多少倍，还有难以胜数的外围组织为他们打掩护。我不能同意这个说法。我们所想的办法很不在行，是慌里慌张地临时凑合应付，执行时也是一片慌乱。所策划的"隐蔽活动"，根本没有开展起来。和一九六四年的情况相反，我们做得太少，行动也太迟缓，这样阿连德就任了总统。没有发生政变。一九七〇年十月以后（尽管参议院的报告中有些无中生有的含沙射影的错误说法），我们已不再去联系以图组织什么政变。后来阿连德终于被推翻，那是由于他太无能、太固执的缘故。军方领导人没有和我们商量就主动地对他采取行动，因为他们确信，阿连德蓄意夺取全部权力，并为此行将组织自己的政变。他们这么认为是很有道理的，我将在第二卷中谈这个问题。

阿连德就任总统

十月十五日以后，大家已公认不可能阻止阿连德就任总统，高级官员们越来越转而注意我们同阿连德政府的关系问题。科里大使以前认为，要想和阿连德达成临时协议，那是幻想。但是，他现在改变了这种看法，建议立即同新当选的总统开始谈判。现在科里提出这么一个论点：既然阿连德想要在国际上具有威望，显得他

的政府是合法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又需要我们默认，所以我们就应主动表示我们对他毫无敌意，以换取智利方面的克制态度。在没收问题上尤其是应该这样。十月十五日，我给科里安排了向尼克松陈述他的意见的机会。尼克松已不再反对阿连德任总统，但不主张同他合作。他的回答有些含糊其词，从那以后，不公平地把科里当作一个"软弱的人"。

科里的建议具体分析了我们在政策上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局面。十月十七日，我向高级研究小组介绍了建议的主要内容：

> 要是我们公开过早地表示敌对的态度，那就可能促使智利的民族主义分子团结一致支持阿连德。另一方面，要是我们表示愿意和解，那就是甘冒表现软弱或对在西半球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府无动于中的风险。
>
> 我离开会场的那一天，谁也不相信可以长期采取和解的态度。我们所面临的唯一抉择是采取什么策略。问题是：让人们看到是阿连德先采取行动而造成对峙局面好呢，还是美国立即采取敌对军事行动好。

第二天，我向总统概述了事态发展的情况。我写给他的报告说，如前所述，现在阿连德肯定要就任总统了*。美国政府内部一致认为，阿连德是一个有强烈的反美偏见、强硬、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谋求与古巴和苏联建立密切的关系，领导西半球反对美国影响的一派力量，并有计划地鼓动与我们相敌对的政策。他几乎肯定将没收美国人的投资，而且很可能不付给适当的赔偿。这样一个政府存在的本身，必定会助长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那些敌视我们的人的气焰。可以断言，阿连德开始的时候地位并不牢固，支持他的那个联合内部派别很多。智利经济情况在恶化。智利的民

---

* 这毫无疑问证明，我们事先并不知道维奥十月二十二日的阴谋。

主传统在一段时间内使他不敢轻举妄动去建立一个极权国家。军方亦不信任他。我写给尼克松的报告说，“为了克服这些弱点，阿连德的‘行动方案’几乎肯定会谋求合法性和威望；使那些心存疑虑的人放心，并且十分谨慎地避免反对派很快联合起来反对他；分散反对他的势力，然后在他力所能及时逐一地各个击破。如果让他顺利地执行他的行动方针，他便很有可能有能力有办法在一两年内巩固他的政权，使他的反对派不起作用。”

这样我们就面临着和解政策不起作用的困境：“阿连德不会自动改变他的目标；他也不大可能仅仅为了能够同我们相处下去而愿意谈判修改他的目标。因此，美国想要同他和解的政策，在他想要而且能够采取反美方针的情况下，是不大可能使他改弦更张的。”换句话说，我们实际存在的选择就是高级研究小组所已指明的：我们究竟应采取公开敌对的态度呢，还是应当采取一种“正确”而“冷淡”的态度，从而由阿连德去强行造成对峙的局面。我促请总统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我表明，我宁可避免对峙。采取“冷淡而正确”的态度。

不过，有若干礼仪上的问题必须立即作决定，那就是关于我们对阿连德很快就要就职应如何正式表态的问题。我建议由罗恩·齐格勒宣布我们已注意到阿连德当选，我们未来的关系要由智利决定；我们派遣一个小的、规格低的代表团由助理国务卿查尔斯·迈耶率领去参加就职典礼；恢复给智利军方的军援输送。我建议，关闭我们设在智利的空军大气层试验站（因为阿连德必定会要关闭）；我们和各主要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协商，设法协调西半球各国对智利新总统的政策。

尼克松批准了我的全部建议。这些建议于十月二十一日传达给各政府机构。智利国会十月二十四日投票选举阿连德为总统。十月三十日我支持国务院的建议，即授权助理国务卿迈耶向阿连

德致贺词，说尼克松总统得知，智利人民给予了阿连德巨大的荣誉和责任。这不是一个热情洋溢的贺词。我主张这个贺词用口头转达，不要写成书面的，但在礼貌上要做到得体，以便让阿连德选择和解道路，如果他愿意这样的话。

十月三十日，阿连德宣布组成他的十五名阁员的新内阁。重大的经济和亲信职务全部交给了共产党(财政、公共工程和劳工)；经济部长由一名很亲近共产党的无党派人士担任；四个职务由阿连德自己的社会党员担任(内政、外交、住房和总统秘书)；其他七个职务由其他几个激进的小党派人士担任。新外交部长克洛多米罗·阿尔梅达在过去由于钦佩中国共产党人和古巴人，曾采取过反苏立场，可见他左到什么程度了。

卸任总统弗雷于十月三十一日向智利国会发表了告别演说，他在演说中声明，他打算作为阿连德政府的建设性的反对派继续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他敦促智利人维护民主制度，要人们警惕不要把大学变成政治战场。看来，他的演说反映了人们对阿连德统治下政治民主权利前途的普遍关注。

阿连德于十一月三日在国会的联席会议上宣誓就职。他保证，“维护国家的完整和独立，维护和遵守宪法”。他还号召智利人，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工作”，并作出必要的“牺牲”。有六十多个外国代表参加这次就职典礼，包括越南北方、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德和古巴的非官方代表团(古巴代表团由长期任共产党领导人的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率领)。波多黎各独立党的领袖们也应邀参加了就职典礼，这使人先尝到了一点阿连德的反美偏见的滋味。有人在公开谈到就职典礼盛况时，引用了阿连德的话说，他计划，如果国会(在二百个议席中，他们人民联盟只控制了九十个席位)拒绝接受他所倡议的政府“新形式”，便举行全国公民投票⑬。十一月五日举行群众大会，三天的庆祝活动至此达到了高

潮。阿连德在大会上发表演说，保证建立一个“工人阶级共和国”，他指责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平等。他暗示要大搞国有化计划。

阿连德接见了查尔斯·迈耶。迈耶向他转达了尼克松的贺词。阿连德没有表示他是采取了和解的态度。他的政府的主旨已定。例如，过了几天，切·格瓦拉的雕像在圣·米格尔工人阶级区揭幕。拉丁美洲的一些革命斗士，其中包括古巴工人联合会的总书记出席了揭幕典礼，参加典礼会的群众高唱智利和古巴的国歌⑭。

十一月六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下开会来审议我们对智利的政策的。也就在这一天，一则可靠的报道说，阿连德和智利民族解放军这个为在玻利维亚推进革命而成立的激进团体的成员举行了秘密会议。这个报道自然无助于改善会议的气氛。据说，阿连德在那个秘密会上保证，一旦他的政府牢牢地掌握了政权，智利将成为谋求通过武装斗争“解放”自己国家的拉丁美洲各革命组织的援助和训练中心。

虽然如此，尼克松还是接受了大家的意见，赞成采取“冷淡而正确的”态度。他表示担心，阿连德成功地巩固了政权会助长整个拉丁美洲所有我们的敌人的气焰，还可能使许多骑墙派转而反对我们。不过，他同意，如果我们采取公开敌对态度，反而可能对阿连德有利。因此，他决定采取体现在十一月九日发布的指示中的政策。指示申明，美国公开的表态应“冷淡而正确，避免给阿连德政府以口实来唤起国内和国际上的支持以巩固他的政权”。但是，指示也要求联合起来施加压力，免得“在智利建立的敌视美国利益和其他西半球国家的共产党国家”得以巩固下来。总统下令，不得给新的私人投资颁发保证书，已经发了的，也应在可能条件下停止生效。总统还下令，运用我们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影响，限制给智

利的信贷或其他财政援助。暂时不再承担新的双边经济援助义务，但是，人道主义计划作为例外情况处理。现有的义务应予履行。

这个指示是严峻的，但在执行上不象措词所说的那么激烈、果断（比如，在执行上，远不及后来对智利的奥克斯托·皮诺切特或对尼加拉瓜的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的政策严厉）。智利政府无偿地没收的新政策是为了打击私人投资。政府火上加油造成的通货膨胀（在阿连德死亡的那一天）达到了百分之三百五十的水平。中产阶级受到摧残。智利已无力偿还一九七一年的国际债务。在这种情况下，不论美国在国际信贷机构中推行什么样的政策，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三年智利的信用都会一落千丈。阿连德在他的一九七〇年竞选宣言中（"人民政府的头四十项措施"），曾保证"把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承担的义务作废"，在他一九七〇年提出的人民联盟纲领中曾宣称，打算"没收帝国主义资本……增加为我们的活动自筹资金的能力"。"对于含有限制我们主权义务的条约和协定，特别是智利和美国签订的互惠援助条约、共同援助条约或其他条约"，他认为"酌情复查、谴责或废除是绝对必要的"。对他这样一个人，任何国家的或国际的金融机构要是提供大量的信贷，那是不慎重的。

至于美国的互惠援助计划，赠与的援助，如前所述，已于一九六八年弗雷任总统时就终止。贷款计划在一九六九年即已减到四千万美元左右，到一九七〇年为七千万美元。即便是在阿连德统治时期，作为例外的人道主义计划也还为粮食用于和平计划拨款一千六百八十万美元，为救济特别灾害拨给二十五万美元，还有美国赞成泛美开发银行一九七一年一月贷款给智利的两所大学一千一百五十万美元。和平队留了下来。阿连德在职期间，美国还批准提供四千二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同意重新安排智利所负的约

二亿五千万美元债务的偿还期，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智利提供贷款八千二百三十万美元，并确认以前承担的为数约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义务继续有效。阿连德从各个来源得到的新的信贷加在一起，将近九亿五千万美元，其中六亿多美元是从共产党国家借到的⑮。对于那些总想找点外部原因来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经营管理的经济造成了灾难的人来说，承认事实也许是痛苦的事；但是，使阿连德倒台的不是美国的经济压力，而是他的政策。

阿连德迫不及待地执行他的纲领。十一月十二日，他宣布和古巴重新建立外交关系。重新建交的新协定是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参加阿连德的就职典礼时签订的。这个新协定违反了美洲国家组织一九六四年通过的决议，该决议被阿连德指责为缺乏“法理和道义基础”。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就作出了反应，发表了声明，对智利未与美洲国家组织的协商机构打招呼便采取了行动“表示遗憾”。阿连德政府还迅速地和北朝鲜代表团签订了一项条约，条约虽然没有提及外交关系，但还是构成了事实上的承认。智利随即退出了联合国朝鲜委员会。

十一月二十日，阿连德对美国工业采取了第一个行动，他根据一九四五年劳工法下令接管了北印第安那黄铜和拉尔斯通尿环公司控制的两家智利公司的行政管理权。阿连德指责这两家公司蓄意剥夺智利人的工作权利。他接着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共产党的一次全体大会上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宣告，他的政府很快就要提出把美国公司、智利人和外国人的银行、保险公司和未指明的工业财产收归国有的立法。据报道，在提出这类立法的同时，很可能也提出提案，修改宪法中保证私有财产的条款，使政府可以接管厂房设备（如工厂矿山）以及私人所有的土地（业已授权没收）。在他发表了这篇演说后，又公布了把大量基础工业收归国有的计划，对工业、银行业、商业和农业实行由中央计划管理的措施。这些正是他

的一九七〇年纲领保证要做到的。阿连德的财政部长向智利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提出经济计划提纲，他把智利的经济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归咎于外国的、特别是美国的投资商。

阿连德在一个月内就赦免了属于战斗工人团的数以百计的革命恐怖分子。战斗工人团是一个比共产党还要左的决意用暴力夺取政权的组织。在一九七一年一年内，特别突出地标志着西半球团结破裂的一件事情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对智利作了一次长达近一个月的访问。访问结束时，还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申明"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斗争和对世界形势的共同观点"，谴责"帝国主义"对越南的"干涉"，为"资本主义货币危机"和"社会主义阵营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力量的日益壮大"而欢呼。

阿连德的女婿、古巴人路易斯·费尔南德斯·奥那，曾积极参与策划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远征，很快就在圣地亚哥的总统府担任了要职。阿连德在现有的军队和警察系统外还组织了他私人的安全部队，其成员基本上是战斗工人团的极端分子。他秘密进口了大量的古巴武器，把他的支持者武装起来，为巷战作准备。一个"按照宪法产生的"总统竟采取这种手法真是太有趣了。一万到一万五千名无需签证的外国人前来帮助组织智利境内的游击队左派，并在邻近国家进行恐怖活动。他们企图推翻军事机构，一九七一年，一群士官在总统默许下曾发动一次兵变，要接管海军。

有人说阿连德是民主人士，这种神话不管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也不能叫人信以为真。智利最高法院于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审计长于一九七三年七月二日，众议院于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先后宣告，阿连德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措施违反宪法，超越了法律的范围。促成一九七三年军事政变的是在智利国内人们对他的不满。这一政变的酝酿、策划和执行我们都没有插手。

在一九七〇年九月，这一切都还是难以逆料的事。那时我们

未能阻止阿连德上台执政。我们准备同他和解，如果阿连德出乎意料想要和解的话。但是，我们也认为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阿连德说话算数，履行自己的诺言，因而也做好了准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就是智利在我们那个危机的秋天中所处的地位。我们在约旦和西恩富戈斯都已得手，但是，在西半球，我们还要去面对继续出现的挑战。我们的讨论磨炼了我们自己去对付将来其他危机的能力。我们所经受的各种考验，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而且是紧接着我们在柬埔寨问题上惨痛的经验之后出现的，因而更加错综复杂。我们既已挡住了别人强加于我们的挑战，现在可以设法按照我们自己的目的去左右局势的发展了。

① 见保罗·E·西格蒙德著：《阿连德的倒台和智利政局，一九六四至一九七六年》(美国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出版)，第八九页。人民联盟纲领全文见乔丹·赞米特编：《智利的社会主义道路》(美国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第二五五——二八四页。

② 见罗吉斯·德布雷著：《智利的革命：同阿连德的谈话》(纽约，兰多姆出版社，普及本，一九七一年出版)第一五九页。

③ 同上，第一一九页。

④ 同上，第一二〇页。

⑤ 同上，第一一八页。

⑥ 同上，第一一七页。

⑦ 同上，第一一八页。

⑧ 同上，第一二二——一二三页。

⑨ 同上，第八二页。

⑩ 按照福特总统一九七六年改组情报系统的命令，第四十号委员会改名为行动顾问组。按照卡特总统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发布的第一二〇三六号行政命令，一个称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协调委员会的类似委员会行使同样职能。

⑪ 美国国会参议院研究政府情报活动特别委员会：《关于暗杀外国领导人阴谋案的特别报告》，第九十四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第二二九页。

⑫ 德布雷著：《智利的革命》，第一二三——一二五页。

⑬ 与墨西哥城报纸《至上报》记者的谈话，于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四日发表。

⑭ 见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九日《纽约时报》。

⑮ 在阿连德任总统期间，智利从共产党国家和西方国家共得到九亿四千七百九十万美元的新贷款，其中六亿二千万美元是苏联和其他共产党集团国家提供的。这些数字不包括根据以前允诺继续提供的贷款。比如，泛美开发银行在阿连德时期便继续向智利提供四千六百二十万美元的贷款，事实上，这一时期该银行每年提供贷款的平均数比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〇年任何一年所提供的贷款都大。见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三年阿连德时期美国和智利的关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泛美事务小组委员会听证会记录》，一九七五年出版，第三二四、四四七页；美国参议院研究政府情报活动特别委员会：《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三年在智利的隐蔽活动》，第九十四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工作报告，一九七五年出版，第三二页；美洲国家间争取进步联盟委员会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提出的关于智利国内形势和需要从外面筹款情况的报告(美洲国家组织丛书H/XIV，美洲争取进步联盟委员会/650号)V14—V15页。

第十八章

应邀赴北京

华沙渠道的结束

从表面上看，尼克松政府任内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会谈没有出现戏剧性场面。会谈于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日在华沙中国大使馆举行。会谈时我国驻华沙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办雷阳隔着一张桌子面对面地坐着。这是两年里第一次举行会谈。这种大使级会谈断断续续地举行已有十五个年头。会谈的重大意义似乎就在于，它是不能取得任何一项重大成就的时间最长的会谈。会谈已进行了一百三十四次，全都毫无结果。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的议程上同样是充满那种徒劳无功的气氛。所不同的是，华盛顿的官僚们放过血*以后，斯托塞尔奉命说点新鲜的东西——当时的情况表明，雷阳也是这样。

以往一百三十四次会谈的主题一直是我们同台湾的关系这个难解决的问题：只要中美敌对状态继续存在，要解决问题是不可设想的，而只要台湾问题一天不解决，敌对状态也就不会结束。在会谈中不时提出的其他问题是：美国方面要求赔偿被收归国有的财产和偿还未按时偿付的债务；中国方面力求收回一九四九年以后美国按对敌贸易法冻结在美国的资产；我们方面力求使监禁在中国的美国人获释，时而也试图使美国新闻记者能到中国去采访，或

* 意思是指冷静一下。——译者

探讨贸易前景。这都是些双方纠缠不清的老问题。

所有这些大家熟悉的议题都可能在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中不厌其烦地旧事重提。我们方面的指示是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司拟定的。该司根本不知道过去一年中传达到中国方面去的信息，还以为没有理由要改变以往一百三十四次华沙会谈中沿用下来的那一套做法。这个做法确实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但也没有造成失败或引起争论。尼克松和我一样，虽未漠视那空洞无物的议程，却认为华沙会谈是向中国传达一个新的更有意义的信息的机会。只要北京认为美国是它的主要外部敌人，而华盛顿又把中国看作是包括越南在内的一切亚洲侵略和革命活动的根源，那么议程上的任何问题都不可能明确规定，更谈不到解决了。

二十年来，美国决策人把中国看作是一个难以理解、不可能左右的阴沉、混乱、狂热和格格不入的国度。他们一直深信，越南战争是中国的扩张主义的反映，文化革命是迷信意识形态纯洁性的产物。这些对美国人的气质来说是格格不入的，也是很吓人的。中国人方面则认为，我们在越南所作的努力的规模同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不成比例的，因此，他们认为，唯一讲得过去的目的是把印度支那变成最后进攻中国的跳板。这二十年的僵持真正反映了这些看法，它使我们的专家看不见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美国和中国之间正在出现一种还只是隐约可见的共同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家们无疑也象他们一样。两国领导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第一次开始彼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对方。

苏联在四千英里的共同边界上集结力量所造成的明显威胁，迫使中国谋求减少它的敌人，并获得另一股对抗苏联压力的力量。尼克松政府虽然背上了越南战争创伤的包袱，仍然有决心要缔造一个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它深信，同四分之一的人类接触能使我

们再次以新的观点去办外交。双方都必须处处小心谨慎，以意味深长而又微妙的信息和姿态去试探对方，而这些举动一旦遭到拒绝就不承担责任。那么，中国发出愿意改变方针的讯号所显示的微妙变化为我们的专家们所忽视，也许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在美国的“对华友好”团体所作的好心好意但目的性不明的努力也把问题搞乱了。

他们之中很多人所持的观点都是根据个人“亲善”的抽象概念或甚至历史上的内疚感，而决策人是难以把这些东西同美国国家利益或中国国家利益的现实调和起来的。中国人想要的不是空洞的恩惠，甚至也不是过去一直成为对话的主要内容的实际步骤，诸如承认、联合国会员籍、各种权利要求、交流等。他们想要的是战略上令人放心的保证，使他们四面受敌的恶梦有所缓和。美国新政府准备提供这种保证。它的不感情用事的态度现在倒成了一笔有用的资产，因为它和中国冷静估计的需要合拍。但是，我们必须克服二十年来先入为主的观念，专家们的种种清规戒律所形成的瘫痪性作用和政府内部互相倾轧的怪现象。我认为，除非我们能够摆脱在华沙起阻滞作用的那种仪式，特别是除非我们安排特别使节在两国首都之一，或许就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否则，这些都办不到。

美国驻华沙大使的人选，通常都没有关于中国事务的专门知识。因此，每次会谈都要有一名中级官员带着煞费苦心征得官僚机构和友好国家同意的发言稿乘飞机赶来参加。我们的大使在会上念发言稿；他所得到的回答无疑也是这一类文稿。大使们只有在澄清少数几个问题时才有权自行处理。在下一次会谈里，他们照样宣读在各自的首都重新经过冗长准备的对答。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而且毫无进展。在当时那种不信任的气氛下，哪一方也不能肯定坦率地陈述真实的目的或看法是否会有什么用处。而没有不拘

束的讨论就不能消除不信任。我认为很有必要把对话提到这样一个级别，即谈判代表能进行交换条件的谈判，而且很熟悉他们领导人的想法，因此能掌握基本战略思想。我想利用一月二十日的会谈来表示我们愿意派使节到北京去；我向总统指出，只要发言中谈到我们的基本思想，再谈些别的事情都是可以的，这些基本思想是：我们想要有个新的开端；我们不会参加苏美两国共同主宰世界的谋划；我们将不以意识形态为依据、而以对共同利益的估计为根据来开始我们的谈判。

到那个时候为止，在制定对华政策的那些人看来，这些想法没有一点是可以接受的。到了要草拟斯托塞尔大使一月二十日会谈的发言稿时，这些想法的每一点都遭到猛烈的抵制。亚洲问题专家不赞成我们希望有一个新的开端（部分原因是他们不知道当时正通过秘密渠道传达的信息）。苏联事务专家们担心，光是会谈这个事实就会引起苏联的对抗，如果在发言中再保证不参加苏美共同主宰世界那就更会引起对抗。他们认为，只有对方放弃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参加关于武器管制的谈判，或保证在亚洲采取和平行动，才能说是取得了进展。而这些问题除非与更大的问题联系起来，否则北京根本不会考虑。至于派使节去北京，一提这件事就把官员们吓得发抖，因为这样的会谈可能要由白宫亲自掌握，国务院以后再也插不上手了。

这一场官场的争斗是以传统的官场方式妥协解决的：我同意全部接受国务院的得意项目——提到台湾、武器管制、资产、权利要求、扣押人员等等问题——以换取他们接受我认为必不可少的那些想法。最后拟定给斯托塞尔的指示仍然比我所希望的要含蓄些。但是，等到我更加了解中国人的时候，我才认识到，弦外之音，不论从什么动机出发，他们几乎总是会注意到的。中国人与外国人打交道已有三千年的历史，而且不乏成功的经验，他们往往认

为，谁要一再坚持一种说法，那就说明这里面大有文章。

恰好中国人的想法同我们的想法并行不悖。在一月二十日的会谈中，斯托塞尔宣读了一篇声明，重申美国不谋求“参加针对中国的与苏联共同主宰世界的谋划”。他加上一句其务实精神使官僚们所流的血*不那么显眼的话：美国“准备考虑派一个代表到北京去同你们的官员直接讨论问题，或接受你们的政府代表到华盛顿来更全面地探讨我今天的发言中提到的任何问题，或我们同意讨论的其他问题。”

中国临时代办雷阳当然没有对这个惊人的变化作出回答，但是他照着稿子念的发言在台湾问题上显然语气和婉，与往常不同，而且在惯常的词句当中隐藏着两句含蓄的话：

我们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从根本上改善中美两国的关系。这些会谈可继续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在更高一级进行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他渠道进行。

在相隔一万二千英里的两国首都拟定的两篇正式发言，实际上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但是，华沙会谈的性质使我们不得不等候一个月，然后再看看在下一次会谈中能否把这个建议向前推进一步。

快到一月底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报告谈到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巴基斯坦驻北京大使的谈话，很受鼓舞。巴基斯坦大使发现，周恩来首先担心的是苏联，其次是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至于美国，周明确地认为是个次要的威胁；他似乎是已准备好，只要我们采取

---

* 和前面“放血”的比喻相呼应，指国务院官员勉强同意。——译者

主动，便同美国举行高级会议。据这个报告说，周恩来曾考虑过，我们显然不愿意“采取象柯西金那样的步骤”——换句话说，愿意派一位高级官员到北京去。

在这整个过程中，苏联人的愚蠢是够典型的。华沙会谈举行以后的第二天，多勃雷宁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他是想要我介绍情况来了。他倒并未因为莫斯科在任何问题上从未开恩向我们介绍过情况而裹足不前，竟跑来要我帮忙。当我避而不谈他的请求的时候，他便说，他希望我们不是在考虑“利用”中国作为一种军事威胁。他这样说实在太荒唐了。其实，那次会谈的情况很简单，无非是每个大使念了一篇预先写好的发言稿。对于他的说法我一笑置之。苏联大使馆的其他人员同样向其他级别的人打听。显然，北京已成为触发“神经痛”的地方。

我们一面等候举行第一百三十六次华沙会谈，一面加倍努力寻找不那么受限制的渠道。二十年不来往给我们的惩罚之一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接近中国领导人。亨利·卡伯特·洛奇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朋友、一个西欧国家驻北京的代办，他自称能见到中国领导人。经尼克松同意，我把一个信息托付给这位外交官，这个信息指出，在华沙难以进行认真的会谈，建议通过我国驻巴黎武官弗农·沃尔特斯将军（他已证明很善于安排我和黎德寿的秘密会谈）建立另一条渠道。洛奇的朋友拿了那个信息，以后每过几周便忠实地报告说，他还没有机会传递这个信息。终于，在十个月以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一日那天他通知我们，他很快就可以把信息传递过去。我想象不出他怎么会有这个信心。但是，这时我们已经建立了另一条渠道。

计划于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日举行的第一百三十六次华沙会谈使白宫和国务院再次出现互相扯皮的现象。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看来很可能中国人已接受了我们提的派一位使节去北京或接

受他们的使节到华盛顿来的建议，我们应该如何作出反应。我要斯托塞尔表示原则上同意，然后把这个问题提交华盛顿作详细回答。国务院提出这么一个不寻常的建议：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倡议后退，只表示注意到中国的答复而不发表意见。国务院很怕失去控制权，没有什么比维护其受到威胁的特权更能使官僚们肝火上升了。除此以外，国务院还断然表示，不愿意向多疑的盟国、坚持己见的中立国和易怒的苏联作必要的解释，说明为什么会谈要在新的地点进行，更不要说向新闻界解释了。

我的意见占了上风。尼克松命令我指示斯托塞尔作出肯定的答复，当然也不忽略背诵双边问题的那一套官样文章(台湾问题、权利要求、资产问题、囚犯问题，如此等等)。这些是过去那一百三十五次会谈沿袭下来的。为了确使中国人理解我们改变了的态度，我们在总统的对外政策报告中以空前求实的精神谈论中国。总统的这个报告是在二月华沙会谈之前两天公开发表的："中国人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的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我们强调我们所崇尚的不是夸夸其谈而是现实的政策。我们关系的关键是彼此对待对方的实际行动。这个报告十分明确地否定在中苏冲突中有任何袒护一方的打算，因而也不打算要搞两大国主宰世界的谋略。

我们希望改善关系不是想要利用中苏冲突的一种策略手段。我们认为这一冲突的加剧对我们毫无好处，因此，我们不打算袒护任何一方。美国也无意与任何一个大国联合起来主宰世界或结成敌对性的联盟来反对两个共产党大国中的一个。我们的态度十分明确：只要某些国家把它们自己看作是另一些国家的死敌，就不可能有持久和平。

正如我所提到过的，报告中关于国防政策那部分相当强调，我

们不再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看作是单独一个敌人。从今以后，我们制定军事计划时将从这样一个设想出发：中苏两国联合起来侵略我国已不再是一种迫在眉睫的紧急事态。我们将根据每个国家对我们的行为分别同它打交道。

对方收到并理解这些信息。在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中，雷阳作了一次非常和婉的发言，表示接受我们派一使节去北京的建议。我们似乎快要突破了。如果说，我们在华沙会谈之前便已示意我们已改变态度，中国人随后也马上作了同样的表示。二月二十二日我们收到巴基斯坦大使希拉利的一个文电，这个文电说，他的总统叶海亚·汗认为，我们的主动行动鼓舞了中国人。这种迂回的说法无疑说明，叶海亚从中国人那里得到消息，中国人仍然宁可间接和我们打交道。据叶海亚说，中国人现在不象以前那么担心美苏勾结了。但是，如果美国使对方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的回答是出于示弱或害怕，那他们会感到很气愤的。循序渐进的前景良好，特别是因为“他们认为扩大越南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不那么大了。他们认为中美交战的可能现在已经很小了。”换句话说，周恩来理解我们了。他甚至在一九七〇年初便已了解许多国内批评家们未能承认的事情：我们即将从越南脱身。与此同时，他还明确无误地暗示，中国无意参加越南战争，也无意因为越南战争而攻击美国的其他切身利益。

我立即答复希拉利大使，对报界的揣测我们无法控制，但是白宫将审慎地避免发表任何可能表示怀疑中国的动机或实力的评论。我再次建议我们开辟一条比华沙会谈更适于秘密交换意见的渠道。尼克松在我汇报谈话内容的备忘录上批示：“同意”。通往北京的道路已经打开，如果我们做好了准备巧妙地走下去的话。

但是，二十年来形成的疑心是不容易克服的。现在，在面临中国接受我们自己的建议的情况下，我们政府内部潜伏着的种种不

安再次表面化了。在下一次华沙会谈中，我们不能仅仅用大家所喜爱的那些议程项目来回避问题了，哪怕用最巧妙的笔法来拟定给斯托塞尔的指示也不能掩盖我们必须回答中国人邀请我们到北京去这个现实。

国务院东亚司认为，讨论了十五年的那些双边问题还未取得进展就去北京暗含有向中国人让步的意思，而且有使我们的盟国发生误解的危险，更不要说引起莫斯科的敌意了。该司主张要中国人对我们所关心的主要亚洲问题作出让步，作为我们同意参加高级会谈的代价。我认为，同现在使中国人感到不安的主要问题比较，双边问题是次要的。只有非常担心苏联的意图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人愿意坐下来跟一个前此被丑化为头号敌人的国家会谈。如果我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人真正想要讨论的是全球均势的问题。国务院担心，中国人可能使我们在北京陷入旷日持久的屈辱性谈判中而不能自拔。我对此毫不在意。他们根本不可能想要使我们受辱。只有肯定中国人是在谋求减少他们的敌人才能说得通为什么北京发出邀请。光是开始会谈就会使国际关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因为这表明，我们现在有各种以前认为不存在的选择，表明即便是在越南战争的压力下我们也能够采取大胆的主动行动。

三月十日罗杰斯在向总统提出的一份备忘录中概述了国务院的意见，建议三月十九日为举行下一次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日期。如果我们除去总统考虑问题要用四十八小时，那么这个备忘录显然是存心在开会日期上造成拖延。中国人不可能在接到通知后那么短时间内准备好去参加会谈。所建议的议程也使会谈不可能有成果，议程是：原则上同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扩大贸易和彼此间的接触；中国人单方面作些善意的姿态，例如释放美国人或扩大旅游范围。只有中国人在这几点上让步以后才可以万无一失地去讨

论仅仅是派更高级的使节去北京的方式问题，而罗杰斯乐观地预期需要再举行“几次”华沙会谈中国人才会作这些让步。

三月十七日，我花了很长时间在情况室和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共进午餐，在进餐的时候他再度极力主张要中国人表示愿意满足我们在双边问题上的要求。他后来亲自写了一封短信给我，概述他的不安心情：

> 在没有这种澄清的情况下到北京去就有这样一种严重危险：北京利用我们去达到它在对苏关系上的目的，而我们不论在同中国人的双边关系方面还是在其他地方，特别是东南亚谋求缓和紧张局势取得进展方面，都得不到任何补偿。由于同样的理由，我认为，除非我们已坚决地最后决定同中国人举行会议讨论象通讯联系、人员来往、会谈的时机、安全等问题，否则我们不应表示愿意讨论这类问题。北京会把我们讨论这类问题解释为十分肯定地承担了举行更高级会谈的义务，并会使中国人更加相信，在举行这种会谈之前，他们用不着和我们讨论“实质”问题。在这个时候承担这种义务会削弱我们力促中国人就他们自己的意图和在更高级会议中的谈判立场进一步表态的能力。

我不同意这些看法。一个美国使节访问北京必定会触发一场地缘政治革命；光是对河内就会造成创伤。这些就是压倒一切的“补偿”。同时，中国人若是完全不了解我们的整个做法就在华沙公开承认与他们的整个亚洲政策相反的原则，那也是不可想像的。我们在同我们的亚洲朋友的关系上肯定会碰到严重的复杂情况。但是，中国最终必定会摆脱它自己造成的孤立状态，到那时我们总是要碰到这种情况的。美国不应甘愿做无能为力的旁观者，而应有目的地去造时势。

尼克松和我持同样的看法。他在几次谈话中都强调他希望把会谈地点迁到北京去，派一个总统特使而不是普通的大使去参加

会谈。当然，这也正是国务院对这件事那么缩手缩脚的原因。尼克松提议要我绕过官僚机构，让洛奇的朋友、那位驻北京的欧洲国家的代办通知中国领导人，我们原则上同意派一个总统特使参加会谈。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这位一厢情愿的媒人说他能见到中国领导人是信口开河说大话，但既然原先托他的信息都没有传递过去，我看还是不托他办这么惊人的事情为好。

这次内部扯皮扯了一个星期，把原先打算举行华沙会谈的日期给耽误了。为了把事情弄出个眉目来，我在三月二十日给国务院发了个备忘录，建议立即举行华沙会谈，并主张给斯托塞尔的指示要反映出一种对举行更高级会谈的“积极”态度；我们还应接受雷阳的那个暗示，即一般的远东问题也可以讨论，而不仅限于传统的中美双边问题。国务院回答说，最早也要到四月八日才能把“经审批的”发言稿拟好（这在我思想上倒引起了一个问题：要是我们同意三月十九日举行会谈，那么提出的发言稿是不是未经审批的呢）。我同意了这一点。北京在答复中建议四月十五日开会，这是由于策略上的考虑，还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官僚主义，没有透露。* 这一拖延使国务院想出了推迟的另一个理由。中华民国（台湾）行政院副院长、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定于四月二十二日访问华盛顿。东亚司认为，在访问前两个星期或访问后十天内举行华沙会谈是不明智的（他们始终不肯告诉我这些天数是怎么样算出来的）。因此，美国于四月一日向中国人建议四月三十日或以后的任何一个时间举行会谈。至此，显然中国人被激怒了，他们自己也决定玩弄拖延的策略了。他们过了四个星期才回答。四月二十八日，他们提议五月二十日举行会谈，我们同意了。

我们能够得到答复就已经是很不寻常的了。到四月二十八

---

* 毛泽东后来于一九七二年二月间向尼克松解释说，在中国方面有过某种官僚主义的阻力或至少是拖沓。

日，西哈努克已在北京建立了他的流亡政府和解放军。周恩来一直热情地支持他的事业。南越军队当时正开进鹦鹉嘴。我们的军队已部署好要开进庇护区。在这一切面前，中国同意进一步会谈，其目的是安排一个帝国主义敌人的代表到北京去访问。直到五月十八日，我们在柬埔寨的作战行动开始已有将近三个星期的时候，中国人才通过新华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扼要的声明说，鉴于美国政府"悍然"出兵侵入柬埔寨，"中国政府认为按原定五月二十日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百三十七次会议已不适宜。今后何时举行，将通过双方联络人员另行商定。"

这样反而好些。如果中国参加了这样一次会谈，那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是非严厉谴责我们不可的。这样就免不了要对骂起来。取消会谈的方式方法倒是极其克制的。他们认为"不合适的"只是举行会谈的日期，而不是举行会谈这一事实。中国明确表示愿意继续会谈，甚至提出了继续会谈的程序。以后还有因双方无法控制的事件而使会谈中断的情况，但是，从那以后，中国和美国从未长时间互不接触。

取消五月二十日的会谈凑巧还有另外的原因。我们政府还没有准备好作单独方面发言。诚然，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成功地修改了五月二十日的安排，把讨论特使访问的技术上的问题包括进去，并授权斯托塞尔谈更广泛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远东方面的关系问题。但是，所做的这些修改是很勉强的，措词又是华而不实的老生常谈，显然华沙就不是个适于进行严肃讨论的好地点。白宫很想同北京谈地缘政治方面共同关心的问题，这在华沙根本不可能讨论，也许连理解都不可能。华沙会谈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在这一年里我们以后重新建立联系的时候，那是通过另一条不同的渠道，要讨论的问题的焦点也更加鲜明了。

三角关系

我国政府内部，在对待华沙会谈的战略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对于继续向北京表示我们的和解态度总的来说是可取的这一点，却没有分歧。国务院巧妙地清除了在朝鲜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对华贸易和联系的各种障碍。三月十六日，对前往北越、古巴、北朝鲜和当时称为大陆中国的旅行限制又正式延长了六个月。但实际上，对到中国去旅行作了局部的例外规定。美国政府宣布，从今以后，凡是抱有“正当的”目的持美国护照到中国去旅行的，都可以办理批准手续。四月二十九日宣布，在其他国家制造的非战略货物所用的美国造的部件和零件都可以向中国出口。实际的目的是缓和一下由于我们的管制扩大到自己的领土以外而引起的与友好国家的争端，而根本的目的是作一个北京不可能误解的政治姿态。

我仍然确信，中国向我们表态时谨慎小心，是由于苏联在远东迅速地无所不用其极地集结军事力量。沿着中苏边界发生军事冲突的前景使我们面临着各种恶梦一般的选择。对这样一种极其不幸的事件临时作出反应必定是游移不定的，而且很可能是不适当的。在一九六九年这一年里，我一直想方设法使部际机构制定一些应变计划。但是，各个部局都认为可供我们选择的方案都可怕得难以想象，因此，他们只是制定了谨慎回避的方案。他们所开列的巧妙的应变办法似乎更多地是想保险不会被指责为缺乏远见，而不是向总统提出一套实用的选择办法。一九七〇年初，我决定要求我自己的工作人员制定我们自己的计划，结果写成了一个深思熟虑的长篇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有几年时间作为我们的基本计划文件用。若干年后，有人在一本书里贬低这个文件，说它是“瞒着政府其他部门偷偷地”采取步骤的又一个事例。这本书的作者

写书的时候已不再是我的工作人员，他竟谦虚得出奇，略而不提那篇研究报告是他写的！①

与此同时，我们密切注视中苏关系。一九七〇年四月间有一个报道说，中苏边界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尼克松是在他上午的新闻简报上看到这个报道的。这个新闻简报是由白宫的助手们组成的一个工作效率很高的小组在前一天晚上综合新闻报道写成的。尼克松常在页边上加些评语，然后传到有关工作人员那里，由霍尔德曼的一个小助手用被动语态写成措词华丽的备忘录，好象尼克松写的评语是从天而降的雷声似的（“要求你们注意已出现的报道……”）。这一次我回答说，在边界谈判中所取得的进展（这在当时并未证实）固然可能使中国人希望同我们举行更高级会谈的紧迫性减少一些，但不会改变基本现实：

我们知道，苏联人对中国的政策和意图的疑心极大，而中国人已十分明确地表示，他们就是不买他们现在称为“新沙皇”的苏联人的帐……。因此，我们对共产党中国的战略似乎没有必要作重大的改变。中国人很可能仍然希望继续发展同我们的联系作为抗衡苏联人的措施。他们似乎对和我们开展贸易也颇感兴趣。他们倒可能认为，在北京举行更高级会谈的迫切性不那么大了；我们可能发现，自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以来我们在华沙同中国人发展联系的迅速步伐将会放慢。

尼克松在上文中提到在北京会谈的地方划了圈，并用正规的书法写道：“我们务必使国务院不至于在这件事情上拖延。”

所有这些努力和揣测都因为柬埔寨的事件而暂时停顿下来。当我们宣布进入庇护所的时候，政府内外都有人指责我们既破坏了同莫斯科改善关系的希望，也破坏了和北京改善关系的任何希望。的确有人甚至说，这两个国家现在会被迫联合起来反对我们。但是，根本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所出现的只不过是道义上的口

头指责，没有任何行动。

我们在第十二章中已看到，中国人在五月四日和五月五日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的“明目张胆的挑衅”。他们安慰河内的办法不是答应增加援助，而是引用了毛主席的话，说美国是“纸老虎”，还说“辽阔的中国领土是他们的可靠后方”。我对总统说：“中国人已发表声明，实际上是说，他们不会采取什么行动。”

在柬埔寨的事件并没有把两个共产党巨人赶到一块去，倒是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都要争取影响在印度支那起来反抗的各种力量而创立了一个互相角逐的新战场。西哈努克仍然安然流亡在北京，这使莫斯科和河内都感到很不舒服。从更广义上来说，中国和苏联对我们军事行动的有节制的反应再一次清楚地说明，借助于三角外交来解决战争是可能的。这两个共产党强国，都因为害怕我们可能全力以赴地支持其中一个，而不能在越南问题上冒和我们决裂的风险，这一点已经是明确无疑的了。

五月十八日《真理报》登载了一篇猛烈地攻击中国的文章，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接受苏联提出的在柬埔寨采取联合行动的要求。对这样一种指责非常敏感的中国人以最重的炮火还击，他们五月二十日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这个声明，如果把其中华而不实的词藻去掉，也露出非常谨慎的真面目。我给总统所做的分析指出：

实质上，……那是一篇非常空洞的声明。它只提出要“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甚至关于中国是斗争的“后方”这种常用的词句都没有。声明的中心论点是：小国能够打败大国，河内看来必定从中得不到什么安慰。它没有提出什么威胁，没有承担什么义务，对你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避免表态。

从策略上来说，毛的声明是要达到这么几个目的：

——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动大事宣传。

——以毛的个人威信加强中国人对西哈努克的支持。

——它尖锐地指出，已有二十个（别的）国家承认西哈努克（莫斯科没有承认西哈努克，而且始终不承认他）。

第二天河内公开感谢毛，但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河内的观点和北京的观点有许多微妙的差异。中国大谈印度支那三国人民需要结成一条统一战线（这一提法特别是指越南共产党人和柬埔寨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而河内则要求务必注意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一致，实际上是要求毛弥合他和莫斯科的分歧。

华盛顿收到毛的声明的时候尼克松的脾气特别坏。他没有等我的分析就下令，凡是在越南用不着的第七舰队的舰只全部开进台湾海峡："挫掉那种好战的锐气。我要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虚张声势，恐吓他们……。我不想要什么长篇大论的文件。不要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我要你打电话告诉穆勒，这是总司令的命令。你可以告诉莱尔德。事情已经无可挽回。我要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到达那里。"尼克松的亲信们早已认识到，象这类命令如果不在二十四小时内执行是会更有利于公共福利的。我在前面指出过，当尼克松说"无可挽回"时，这正突出地表明他把握不定。等到我们有机会讨论毛的声明的真意以后，尼克松才省悟到在台湾海峡重新部署力量并非良策。把柬埔寨同中国的安全连在一起不可能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毛还是留着不少的口子以待恢复两国互相接近的长征；在盛怒之下把这些口子都堵死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

因此，到六月中，当在柬埔寨问题上的愤激情绪平息下来的时

*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是通常由总统发出的要求各部门进行联合研究的指示。

候，我们便再次想办法重新开始联系。六月十五日，沃尔特斯将军奉命去接近中国驻巴黎武官方文，对他说，有个信息要向他传递。交给了沃尔特斯一份文稿去念，文稿的内容是我们现在都已熟悉的想法：由于华沙这个论坛太公开，也太拘谨，我们希望打开另一条保密通讯的渠道。我们的秘密渠道系统苏联人是很感兴趣的，但对中国人还没有什么吸引力。也许他们不理解，一个严肃的政府怎么可以这样办事。如果确是这样的话，有这种看法的不光是他们。（后来他们也变得精于此道了。）精明能干的沃尔特斯两次试图把交给他的信息传过去，一次是在夏天，还有一次是在九月初，两次都没有成功。这两次沃尔特斯都找到了方文并且谈了华盛顿的信息，方文含糊地说，他将转告他的政府，然后很快开车走了。以后没有回音。

也许中国要实行新政策在内部也有困难。我们很可以设想一下，共产党国家的人同样对革新有抵触情绪；我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在北京有人同时发表不同的有时是矛盾的政策观点，以林彪为首的军方特别主张奉行强硬路线。（我秘密去北京之后不久许多高级军事领导人都更换了，这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据报道，周恩来在六月初曾对一些东欧国家的外交官说，由于柬埔寨危机同美国在华沙的接触"暂时"中断以后，中国盼望恢复接触。周主动向几个客人谈这些意见，是联系中国希望同世界各地的一切国家改善关系谈的。② 中国人再次要求推迟六月二十日的华沙会谈时态度温和，似乎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强调说，恢复会谈的事将"在以后适当时间讨论"。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政策中也有一种好战的倾向。六月二十七日，中国人"纪念"杜鲁门总统决定把第七舰队安插在台湾海峡二十周年。他们谴责这是"美国派军队占领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北京指责美国一再派军队"侵犯"中国主权所属的领土，尼克松就任总统以来即已发生了十三次入侵事件。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七月二日，中国人派了两架米格19飞机起飞，显然是预谋要拦截并可能要击落一架在中国海岸外一百海里上空执行收集情报任务的C-130飞机。这是一九六五年以来中国头一次图谋拦截惯常的侦察飞行。我送交总统一份备忘录，谈论这一事件的"令人迷惑不解，甚至不安的"方面。我强调说，如果我们放弃在离中国海岸很远的海上侦察飞行，必然会被中国那些主张奉行强硬路线的人所利用。但是，我尤其担心这个事件引起中国内部的斗争：

也许最合理的假设是：在政府的当权派中确实有人想破坏中美关系。大约有两年时间，中国人降低了通常很刺耳的宣传调子，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试探我们，看看我们为改善关系愿意做什么。这个政策通常是和周恩来和在同一时期左右国内政策的温和派相联系的。在过去两个星期里，有迹象表明一些狂热分子正在东山再起，还有迹象表明，他们正在由于相对地被排除在经过整顿的党之外而抗争。在三军中，空军是在文化革命中最激进的。企图击落飞机可能同政策与权力的斗争有关，其目的是制止对外政策的温和的倾向。这些罪魁祸首也许还希望挑动我们作出反应或发表愤怒的声明，这么一来他们就可以诋毁主张和美国实现有限和解的任何人。

忽然间，七月十日那天，开始出现这么一种情况：中国人似乎已解决了他们内部的争执。北京宣布释放詹姆斯·华理柱主教。华理柱是一九五八年被捕，一九六〇年以间谍罪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的。同时宣布，一九五四年在上海以间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美国商人休斯·雷蒙德已于三个月以前自杀。这是扫兴的事。但是，释放华理柱主教的时机是有象征意义的。正好在这个时候，也宣布重开同苏联的边界河流航行谈判，这又起了相互抵消的作用。

在我们方面，我们继续作些不可能被驳回，也不需要对方首肯的姿态。例如，六月下旬，通用汽车公司申请准许把美国制造的柴

油发动机和零件和意大利罗伯托·佩里尼公司生产的八辆大型自动卸货卡车一同运往中国。国防部对这首次把零件卖给中国提出反对。国务院和商务部建议批准。我在(七月十三日)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支持国务院和商务部的意见。中国人坚持要美国造的发动机作为售货的一部分，尽管他们自称对和美国的贸易毫不在乎，尽管他们可以买到其他发动机。他们可能是以此来试探一下我们的意图。七月二十四日，尼克松批准了这笔交易。七月二十八日，商务部宣布了这个决定。八月二十六日，美国宣布取消禁止在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装载非战略物资运往或运出中国的船只加油的禁令。

虽然中国人继续保持沉默，我们毫不讳言地把我们所采取的行动的初衷公布出去。一九七〇年九月十六日，我在芝加哥对一群美国中西部的编辑和发行人说：

> 当今世界上最深刻不过的斗争也许是…… 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之间的斗争。沿着四千英里长的边界，在一边有领土要求问题，在另一边大量集结了军事力量。由于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还有谁是正统的共产主义中心之争，使他们的冲突具有准宗教的含义，因而他们之间的斗争就更加严重。

这就是使我们同北京和解具有紧迫感的因素。这就是——尽管有暂时中断的情况——华盛顿和北京正在坚持不懈地互相靠拢的原因。

巴基斯坦渠道

这些信号全都很好。不过，我和尼克松都确信，首要的事情是建立起一条保密的通信联络途径，一条不受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和

传统仪式的阻碍、双方都信得过的途径。九月二十七日，我在巴黎的时候，我的朋友让·圣特尼告诉我，他偶尔在社交场合见到过中国大使黄镇。我托他提一下我们希望直接联系。圣特尼在十二月间照办了。

周恩来和毛泽东作出决定，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该向我们发出一个信号。不幸他们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理解不了其中的真意。十月一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老朋友）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队伍，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③ 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如果说毛拿的是一把轻剑，尼克松却举着个大锤来传达他自己的信号。几乎就在斯诺看国庆节游行的那个时间，尼克松向《时代》杂志记者发表了谈话，重点谈了刚结束不久的约旦危机。在尼克松的谈话中插进一段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他自己在这里面的作用的寓意很深的话：

> 也许在五年时间里，或甚至十年时间里还不可能起这种作用。但是，在二十年内，它应当能起这种作用，否则的话，世界就会处于致命的危险境地。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④

后来在十月间尼克松又亲自作了进一步的努力去促成这件事。有几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到联合国来参加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尼克松在华盛顿接见他们中的好些人，并借此机会指出他很希望中美和解。十月二十五日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会晤是关键性的一次会晤。叶海亚即将访问北京。总统向叶海亚说明了我们力图列入华沙会谈议程但未获成功的各点。他要求叶海亚传话说，我们认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我们绝不会与苏联共谋反对中国；我们愿意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北京。尼克松提到罗伯特·墨菲、汤姆斯·E·杜威，或我自己作为使节的可能人选。

第二天，尼克松和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谈的也还是这些内容，他是从一九六九年他访问布加勒斯特时的会谈情况谈起的。尼克松滔滔不绝地说是既希望和中国也希望和苏联建立良好的关系，以防万一这次谈话传到苏联人的耳朵里去——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在同一天过些时候，尼克松利用齐奥塞斯库的访问公开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尼克松在国宴上致祝酒词时谈到美国和罗马尼亚的许多共同利益，其中突出地列举了罗马尼亚和美国一样都希望和苏联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良好的关系。一位美国总统用中国的正式名称这还是第一次。为了确保罗马尼亚人领会了这个信息，十月二十七日在布莱尔大厦我和齐奥塞斯库私下会谈时，又一再用同样的语言谈了尼克松所谈过的事。

现在我们只好等待了。十一月不是一个吉利的月份，因为联合国又一次成功地阻止北京进入，促使《人民日报》的作者们选用最尖锐的词句进行抨击。十一月十九日，联合国投票表决的前一天，我提议就两个问题进行部际联合研究。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期政策；另一个是鉴于在联合国支持我们的立场的会员国不断减少，探讨一下中国的代表权问题。*

十一月下旬有一篇报道说，莫斯科和北京签订了贸易协定，因而又引起了尼克松的疑虑。我认为贸易量不很大。我还认为，中苏分歧不是那么简单就解决得了的。商务上的姿态决不能改变四十个师的苏联军队部署在中国未予承认的四千英里长的边界上这一事实。商务上的来往交易也并不能平息苏联领导人对南面那八亿一心要收复失地的人窥伺辽阔、富饶的西伯利亚所必然要产生的不安。西伯利亚这个地方对俄国人倒是没有什么吸引力，不管什么人在俄国首都执政，都是一些被放逐的人到那里去开拓。我给总统写了这么两段话：

在西方，人们普遍揣测，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国家那么样忙于继续争吵，因而感觉不到要跟我们及西欧达成某种重大和解的压力。为了抵销这种揣测，苏联和中国都很需要表面上有较为正常的关系。因此，关系改善的迹象对北京和莫斯科都有用处。

虽然如此，这多半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改善。没有迹象表明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得到的情报确实表明，沿着中苏边界的军事能力在继续不断地改进；这一事实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促使中国人愿意接受使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各种表示。这一主张他们在两年前是断然拒绝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中国人在叶海亚·汗总统十一月十日到十五日访问中国以前已经给我们发出了一个与过去的一切信息大不相同的信息，我们还以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叶海亚访华三星期以后，十二月八日，希拉利大使同我的工作人员哈尔·桑德斯联系说，他有一个关于叶海亚中国之行的"信息"向我传递。我们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为什么叶海亚回到巴基斯坦以后等了三个星期才发出这个信息。也许中国人出于他们自己的考虑

---

* 事情真巧，尼克松十一月二十二日写了个条子给我，敦促我开始研究联合国方面的问题。⑤当时这一研究已在进行中。

确定了一个日期，要过了这个日期才可以发出信息；也许是由于叶海亚谨慎，预防万一。不管怎么样，第二天我就把希拉利请到白宫来。在我的办公室里，下午六点多钟，他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封用有蓝道的白色信纸手写的函件，这个函件是有人亲手交给他的。叶海亚就是不相信用电报通信联络是安全可靠的。（以后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的一切信息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希拉利说，他没有被授权可以把这个文件给我留下来。因此，他不得不读给我听，他慢慢念，我把它记下来。我们当时忙于干这种刻板的事，根本没有注意到，一个以古宗教为立国之本的国家的杰出的举止文雅的代言人口念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亚洲革命国家领导人的信息，而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领导人的一个代表把它记下来，这是多么不和谐；也没有注意到，在这个信息随发随收的时代，我们竟回到前一世纪那种外交方法——由一名信使传递、宣读手写的照会的方法。一件带有根本性的重大事件发生了，其方式是学究式的，几乎是平淡无奇的。

不管怎么样，我当时实在太忙，无法表达我所感到的激动心情。通常在外交上，个别的事件乃是一系列事件的一部分，一系列事件合成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其最终的意义只有事过境迁以后才能看得清楚。通常转折点也只有在回顾的时候才能看清楚。但是，希拉利带来的信息显然是个重大事件。这不是一个一遇到困难阻力就应予以拒绝的间接的深奥难懂的信号。这是周恩来发给理查德·尼克松的权威性的个人信息。周恩来宣告，中国“一直愿意并且一直在设法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谈判……。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周恩来很有风度地说，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这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

的真实可靠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

总而言之，正邀请总统的个人代表前往北京。诚然，会谈的目的据说是“撤出中国领土台湾”。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标准的公式，也许是为了保证不至于泄露出去，或提防华盛顿失信。用这样的措词向头号敌人发出邀请不那么有损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是不会发出那种对方显然不可能接受的邀请的。他们恳请一个美国使节去访问必定不单是为了中国的一个省的前途，而是受到比这更深刻的当务之急的驱使，必定涉及到中国安全问题本身。

希拉利一离开，我就穿过大厅走到椭圆形办公室，在那里我和尼克松谈了很长时间。我们一致欣然接受邀请。我们都认为，不能只把台湾问题列入议程。我们确信，这也反映了中国人的意愿，尽管他们很不愿意把这个意愿写进信件中。因此，我草拟了一封回信，于十二月十六日把它交给希拉利。这个回信也在我们方面确立了一种程序。中国人通过巴基斯坦提交的信件是手写的，与此相对应，我们以后的信件都是用打字机打的，用的是静电印刷术复制的信笺，上端不印什么字样，也没有美国政府的水印图案。信件上没有人签名（没有把这件事通知我们的官僚机构）。

我们的回信表明，美国准备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以讨论

> 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北京的会谈将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而是将包括旨在改善关系及缓和紧张局势的其他步骤。至于美国在台湾的驻军，美国政府的政策是，随着东亚和太平洋紧张局势的缓和，美国将减少在该地区的驻军。

（最后一句话的用意是，把从台湾撤军与结束印度支那的冲突联系起来，以引起中国人对结束越南战争的关注。这是我国政府

的许多部际研究报告一直沿用的一个公式。尼克松十四个月以后访华结束时发表的上海公报一字不改地把这句话写了进去。）我们的信息建议较低级的官员先举行会谈，为使节的访问作出安排。双方实际上已同意在北京举行会谈。

中国人一旦走上了这个轨道便连续发出他们的信号。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埃德加·斯诺，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可是这个举动又一次把我们的敏锐性和我们的情报机构的能力估计过高。尼克松是在十月间在和《时代》周刊记者的谈话中第一次公开表示愿意访华，而毛泽东则在后来由《生活》杂志刊载的他的谈话中第一次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这两次谈话无疑使亨利·卢斯*心神十分不安）。毛泽东干巴巴地对斯诺说，"目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要同尼克松解决。"因此，毛泽东"高兴和他谈，不论作为旅游者还是作为总统都行。"当时把翻译唐闻生所作的谈话记录给了斯诺，但是在几个月内不容许在他的文章中发表，这个做法是够巧妙的。中国人必定估量我们会知道这个谈话的内容，他们估量，既把手写的逐字记录交给了斯诺而又不容许他发表就会增加这个谈话的可靠性。如果他们是这样估量，那他们就要大失所望了。我们过了几个月以后才得悉这个谈话的内容，而到这个时候，我们已接到周恩来的信息，其内容十分明确，我们这些不那么细心的人也能理解。⑥

虽然如此，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还是很有趣的，因为它告诉我们中国领导人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间的心理状态。它表明，他早在那个时候已在考虑总统访华的问题，而当时在我们的来往信息中都还没有正式提到这个问题。它表明，美国单方采取的一切步骤中国都已注意到了。斯诺引用了一位中国高级外交官员的话说：

---

* 亨利·卢斯是《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的发行人。——译者

"尼克松正在从越南脱身。"看来天安门广场对我们对越南政策的方向比哈佛广场还理解得更透彻一些。诚然，斯诺的确暗示说，是我们方面要求派个使节到北京去的。实际记录有些不一样。在一月二十日的那一次华沙会谈中，双方都建议举行更高级的会谈。直到我们接到北京的正式邀请之前，我们始终没有排除以华盛顿为会谈地点的可能性。斯诺的文章还暗示说，是总统自己请求到北京去的。事实上，尼克松在他一九七〇年十月和《时代》周刊记者的谈话中只是泛泛地表示希望访华，而在我们所交换的信件中，是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传达的周恩来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也许中国人仍然保持着他们自命为中央王国这个传统的形象，周围的野蛮人都要向它朝贡。事实上，在各大国中，不只是北京，其他国家也都不愿意显得有求于人的样子。

十二月二十三日，让·圣特尼在巴黎见到中国大使黄镇，这位大使说，他已把我的信息呈送他的领导人(指我于九月间给圣特尼的信息)，在这个信息里我表示我们希望开设一条安全的渠道。北京就是这样使其他途径开始生效的。

一九七一年初，中国人又发出另一个重要信息，这一次是通过罗马尼亚发出的。显然，中国人和我们一样没有把握，不知道应该怎样和我们通信联络。罗马尼亚大使科梅利·博丹一月十一日在白宫访问了我，他带来了一个信息，那是罗马尼亚副总理格奥尔基·勒杜列斯库在十一月下旬访问北京的时候交给他的。(这次对为什么拖了那么长的时间才把这个信件传递过来，也还是没有作什么解释。)这位大使向我们宣读了周恩来的一个书面信件，这个信息和通过叶海亚传过来的那个信息大部分内容是一样的，它也向我们说明，这个信件是"经毛主席和林彪审阅的"，还说明，台湾问题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美国准备解决这个问题，欢迎派一位美国特别使节到北京来。不过，周恩

来有一个全新的惊人的提法。他说，尼克松总统既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那么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的。他的这个提法消除了一切顾虑。

总统访华就是这样第一次提出来的。我们之所以访问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正是由于它们独立于莫斯科，现在周恩来把这两个首都和北京放在一块儿提，说明不论在台湾问题上发表过什么正式的言论，他首先最关心的还是苏联的挑战。中国人的这两个信息都没有提到印度支那问题。越南战争可以使美国国内得不到安宁，但却不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解的障碍；而越南战争就在这个信誓旦旦的革命国家的边界上激烈地进行，而且在四年前它还被看作是挑起这场冲突的挑拨者。我在向尼克松提出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到了这几点。他在备忘录上批注说，我们不应显得太急于回答。

按照尼克松的这个指示，我一直等到一月二十九日才给罗马尼亚大使作了答复。他行将回布加勒斯特述职，如果我放过这个机会根本不提周恩来的信息，那他会认为这太奇怪了。为了避免发生误会，或对两个信件的意义作不同的解释，我给博丹的那个信息和一个多月以前给希拉利的那个信息字句完全一样。我们准备谈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国际问题。唯一的不同是，这个信息是口头的而不是用打字机打的，这表示我们对巴基斯坦渠道更喜爱一些；我们考虑巴基斯坦对中国和对苏联的地位不象罗马尼亚那么复杂。（要罗马尼亚不向莫斯科透露情况是困难的。）我没有提总统访问的事。在我们先前关于议程的信息未获回音之前提这件事为时过早，而且可能使对方感到尴尬。

我们又一次处在只好等待的地位。我利用这个间隙努力学点关于中国的知识。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中到一九七一年四月初，我和来自各个不同的最高学术机关很有学问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晤

谈了三次。应该说，我的一些老同事传授给我一些很有启发意义的真知卓见，这是很令人快慰的。根据我的记忆，局外的顾问们虽然很有学问，但是，他们进行工作是有困难的。一个决策人最需要外界的咨询意见的地方是介乎策略和目标之间的那个中间领域。策略通常完全取决于当前的形势，看不到电报的局外人很少能够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在另一头，最终目的反映哲学观点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一个顾问在这里固然可以提供某些真知卓见，但是，他的这些见解要起作用的话，那他就必须熟悉决策人的观点——改变方针更多地要求有自信，这比专门知识更重要。局外人的咨询意见对于介乎中间的一个时期最有用，它使决策人能越过紧急时期而又未到最终时期这一段时间内去看问题，即能看到两年到五年的形势。令人遗憾的是，研究中期问题按理说原本是这些有志于政治问题的院士们的本行工作，但是如果把他们召到华盛顿来要他们做的事无非是他们在家里也能完成的，他们就似乎觉得受骗上当，就失掉了那股因接近政权而兴高采烈的劲头。因此，他们不去集中精力提中期的咨询意见，而是往往向决策人提一大堆细微末节的策略性的意见，或竭力提些属于宏图大略一类的战略上的意见，直到弄得无精打采，开始对官僚主义那一套感到有了新的、还不那么习惯的爱好。

一九七一年初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们的情况就是这样。学院式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深信，对中国来说，首要的问题是越南问题和台湾问题。事实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要我同意，军备控制是另一个优先事项；而中国人从来连提都不提这个问题，每当我们提这个问题他们立即反对。他们一贯的观点和戴高乐的观点是一样的，认为这无非是美苏勾结的另一种形式而已。专家们另一个几乎是普遍的看法是：我们必须首先承认北京为中国的唯一政府或至少容许北京进入联合国，然后才能改善中美关系。这个看法也

是错误的。突破发生在中国进入联合国之前几个月，而七年之后卡特总统才承认了北京政府。双边贸易和交流是教授们提出的另一个优先项目(交流意味着教授们可以访问中国)；事实证明，中国人对这些东西兴趣并不大，必要时搞一些以达到象征性的目的。他们还普遍认为，中国会坚持要我们保证撤离亚洲。实际情况正相反。中国非常希望我们留在亚洲作为抗衡苏联的力量。我恭敬地听取了我的同事们所提的各种建议，不敢有任何不耐烦的表示，因为我意识到，由于我担任过前两届政府的学术顾问，我对他们的情况最熟悉不过了。

我们在等待着中国答复的时候，第二个学习机会是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要求部际机构作的三个研究报告。*这三个研究报告是：对华政策，中国在联合国的会员籍问题和我们在太平洋的军事战略。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为我们现在进行的秘密外交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它使总统和我能够在不透露我们的战术计划的情况下了解到各政府部门的观点和主张。因此，我要求分类详细说明，在我们的台湾驻军中，哪些是在印度支那的作战行动需要的，哪些是作为和台北的共同安全条约的一部分需要的，把这些问题作为我们对亚洲的军事态势的研究的一部分。这样，我就能作到心中有数，如果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我们要撤掉一些军队的话，我们可能要作什么让步。我是这样对高级研究小组说的：“我们反正即将要改变军事部署，却可以借此机会作些让步，这样做再好没有了，这是我们以前没有作过的。把这种消息告诉台湾，倒也不错。”

官僚机构和知识界都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上花了很大的力气。这一点我在后面再谈。

---

* 高级研究小组于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二日开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于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开会。

一九七一年二月间和三月初，另一件我们花了很大力气的事情是，南越军队在我们的后勤和空军的支援下为切断在老挝境内狭长地带的胡志明小道而进行的战役。在国会里和在新闻界批评我们的人公开宣称，他们认为这个有限的作战行动——作战行动的地点在老挝的最南端，老挝政府对该地区已将近有十年时间未行使主权——是对北京的挑衅，其规模相当于麦克阿瑟一九五〇年向鸭绿江挺进的那一次。一向被人看不起的南越军队发动这次未敢大力进行的战役，受到很多人的谴责，他们认为，这是向北越本身进攻的前奏。他们说，为了防止进攻北越，北京可能进行干预。(要是南越人果真有这么大的能力，越南战争的结局就很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确信，中国下的这局棋是从大处着眼的；它不会自愿地使自己陷入最糟糕的恶梦般的逆境——美苏勾结的局面——之中，它不会为了河内而在老挝南部无人居住的丛林中向我们发动战争。

事情的结局证实了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诚然，《人民日报》一九七一年二月四日振振有词地谴责了在老挝的作战行动。但是，和前一年对待柬埔寨问题一样，它谨慎小心地避免对尼克松进行人身攻击，它只在一个地方直接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就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取得完全的胜利"。换句话说，越南完全有能力去赢得它自己的战争；中国不会自己在军事上卷进去。

中国领导人还怕我们不理解这一点，因而特别选了《人民日报》发表谴责文章的那一天向我们发出另一个信号。周恩来的一个老朋友和亲信、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对挪威驻北京大使奥利·艾尔格德说，中国了解美国政策的新动向。乔说，由于印度支那战争，不可能恢复华沙会谈，但是中国人迟早要和我们坐下来谈。他表示特别希望和我会晤，并要求提请我们注意这段谈话。我们注

意了这个信息，并且加倍努力注意使中国理解我们在老挝的有限目的。尼克松二月十七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这个行动的矛头不是指向共产党中国，而是指向以南越和柬埔寨为其目标的北越人的。因此，我不相信共产党中国人有任何理由可以把这个行动理解为对他们的一种威胁，因此也没有理由对此作出反应。”周恩来三月五日到八日访问河内时所表现的克制态度也很值得注意。他提出要给北越人道义和物质支持，但丝毫没有对尼克松进行人身攻击，或威胁说中国要进行干涉。

与此同时，我们在总统于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发表的第二个对外政策报告中重申我们希望改善关系。在美国的一个官方文件中用中国的正式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还是第一次。我们还继续放宽对华贸易限制。三月十五日，国务院宣布总统决定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此后只要有正当目的，许可到中国去访问。（中国人在办理入境签证上没有放宽多少，在十八个月内才给三个美国人办了入境签证。）龙·齐格勒按照我的指示在白宫的一次介绍情况的会上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他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的行动，但是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

三月十七日中国人表明，当他们认真的时候，他们尖刻地进行抨击的本事是很不小的。他们在言论上对苏联进行了十分猛烈的攻击。三家中国大报纸* 联合发表社论纪念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诞生一百周年，社论强调要有“革命的群众的力量”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社论谴责勃列日涅夫是“叛徒”，只是随随便便地谈到美国，两者成为鲜明的对照。苏联已取代我们成为北京的主要敌人。

---

* 原文如此，实为我国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译者

虽然如果莫斯科让人们看到它经不起一击，那对它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但是，现在大家都已能清楚地看到，中国是那么不畏强暴，以致苏联连言论上的攻击也不能采取毫不在乎的态度了。三月二十六日，苏联外事周刊《新时代》拼命攻击美国对中国开展“微笑外交”，希望使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该周刊说，连美国“极反动的”集团为了这个罪恶的目的也赞成和北京建立关系。

三月份快结束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三月三十日在会上作了正式报告，哀叹苏联和中国的关系继续处于僵持状态，但是“坚决地”驳斥“正在从北京散布出去并已渗入到中国人民思想中”的关于苏联的“莫须有的毁谤”。

帝国主义者正加紧对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采取侵略行动。考虑到在中国和苏联之间散布不和正是在这种情势下进行的，那就更加荒谬和有害。这种情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要求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团结一致，采取联合行动，而不是煽动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之间的敌对情绪。

但是，勃列日涅夫在报告执行部分提出的建议证明，莫斯科没有能力去防止它所害怕的事情发生。他建议召开核大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的五国会议，“在会上应审议整个核裁军的各种问题”。由于可以预断北京必定拒绝这种建议，这显然又是企图孤立中国。美国如果懂得它自己的利益所在，就不可能有任何参加这种企图的动机。

到三月底，发展趋势就明朗化了。我们漫长而艰难的行程的第一阶段即将结束。正是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乒乓外交

中国在文化革命中自己造成了瘫痪状态以后，有条不紊地恢复它的全球外交，这预示着戏剧性事件即将在我们头上爆炸。一九六九年五月间，北京开始在这场大动乱中除一人外把全部大使召回国内进行了更换。一九七〇年，它谋求跟以前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建立新的关系。到一九七一年四月初的时候，国务卿罗杰斯向总统报告说，在过去六个月，又有七个国家承认了北京，比过去七年还多。罗杰斯报告说，中国正在同各种国家，如奥地利、黎巴嫩、秘鲁和喀麦隆讨论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已向几个非洲国家建议恢复关系和派驻新的经济援助使团；它还谋求和英国、日本改善关系，甚至试探了苏联集团中的东欧国家。据罗杰斯说，北京所作的努力很大一部分目的在于争取别的国家赞成它进入联合国。周恩来三月三日向英国驻北京临时代办表明，中英关系升级的条件是：英国改变它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态度，撤销英国驻台北领事馆。

一九七一年四月一日，国务院报告了其他意味深长的发展情况。例如，周恩来在三月间接见了日本前外相藤山爱一郎，并对他说，和美国的关系"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突然引人注目地有所改善。"周说，他"十分仔细地"阅读了总统的对外政策报告，"特别注意到美国总统第一次用中国的正式名称称呼它"。同一份国务院备忘录中有一个关于埃德加·斯诺前不久跟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的印象的报告，国务院不可能收入谈话的全文，因为它忽略了邀请尼克松这一重要因素；它反而报告说，斯诺和毛泽东、周恩来会谈以后得出的印象是："由于印度支那战争，中美关系没有立即改善的前景"。这个备忘录说，毛泽东预期中美关系在一九七二年以前不会

有什么进展。在同一个报告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暧昧关系的段落中有另一句从表面上看无足轻重的话，如果我们当时懂得它的重要意义的话，倒是足以证明这个令人丧气的结论是不对的。国务院指出，中日两国都有困难，但是，还是有些有积极意义的迹象，例如:“北京已派了它的乒乓球队到日本去参加国际比赛，几年来它参加这类体育活动还是第一次。”我们过了五天以后才全部了解这句话的重大意义。

美国乒乓球队也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们乒乓球队的那九名美国青年当时根本不知道，他们也将成为一场复杂的围棋赛的选手。四月四日，比赛暂停，休息一天，洛杉矶附近圣莫尼卡市立学院十九岁的学生格伦·科恩主动接近中国球队领队、三次获得世界冠军的庄则栋，捞到一次和中国选手们一道乘大轿车去参观三重半岛上珍珠农场的机会。(用“捞”这个词几乎可以肯定是用词不当；中国人到名古屋去如果不是带有和美国人交朋友的明确指示，那他们是不会同意的。中国人最了不起的才能之一是使经过精心策划的东西看起来象是临时决定的。)第二天，科恩等候庄则栋打完一场比赛，把一件T型衬衫送给他作礼物。科恩是学历史和政治学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后来他说，他想要“增进同每一个人，包括同中国人的友谊”。使他感到又惊又喜的是，庄则栋接受了，而且回赠科恩一块上面印有中国风景画的手帕。⑦

四月六日，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把大家都惊呆了。担任美国乒乓球队领队的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 梅·B·斯廷霍文打电话向美国驻东京大使馆请示。驻日使馆的中国问题专家威廉·坎宁安毫不犹豫地建议斯廷霍文接受邀请。⑧坎宁安只知道我们总的希望改善关系；而对我们向北京提出的建议是一无所知的；他的洞察力和主动精神很值得称赞。华盛顿的官僚们

却没有那么大的胆略。四月七日，国务院为确保不至于被指责为冒失，便向白宫打报告说："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作为回答美国最近采取的主动行动的一种姿态。"这次访问在国际上轰动一时，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周恩来慎密的舞台监督在这里面起了不小的作用。北京广播电台在最好的时间广播了美国乒乓球队到达的消息，虽然被邀请的还有其他几个国家的球队。

在中国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邀请后的第二天，尼克松发表一篇关于越南问题的演说。尼克松在演说中宣布从一九七一年五月一日到十二月一日再撤出十万名美国军队，同时也振振有词地为他的印度支那政策，包括在老挝的作战行动辩护。这对北京没有产生任何不良效果。美国乒乓球队的选手们在中国受到了盛大欢迎。四月十四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他们。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驻北京的绝大多数西方外交官都未能实现这个宏愿。这位非凡的中国总理说，"你们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上打开了一个新篇章。我相信，我们友谊的这一新开端必将受到我们两国多数人民的支持。"运动员们当时有点发楞，没有答话，这位总理继续谈这个问题："你们同意我这个意见吗？"这些美国人立刻鼓掌欢迎。他们很快就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这个邀请立即被接受了。

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画得光采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份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这是向白宫发出的一个信号，表示他们已注意到我们的主动行动。从中国的观点看，由于这些

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一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周恩来也懂得怎样作才不会遭到拒绝。在中国内部，这有助于使党政干部适应方针上即将发生的革命性变化。不过，这也暗含有对我们的警告：如果中国的建议遭到拒绝，北京可以积极开展人民对人民的来往接触，很象河内当时所做的那样，设法发动一场公众的运动以求达到他们的目的。

我们预期多勃雷宁随时都可能从莫斯科带来要我们去参加最高级会谈的邀请，这样就使当时的情况变得很棘手。如果宣布举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那么中国的建议就可能实现不了；如果我们的对华外交过于活跃，又可能使我们的对苏政策受挫。结果，苏联人爱占小便宜的老毛病使得多勃雷宁回来的时候带来的又是一个拖延时日的答复。他的主子们仍然没有放弃利用最高级会谈作为诱饵来在柏林问题上取得让步的打算。这真是弄巧成拙。这一次我们手里拿着苏联政治局根本不知道的牌。莫斯科倒替我们解决了问题。它的高压政策使我们得以顺利地着手建立起中美苏三角关系。

紧接着乒乓外交之后，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整个事情的曲折发展过程在许多方面都是令人坐立不安的。只有总统和我才理解周恩来的举动的全部含义，因为只有我们才知道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来往信息。我们知道，某种重大事件即将发生，但是，我们对于事件将通过什么渠道表露出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却是感到捉摸不定。每当重大事件即将来临的时候，尼克松的心情总是很矛盾的，他既有事情变糟的预感，又满怀希望，既抱有为国家着想的崇高目标，又夹杂着一些政治上和个人的考虑。他担心中国会在最后时刻后退；而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同时，他对已决定了的事情——即在总统出访之前，先派一个下级使节访问北京——另

有考虑。他不顾我们根本没有答复过中国请总统去访问的建议这一事实，现在想省掉先派使节这个阶段，以免使节的出使使他自己的中国之行为之失色。我提醒他，关于这两件事，我们已有三个月时间都没有直接从中国人那里听到什么消息，总统毫无准备地前往中国访问未免太危险了。尼克松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前景欣喜若狂；但是，也因为老是担心他的事业得不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结局而忐忑不安。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自然也有和尼克松一样的感觉。我倒不象他那么样怀疑中国人会后退，或仿效河内进行心理战。毕竟北京的目标和河内的目标很不一样。河内是想使我们丧失斗志；而北京需要我们作为抗衡莫斯科的力量。河内没完没了地攻击我国政府的权威；中国所关心的是，华盛顿能拥有维持全球力量均衡的权威和决心。我倒比较担心北京对我国政府处事的方法是否理解得很透彻，懂得通过什么渠道来接近我们。

我们还是镇静下来了。尼克松同意，我们应按照既定方针继续向北京示意，然后等待在地球另一边的高深莫测的对方官员们回话。我们进一步发出信号，表示我们是稳步前进的。在一九七〇年间，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属的副部长委员会曾奉命拟定一个增加同中国的旅游和贸易的计划。到一九七一年三月中的时候，已拟定了一个很长的单子，列举在总统行政权限内可以设想的每一个步骤，这些步骤不需要中国表示接受或采取互惠行动。被进取精神冲昏了头脑的这个副部长委员会建议立即批准这个一揽子计划。我抱怀疑态度。虽然我是“无法拒绝的步骤”这种政策的创始人之一，我不赞成在没有互惠条件和我们还不了解中国答复的性质之前采取这么大规模的行动。我在三月二十五日向总统提出的一份备忘录中——早在向乒乓球队发出邀请之前——把这个单子分成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揽子的步骤把对华贸易保持在略低于

对苏贸易的水平上；第二阶段把对华贸易置于和美苏贸易平等的地位；第三阶段超过对苏联贸易的水平。我建议第一揽子在最近将来单方执行；第二、第三揽子的执行则应等待我们对华关系有了发展以后，而且是以互惠为条件的。

当邀请乒乓球队的消息传到我们那里的时候，这个备忘录正放在尼克松桌上。我对他说，这是总统作决定最合适不过的时候了。尼克松在四月十二日批准了这个基本战略，并下令立即执行第一阶段的措施。四月十三日，我把这个决定通知各政府部门。四月十四日，白宫通过龙·齐格勒宣布第一次大幅度取消存在已有几十年的对华贸易禁运。他是联系一九六九年以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来谈这些新措施的。但谈到背景，他承认乒乓球事件对这次宣布的时机是有影响的。在同一天，我把总统批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售内有美国制造的发动机和变速器的法国自动卸货卡车的另一项决定通知各政府部门。

要使三角外交有效，那就要靠参加角逐的人本来的动机和倾向去发挥作用。这种外交必须避免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说你正在“利用”竞争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否则的话，你就有遭到报复或讹诈的危险。我们要同中苏双方都保持较密切的关系，要比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更密切些，只有这样，中苏之间互相敌视的关系才能最好地为我们的目的服务。其余的事就只有让事件本身产生的动力去决定了。

四月十三日，我又一次召见了苏联临时代办尤里·伏龙索夫——他好象命中注定要接收不愉快的消息似的——以便提前一天把我们和中国开展贸易的决定通知他。我强调说，这并不反映有什么反苏意图。这在外交上是惯用的抚慰对方的手段，向施展这种手段的对象提出正式保证，其用意是既吓唬他一下又叫他清醒清醒。如果对方确实信以为真，那就反而达不到玩弄这种手段

的目的。一般来说，苏联外交官不是那么好愚弄的；但是，我认为事情的含义本身已说明了问题。我还敦促齐格勒在白宫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同样否认有反苏意图。他照办了。同时，为平衡起见，他也按照指示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说："毫无疑义，尼克松总统所采取的主动行动，已打开了我们和中国关系上新的一页。"

在北京"注视着华盛顿的人们"看到在华盛顿的"不同意见的纷争"必定觉得很可笑。一方面，总统处处表现得欣喜若狂。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会议的一次常会上，尼克松大谈特谈他使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长远目标，"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大家庭隔绝的状态"。他追述了他所采取的各种不同步骤，并指出，他的政策已开始有了成果。他一向有不到悬崖边上不回头的习惯，这次也是这样，他的顾问们急得直打转。他说，他已向他女儿特里西娅和她的未婚夫(他们准备在六月份结婚)说，中国是度蜜月的好地方。尼克松希望他们有朝一日能看看中国。"事实上，我希望我在某个时候也这样做。"

另一方面，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对一群记者说，他不同意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他说，在出现乒乓外交之前的一次国家安全会议上，他提出过反对意见。这个谈话本来不是供正式发表的，但是记者们的克制是有限度的。总统和副总统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是那么好处的；在一个人身边有这么一个人，其毕生的宏愿只有等他死了之后才能实现，这毕竟是使人感到别扭的事。尼克松本已感到他周围都是潜在的敌手，听了这种话真是火上加油。他认定，这次失言再次证明阿格纽不适于作他的继承人——他对大多数潜在的候选人都有这个看法——并命令霍尔德曼要求阿格纽以后不要再谈论中国问题。

我们等待的时候焦虑的心情有增无已。尼克松怕整个事情告

吹而烦躁不安。我们终于在四月二十七日决定直接去和中国人接洽。我们派了一名信使到巴黎去，带一封信给让·圣特尼，要求他尽快把我们想在巴黎开辟一条渠道的正式建议传达给中国大使。我们选择巴黎是因为，中国人对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长时间保持缄默，至少有可能是北京对这两个渠道都不信任。但是，这封信根本没有递交。这封信正在途中的时候，巴基斯坦这条渠道终于活跃起来，我们叫信使不要投递了。

第一个表示是四月二十七日下午三点四十五分到达的——传话说，希拉利需要和我紧急晤谈五分钟。哈尔·桑德斯对他说，我第二天便要动身去休假。希拉利坚持说，他的信息不能等。因此，我在下午六点十二分接见了他。他交给我两页手写的备忘录，传达周恩来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回答尼克松总统十二月十六日发出的一个信息（我们这时才知道，中国人在一月五日收到这个信息）。这封信书法很漂亮，原文如下：

周恩来总理的信

周恩来总理感谢叶海亚总统于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转达了尼克松总统的信息。周恩来总理十分感谢叶海亚总统；如果叶海亚总统能把下列信件的全文转达给尼克松总统，他当不胜感谢：

“由于当时的形势，未能及早回答美国总统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信。

“目前，我们正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联系的情况。但是，如果要使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得到恢复的话，美国就必须把它的全部武装部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之间的直接讨论才能找到解决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美国国务卿或甚至美国总统本人，以便进行直接会谈讨论。当然，如果美国总统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可以推迟到以后再进行。至于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讨论的形式、程序和其他细节，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完全可以通过叶海亚·

汗总统的斡旋作出适当安排。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我问希拉利巴基斯坦是什么时候收到这封信的。他回到他的办公室以后打电话告诉我，这封信是四月二十三日到达巴基斯坦的。拖延的原因是，它是由信使送到华盛顿的。

周为什么等了那么长时间才和我们联系，那只有揣测了。由于在老挝的作战行动，更早联系会是不慎重的。也许中国人和我们一样，对于最好用哪个渠道有点举棋不定。关于罗马尼亚渠道我们两国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它就是太暴露了，利用这条渠道所必需做到的事情太多了，它的地理位置也太不好了，不适于在最后阶段办理联系事宜，尽管它在前一些阶段帮了很大的忙。中国人还试用过挪威渠道，我们则试图开辟巴黎渠道。要能知道为什么北京不想开辟巴黎渠道那会是很有趣的。也许它高度估计了法国情报工作的效能；也许它担心苏联的渗透；也许它和巴黎的通讯联系不是那么好。也许按古典的中国方式，周恩来等着看看在乒乓外交已给对方明显示意以后，他能否促使野蛮人去请求他发出邀请。我们保持沉默可能使他感到大惑不解，这和他的沉默把我们弄得大惑不解是一样的道理。差一点儿把事情搞僵了，只是我们外表上的稳重才促使中国人作了不得不先迈出一步的姿态；这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寻常的。

我们就这样终于到了一条道路的终点和另一条道路的开端。周恩来的语气热情，表明我们用不着担心受屈辱；以前发来的信息的那种高傲的语气已经弃而不用了。建议举行的会谈的题目仍然是台湾问题，但是重点在于撤走我们的军队而不是放弃我们和台湾的关系。中国人谋求举行高级会谈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恢复和美国的关系。他们特别向总统发出了邀请，不是随随便便口头提出事后可以否认的，而是在正式的信件中提出的。周恩来也不想冒

险让下级人员在“形式”问题上争论不休，因而妨害我们的共同设计。他决定把技术上的安排保留在巴基斯坦渠道内，这就保证了有取舍之权，可以进行高级审议并且可以迅速作出决定。

希拉利只呆了不到二十分钟便离开了我的办公室。我立即去看总统。我在林肯厅找到了他，把信念给他听。没有必要交谈。信本身说明了问题。

还没有过一小时尼克松就打电话把我叫了回去。即使是重大事件最终也要归结为执行问题。我们第一个执行问题是派谁到中国去。本来并没有考虑派我去。我们一致认为派戴维·布鲁斯当这个使节最理想。我在五月下旬确曾同布鲁斯谈过以后可能派他出去的问题。但是，我们后来意识到，由于布鲁斯担任在巴黎举行的关于越南问题的和平谈判的代表团团长，选他当特使中国人可能认为是明摆着的阴谋。我们不希望在这个搭桥阶段出纰漏。（这个判断证明是正确的。我在十月份第二次到中国去时北京不同意布鲁斯参加我的代表团。他们后来改变了主意，欢迎他出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第一个主任。）我们讨论了一长串的其他候选人名单，其中包括乔治·布什和埃利奥特·理查逊。还反复考虑过派纳尔逊·洛克菲勒，可以让艾尔·黑格陪他去。我们发现，在安排秘密出访时，他们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要不是对尼克松的思想了解得不够细致，就是由于他们可能过于引人注目，以致影响人们对尼克松自己出访的注意。尼克松几次提了汤姆·杜威的名字，还大谈特谈杜威怎么能干。不幸杜威再也不能担任公职；他已于几个月以前去世。没有提起过罗杰斯的名字；尼克松决心让人们理所当然地把他看成是对华政策的创始人，而不是国务院，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提罗杰斯。

我们克制住我们的激动情绪，谈论了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尼克松认为，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坚定性为我们在战略上铺平了道路，

虽然在有些场合造成了暂时的拖延。美国只有在亚洲显得强大，中国人才会认真对待。我对总统说，现在形势变了，我们开始见到国际新秩序的轮廓了。我们事实上已按照我们的意图把我们政策的几个不同部分连接起来了："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已经把各部分全都连接在一起了。"我们把对欧洲、对柏林的政策，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在中东的政策全都连接起来了。尼克松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即将宣布限制武器谈判的结果（五月二十日达成协议，同时考虑进攻和防御方面的限制）会不会使中国人感到不快。我认为不会；他们是从大处着眼看问题的。尼克松问，如果宣布九月份和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我们当时仍然认为这是可能的——会不会损害我们对华方面的主动行动。我相信苏联领导人不可能行动这么迅速；他们还在等美国国内在越南问题上的抗议把我们进一步削弱；他们还在力图逼迫我们作更多的让步，作为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谈的代价。我认为，周恩来作了"一个更加精辟的分析"。如果我的这个看法证明是错的，我们无非是决定一下这两个最高级会谈那个先举行罢了。好事太多也会使人尴尬。这是好事情——两年来我们错过了不少好事。

职位高的人常免不了烦恼，失望，打点小算盘。事情并不象公众所想象的那样，一下子就达到了戏剧化的顶峰，而往往是由似乎没完没了的压力、紧张局势积累而成，这期间，每一次问题显然得到解决，到头来却不过是一系列新问题的先导。对领导人性格的考验是看他们在面对着捉摸不定的形势时是否愿意坚持下去，是否愿意为他们既不能说明也不能完全看到的未来有所建树。偶尔有少数幸运的领导人能参加他们认为将是有意义的大事。那天晚上我回家比平常晚一些，到家后我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思绪万千。有两年多时间，我所特别担心的一直是，越南问题使我们举国上下失去了信心，使我们国家逐渐失去维护自由国家和支持争取进步的

巨大能力。正当战后世界分崩离析，迫切需要我们作出创造性贡献的时候，我们却有因为东南亚一角的问题在国内闹到不可开交而大伤国家元气的危险。不管在印度支那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必须在国际关系上揭开一个新的纪元——这个目标，没有举国一致，努力献身的精神是达不到的。来自北京的信息首先告诉我们，尽管有印度支那问题，我们还是有可能使美国人民高瞻远瞩，看到充满机会的未来。现在，再度出现了美国人终于能够由于憧憬着一个更富于建设性的和平世界而开始团结起来的前景。而且事实证明，美国纵然是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拥有办大事的内在力量。两年来，我第一次在激动之余感到悠然自得，内心平静。

第二天上午我和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再度晤谈。尼克松要我把中国的照会念给霍尔德曼听，并说明这个照会的重大意义。尼克松不是不理解照会的意义，他是想一面听我念照会，向这位当年在离乡背井的孤独的日子里一直和他在一起的老亲信谈事情的经过，一面玩味这一取得伟大成就的时刻。这是一个证据，证明我们没有虚度那些孤单、劳累的岁月。

我们又一次讨论了派谁任使节的事，但是还是没有结果。这次是在霍尔德曼跟前讨论的。尼克松仍然担心中国人可能用河内用过的那种策略，邀请反对我们的其他美国政治人物去访问，以此向我们施加压力(这一疑虑他始终没有克服)。我认为他们不会，北京的战略要求和河内的不一样。北京不希望开始同中国搞关系显得是强求；如果美国政府表现得勉强应付，那就满足不了中国要求得到应急保险的需要。中国人认为，华盛顿能对苏联的压力起抗衡作用，中国人希望这个抗衡力量份量很重，而且是自发的。虽然如此，尼克松还是要我设法劝阻北京，不要跃跃欲试地去和他的政治反对派打交道。表示同意照办并不难，而懂得怎么样去办这件事那就难多了。

当天上午过些时候尼克松告诉我，他已决定派我去当使节，要我立即开始做准备工作。他的动机是复杂的。政治领导人对待这种事情总是这样的。只有浪漫主义的外间人才会相信一个在艰苦的权力斗争中占了上风的人会仅凭理性的分析作出决定。尼克松的压倒一切的动机无疑是，我最了解我们的政策；我熟悉我的思想复杂的首长，因而能给他安排好到北京去的访问，使他感到非常舒适。他可以随便地要我制止他的过于热心的先遣人员提出的关于对外联络的要求。另一个因素无疑是，在所有使节人选中，我最受他的管束。我是白宫工作人员，除了通过白宫新闻处外，我无法公开宣传我的活动。我的成功也就是总统的成功。对于广大公众来说，我基本上是默默无闻的；我任职两年半以来从未举行过公开的记者招待会。

当时，我不能说，我感到十分惊讶。我倒感到如释重负，为设计此行忙了那么长的时间，现在我可以善始善终地去办这件事情了。至于尼克松，不管他的动机有多么复杂，而且他明知道他的传统的支持者会感到十分震惊，却敢于使我国战后时期的对外政策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这是值得称赞的。尼克松当时只有他的安全事务顾问从旁协助，没有经过官僚机构审批的正常手续提供的证件，便授权派出使节，如果使节此行失败，必定会给他造成一场政治灾难，会给他的国家造成一场国际灾难。尽管当时的形势对我们有利，但并不能因此减轻他独自作此决定的责任。尽管尼克松通常有信不过别人的习惯，但并不能因此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只有一个刚毅的人才敢于在只有孤零零一个人的陪同下沿着悬崖边行进。

计划和失算

我们等了四个月，不打算立即正式作答，以免显得过于心急。但是，必须很快把决定付诸行动，特别是因为我和尼克松即将要去休假，他到圣克利门蒂，我到棕榈泉去。

我在四月二十八日召见了阿格哈·希拉利，给了他一个临时的答复。我们给中国人的信件在和总统讨论了以后，第一稿由我执笔写成，然后从头到尾地搞了几稿，把艾尔·黑格、温斯顿·洛德的意见和我自己重新考虑的意见吸收进去，最后用打字机打下来再送给尼克松审阅。我所作的记录表明，他没有改动便批准了信件。

我们的临时答复表示感谢叶海亚·汗总统办事过细，考虑周到；感谢周恩来给我们发来的信。我们评价他的信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向前看的。我们将本着同样的精神作答。北京可能期待在五月十日那一个星期得到正式答复。为了把总统担心中国人可能去接近其他的美国政治人物这一点写进去，为了防止中国人因神经紧张而着手开辟新的复杂的渠道，我加上了一些个人的——因此也是可以不承担责任的——意见。我建议叶海亚把这样一个意见作为他个人的意见向周恩来转达：即在官方的联系尚未牢固地建立起来以前，务必只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交换意见。我们希望中国人在我们正式回答他们并且任命了一个特使之前不会再提出其他倡议。这并不妨碍加紧进行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学生、记者、学者的交往——这些是我们十分欢迎的。我强调说，不要把这个意见作为美国官方的主张，而是作为叶海亚对我们态度的个人估计来转达。我毫不怀疑周恩来会理解其中真意。五月五日，巴基斯坦人通知我们，所有的信息都已于五月一日传递给了中国人。

也正是在这一天，破坏性的示威游行力图使华盛顿陷于瘫痪，据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宣称，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说服政府必须为争取和平而努力。

但是，在这个信息能够到达北京之前，我们奇怪的政府制度却造成了一个使整个事情复杂化的失算；这个失算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害确实证明中国领导集团谋求同我们和解的决心有多大。国务院当然不知道当时正在传递的信息——虽然很可能已经感觉到，从乒乓外交和我们要求国家安全系统所作的许多关于对华政策的备忘录看，即将发生某种大事。明确归国务院管的对华政策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它以政治特权受到伤害的心情狠抓了这个问题。

国务院正确地估计到，我们一贯的主张在联合国中所得到的支持愈来愈少，因此，它急于设计出某种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又不驱逐台湾的方式。它图谋既讨好当时正在折磨我们的国会中的自由派，而又不得罪保守派，更不要说早先得到“援华院外集团”很大支持的总统了。因此，它提出了若干方案，这些方案的共同特点是：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表示反对；只有为数不多的新闻记者和国会议员表示赞成。一个是“普遍派代表”方案，即一切分裂的国家的两部分都应由联合国分别接纳。这和两个中国的解决办法差不多，而两个中国的解决办法是台北和北京都坚决反对的。这个方案当时也会引起南朝鲜和西德的反对。另一个方案是：只要有多数票，即可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安全理事会的席位给它，台湾则在大会中保留某种不作明确规定的地位（在程序上规定，驱逐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这对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也都是不可接受的；只有在国内批评我们的对华政策的人才认为它是可以接受的。也许它能使我们在大会里再混过一两年。国务院已有好多个月一直在力促总统就采取什么做法作出决定，

因为争取别国支持我们选定的方案需要时间。我在总统的同意下采取了延期作决定的办法，因为我不想在这个挑衅性的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上危害我们新的对华政策的还不牢靠的开端，而且这类问题反正会被我们同北京的关系的演进甩到后面去。

从我们对华政策问题辩论的理论性质所反映的情况看，许多专家还是那老一套的想法，认为联合国问题的“解决”是改善我们同北京的关系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而中国通过哪个渠道也没有提出过这么一个论点；中国人发来的信息，连提都没有提出过联合国问题。国务院在得不到总统的裁决的情况下，公开提出了它的理论主张，以便插足于官僚们的辩论之中。四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宣布说，我们认为，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将来要在国际上求得解决”。这一论点，中国争论的双方都拒绝接受，因为双方都认为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主权国家的一部分。国务院发表这个声明的目的是使我们能为联合国接纳北京同时保留台湾在大会里的席位这一主张奠定法律基础。四月二十九日，国务卿罗杰斯在伦敦出席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部长级会议时，在电视上发表谈话，宣称，埃德加·斯诺在《生活》杂志上报道的毛泽东邀请尼克松去访问是“随随便便地提出的”；他认为，那不是“当真的邀请”。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罗杰斯还说，中国的对外政策在许多方面都是“扩张主义的”；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一直“相当偏执”；如果我们努力改善和苏联以及和中国的关系刺激了它们永世结仇，那是一种“红利”。不过，他又说，这不是我们的目标。罗杰斯又说，要是尼克松按照东亚司一直力促他遵循的路线前往中国，那有可能是“殊途同归”，但有一个条件：中国必须无条件地参加国际社会，并遵守“国际法规”。

罗杰斯并不知道我们和中国交换意见的情况，因而造成了混乱，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但是，并不能因此减轻他

的谈话的影响。他的谈话对我和尼克松简直是晴天霹雳。我们担心北京可能把罗杰斯的谈话理解为对它的信息的答复，或得出结论，尽管它在许多个月以前便告诫美国不要把它向我们开放当作软弱的表现——事实上那些感到自己是强大的国家是很少说这种话的——我们还是认为中国对压力是敏感的。中国人显然担心我们的要求会层层加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就可能故态复萌，再次陷于阴郁的孤独状态，或发表好战的长篇大论的声明以表明他们是不怕压力的。我们需要发出一个使他们放心的信息。但是，使巴基斯坦渠道超过其负荷量是不明智的。况且，拟定一个否认国务卿的谈话的文稿是不容易的，那样做将会害多利少。尼克松在四月二十九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尽可能地作一些纠正工作。他表明，在我们对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的态度上，并没有作出什么决定。他列举了人们向他提出的各种建议，其中既有两个中国的解决办法，也有只承认一个代表的解决办法。这是他在不公开否定他的国务卿的讲话的前提下所能说到的程度。在尼克松的谈话中用和解的语气提到他可能访问中国。这段话在北京听来比在华盛顿听来更有意义："我希望，事实上是预期，在某个时间以某种身份访问大陆中国，以什么身份出访我还拿不定主意。"尼克松的这个做法是很巧妙的。

中国五月四日的一个广播说明中国人对我们官僚们的鬼把戏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国务院所说的台湾地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被谴责为对中国内政的"无耻干涉"，是一种"以中国人民为敌的"行动。北京着重地宣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又说："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说：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新发展"，但又说，尼克松政府改善中美关系的行动是个"大骗局"，是企图"捞取政治资本，摆脱它的孤立地位"。这个广播警告我们不要逼人太甚；但是，事实上并没有打

断我们的信息来往。

这是由于中国的行动自由也受到了限制。我们双方的官方也许动不动就打呃，但是在中国边界上那几十个师的军队是苏联的军队。苏联人又调了新的部队到蒙古边界，使总兵力达到四十四个师。中国人也大量增加了他们的地面部队。苏联和中国之间的边界谈判陷于僵局。勃列日涅夫在和一个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对中美关系所取得的进展表示十分关注。一个苏联电视评论员在四月二十五日评论中美关系时说，“压力对苏联不起作用；这样一种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凡是自称不为压力所动的国家，要不是吹牛就是很走运，它从未受到过压力。

我继续着手计划到中国去访问的工作。我到棕榈泉去休假时带了一大包关于中国哲学、历史和艺术的书去。温斯顿·洛德负责准备介绍情况的材料。他的美丽、媚人又聪明的中美混血妻子贝蒂生在上海，她父母原来在大陆，但和台湾有密切的关系。温斯顿为了执行任务必须向贝蒂保密，这对他来说是件十分苦恼的事。温斯顿到处张罗，对每一个他设想可能出现的问题都作了一大本一大本的记录。

为了开始作技术上的安排，我在五月三日通过秘密渠道向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约瑟夫·法兰发了个信息：

> 为了只有总统和我知道的非常敏感的原因，总统希望你找点个人的……借口，立即返回美国，以便你能和我会谈。我们的会谈必须完全保密；会谈的性质，除总统、你和我自己以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我意识到这个信息会给你带来困难。但是，我确信你会认识到，总统重视我们的会谈，这是压倒一切的考虑。我们会谈的题目不要求你作任何准备。

感到迷惑不解但为人忠诚可靠的法兰乘飞机到洛杉矶，他对

他的上级说，是为了办点“私事”；我派了一架朋友的私人飞机把他从那里接到棕榈泉。五月七日，他和我在我当时住的那所私人住宅里举行秘密会谈。我们在一块谈了三个小时，然后法兰返回洛杉矶飞机场；法兰曾到棕榈泉来过是根本无案可查的事。

在那个时候我们幸亏有这么一位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他不是一个正规的政府外交官员。如果他是个老牌外交官员的话，他决不会未经“亲自”向华盛顿他所属的部长们发信请示，保险自己不出问题便响应我们的要求。而且法兰这个人办事扎实而能干，也很认真。他是那么巧妙那么慎重地为我这次出使作好复杂的安排。五月七日，我在棕榈泉和他一块回顾了我们和北京的一切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递的来往信息。我告诉他，此行的技术安排应通过他作，以避免由于这么复杂的材料经过太多人手所可能造成的误解。法兰可以利用他使馆的工作人员去深入考察一下一些安排是否切实可行，只要他不告诉他们这些安排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在这一点上，我的想法是在巴基斯坦或在中国华南的一个方便的飞机场和中国代表会晤。我对法兰说，凡是我通过希拉利发给叶海亚的信息我都让他知道。我指望他在我呆在巴基斯坦的时候管束住他使馆的人员，并使人觉得我“为掩人耳目”而编的那一套是真的。

法兰建议在中国举行会谈，让中国人偷听比让巴基斯坦人偷听要好一些，因为中国人反正要做记录。我对法兰说，我准备通过我国驻卡拉奇海军武官设立一条海军秘密渠道；在柏林谈判期间，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小埃尔莫·R·朱姆沃尔特海军上将曾为我设立过一条类似的渠道，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后来，我们发现海军的渠道太不方便了。在赫尔姆斯的合作下，我们通过中央情报局订立了一个有效的制度。）

在那些日子里，搞秘密渠道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秘密渠道

把每一个官僚机构都排除在外，可它却把使用它的人变成了另一个官僚机构的人质——直到我们终于能够建立起直接以白宫为起点不通过其他机构的渠道为止。秘密渠道基本上是一种通信系统，它设法绕过正常的程序；不过总得有人提供方便才行。通常被排除在外的对象就是国务院，因为国务院自己甘当技术和习惯的牺牲品。从技术方面来说，那是因为它的电子计算机组按照预定的程序自动地把哪怕是最敏感的电报也分发到整个国务院大楼；从习惯方面来说，那是因为外交官们是靠互通情报过活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巧妙办法来摆脱那些限制性的规定。因此，连国务院都设立了它自己内部的秘密通信渠道，而且几乎每一个现代的总统都想办法避开国务院的正式的通信联络系统。赫尔姆斯懂得如何限制电报的来往；他对秘密渠道的掌握是慎重的，也是胜任愉快的。

我把我已计划好了的出访路线概括地告诉了法兰。我将从华盛顿出发作一次“了解情况”的出访，我将访问西贡、曼谷、新德里、伊斯兰堡和巴黎。我预定在每一个停留的地方都举行许多了解情况的会议，但不举行新闻发布会。我的飞机上不载新闻记者。我希望，等到一个星期以后我到达伊斯兰堡的时候，记者们从我身上采访新闻的兴趣已经不大了，因为当地的记者对我的这一套已十分厌烦，而且也没有发多少消息。法兰告诉我常驻伊斯兰堡的只有一名美国记者。

我和法兰商定，最有效的计划是：我将于星期五上午到达巴基斯坦。法兰将安排我一整天的活动，既在大使馆又在巴基斯坦政府那里进行。如果叶海亚总统同意，他可以请我到某一个合适的幽静的地方度周末，比如说开伯尔山口或某一个山上站头。我将让我的飞机停在飞机场一个显目的地方。我将乘一架预先停放在巴基斯坦的美国、巴基斯坦或中国的飞机到中国去。等我们知道

会谈地点并对可行性进行了深入研究以后，我们就会作出最后决定。在我不露面不超过三十六小时以后，我将引人注目地重新露面，然后往西行进，到巴黎去。法兰认为这一切都是办得到的；他答应一回到驻地便马上和叶海亚联系。我对他说，我会把法兰所担负的任务通知希拉利。

五月份和六月份有好些机会使我们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可以再向前迈进一步，并发出令人鼓舞的信号。五月七日美国国务院、商务部、财政部和交通部公布了执行白宫于四月十四日所宣布的放宽对华经济限制的规定。财政部取消了在对北京的交易中使用美元或美元票据(在限制性帐目中使用的票据除外)的管制。这么一来，中国血统的美国人现在可以把美元汇给在大陆的亲戚了。挂着外国旗的美国船只也可以在大陆中国的港口停泊了。挂美国旗的船只从此以后可以把从美国启运的货物经非中国港口运到大陆去了，也可以从一个非共产党港口启运到另一个非共产党港口去。

五月九日，我在棕榈泉休假后回到华盛顿，我已把给周恩来的上一封信的回信拟好。尼克松第二天上午批准照发，我在中午把这个没有签字的信交给希拉利：

尼克松总统仔细地研究了周恩来总理委托叶海亚·汗总统转来的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信件。尼克松总统同意，为了解决把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分隔开的问题，有必要举行直接高级谈判。因为尼克松总统十分重视使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他准备接受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请他访问北京以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直接会谈的建议。在这样一种会谈中，每一方都可以提出它所关心的主要问题。

为了给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作准备，为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建立可靠的联系，尼克松总统建议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初步的秘密会谈。基辛格博士准备在中

国国土上参加这样的会谈，地点最好是在巴基斯坦方便的飞行距离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基辛格博士将被授权讨论使尼克松总统的访问成为最有益之举的环境条件、这样一次会谈的议程、进行这种访问的时间，并开始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初步交换意见。如果认为，在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克松总统到达之间这段时间公开派一特使到北京是可取的，基辛格博士被授权作此安排。预期，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在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秘密会谈后不久即可宣布。基辛格博士准备在六月十五日以后来。

我们建议，基辛格博士此行的具体细节，包括地点、停留的时间多长、通信联络以及类似的问题通过叶海亚·汗总统作为居间人进行讨论。为保密起见，务必不用其他渠道。同时，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会谈要绝对保密。

后来，我们了解到，中国人对我们希望保密这一点疑心很大；也许他们以为这是一种使我们可以很快根本改变方针的计谋。中国人既谨慎小心又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保守机密。*现在要清楚地追忆美国和中国在那些日子里互不理解的感觉已很困难。除了在华沙会谈中作一些形式主义的发言以外，我们一直和中国领导机关没有任何一种联系。本书中所引述的信息不折不扣地是我们唯一的来往信息。因为中国领导人不喜欢闲谈，大多数驻北京的西方外交官往往好些个月都见不到任何重要的中国官员；除了在纯粹为了庆祝的场合，这些西方外交官很少有人能遇见一个高级的中国领导人。因此，我们连友好国家政府之间偶尔互相交换的珍闻都没有传到我们耳里；我们对于在北京会碰到什么心中无数。

此外，我们知道，如果在访问之前先发表公告，那些想要得到一系列让步的人和那些要我们保证寸步不让的人就会对我们两面

---

* 埃德加·斯诺后来写道："只有一件事使中国人感到惊奇：基辛格先生成功地保守了他访问的机密。中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过和美国外交官相处的经验，这使中国领导人确信，美国人是保守不住机密的。"⑨

夹攻。别的国家会要求向它们说明会谈情况并作出保证，而会谈的议程不过是容许各方提出它认为重要的问题而已。所有这一切就都会成为公开的了，而且这些情况又会回报到一个我们只能通过第三方才能进行通信联络的首都。一些国家可能用先发制人的办法阻止我们去访问；另一些国家则可能设法破坏它。这样，两年多来煞费苦心培养的这棵嫩苗就很可能被掐死。中国人还是及时地理解了我们的情由；我现在毫不怀疑，第一次出访的保密成了踏踏实实地按部就班地改善两国关系的一种保证。

照会的最重要部分是我们正式接受总统访问北京的邀请。我们强调要保密，但也设法使中国人放心，同意访问过后可以立即宣布，还同意在尼克松访问之前派一特使第二次公开地进行访问。我们强调说，我们不能同意只讨论台湾问题；应规定每一方都可以“提出它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北京在五月十七日收到了这个信息。

五月二十日，经过好些个月的讨价还价以后，美国和苏联宣布在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中在程序上有了突破。在这以前，苏联人一直坚持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只讨论限制反弹道导弹；现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同意，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同时讨论限制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尼克松一直担心这可能会使中国人感到不安。我倒不那么担心——显示我们左右逢源往往是一种本钱——我倒认为这是向北京表明同美国联系有好处的好机会；我们可以直接向中国人保证，宣布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结果并不含有美苏合谋主宰世界之意。经总统批准，我把这个正式发表的一份预发副本发给法兰，由他交给叶海亚转给中国人。同时附有一个信息向中国人保证，我们“不会缔结把矛头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协定”，保证在我即将进行的秘密访问中我准备讨论“这个问题和有关的问题”。

正当我们等待北京答复的时候，我们发现不只是我们才有这

种冒冒失失的官僚。五月二十六日，哈佛大学的一个老同事给我打电话，很激动地告诉我，他在前一天到过渥太华；那里的新建立的中国使团的成员抱怨说，尼克松曾被邀请去访问中国，但是他不愿意去。这是一个奇怪的信号——令人疑信参半的信号；了解事情的整个经过的一个中国官员必定知道，美国已经对邀请作了肯定接受的答复。这也是一种警告——不论是有意或无意——它表明，如果这个主动行动告吹，中国人能公开地采取什么行动来对付我们。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自己处于未能利用机会改善中美关系的守势地位。我决定把总统可能去访问的事，说得无关紧要，并建议这位哈佛大学教授在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到达任所时安排一次我和他的会谈，以此来说服这位教授。

五月三十一日，我们从希拉利那里收到一个激动人心但又很含蓄的信息：由北京发出的一个很长的信息正在由一名巴基斯坦的信使传送过来；希拉利只是简略地被告知这个信息内容。这个信息显然是很鼓舞人的；希拉利相当肯定，中国人接受了我们建议的主要内容。我们焦急地等了那位巴基斯坦信使两天。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图谋的国务院急于开始在联合国就中国代表权问题争取选票，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可它偏偏在这个时候力促总统对它修改过的两个中国的方案作出决定。所建议的办法是，国务卿在快到六月底的时候发表一篇演说。这是最糟不过的时机了；这也表明，我们政府的两个渠道这种制度是漏洞不少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尼克松本来是非作解释不可的，但是他决计不正面应付他的国务卿。因此，他直截了当地在六月一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在七月十五日以前他不会就中国代表权问题作出决定。这个日期的选定不是偶然的。从伊斯兰堡来的那个信使终于到达了。希拉利于六月二日下午八点十分带着周恩来的答复急急忙忙地进来找我：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十七日和五月二十二日的口信，并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其中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不言而喻，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首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美国武装部队如何具体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全部撤走的问题。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为美国代表先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

周恩来总理建议，最好由基辛格博士在六月十五日到二十日之间选定一个到达中国的日期；他可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至于飞行方面，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我当时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简直是难以形容。周恩来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即每一方都可以提出它所最关心的问题；这就保证可以讨论我们最感兴趣的全球性的问题。周恩来再次以最容易获得解决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轮廓：撤走美国军队。如果中国领导人不是很愿意，甚至急于根本重新估价中美关系的话，那他们是不可能做到这样的程度的。

我从我在白宫西侧的办公室走到正厅去通知尼克松总统。尼克松正在宴请尼加拉瓜总统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我告诉站在国宴厅外面的那个随从武官，务必请总统尽快出来见我一会儿。我一面等候一面在大厅里来回走了几分钟。总统大约在九点半钟出来。我把信息的内容告诉了他；他兴高采烈地把我领到林肯厅，找到了一种白兰地酒和两个玻璃杯，然后举杯祝贺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尚待取得的成就。我记得尼克松的祝酒词是这样的：“亨利，

我们现在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或我们的成功，也不是为了祝贺使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几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现在所做的事而有更好的机会过和平的生活。”⑩我想起来的这个祝酒词不是十分精确的；也许这么兴高采烈地祝酒未免太早了一点。但是，我所引的这段话准确地反映了这么一种情绪和重新点燃起来的这样一种希望：在摆脱了令人沮丧的战争所造成的怨恨和分裂之后，我们举国上下对国家的前途又有了新的信心。

两天以后，在六月四日下午，我把我们给北京的回信——由我和温斯顿·洛德搞了许多稿以后写成的——交给希拉利。在这个信件里尼克松总统表示感谢他们对我去访问所表示的热烈欢迎。“由于时间短，以及基辛格博士需要为他的旅行找个合适的借口，他现在发现在七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以前不可能离开华盛顿。因此，尼克松总统建议基辛格博士于七月九日到达中国，于七月十一日离开，他将乘巴基斯坦的一架波音飞机从伊斯兰堡直飞北京。”（后来是按照这个日程到达的。）我们的信件对中国人愿意保守秘密表示感谢，并再一次提出授权我就不久以后发表新闻公报事宜作出决定，“如果有此共同希望的话”。我们之所以选定七月九日这个周末是因为罗杰斯计划七月份再过些时候到伦敦去；我们不能在国务卿正在外面旅行的时候宣布总统将访问北京。

六月十一日，周恩来写了一个简短的通知，同意接受七月九日这个日期；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对他来说是相当不便和尴尬的，因为北朝鲜总理金日成原定在这几天访问北京。叶海亚·汗当时正为处理东巴基斯坦的问题日夜操劳，本来很不开心，但执行这个使命的精神却使他兴高采烈。六月十九日，希拉利带来了叶海亚的一份书面照会：“北京的上次那个信件似乎已最后把事情确定了。请我们的朋友放心，我们一定作好绝对可靠的安排，他在这方面不

必有任何顾虑。”

我们现在是大局已定，剩下的问题是落实到行动上了。第一个问题是使国务卿相信，我确实需要到亚洲各地去进行一次漫长的“了解情况的访问”。这是我作为安全事务顾问自己安排的第一次到国外去访问。他不大愿意，这是可以理解的。眼巴巴看着我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左右华盛顿制定政策的过程已经够痛苦的了；要同意让我开始插进来，掌管对外政策在海外的执行，那就更痛苦了。事实上，我完全谅解他的反对态度。国务院本应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对外政策中心；如果总统不信任他的国务卿，他可以撤换他，而不应当让他的安全事务顾问去代替他。如果总统不信任国务院，他应当用行政命令强使它照办，而不应当利用国家安全机构对它处处设防。从理论上说，这些基本道理固然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但付诸实施就不那么容易了。要使政策基本上做到前后连贯，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务卿，这个国务卿不仅要在正式场合，而且要在一切细节上都愿按照总统的意图去做。这两者兼而有之的国务卿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在近代，往往缺少这种或那种品德。

一九七一年六月间，我不是以那么超然的观点去看待这个问题的。不管怎么说，这种高明的见解总解决不了我们当前的实际问题。因为在中国人接受了七月九日这个日期以后，我们就只好这样干了。尽管国务院抗议说，鉴于东巴基斯坦的动乱所造成的紧张局势，我去访问印度次大陆的时机很不好，而且可能会引起误解，那也没有关系。我曾短暂地探索过从冲绳岛上的美国空军基地进入中国是否可行，但是很快就决定，这对北京来说会是个令人不愉快的象征，而且也犯不着未经征询日本政府的意见便擅自从我们已承认的日本领土秘密出访，因而使日本政府受屈辱。尼克松不愿意直接下命令；他委派霍尔德曼去说服罗杰斯。国务院终

于勉强地收回了它对此行的反对意见。至于怎样把我的最后目的地通知罗杰斯，总统想了个很好的主意，他把罗杰斯请到圣克利门蒂去，在我出访亚洲的大部分时间都把他留在那里。这样，他就能够在最理想或至少控制得最好的环境下把消息透露给他。

另一个复杂的情况是，就在我预定要到北京去这个时间，美国政府的全部高级官员似乎都迫不及待地要去漫游台湾。首先，我们不得不劝阻副总统阿格纽，请他不要去作等待已久的对蒋介石的访问；我们安慰他，请他周游世界，把重点放在中东和非洲。还有梅尔·莱尔德也打算正好我在北京那几天去视察在台湾的防务设施；他已经作好了计划要到日本和朝鲜去同盟国的国防部长会谈。莱尔德是个组织纪律性很强的军人；他没有询问我要求他改变日程的原因，便主动重新安排了他的日程。

而由于安排这种种公费旅行的事，没有为我出访留下一架总统座机。总统到圣克利门蒂去要用两架飞机；阿格纽又要了一架；还有一架政府要员的座机又给莱尔德要了去。我们终于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一架战术空军司令部的指挥飞机，飞机上装满了电子设备，坐在上面非常不舒服，那架飞机引擎太旧了，它要求很长的跑道。在起飞的时候，它给人这么一种感觉：好象它宁可取道陆路到达目的地似的。

正当各种技术性的和官场里的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时，发生了一件事，这在我启程去执行任务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那就是公布了所谓的五角大楼文件。在我们奋斗了好几个月建立起一条通往北京的秘密渠道，又克服了许多障碍和疑心之后，突然公布了七千多页的秘密文件，使政府受到很大震动。当然，这些文件丝毫无损于尼克松的总统地位。的确，在白宫的政治工作人员中存在着一种情绪，想利用这些文件来说明我们的前几任总统所搞的阴谋诡计，以及我们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的困

难。但是，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态度似乎违背了公众的利益。如果每一位总统都利用他对于取消保密所掌握的权利来诽谤他的前任，或者他对于维护保密制度的取舍之权竟成为一个党争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永远不可能有其他国家必须信赖的连续性，我们的政府制度肯定会完全失去信誉。这些文件的公布是经过选择的，是片面的，显然是想把它们当作政治战的武器使用。它不公平地损害了象约翰·麦克诺顿这样的人的个人名誉。麦克诺顿是一个杰出的公仆，据我了解，他基本上是反对战争的，但却在五角大楼的文件中被描绘成了一个罪恶的战争贩子。在一九七一年的时候他已不能活着为他自己辩护了，他已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和他的家人同归于尽。

我们当时感到十分担忧的是，北京可能得出结论说，我们的政府太不稳定，太容易受干扰，太不可靠，不是一个可靠的伙伴。大量地泄露政府机密，必然会引起其他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的政府对我们的可靠性的怀疑，甚至对我们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的怀疑。刚好在这时候，我们正在和北越人进行秘密会谈，我们还以为会谈快要有所突破——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中正处在重要的节骨眼上。我们还处在微妙的柏林谈判的最后阶段，其最后结果如何也要看能否保密。

我不仅支持尼克松反对这种大规模盗窃机密和未经批准擅自公布机密的行为，而且还鼓励他这样做。我们曾向法院提起公诉，以便根据民法下令禁止公布这些文件，但未获成功。（这个主意不是我出的，但是，我并不反对这样做。）我不知道后来所采取的步骤，那些卑鄙、幼稚和无益的举动终于导致尼克松政府的垮台。我认为那些做法是不可宽恕的，但我仍然认为盗窃和公布政府文件的行为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公布五角大楼文件这件事并没有阻碍我们向北京表示我们的意愿。但并不因此改变这个原则。

我们当时不可能知道这一点。那些盗窃文件的人也没有考虑到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甚至没有注意这一点——他们的目的毕竟是破坏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我们只能揣测我们那样大力维护保密的原则到底是使北京放心还是它认为这无关重要。

经过情绪激动的几个星期以后，我们秘密出访的日期快到了。我选择了我的伙伴：约翰·霍尔德里奇，他是职业外交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中分工管东亚问题的中国问题专家；迪克·斯迈泽，也是职业外交官，在我的工作人员中分工管越南问题的专家；温斯顿·洛德，以前曾在国务院和国防部工作，现任我的特别助理，主管最敏感的问题，他是我信得过的亲信和密友。

我一向相信，谈判的秘诀是做好过细的准备工作。谈判代表不仅应当知道所谈的问题的技术方面，而且应当知道其中的细微末节。首先，他必须对他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途径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他必须研究他的谈判对手的心理和目的，并决定是否和如何把对方的目的和他自己的目的调和一致起来。他必须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因为迟疑不定的印象会招致对方的含糊其词或寸步不让；在谈判桌旁如果还需要经常去查阅文件就有损谈判的权威。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和我的伙伴们六月十九日到二十日跑到比斯坎岛去度周末，以便熟悉介绍情况的文件，这些文件已经重写过许多次——在我们出发之前还要重写几次。（我常常跟人谈起一位哈佛大学教授的一件轶事。这位教授要求一个学生写一篇期终论文，要他连着写了十稿，每写一稿他都退还给那个学生，在上面写上这么一个问句："你不能比这个写得更好了吗？"。这个学生写完了第十稿以后气愤得感叹道："不，我不能够比这个写得更好了。"那位教授说，"既然是这样，我现在可以看看这篇论文了。"虽然这不过是一段轶事，我的工作人员还是相信，他们是本着这种精神干的。）在一大本一大本的介绍情况的文件中，包括有关我预料要和

周恩来讨论的题目的资料。这些题目是：印度支那问题、对苏联的关系、印度和巴基斯坦问题、贸易和交流、台湾问题和被监禁在中国的美国人问题。这些文件论述了已知道的北京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并概括地提出我应采取的立场。（这些材料大部分取自我下令在国家安全系统内所作的那几个部际研究报告。）有一篇稿子是会谈的开场白，还有一篇是关于此行的目的和要采取的战略的概论性的文件。多次写这些文件使我自己的思路更鲜明了。这些文件可供总统审阅，使他有机会批准这一做法并使之定形。

在集中精力作准备的那个月里，我们也还要照顾到三角的另一边。六月八日，我把阿纳托利·多勃雷宁领到戴维营漫谈美苏关系问题。多勃雷宁心平气和地对我说，苏联并不反对我们逐步地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他甚至告诉我苏联是怎样估计各个中国领导人的。至于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他继续玩弄他那套捉迷藏的游戏。莫斯科最高级会谈本来暂定于一九七一年九月举行，现在由于苏联图谋在其他谈判中，特别是在柏林谈判和欧洲安全会议的谈判中索取更多的让步，以种种借口顺延。不过，手里拿着对方根本不知道的牌是很值得欣慰的。我对多勃雷宁说，我们已经探索了十四个月时间，看来确定召开最高级会谈日期的时间已经到来，他当时必定又一次断定，跟他打交道的这个人缺乏耐心，很可以利用。事实上，我才不忙于要举行最高级会谈呢。我只不过是想确定一下即将举行的这两次最高级会谈的先后次序而已。我稍为倾向于先举行北京最高级会谈。要是他当时回答说，赞成早日举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话，那倒是给我们造成一个棘手的问题，难于确定先举行哪一个最高级会谈了。苏联人无意中又为我们解决了问题。我曾经设想，如果我突然告诉他，一个月以后我打算到什么地方，多勃雷宁会作何反应。

六月十日，白宫公布了按照总统四月十四日的决定从对华贸

易出口管制项目单上撤销管制的项目单子。龙·齐格勒所发布的一项新闻公报宣布，正在使种类繁多的非战略货物从此以后可以向中国出口；二十年来，也是第一次许可中国商品向美国进口。这项公报指出，在对华关系上，我们“以后会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可能性”。本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以来对中国所施加的单方面的限制现在已经大部分解除了。发信号的时期正在告一段落，下一步就是谈判了。

六月二十八日，《纽约时报》登了一条马路新闻，把我列为将来出任美国驻北京大使的可能人选。比尔·罗杰斯认为这条新闻很可笑。我跟他开玩笑说，也许是国务院故意泄露机密，以便把我弄到远离华盛顿的地方，愈远愈好。罗杰斯也拿我逗趣说，如果你真愿摆脱在华盛顿的种种烦琐事务，到那里去倒是个好差司。我表示同意。我说，我喜欢吃中国菜。

六月三十日，白宫新闻秘书在他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公告：尼克松总统即将派我于七月二日至五日到越南南方去执行调查事实的任务。随后我将到巴黎去和戴维·布鲁斯大使进行磋商；在我到巴黎去的途中，我将在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和官员们会谈。此外，为了转移经常从河内那里得到情报的苏联人的注意力，我安排了同黎德寿的又一次秘密会谈，于七月十二日在巴黎举行。这么一来，在我的日程表上就没有什么漏洞引起人们的疑心了。

七月一日那天黎明时分，我和我的同伴们终于乘一架拥挤不堪、坐上去很不舒服的飞机动身去作我们一生中最重要不过的一次旅行。

① 罗杰·莫里斯著：《不一定伟大》（纽约，哈珀与罗氏出版公司，一九七七年），第九七页。

② 见一九七〇年六月十八日《纽约时报》。

③ 埃德加·斯诺:《中国将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会谈》,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日《生活》杂志,第二四页。

④ 一九七〇年十月五日《时代》周刊。

⑤ 理查德·尼克松著:《尼克松回忆录》(纽约,格罗斯特和邓洛普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第五四六页。

⑥ 尼克松的记录说,"在毛泽东发表谈话后没有几天"(《尼克松回忆录》第五四七页),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谈话。我看了我所作的记录以后相信,直到《生活》杂志于一九七一年四月三十日发表了毛泽东的谈话,也就是在乒乓插曲以后,我和尼克松都才知道毛泽东的谈话。在我的记录中,最早提到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是在国务院一九七一年四月一日的一个低级官员的报告中,报告的大意是: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表示对台湾问题有所松动。斯诺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日再度在《生活》杂志上撰文谈这个问题。尼克松所说的想必是指,他在我秘密出访之前已知道毛泽东的谈话。这是对的。

⑦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合众国际社发表的阿诺德·迪布尔的一篇报道谈到这一点。

⑧ 我国驻东京大使阿明·迈耶谈到这件事,并公正地表扬了坎宁安当时所起的作用。阿明·H·迈耶著:《出使东京:一个大使的纪事》(印第安纳波里斯,鲍勃斯—梅里尔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第一三〇——一三一页。

⑨ 斯诺:《中国将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会谈》。

⑩ 《尼克松回忆录》,第五五二页。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未命名图书
作者＝
页数＝397
SS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